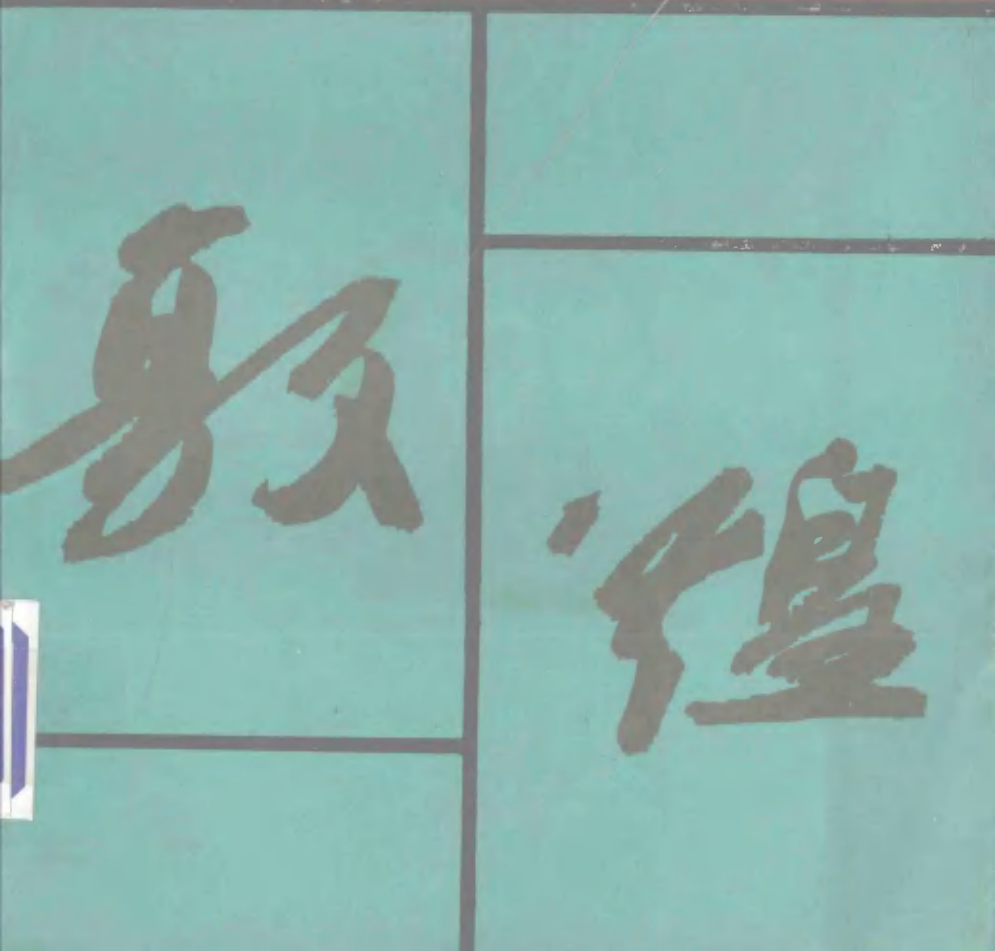
敦煌學述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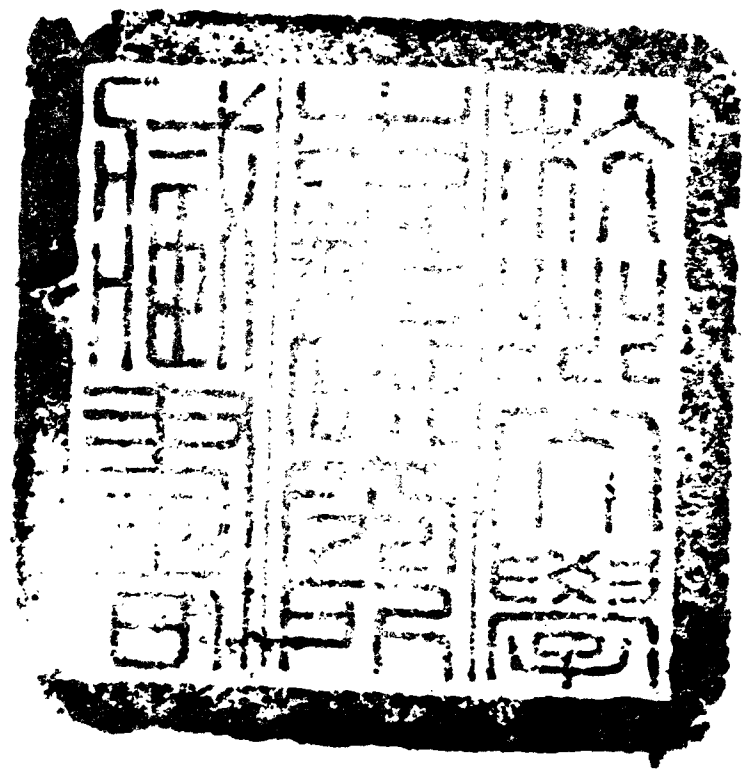
刘进宝

甘肃教育出版社



敦煌学述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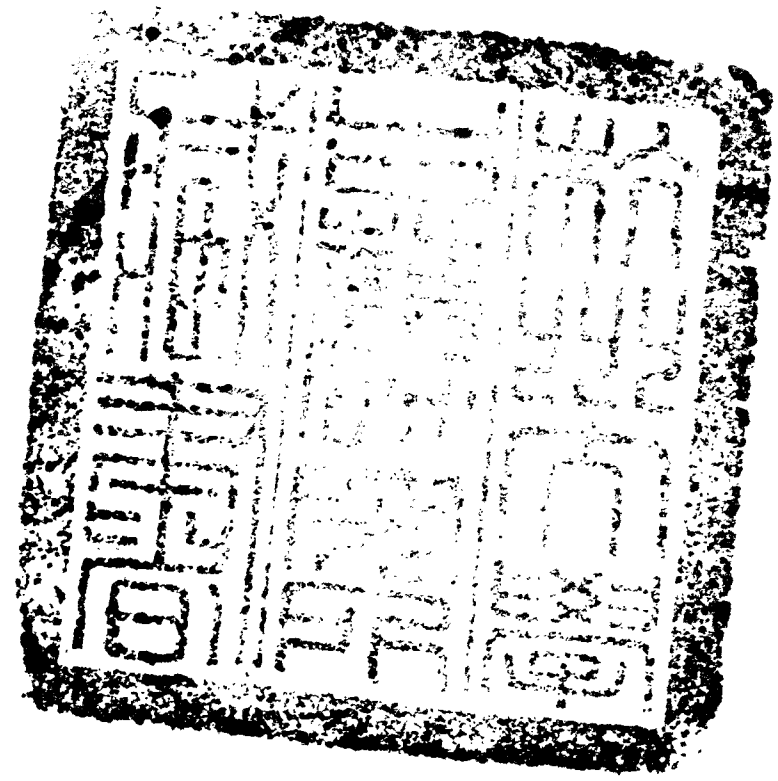
刘进宝



00007940

甘肃教育出版社

目录



引　言：何谓敦煌学……（1）

第一章　千载沧桑话敦煌……（1）

一、敦煌一名的由来……（1）

二、汉代对敦煌的开拓和经营……（6）

1、汉代对敦煌的开拓……（7）

2、敦煌郡县的设置……（9）

三、华戎所交一都会

——敦煌艺术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13）

1、学术文化的发展……（13）

2、佛教活动的兴盛……（19）

3、佛教艺术之花的绽开……（23）

四、丝绸路上的一颗明珠

——隋唐时代的敦煌……（25）

1、经济的高度发展……（25）

2、中西交通的兴盛……（30）

3、辉煌灿烂的莫高窟艺术……（34）

五、吐蕃的统治与张议潮起义……（37）

1、吐蕃治下的敦煌……（38）

2、张议潮起义及归义军的建立……（43）

3、渐趋衰退的敦煌艺术……（49）
六、孤悬西陲的归义军……（51）
1、张氏政权的艰难统治……（52）
2、西汉金山国与敦煌国……（55）
3、曹氏的继续统治瓜沙……（59）
4、“日落西山”的莫高窟艺术……（63）
七、丝路的衰落与敦煌的沉寂……（67）
1、丝绸之路衰落的原因……（67）
2、渐趋沉寂的敦煌……（70）
3、已近黄昏的莫高窟艺术……（72）

第二章　艺术瑰宝千佛洞……（76）

一、莫高窟的创建与编号……（76）
1、莫高窟之名称……（76）
2、乐僔法师与莫高窟的创建……（78）
3、研究敦煌的锁钥——莫高窟编号……（80）
二、墙壁上的图书馆
——敦煌壁画概述……（82）
1、敦煌壁画的内容……（82）
2、形象的历史……（86）
三、彩塑艺术的杰作……（90）
1、丰富多彩的敦煌彩塑……（91）
2、敦煌彩塑的制作方法和特点……（94）
四、飞天新装挥舞迎
——敦煌的飞天艺术……（98）
1、敦煌飞天的产生……（98）
2、飞天的发展变化……（100）
3、敦煌飞天的艺术风格……（103）

五、反弹琵琶伎乐天
——敦煌的乐舞艺术……(106)
1、敦煌曲谱的解译……(106)
2、名目繁多的乐器……(110)
3、千姿百态的舞蹈……(113)
4、令人费解的舞谱……(116)
六、人间天国多楼台
——敦煌的建筑艺术……(119)
1、古建筑实物……(120)
2、壁画中的古代建筑……(121)
第三章　扼腕愤谈伤心史
——敦煌遗书与文物被盗记……(126)
一、震惊世界的大发现……(126)
1、藏经洞遗书的发现……(127)
2、土地庙遗书发现记……(132)
3、大胆的推测……(133)
二、千古之谜谁解说?
——敦煌藏经洞封闭之谜……(135)
1、藏经洞原为洪谨(音辨)影窟……(135)
2、藏经洞封闭之谜……(137)
三、斯坦因敦煌劫宝藏……(145)
1、斯坦因与西北考察……(145)
2、千佛洞骗宝……(147)
3、盗劫后的评说……(153)
四、“汉学大师”取菁华……(156)
1、法国的“汉学”研究……(157)
2、伯希和敦煌劫宝藏……(158)
3、菁华犹在巴黎藏……(163)

五、姗姗来迟的桔瑞超……(168)
1、大谷光瑞与西北考察……(168)
2、日本的敦煌遗书……(170)
六、不甘落后的鄂登堡……(173)
1、组织考察的“俄国委员会”……(174)
2、鄂登堡与敦煌盗宝……(176)
3、苏藏敦煌写本概况……(181)
七、带来厄运的华尔纳……(185)
1、第一次盗劫……(185)
2、罪恶阴谋未得逞……(188)
3、损失惨重难挽回……(191)
八、劫余断篇又遭劫……(193)
1、遗书的流散……(193)
2、运京途中遭劫记……(194)

第四章　敦煌遗书

——百科全书式的宝藏……(199)
一、史学研究的新领域……(199)
1、提供了丰富的材料……(200)
2、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进展……(202)
3、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207)
二、宗教研究的新材料……(210)
1、“佛教遗书”甲天下……(211)
2、道教典籍……(215)
3、景教文献……(216)
4、摩尼教经典……(221)
三、科学技术的珍宝……(223)
1、丰富的天文学资料……(224)
2、雕版印刷术的实证……(227)

四、有待发掘的医学宝库
——敦煌医学概述……(232)
1、古本草学的新发现……(233)
2、丰富的医经……(235)
3、珍贵的医方……(237)
五、通俗文学的重要一页——变文……(239)
1、什么是变文……(239)
2、变文的题材和内容……(243)
3、变文的价值……(247)
六、诗苑奇葩竞争艳……(249)
1、敦煌诗人之作……(250)
2、释氏佛徒之作……(253)
3、敦煌民间诗歌……(256)
4、敦煌佚存唐代诗人之作……(259)
七、天真质朴的曲子词……(262)
1、词的起源与敦煌曲子词……(262)
2、丰富的内容……(265)
第五章　敦煌学研究遍天下
——敦煌学的发展及其研究概况……(277)
一、敦煌学的产生及其在我国的初步发展
……(277)
1、从史的角度考察敦煌学之产生……(278)
2、草创阶段(1909—1924年)……(280)
3、艰苦创业(1925—1949年)……(281)
4、初步发展(1949—1966年)……(283)
二、科学考察结硕果……(286)
1、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及其成就……(286)
2、敦煌考古促进了敦煌学研究……(293)

三、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297)
1、于右任先生的建议书 ……(297)
2、向达先生的大声疾呼……(299)
3、贺昌群先生的积极响应……(300)
4、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302)
四、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303)
1、研究队伍日渐壮大……(304)
2、学术活动日益频繁……(311)
3、研究成果大量涌现……(317)
五、台、港地区的敦煌学……(322)
1、敦煌学教学与人才培养……(323)
2、研究机构及学术活动……(324)
3、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326)
六、法国的敦煌学研究……(331)
1、主要的敦煌学家及其著述……(332)
2、对敦煌汉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335)
3、对其他民族文字写卷的研究……(339)
七、敦煌学研究在日本……(343)
1、二次大战前的研究概况……(343)
2、二战后至七十年代的研究概况……(346)
3、最近十多年的研究情况……(349)
八、其他国家的敦煌学研究……(352)

后记……(356)

引　　言——

何谓敦煌学

本世纪初叶，敦煌藏经洞遗书的被发现，震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研究，从而在世界上兴起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

从此，敦煌的名字响遍全球，人们对敦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世界上掀起了一股敦煌热：国际性的敦煌学术讨论会不断召开，并成立了各种敦煌学研究机构，创办了一些敦煌学研究的专门刊物；以“敦煌”、“飞天”命名的各种商品已冲出中国，飞向世界；取材于莫高窟壁画的《丝路花雨》及中日合拍的大型历史故事片《敦煌》的演出，曾轰动了全国和世界文化界；每年去敦煌参观游览的中外游客更是络绎不绝。可以说，从学术界、文化界、艺术界以至大中小学学生、社会青年，都很想了解敦煌和敦煌学。

一

敦煌学的产生虽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由于对敦煌学理论研究的轻视，致使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敦煌学的概念、含义及研究对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称为敦煌学，或称为敦煌研究，或称为敦煌文献研究，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周一良先生和姜亮夫先生的观点。周一良先生在为王重民先生的《敦煌遗书论文集》①作序时说：“敦煌资料是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的宝

①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

藏，而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如果概括地称为敦煌研究，恐怕比‘敦煌学’的说法更为确切，更具有科学性吧。”在纪念《文史知识》创刊5周年时，周一良先生又作文说：“从根本上讲，‘敦煌学’不是有内在规律、成体系、有系统的一门科学，用固有名词构成的某某学又给人不太愉快的联想，所以最好就让它永远留在引号之中吧①。”周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学贯中西，对敦煌遗书素有研究，并发表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学术论文，近年对敦煌遗书中“书仪”卷子的系列研究，已引起了国内外敦煌学者的关注。正因为如此，周先生的观点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周先生主要研究敦煌遗书，对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史地研究不多，因此，周先生的论点主要是针对敦煌遗书而言，而且也比较多地强调了敦煌遗书各个部分之间的区别和差异性，并没有从敦煌学的各个方面加以考察，所以我们认为其观点有一定的片面性，也不够准确。

姜亮夫先生在《敦煌学之文书研究》②一文中指出：“敦煌学之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写本、文书为主。而复及古长城残垣、烽燧遗迹、所出简牍，及高昌一带之文物为之辅。”在《敦煌学必须容纳的一些古迹文物》③一文中更全面地论述了其观点，指出：“敦煌地区所发现的汉竹简、汉以来的‘绢’、‘纸’军用器（属于汉以来戍卒使用的），及一切杂器物、寺塔，乃至于长城的砖石等，都是敦煌学中不可少的从属品，……原则地说，敦煌学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宝库，所以这些属于中国文化史上曾经存在的文物，点点滴滴也是与敦煌学有血肉关系的。”

姜亮夫先生是我国老一辈的著名敦煌学家，已出版了《瀛涯

①周一良《何谓“敦煌学”》，载《文史知识》1985年10期

②载北京大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集

③载《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4期

敦煌韵辑》、《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莫高窟年表》、《敦煌学概论》、《敦煌学论文集》等专著。可以说，姜先生是目前国内成果最多、威望最高的敦煌学专家之一，因此，其论点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推敲一下姜先生的观点，就可看出其对敦煌学的范围有些太扩大了。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中国文化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文物，是与敦煌学有点滴关系的；但有关系并不等于相同，也不等于包含。如历史学与文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国古代就有文史不分家之说，但文学就是文学，史学就是史学，各有其特点及研究对象和范围，并不能由于有关系就将史学包含在文学之中，或将文学包含在史学之中，或者将二者合而为一。因此我们认为，姜先生把敦煌地区发现的汉竹简，汉以来的“绢”、“纸”军用器，及一切杂器物、寺塔、长城的砖石、高昌一带发现的文物等，都划归敦煌学的范围，是不够科学的。这样，容易混淆西北史地学、吐鲁番学、丝绸之路学、中西交通史、中亚史等与敦煌学的界限。

1984年，林家平、宁强、罗华庆三同志发表了《试论敦煌学的概念、范围及其特点》①一文（以下简称林文），对以上关于敦煌学的两种定义也不同意，从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敦煌学及其范围。

林文说：“敦煌学的概念内涵应有三个层次：第一，敦煌地区遗存至今的文献文物资料。第二，对这些文献文物的整理研究。第三，指导这种研究的科学理论。”林文将“敦煌地区遗存至今的文献文物资料”作为敦煌学概念的第一个层次，我们认为是无法解释的。因为据目前学术界的普遍看法，敦煌文献指1900年6月22日藏经洞发现的遗书和1944年8月底在土地祠残塑中发现的遗书。文物是指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诸石窟。我们认

①载《兰州学刊》1984年1期

为敦煌的文献文物资料，只是敦煌学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敦煌学本身。就象《水经注》是郦学研究的对象，而不是郦学本身；《红楼梦》是红学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红学本身一样。

每一门学科，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在其发生、发展中，要不断研究其成果，总结经验，以便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敦煌学也不例外。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已经有九十年的历史了，经过我国学者的不断努力和辛勤劳动，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这些成果加以总结研究，也是完全必要的。正如林文所说："在把敦煌学研究引向深入的同时，从方法论的角度总结这些经验和成果，找出规律，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总的指导纲领，结合中国敦煌学的具体情况，创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敦煌学理论体系，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必然。"接着林文指出，不论从资料、研究本身，还是从中国的具体情况看，都"为建立这个体系准备了前提条件。"即是说，我们现在只是有了建立这个理论体系的前提条件，而这个理论体系还没有建立。那么，在这个理论体系建立之前，是否存在敦煌学研究呢？是否有敦煌学这门学科呢？既然林文把"指导这种研究的科学理论"作为敦煌学的概念之一，那么在这个理论体系建立之前，对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学理论的研究，是否称敦煌学研究，应作何解释？而且林文这一论点与其"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已经走过了八十多年的历程"，"敦煌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诞生于四十年代前期"等说法，也是自相矛盾、无法统一的。因此我们认为，林文把"指导这种研究的科学理论"作为敦煌学的概念之一，也是没有理论依据的，在实践中也无法解释。

二

我们认为，所谓敦煌学，就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这门学

科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大凡中古时代的宗教、民族、文化、政治、艺术、历史、地理、语言文字、文学、哲学、科技、经济、建筑、民族关系、中西交通等各门学科，都可利用敦煌学资料，或填补空白，或纠正前人的错误，或改变某些传统的说法。正是由于敦煌遗书和敦煌石窟艺术的内容十分广泛，所以有人喻之为“学术的海洋”，我国中古时期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百科全书”。

我们这样表述敦煌学，是由其性质决定的。因为所谓敦煌学，就是指以敦煌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而在中国数千上万的州郡县中，敦煌所以独特，以地名学，形成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正是由于在敦煌发现了五万卷左右的敦煌遗书和在敦煌保存下了以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为代表的大量石窟艺术的缘故。也正是由于敦煌遗书和敦煌石窟艺术的存在，敦煌学才成了一门学科。敦煌学既然是一门学科，就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即要搞清楚敦煌学这门学科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因此敦煌学理论，自然是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还由于敦煌学是以地名学的一门学科，所以敦煌史地也是敦煌学研究的对象之一。

我们这样表述敦煌学，也是由敦煌学本身的发展决定的。敦煌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通过其发生、发展的历程，也可看出我们这样表述敦煌学的缘由。

法人伯希和盗劫敦煌遗书之后，曾在北京给罗振玉、蒋伯斧、王国维等人看了一部分敦煌遗书，并送给罗振玉一些敦煌遗书照片，罗据此编成《敦煌石室遗书》一书，并撰写《鸣沙山石室秘录》，这是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刊布和大规模研究与介绍的开始。《王国维年表》1909年载其事曰：“法国大学教授伯希和，继斯坦因之后，至我国西北劫取甘肃敦煌鸣沙山莫高窟千佛洞中大批卷轴文物。八月中秋，携其所窃部分卷轴，途经北京。罗氏（即罗振玉）偕先生及蒋伯斧、董绶经往观，旋约集同好，

编定其文字为《敦煌石室遗书》，以先生所译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为附录，由武进董康（绶经）诵芬室刊行。”正是在罗振玉、董康、蒋伯斧等人的奔走呼告、极力呼吁下，清政府学部才于1909年8月20日致电甘肃：“行陕甘总督，清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要求将剩余敦煌遗书全部运往北京，由学部接收。这批八千余卷的敦煌遗书，后移交京师图书馆，即现在的北京图书馆保存。

1924年，陈垣先生依据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八千余卷，编成《敦煌劫余录》一书，它是我国学者编撰的第一部大规模的关于敦煌遗书的目录书。陈寅恪先生1930年为其作序说，此书乃“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也。”并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第一次提出了敦煌学这一概念，使用了敦煌学这一名词。1940年，向达先生修订《唐代俗讲考》时，也沿用了这一名词，说“时贤因为之特创一敦煌学之新名辞。”由此可知，当时学术界所谓之敦煌学，仅仅是指整理研究敦煌遗书而言，并不包含其他。

四十年代初，在学术界一些有识之士的倡议进言，大声疾呼下，国民党政府于1943年3月采纳了于右任关于设立敦煌学院的建议，教育部委派高一涵、常书鸿为正副主任，负责筹备敦煌艺术研究所。经过近一年的积极努力和辛勤工作，研究所于1944年2月1日正式成立，常书鸿被任命为所长，并从重庆征聘来了史岩、李浴、苏莹辉、潘絜兹、罗寄梅等敦煌学研究者，开始了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1947年，敦煌艺术研究所与华西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联合出版了史岩先生的《敦煌石室画像题识》一书，这是我国学者对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此后，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逐渐深入，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大，从而使敦煌石窟艺术亦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了。因此，学术界所说之敦煌

学，便包括敦煌遗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两个方 面。段 文 杰先生在《敦煌研究文集·前言》中说："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敦煌石窟，……一部分是藏经洞出土的缮本图书。"

近年来，敦煌学理论的探讨日渐受到重视，相继发表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文章。这些情况表明，敦煌学理论研究已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一个方面，而且必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由于敦煌学是以地名学的一门学科，因而在探讨敦煌艺术的产生、发展各个时期，探讨藏经洞的封闭，敦煌遗书的发现、被盗等问题时，必然要涉及到与其有密切关系的敦煌史地。可以说，深入了解、研究敦煌史地，是全面研究敦煌学的前提之一，所以我们认为，敦煌史地也是敦煌学研究的对象之一。

三

敦煌学的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经过科学地整理、归纳、分类后，都可以包含在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和敦煌史地四项之下。现将其简单叙说如下：

第一、敦煌遗书。敦煌藏经洞发现的遗书，总数达五万卷之多，其中绝大多数是写本，一小部分是木刻本。刻本中有唐咸通九年（868年)刻的《金刚经》，首尾完整，卷首有一幅"佛说法图"，雕刻者刀法纯熟，线条细致工整，充分显示了我国雕版印刷术的精湛技术，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刻本书籍。这些书籍除用汉文书写外，还有用藏文、梵文、康居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粟特文等抄写的。藏书的内容，以佛教经典为最多，还有道教经典，经、史、子、集 四 部 书，诗、词、曲、赋，通俗文学，域外古语言古宗教、图经、方志、医药、历书、社会经济资料等一应俱全，应有尽有。此外，还存有寺院的契约、帐簿、户籍、信札等经济历史资料。尤为可贵的是，许多写本注

明了抄写年月，最早的是东晋永和九年（353年）抄本《佛说无常经》（藏于苏联），最迟的为北宋天圣八年（1030年）抄本《杂写》（藏于巴黎）。这些手抄的经卷、书籍时代性很强，是研究当时社会生活面貌的真实材料，也是研究我国近二千年学术文化发展的宝贵文献。

第二、敦煌石窟艺术。我们所说的敦煌石窟艺术，包括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的榆林窟等，因为这些石窟都属于汉代敦煌郡的境内，而且石窟的形制、开凿年代和艺术风格，也都是相同的。但只有莫高窟的规模最大，宝藏最丰富，保存的最完整，最具有代表性。

敦煌莫高窟的艺术作品，包括无数宏伟绚丽的壁画和数以千计的优美彩塑，以及琳琅满目的图案装饰、佛画、佛绣，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艺术家在绘画和塑造艺术上的高超造诣。敦煌石窟艺术，是中国绘画史、美术史、雕塑史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且敦煌石窟艺术中还包括许多古代的木檐建筑，因而也是中国建筑史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三、敦煌学理论。敦煌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其理论建设还不够充分，仍在不断深化和探讨之中。敦煌学理论主要包括敦煌学的概念、范围、特点、研究对象，敦煌学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目前研究敦煌学的作用和意义，敦煌学本身的发展史等等。

第四、敦煌史地。我们所说的敦煌史地，就是指研究中古时代的敦煌历史和敦煌历史地理。并非是林文说的“主要是对敦煌遗书中有关敦煌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风俗、中西交通等方面的历史文献的研究和对敦煌、安西两县境内现存古代遗址、遗物的考古研究以及对壁画中、供养人题记中有关敦煌史地记载部分的研究。”因为敦煌遗书中有关敦煌地区的历史文献，如《沙州都督府图经》等，可以归纳到敦煌遗书之内；而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和供养人题记中有关敦煌史地的记载，则可归并到敦

煌石窟艺术之内；至于敦煌、安西两县境内现存的遗址、遗物的考古研究，则属于地方史研究的范围。而作为敦煌学研究对象的敦煌史地，则是指与敦煌学其他三个主要研究对象相互关联，即与敦煌艺术的产生、发展等有密切关系的敦煌历史和敦煌历史地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

以上对敦煌学及其研究对象的论述，只是笔者对这一问题的一孔之见，并非完美无缺的“统一”概念。我们认为对敦煌学这门新兴的学科来说，其概念定义是很难科学界定的，正如列宁所说：“所有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的各方面联系①。”这就是说，每一个定义不过是一种质的规定性，不可能把发展中的所有质的规定性穷尽，对敦煌学这门发展中的学科来说更是如此。

---

①《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08页

第 一 章———

千载沧桑话敦煌

敦煌学是以地名学的一门学科。敦煌史地既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只有深入探讨、了解敦煌史地，才能对敦煌学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欲究敦煌学者，必先明敦煌学之基础与背景①。"因此，有必要先谈敦煌的历史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

一、敦煌一名的由来

现在的敦煌市位于河西走廊西端，是甘肃省最西边的一个县级市。它东临安西县，西与新疆诺羌县接壤，南与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毗邻，北与新疆哈密市相连。地处东经92°13′—95°30′，北纬39°35′—41°35′之间。东西长60—240公里，南北宽90—190公里，总面积31,200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6.9%，仅次于肃北和阿克塞两县。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3.39人，人均占土地443亩，是甘肃省幅员辽阔，人烟稀少的地区之一。虽然敦煌面积很大，但绿洲面积只有210万亩，仅占总面积的4.48%，其余绝大部分是戈壁、沙漠和山地，所以敦煌有"戈壁绿洲"之称②。

---

①赵俪生《张澍的生平及其著述》，载《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4期

②参阅甘肃省统计局、甘肃人民出版社编《甘肃地县概况》下册18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敦煌这个名字，是汉武帝建郡时命名的。根据古籍记载，此地古属雍州。《尚书·禹贡》说："黑水西河惟雍州。"《文献通考》卷322《舆地考八·古雍州条》解释说："西据黑水，东距西河，西河即龙门之河也，在翼州西故曰西河；黑水出今张掖郡鸡山，南流至今敦煌，经三危山，过今南溪郡而入南海。"又说："汉之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安定、天水、陇西、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皆其分地。"

在我国的古史传说中也曾涉及到敦煌这个地区。如《尚书·舜典》说，在虞舜时，帝舜曾经"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许多人认为"三危"就是指今敦煌南面的三危山。《史记·五帝本纪》曰："三危山有峰，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水经注》说："三危山在敦煌县南①。"唐代李吉甫认为，"三危山在（敦煌）县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尚书窜三苗于三危，即此山也②。"清人常钧在其《敦煌杂钞》中说："尚书孔安国传，三危西裔之山，舜窜三苗于三危，禹贡三危既宅是也。隋志敦煌县有三危山，括地志山在沙州东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名。都司志三危为沙州望山，俗名升雨山，在今城东南三十里，三峰耸峙，如危欲坠，故名③。"

敦煌的含义为何，历来存在分歧，至今仍然未有定论。东汉应劭注释这两个字的意义时说："敦，大也。煌，盛也④。"认为敦煌是一个很繁华的城市。唐代李吉甫解释说："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⑤。"认为这个地方对开发广大的西域地区有很重要的作用，故名之曰敦煌。

---

①《水经注》卷40《禹贡山水泽地所在》

②⑤《元和郡县图志》卷40

③《敦煌杂钞》卷下《三危山》

④《汉书》卷28《地理志》

对于敦煌的这种解释，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日人藤田丰八在其《西域篇》考订说，敦煌可能是都货罗 Tokhara的译音，而都货罗即汉初居于敦煌、祁连间的月氏族。认为敦煌是少数民族语的音译。

刘光华先生认为，“敦煌”一名在汉武帝设置河西郡县以前很早就出现了。《史记》、《汉书》所记载的“敦煌”和后来的敦煌县、敦煌郡无关，因为它反映的史实发生在战国末至秦汉之际。而和“祁连”连用的“敦煌”，肯定不是指敦煌县、敦煌郡，它和“祁连”一样，应是当地土著居民所呼土名的汉音写名。这个汉音写名的发明权或者就是属于张骞的。至于“敦煌”一词的原意，早在东汉就无法知道了，所以应劭从汉语之字面意义上给予解释。

刘先生说，“敦煌”这一土名，虽然后来为汉朝郡县所沿用，但其所指地区的范围可能比日后的敦煌郡为大。河西走廊可分为三个自然区域，每个自然区域又与一个较大的内流河流域相对应。今山丹境内的大黄山以东为武威、永昌平原，属石羊河流域；大黄山以西至今嘉峪关西的黑山为酒泉、张掖平原，属黑河流域；黑山以西至今敦煌县西境为玉门、敦煌平原，属疏勒河流域。疏勒河流域的玉门、敦煌平原，应是古敦煌的范围。其土著居民沿河而牧，往返活动于疏勒河流域的绿洲上，故范围较大。而后来所建立的敦煌郡则为一政治区划，其范围指今玉门、敦煌平原之西部，即安西、敦煌两县境疏勒河以南地区，这是汉朝统治者从军事、政治需要出发而规划的行政建制，与该地区上古居民依自然山川河流劳动、生息，并作为其活动范围有所不同，前者较小，后者因任自然形势，故比较大①。

---

①参阅刘光华《敦煌上古历史的几个问题》，载《敦煌学辑刊》第三集

1986年，海风的《敦煌地名的来源及其他》①一文，对“敦煌”一词系匈奴语译音提出了异议，认为“敦煌”既不是汉语语词，也不是少数民族语词，而可能与希腊人有关。因为历史文献记载的大夏国，即希腊·巴克特里亚，在公元前三世纪已达帕米尔高原。其中的塞种人或塞人世居于敦煌。据此可知，“希腊人是早于匈奴人在敦煌驻足的。因此敦煌这个地名的由来或与希腊人有关，而很难说是匈奴语的译音。”

与此相反，王翼青先生则认为敦煌地名与希腊人无关，因为海风先生的说法有一个关键性错误，即将Scythians人当作希腊人的一支。实际上，Scythians人是从公元七世纪起活动于里海、咸海、锡尔河以北的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我国译作西徐亚人、塞西安人、斯基泰人等，相当于古波斯文献中的Saka人和我国古籍中记载的“塞种”或“塞人”。这个游牧民族实际上是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的许多游牧部落的联合体，西起地中海东岸，东至我国西北地区，都曾留下他们的足迹。

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建立后，以锡尔河为界与西徐亚人相邻。西徐亚人既不和希腊人同族，又不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臣民，在希腊人和西徐亚人之间不能划等号。正“因为西徐亚人不等于希腊人，所以汉代以前曾世居敦煌的塞种（即西徐亚人）也绝不是希腊人。‘敦煌’一名的来源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与希腊人无关②。”

王宗维先生认为，“敦煌”是族名，它是我国的一个民族，即吐火罗的简译。在《“敦煌”释名——兼论中国吐火罗人》③一文中认为，《山海经·北山经》、《水经注笺》卷二所记载的

---

①《光明日报》1986年10月26日

②王冀青《敦煌地名与希腊人无关》，载《地名知识》1987年4期

③《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1期

敦薨，其范围约当今巴龙台以南，包括焉耆、库尔勒，再向东直至罗布泊方圆数千里的地方。在这样广大的地区，山名、水名、泽名均以敦薨一词命名，根据我国西北地区往往有地从族名的习惯，说明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很大的民族敦薨人在此活动，时间从《山海经》一书成书的年代推测，约在中原战国时期。

多数学者认为，西部吐火罗是从东方迁去的，也就是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南，曾是吐火罗人的根据地，当时吐火罗人就生活在这里。根据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原人译边疆地区人名、地名、族名的习惯往往取两个字简译，省去其他音节，这样，吐火罗就在《山海经》中译为“敦薨”，《大宛列传》中译作“敦煌”。因此，敦煌一名在汉代以前作敦薨，都原于吐火罗一词的第一音节，也就是说，敦煌一名是吐火罗的简译。

最近，有的学者又提出敦煌为羌语译音。在《敦煌与莫高窟释名及其他》①一文中，李得贤先生认为河西走廊的庄浪，今藏语义为野牛沟，张掖的原义是野牛之乡。他说：“敦煌之为羌语译音，盖与庄浪、张掖、删丹等相同。我曾为此遍询深通藏语文的专家，他们根据我的提示和设想，最终由索南杰同志提出‘朵航’的对音来，这在现代的藏语中是‘诵经地’或‘诵经处’的含义。”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即岑仲勉先生在《释桃花石（Taugas）》②一文中提出的。岑先生从东罗马作家Simocatta（约当我国隋代人，其著作成于公元610年）以Taugas称我国，昆莫河诸碑亦以Tapgac称我国说起，认为此二称“虽译写略异，然语原同一，世无异议，”而沿用期间计六百余年中见于汉译只一次，即《长春真人西游记》云：“土人惟以瓶取水，戴而归，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从而

---

①《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5期

②《东方杂志》1936年第33卷21号

认为“桃花石”为城名。从历史上看，敦煌不仅是中西交通之咽喉，而且是国际商业之集散地，它“握北门之锁钥者，最少可六百载，其历史如是久且要，外人叩关投止，因以初到之封境为称，渐乃变成国号，固自然而然之事实矣。”岑先生还将大月氏、靺货罗、桃花石名称字母进行排比研究，指出“敦煌”为译名，而Taugas为“敦煌”之对音。至于“敦煌”这个译名，“究本自大月氏语、匈奴语或其他中亚语，今不可知；东罗马、突厥、西亚之译名，其为间接本自我国之‘敦煌’，抑直接本于以上各语，今亦不可知，展转重译，对音之不能十分吻合，无怪其然矣。”确定“敦煌”为译名，但未推定是何种语言语词。

对于敦煌的这些解释，施萍亭先生认为“少数民族语的可能性要大些。”因为敦煌与祁连同时出现，而“祁连”是少数民族语。《史记·大宛列传》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汉书·张骞传》说：“昆莫父难兜靡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汉书·西域传》也说：“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祁连”一词，颜师古注《汉书》曰：“祁连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为祁连①。”司马贞《史记索引》引“小颜云：‘即天山也。匈奴谓天为祁连’②。”既然“祁连”是少数民族语，那么与祁连相提并用的“敦煌”也可能是少数民族语③。根据目前占有的资料，我们认为这种解释是比较合理的。

二、汉代对敦煌的开拓和经营

从战国到秦，活动在敦煌地区的主要是月氏、塞种胡和乌孙等族。在这些种族中，以月氏最为强大。塞种“本允姓之戎，世

---

①《汉书》卷55《卫青霍去病传》注

②《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索引

③施萍亭《敦煌随笔之一·“敦煌”二解》，载《敦煌研究》第三期

居敦煌，为月氏迫逐，遂往葱岭南奔①。”故到了秦汉之际，活动在敦煌与河西其他地区的则主要是月氏和乌孙了。

1、汉代对敦煌的开拓

西汉初年，匈奴赶走了河西的月氏、乌孙，占据了河西。匈奴占据河西及西域后，除在占领区征收赋税外，还严重地破坏和阻塞中西交通；并与羌人连结，威胁着汉朝的安全。但是，由于西汉初期汉帝国的社会经济极端残破，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因此其国势十分虚弱，无力抵御匈奴的进攻，从而不得不采取屈辱的“和亲”政策。

然而，西汉王朝的“和亲”政策，并没有满足匈奴奴隶主贵族的贪欲。他们经常侵汉边郡，杀掠人民。“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单于者甚厚；然不以重质厚赂之故改节，而暴害滋甚②。”“匈奴数和亲，而常先犯约……反复无信，百约百叛③。”

西汉王朝在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至武帝即位之时，国力已很充实。而且经过平定“异姓诸王”的背叛，及经过文、景的削藩和平定“同姓诸王”的“七国之乱”后，中原割据势力和大商贾的势力都遭到了极大的打击，中央集权已大大加强和巩固。这样，西汉王朝就有足够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来反击匈奴了。武帝采纳抗战派大臣的主张，开始了抗击匈奴的战争。

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谋揭开了抗匈战争的序幕。它是西汉王朝与匈奴由“和亲”到战争的转折点。汉对匈奴的反击战争主要是公元前127年的河南之战、前121年的河西之战和前119年的漠北之战。经过河南之战，收复了“河南地”；经过漠北之战

---

①《汉书》卷96《西域传》

②《盐铁论·结和》

③《盐铁论·和亲》

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①。”

河西之战主要是由青年将领霍去病领导进行的。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青年将领霍去病率轻骑万人由陇西出发作尝试性的进攻。霍去病的具体进军路线，是经过慎重选择的，因为“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②。”因此其进军路线既不能深入羌中与强大的西羌相遇，遭其阻击；又不能接近匈奴本部，惊动匈奴主力，陷入重围，不能自拔。当时霍去病只能在匈奴统治势力薄弱和接近西羌本部的边沿地区，即两大势力的结合部穿行而过，这样才能迅速到达河西浑邪、休屠部地，达到轻骑出击的目的。

据《汉书·霍去病传》载，元狩二年春，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西行过焉支山，深入匈奴地千有余里，大破匈奴，斩获甚多。同年夏，汉王朝决定乘胜出击，再次进军河西，以便彻底打败匈奴在河西的势力，控制河西，保护中西交通。据《汉书》记载，元狩二年夏天，霍去病从北地出发，至居延，然后南下打到祁连山，俘、斩匈奴三万多人，并“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③。”匈奴在河西的势力又一次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霍去病在河西之战的胜利，使匈奴失去了水草丰盛、宜于牧畜的祁连山和焉支山，影响十分巨大。《史记正义》引《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其慜惜乃如此。”

河西的匈奴在一年中连遭两次打击，已有不能支持之势，而匈奴单于又怪罪浑邪王和休屠王无能，“欲召诛之。昆邪、休屠

---

①《汉书》卷94《匈奴传》

②《汉书》卷61《张骞传》

③《汉书》卷55《霍去病传》

王恐，谋降汉①。”他们派人和在黄河沿岸修筑边塞的将军李息联系，李息即告中央。“上恐其以诈降而袭边，乃令去病将兵往迎之②。”这时，休屠王反悔，不愿降汉，浑邪王杀了他，并收编了他的部众；霍去病也当机立断，率军驰入浑邪王营中，“斩其欲亡者八千人”，尽将其众渡河东进。匈奴降汉者“凡四万余人，号十万③。”接着霍去病派人护送浑邪王到长安，受到了汉武帝的隆重接待，武帝并封浑邪王与其亲信数人为侯。汉政府把投降的匈奴部众安置在原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故塞之外。从此，河西走廊正式归入了汉朝的版图。

2、敦煌郡县的设置

敦煌地区归入汉的版图后，汉王朝为了进一步开发敦煌，保护中西交通，便在敦煌地区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敦煌郡县的设置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敦煌建郡的年代，《汉书》的记载就不一致，《汉书·武帝纪》载，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即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而《汉书·地理志》则载，“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敦煌郡，武帝后元（元）年分酒泉置。”

本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依据《史记》、《汉书》和考古新资料，对敦煌郡的设置时间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结论颇不一致。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1）向达、张维华、周振鹤诸先

---

①《汉书》卷94《匈奴传》

②《汉书》卷55《霍去病传》

③《汉书》卷94《匈奴传》

生主张建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①；（2）陈梦家先生主张建于元封四、五年间（公元前107、106年）②；（3）吴礽骧、余尧先生主张建于元封五、六年间③；（4）劳干先生主张建于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或稍后④；（5）张春树先生主张建于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⑤；（6）黄文弼先生主张建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⑥；（7)方诗铭先生主张建于天汉二、三年后至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以前⑦；（8）刘光华、王宗维先生主张建于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⑧。

我们认为，汉代于西北边塞凡有设置，或与重大军事行动有关，或属交通方面之必需⑨。如置酒泉郡以通西北诸国，设武威、张掖郡以隔羌胡交通。敦煌郡的设置，则与李广利伐大宛有密切关系。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王朝为了进一步扩大在西域的影响，“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⑩”。太初二年，李广利伐宛失利，乃“引兵而还，往来二岁。还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使使上书言：……天子闻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⑪。”李广利伐大宛为汉代出兵西域之第

---

①向达《两关杂考》，载《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张维华《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2年2卷；周振鹤《西汉河西四郡设置年代考》，载《西北史地》1985年1期

②陈梦家《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载《汉简缀述》

③吴礽骧、余尧《汉代的敦煌郡》，载《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2期

④劳干《居延汉简考证》，1959年台湾版

⑤张春树《汉代河西四郡的建立年代与开拓过程的推测》，载《汉代边疆史论集》

⑥黄文弼《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载《西北史地论丛》

⑦方诗铭《玉门位置辩》，载《西北通讯》创刊号

⑧刘光华《敦煌建郡于汉武帝后元元年辩》，载《秦汉史论丛》第二辑；王宗维《汉代河西四郡始设年代问题》，载《西北史地》1986年第3期

⑨参阅黄文弼《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

⑩⑪《史记》卷123《大宛列传》

一次，后方必有布置，此时设置敦煌郡，既可以备军事之转输，又有利于中西交通。李广利第一次出兵伐宛在太初元年，太初二年留兵敦煌，而敦煌之名亦出现于此时。因此我们认为，敦煌郡的设置可能也在此时。

敦煌郡，再加上酒泉郡、张掖郡、武威郡，就是一般所说的“河西四郡”。

汉代的敦煌郡，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共统辖六个县，即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与龙勒。当时的敦煌郡，包括今敦煌市、安西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面积约八万平方公里。兹将这六个县的具体所在分述如下：

敦煌县：郡治所在。在今敦煌城西南。常钧《敦煌杂钞》卷二沙州卫：“沙州之西，本有故城，即汉敦煌郡治。经党水北冲，圮其东面。雍正三年，于故城东另筑卫城。”吕少卿《重修敦煌县志》说：“城在县西里许，滨临党河西岸，遗址尚存。其西北一角，高犹数丈。”可知现在的敦煌城在党河东面，是清代雍正三年（1725年）所建，非汉代之敦煌县。

冥安县：今安西县布隆吉一带。冥安以冥水得名。《元和郡县图志》卷40载：“晋昌县，本汉冥安县，属敦煌郡，因县界冥水为名也。”冥水即今疏勒河。其“故城疑在今小湾、双塔堡、布隆吉等处。①”据调查，汉冥安县，主要分布于冥水支流的下游绿洲，其四境东至冥水，南至大雪山，北至乱山子，西接广至县境②。

效谷县：敦煌遗书S。5448《敦煌录》：“效谷城本是渔泽，汉孝□帝时，崔不意教人力田得谷□，因名，后为县。”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说：“本渔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

---

①《重修敦煌县志》卷2《冥安废县》

②吴礽骧、余尧《汉代的敦煌郡》

济南崔不意为渔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其确切方位，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说：“古效谷城在州东北三十里，是汉时效谷县。”据有的学者考证，位于今敦煌城东北二十公里的黄渠乡戴家墩城堡遗址，很有可能就是汉代的效谷城①。

渊泉县：因“地多泉水故以为名。”东汉时改为拼泉。《辛卯侍行记》卷5：“章怀太子注后汉张奂传云，故城在瓜州晋昌县东北，当在今州东四道沟、柳沟堡诸处。”约在今安西县之东四道沟一带。

广至县：今安西县南踏实乡破城子一带。《太平寰宇记》卷153：“常乐县，本汉广至县地……汉广至故城在今西北。”《辛卯侍行记》卷5：“北魏改大至，唐改常乐，……踏实盖大至之转音……按今踏实西北二十里有破城子，殆即汉广至。而章怀注盖勋传云，广至在常乐东，今谓之悬泉堡。”

龙勒县：即今敦煌市南湖乡一带。因县南180里有龙勒山而得名。敦煌遗书《寿昌县地境》曰：“龙勒山，县南百八十里，周时龙马朝出咸阳，暮至寿昌，因以此山之下，遗其衔勒，故名龙勒山。”龙勒，即唐代的寿昌县。《元和郡县图志》卷40载：“寿昌县，本汉龙勒县，因山为名。……武德二年，改置寿昌，因县南寿昌泽为名也。”据调查，寿昌海，即今黄水坝水库。其北约五公里，有一古城遗址，现遗址大半埋于沙丘中。很可能这一遗址，就是唐代寿昌城故址，也即汉龙勒县城②。

在汉代，敦煌是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它南枕祁连，西控西域，是汉王朝西边的重镇，也是中西交通，贸易南北两道上的分

---

①梁尉英《汉代效谷城考》，载《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②吴礽骧、余尧《汉代的敦煌郡》

合点，东西方文明荟萃的枢纽。

汉代经营西域，有如一幕幕话剧，而敦煌则是汉政府导演话剧的后台，也是政府决策西域的耳目①。汉破楼兰、姑师，联乌孙，伐大宛，与匈奴争车师，远征康居等等，都与敦煌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汉代，凡罢都护，废屯田之时，汉政府派人迎接吏士，“出敦煌，迎入塞”，就算完成了使命。对当时的旅行者来说，“西出阳关”就意味着凄怆的离别，“生还玉门”就象征着幸福的重聚。如班超在西域31年，晚年上书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就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反映。

三、华戎所交一都会

——敦煌艺术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敦煌佛教艺术，乃是东传的佛教在一个具有成熟的封建文化的地方的特有产物，也是民族传统文化受外来宗教刺激下出现的新形态。因此敦煌艺术的特点，就在于其地理条件的特殊，使它具有一些个性鲜明的差异，从而显示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与创造力②。

敦煌艺术，既不是西来的，也不是东去的，而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在敦煌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与外来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只有从这个大前提出发，才能正确阐述敦煌艺术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1、学术文化的发展

由于敦煌与河西其他地区都偏处西北，远离中原，因而能避

---

①参阅施萍亭《敦煌与莫高窟》，载《敦煌研究》试刊第一期

②参阅史苇湘《敦煌佛教艺术产生的历史依据》，载《敦煌研究》试刊第一期

诸如“八王之乱”、“永嘉之乱”那样的兵祸之灾，保持境内长期安定的环境。正是由于河西比较稳定，使大量避难百姓流亡到此，发展了河西的经济和生产，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公元一世纪初，就有不少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今陕西中部地区）地区的人前往河西。《后汉书·孔奋列传》载：“遭王莽乱，奋与老母幼弟避兵河西。……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今武威）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绿林军入关后，更始帝委派窦融去河北任巨鹿太守，为融谢绝，提出愿意去河西。《后汉书·窦融列传》说：“融见更始新立，东方尚扰，不欲出关。而高祖父尝为张掖太守，从祖父为护羌校尉，从弟亦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独谓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兄弟皆然之。”从以上记载可知，孔奋因天下扰乱，想找一个安定富庶的地方侍奉老母，遂选中了“独安”的河西；而窦融则从政治、经济、军事上考虑，认为河西殷富，兵精粮足，地势险要，是乱世“自守”、“遗种”之地。

窦融任“张掖属国都尉”后，凭借其祖弟“累世在河西”任职的声望，广泛结交地方官吏，联络周边羌胡民族，使“河西翕然归之。”他和酒泉太守梁统、敦煌都尉辛彤、张掖都尉史苞、金城太守厍钧、酒泉都尉竺曾等人“皆与为厚善”，关系十分融洽，他们共推窦融“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在他统治下的河西，“上下相亲，晏然富殖。修兵马，习战射，明烽燧之警……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①。”从当时全国的形势看，河西的确是一个较为安定的地区。东汉王朝建立后，光武帝刘秀对据有“河西完富，地

---

①《后汉书》卷23《窦融列传》

接陇蜀”的窦融也很重视，特“赐融玺书”，并“授融为凉州牧。”自此，窦融及所控制的河西地区遂归附了东汉。

公元四世纪初，西晋王朝在经过“八王之乱”以后，遂出现了北方十六国的大分裂、大混乱。在中原扰攘不堪时，河西却比较安定，这里不仅是内地流民的避难所，而且其文化亦很繁荣。张轨所建立的前凉政权，大量依靠敦煌人士如宋配、阴充、阴澹、汜瑗等为其运筹。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帮助、辅佐，才使河西的生产有了发展，人口有所增加，也使张轨能“威著西州，化行河右。”在当时北方大混乱的情况下，以敦煌为中心的五凉文化却大放异彩，它不仅保存了汉晋传统，而且在此基础上还有所发展。

汉晋时代，河西地区，特别是敦煌，出了不少著名的文人学士和能工巧匠，并将传统文化继承、保存了下来。这主要是河西地区稳定的结果。我们知道，整个十六国时代，北方处于战火弥漫、干戈不息的混乱局势下，而河西地区则“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①。”因此，“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②。”永嘉之乱时，京城士大夫认识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建兴之乱后，晋王司马保败亡，“其众散亡凉州者万余人③。”正是由于大量士庶避居河西，使河西的文人学士大为增加，并对保留中原先进文化及推动河西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如胡三省所说：“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④。”中原文人学士涌入河西，只是

---

①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②《晋书》卷86《张轨传》

③《晋书》卷86《张轨传》

④《资治通鉴》卷123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月条胡注

河西“多士”的一个原因。另外，随着汉代对河西的开发，丝绸之路的畅通，河西文化与河西经济一起迂回上升。一批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士”，便在西北边陲的河西一隅，破土而出。因此，自汉以来，河西地区特别是敦煌，已是文化极盛之地，文人学士大量涌现。而西晋王室内乱，中州云扰，安定世族张轨出牧凉州，保境安民，兴办文教，选拔人才，为河西的地主阶级创造了保存和发展自己家族和家学的有利条件，从而吸引了不少的中州人士流向河西，这就给本来“多士”的凉州，扩大了“士”的范围①。

河西的文人学士，多出西州大姓。如安定张氏、陇西李氏、略阳郭氏、西平田氏、金城宗氏以及敦煌宋、阴、索、氾等，都是“以儒学显”、“以儒学致位”、“以儒学见称”的西州右姓。当中原板荡、京洛公学沦废，学术下移之时，西州大姓在相对安定的河西一隅，“专心经籍，”致力儒学，既可以发展本地的学术文化，又能保存、继承固有的传统文化，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刘（渊）石（勒）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五凉统治者大都重视学术文化，遂使河西地区的文化事业在两汉以来的基础上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并一跃而为北方文化中心。

在河西地区的文人学士中，敦煌儒士不仅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在学术成就上也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如郭瑀、刘昞、索敞、索袭、索纮、索绥、张穆、张斌、张湛、宋繇、宋纤、氾腾、阚

①参阅武守志《五凉时期的河西儒学》，载《西北史地》1987年2期

②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页

驷等，都是很有成就的敦煌学士。刘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①”；阚骃“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读。注王朗《易传》，学者藉以通经。撰《十三州志》，行于世。蒙逊甚重之，常侍左右，访以政治损益，拜秘书考课朗中，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②”；宋纤“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③”；郭瑀“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④”；索袭“游思于阴阳之术，著天文地理十余篇，多所启发⑤”；宋繇“闭室诵书，昼夜不倦，博通经史，诸子群言，靡不览综⑥”。

河西，尤其是敦煌的文人学士，不但自己的学术成就大，而且还兴办学校，聚徒授业，传播和发扬传统文化。如酒泉人祁嘉“西至敦煌，依学官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都养以自给，遂博通经传，精究大义。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余人。”张重华还征拜他为儒林祭酒，让他传授儒学，“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宋纤⑦“隐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经纬，弟子受业三千余人。不应州郡辟命⑧”；郭瑀专事著书授业，著录弟子千余人；刘昞也曾开设私馆，接纳弟子五百人⑨。

---

①《魏书》卷52《刘昞传》

②《魏书》卷52《阚骃传》

③《晋书》卷94《隐逸·宋纤传》

④《晋书》卷94《隐逸·郭瑀传》

⑤《晋书》卷94《隐逸·索袭传》

⑥《魏书》卷52《宋繇传》

⑦《晋书》卷94《祁嘉传》

⑧《晋书》卷94《隐逸·宋纤传》

⑨《魏书》卷52《刘昞传》

河西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河西各政权的执政者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和提倡有密切的关系。如张轨到凉州不久，即“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①。”并广泛征求高才硕学，经史著述等有识之士；张祚、张天锡执政时期，多次派出使者，厚礼征聘隐逸有学之士。张天锡还以文人自居，在朝卿士、郡县守令纷纷拜师求学，形成风气；西凉主李暠执政后思贤若渴，“采殊才于岩陆，拔翘彦于无际②，”广泛地吸收文人学士，在文化事业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刘昞一生著述颇丰，这与李暠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河西地区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并在文化、教育上有重大影响的文士学人，差不多都出自敦煌。敦煌儒士在河西儒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示了敦煌文化的历史高度。陈垣先生曾经指出：“自汉以来，敦煌文化极盛，其地为西域与京洛出入必经之孔道，实中西文化交流之枢纽③。”可以说，没有汉魏以来敦煌文化的发展，便不可能孕育出象刘昞这样的儒学大师。而一些退隐或隐居的知识分子能够离开中原地区的物质文明，来到敦煌和河西各地，固然有当时政治上的原因，但也说明当时的敦煌已具有了他们从事著述和讲学的物质条件。而这些都说明，汉晋文化传统在河西，尤其是在敦煌已打下了坚实而深厚的基础，以敦煌为中心的五凉文化，不仅继承了汉晋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渐趋成熟。敦煌佛教艺术，正是在这种历史、文化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

---

①《晋书》卷86《张轨传》

②《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③陈垣《跋西凉户籍残卷》，见沙知、孔祥星编《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2、佛教活动的兴盛

十六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争连绵，但佛教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河西地区，佛教更为流行，并对南北朝佛教的广泛传播起了桥梁作用。正如《魏书·释老志》所说："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像教弥增矣。"

河西地区，尤其是敦煌佛教的兴盛，固然是由于敦煌乃丝绸之路的咽喉，是我国汉族聚居区最先接触佛教的地方，但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也有很大关系。东汉以后，社会矛盾、民族矛盾、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复杂，十六国战乱时期，政权更迭无常，统治者不仅需要寻求新的思想武器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而且其本身也需要自我麻醉，祈求冥冥之中的神灵保佑；而广大的劳动人民更是灾难深重，苦海无边，为祈求来生的幸福，便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同时，佛教经过汉魏长时期的传播、发展，已逐渐与儒家思想融合，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佛教徒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为了自身的发展，也学习、研究中国的传 统文化，重新 解释 佛教教义，宣扬忠孝观念。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佛学遂成为河西文化的重要内容。举世闻名的敦煌佛教艺术，就是在河西文化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兴盛和发展繁荣起来的。

河西地区佛教的兴盛，首先表现在译经方面。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河西地区出现了不少的高僧，如凉州人宝云、智严、竺道曼、道泰，酒泉人慧览，张掖人沮渠京声，金城人玄畅等。他们与朱士行、法显一样，不辞艰辛，跋涉于冰天雪地和荒漠沙碛之中，西行求经，瞻仰圣迹。归来时又携回大 量梵文 或胡 语 佛经，在河西境内开窟建寺，或聚徒讲经，或从事译著，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作出了贡献。

早在西晋时期，河西地区的佛经翻译就很负盛名，如大翻译家竺法护通36种语言，世居敦煌，并组织了自己的译场，号称敦煌菩萨。据记载：“太康五年（284年），罽宾文士侯征携《修行道地经》至敦煌，月支竺法护究天竺语，又畅晋言，于此相值共演之。其笔受者菩萨弟子法乘、月支法宝①”；“太康五年十月十四日菩萨沙门法护于敦煌从龟兹副使羌子侯得此梵书《不退转法轮经》，口敷晋言，授沙门法乘，使流布一切咸悉知闻②”。这些经记把当时敦煌的译经活动与佛教的流布情况反映得十分具体，《开元录》载其译经共175部，354卷，乃“佛教入中华以来，译经最多”③者。

昙无谶也是一个有名的翻译家。他曾由中印度去罽宾，辗转龟兹、鄯善到敦煌。北凉攻灭西凉后，昙无谶来到姑臧，沮渠蒙逊对他“接待甚厚”。昙无谶在敦煌时就熟悉了汉语，在姑臧又积极学习。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后，就开始了译经工作。在译经过程中，有道俗数百人参加，遇到的许多疑难问题，独有谶“临机释滞，清辩若流④”。再加上他的文字修养很好，故其翻译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由昙无谶翻译的佛经共有11部，即《大般涅槃经》36卷；《悲华经》10卷；《金光明经》4卷；《海龙王经》4卷；《菩萨地持经》8卷；《菩萨戒本》1卷；《方等王虚空藏经》5卷；《方等大集经》29卷；《方等大云经》4卷；《伏婆塞戒》7卷；《菩萨戒优婆戒坛文》1卷。

昙无谶早习小乘，后从一白头禅师改习大乘，喜其义理，于是专攻大乘。因此，他翻译的这11部佛经，都属于宣传“一切众

---

①《修行道地经后记》，转引自宿白《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文载《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②《出三藏记集》卷七

③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14页，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

④《高僧传·昙无谶传》

生皆有佛性”的大乘教经。在这11部译经中，以《大般涅槃经》最为重要。据记载：“谶既达此（凉州），以玄始十年，岁次大梁十二月二十三日，河西王（沮渠蒙逊）劝请令译。谶手执梵文，口宣秦言。其人神情既锐，而为法殷重。临译敬慎，殆无遗隐；搜研本正，务存经旨，惟恨胡本分离残缺未备耳①”。此经进一步发展了大乘教的佛性说，不仅承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且还进一步认为，断灭一切善根的“一阐提”（缺乏信心者）也都有佛性，皆能成佛。这一新的提法，是对佛教思想的一大突破，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大般涅槃经》译成后，在河西等地广为抄写流传，对大乘教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②。

从以上叙述可知，河西的佛经翻译是很活跃的。但译者多为西域高僧，由于语言上的隔阂，所译佛经有的纯属意译，不免失去原意；有的则纯属直译，难以读通，有碍于对经文原意的理解。即使象竺法护、昙无谶、鸠摩罗什这样的高手，上述缺陷也难以避免。在佛教著作《出三藏记集》中就透露了早期佛经翻译的困难。在该书卷8的《摩诃钵罗若波罗密经抄序》中，道安法师说，将佛经从胡语译为秦（汉）语有“五失本”：“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咏叹，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③。”可喜的是，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许多

---

①释道朗《大般涅槃经序》，见任继愈《佛教经籍选编》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②参阅齐陈骏等《五凉史略》159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③转引自史苇湘《敦煌佛教艺术产生的历史依据》

附有梵文原经的汉译佛经，可以利用它们纠正或补充古译本在译文上的缺点和不足。

河西地区佛教活动的兴盛，还表现在开窟建寺的活动十分活跃。石窟寺是佛教活动的标志，早期佛教信徒的主要功课之一是坐禅，即在石窟中静坐苦修，摈除杂念，一心向佛，以求解脱。据说只有在生前不断地坐禅苦修，才能渐渐达到寂灭的境界，死后升入天堂。因此石窟寺一般都建在远离闹市的幽僻山林中，并往往还有佛塔、佛像，以供修禅者一面观像，一面礼佛，最终达到超俗出世的境界①。

河西地区现存的石窟寺之多，在全国是少有的。这些石窟寺虽没有兴盛于汉魏，但若追溯其建窟渊源，则大都产生于十六国时期。《高僧传·昙摩密多传》说："昙摩密多，此云法秀，罽宾人也……博贯群经，特深禅法，……进到敦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植奈千株，开园百亩，房阁池林，极为严静。顷之复适凉州，仍于公府旧寺，更葺堂宇，学徒济济，禅业甚盛。"《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凉州石窟开凿时说："凉州石崖瑞相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据有凉土，……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斫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尤其是著名的敦煌莫高窟，虽盛于隋唐，下迨宋元，但其开寺建窟之始，却在十六国时期。"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366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②。"从早期佛教在敦煌传播的历史看，僧人崇尚开寺建窟，静坐修禅，因此选择了鸣沙山下这片流水萦回，草木葱郁的沙漠绿洲。由于它既远离闹市，又能得到人间烟

①参阅齐陈骏等《五凉史略》160页

②《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

火的供应，在这里凿窟修禅，的确是很理想的。

3、佛教艺术之花的绽开

敦煌学术、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在汉末的军阀割据斗争中，敦煌由于豪族大姓的控制，相对平安。但豪强大族的兼并却愈演愈烈。三国魏明帝时期，仓慈任敦煌太守（227—233年）时，抑制了豪强的兼并和勒索，为丝绸之路上往来的西域各国商胡提供了种种方便，如签发“过所”、派人护送等，从而使敦煌成为胡汉交往的都会。魏齐王时期，皇甫隆任敦煌太守（249—254年），他改变落后的耕作方式和穿衣习俗，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敦煌又成为丝绸路上的一处重要商品交易中心和粮食生产地。西晋泰始十一年（275年）令狐丰在敦煌修建储存军粮的大型仓城——河仓城（今大方盘城），反映了经济的繁荣和农业的进步。由斯坦因发现的粟特商人写给康国他家乡的一封书信，据认为是西晋末年的写本，其中记载了中亚粟特商胡从敦煌前往金城（兰州）销售大麻织物和毛毡的情况，揭示了敦煌商业兴盛的景象。

敦煌佛教艺术，正是当时历史、文化的产物。早在西晋时，就有月氏后裔竺法护在敦煌译经布道。前凉时，单道开、竺昙猷等高僧又在敦煌修习禅法。到了前秦建元二年，沙门乐僔便在鸣沙山上开凿了莫高窟的第一个石窟，敦煌佛教艺术之花从此绽开。乐僔所开之窟，现在虽无从考证，但通过对早期洞窟的比较、分析，仍能找到一组十六国晚期的石窟，如第267、268、269、270、271、275等窟。

五世纪中叶北魏占领敦煌后，曾设敦煌镇。明帝时将敦煌镇改为瓜州，后又改为义州。庄帝即位（528年）后，又改为瓜州，西魏、北周因之未改。

北魏宗室元荣任敦煌太守后，被封为东阳王。在他统治敦煌

的二十年间，莫高窟的开洞建龛，都与其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北魏分裂后，敦煌先后为西魏、北周所有。北周时期，建平公于义曾任瓜州刺史。他和东阳王元荣一样，都为敦煌地区带去了中原的文化艺术，也为莫高窟的修建作出了贡献。武周圣历碑在叙述了乐僔、法良之后说："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而后合州黎庶造作相仍，实神秀之幽岩，灵奇之净域也。""爰自秦建元之日，迄大周圣历之辰，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根据敦煌研究院的排年整理，北魏时期的洞窟共18个，如第246、247、248、249、251、254、257、259等窟。这一时期的主要窟形为人字披顶和中心塔柱的"塔庙"（或叫"支提"）窟。壁画多以佛本生故事和千佛为主要题材。北周时期的洞窟共10个，如第250、290、294、296等窟。这一时期的壁画内容首次出现了讲孝子和善兄恶弟的故事。

早期的莫高窟艺术，由于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其艺术风格也各具特点。十六国及北魏前期，内容简单，造型朴拙，色彩淳厚，线条苍劲，人物比例适度，面相丰圆，神情庄静恬淡。在衣冠服饰上还保留着西域和印度、波斯的风习。加上凹凸晕染法所形成的立体感和土红地色所形成的温暖浑厚的色调，形成了与魏晋艺术迥然不同的静的境界和形式风格，这种风格明显地受到西域佛教艺术的影响，因而可称为西域式风格；北魏晚期，尤其是西魏时期，民族传统神话题材等新的内容也进入了石窟，出现了爽朗明快、生机勃勃的生动意趣。而面貌清瘦、眉目开朗、嫣然含笑、衣裙飞扬的人物形象的出现，更形成了潇洒飘逸的风格。由于这种风格来自内地，故称中原风格；到了北周，由于北方民族大融合与南北文化的交流，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由并存而融合。在造型上，中原式秀骨清象与西域式丰圆脸型互相结合而产生了"面短而艳"的新形象。在晕染上，中原式染色法与西域式明暗法互相结合而产生了表现立体感的新晕染

法。在人物精神面貌上，淳朴庄静与潇洒飘逸相结合而产生了温婉娴雅、富于内在生命力的新形象。从整体上来说，北周时代的雕塑和壁画，使人感到了更浓厚的社会生活气息①。

四、丝绸路上的一颗明珠

——隋唐时代的敦煌

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并统一南北后，结束了三百多年南北分裂的局面，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全盛时期。开皇初年，隋文帝曾“罢天下诸郡”②，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敦煌也不例外，曾一度废郡为县。炀帝大业三年，又罢州置郡，复称敦煌郡。

隋末唐初，敦煌先由割据武威的李轨所有，后来又成为贺拔行威反叛唐朝的据点。唐王朝占领河西后，曾一度将隋代的敦煌郡改名为瓜州。武德五年（622年），又将瓜州分为两州：即瓜州和西沙州。瓜州治所在原晋昌县，领晋昌、常乐二县；西沙州治所在原敦煌县，领敦煌、寿昌二县。贞观七年（633年）又改西沙州为沙州，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全国都改州为郡，沙州又称为敦煌郡。安史之乱后，肃宗即位，又改郡为州，敦煌仍称沙州。以后就转入吐蕃时期了。

隋与唐代前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中西文化交流的加强，敦煌充分显示了它确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颗鲜艳夺目的明珠。

1、经济的高度发展

包括敦煌在内的隋唐河西地区，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与战略

---

①参阅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论集·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②《隋书》卷46《杨尚希传》

地位。其经济形态是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与畜牧业并举。

（１）农业　隋代以前，敦煌的经济主要是畜牧业。隋统一后，特别是唐代前期，由于水利事业的兴修，敦煌地区的农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敦煌地区的农业发展，完全依赖于水利事业。敦煌地区干旱少雨，年降水量仅37毫米，而年蒸发量却高达2500毫米，依靠天然降水，植物实难生长。敦煌绿洲的植物生长，全赖河渠维持。敦煌唐人写卷开宗明义地说：“本地，水是人血脉①”。为了有效地分配用水，管理用水，唐代的敦煌具有一套比较完备的法规，并严格执行。P·3560《沙州敦煌县地方用水灌田施行细则》，就是西魏邓彦所立，迨至隋唐，一直遵守的配水法则。其中分干、支、子等各级渠道，细列行水次序，并称其为“古老相传，用为法制”，可见它与政府的其他政令具有同等效力。敦煌遗书唐开元《水部式》，更是备载各级渠道的溉田次第、造堰、斗门节水的份量、开闭时期，渠道和斗门的修缮及相应各级官员的职责等法令。

为了有效地行使这些法规，敦煌还设置了专职官员和管理人员。《水部式》载：“沙州用水浇田，令县官检校。仍置前官四人，三月以后，九月以前行水时，前官各借官马一匹。”浇水溉田，必须由县官亲自负责，就是一般的分水斗门，也“皆须州县官司，检行安置，不得私造”。为了有效地管理用水，敦煌每乡都设“渠头”一名或数名，负责各乡水利事宜；各主要渠道或分水斗门，还设有渠长或斗门长，“诸渠长及斗门长，至浇田之时，专知节水多少。”由此可知，唐代的敦煌，自上而下有州、县官、前官、渠头、渠长和斗门长等多级管水人员，各司其职。对各级管理人员，还备有奖、惩条款，“若用水得所，田畴丰

①S·5894《渠规残卷》

殖，及用水不平，并虚弃水利者，年终录为功过附考①。”

敦煌水源，主要为源自南山、流入境内的河流，有甘泉水（即今党河）、苦水、独利河（即今疏勒河）等；另外还有源自本县，滋润本土的泉泽湖泊，有用于人畜饮用及农田灌溉的宕泉、分流泉、沙井（月牙泉）、悬泉、玉女泉等淡水泉、湖和可供野生耐碱植物生长用水的东盐池、北盐池、东泉泽、大井泽、四十里泽等盐碱泽泊②。

敦煌的三条河流又分为许多干、支、子渠，共有大小渠道九十多条，再加上二十多处泉泽湖泊，便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灌溉系统。地处西北边陲的敦煌，当时的人口也只有六万有余，然而水利事业竟如此发达，其渠道堰坝配套之完备、管水配水制度之严密，的确是令人赞叹的。

水利事业的兴修，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唐初为维护丝路，河西地区军镇林立，而“凡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其水陆腴瘠，播种地宜，功庸烦省，收率等级，咸取决焉③。”关于河西的屯田，《旧唐书·郭元振传》载：“大足元年，迁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先是，凉州封界南北不过四百余里，既逼突厥、吐蕃，二寇频岁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硖口置和戎城，北界碛中置白亭军，控其要路，乃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寇虏不复更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其水陆之利。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籴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唐代从高宗、武后到玄宗时期，都在河陇地区，尤其是鄯、凉、河、甘等州大兴屯田。高宗永隆元年（680年），

---

①参阅李并成《唐代敦煌绿洲水系考》，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1期

②参阅李正宇《唐宋时代敦煌县河渠泽泉简志》，载《敦煌研究》1988年4期

③《旧唐书》卷43《职官志·屯田员外郎》

河源军经略使黑齿常之“以河源军正当贼冲，欲加兵镇守，恐有运转之费，遂远置烽戍七十余所，度开营田五千余顷①。”武则天时期，“河州军镇要冲，屯田最多②。”到玄宗时，全国诸军州屯田共992处，河陇地区就有326处，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而凉、甘、河等州又是河陇屯田的最主要部分。这种情况充分说明，唐王朝的屯田政策与其军镇的设置密切相关，它体现了唐王朝在河陇屯田的军事、政治目的：假如不开辟这样广大的屯田，唐王朝就无法在这里进行一系列较有成效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就无法保证丝路的畅通和西北政局的稳定③。

在唐代河陇经济的发展繁荣中，河西的敦煌尤为突出。敦煌绿洲自西南向东北呈扇面展开，面积约300平方公里。其中耕地面积缺乏统计资料，仅大谷文书2839V载有武周圣历二年（699年）前后敦煌县各乡营种麦豆亩数为“486顷8亩”，这当然并非全部农作物种植面积。据有的研究者推测，唐代敦煌县的耕地面积约10万亩④。.

由于唐王朝积极推行屯田、营田事业，敦煌地区的农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如岑参《敦煌太守后庭歌》所说：“太守到来山出泉，黄沙碛里人种田”，敦煌壁画中也有许多农事活动的场面。在哥舒翰坐镇凉州时，“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⑤。”

敦煌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从当时的粮价中也能得到少许反映。敦煌文书P·3348号（背）载“天宝四载河西豆卢军和籴会计录”与“天宝六载十一月河西豆卢军仓收纳籴粟牒”有：“行

---

①《旧唐书》卷109《黑齿常之传》

②《文苑英华》卷920张说《唐河州刺史冉府君神道碑》

③参阅钮海燕《唐代河西陇右的战略地位》，载《历史教学》1985年1期

④参阅李正宇《唐宋时代敦煌县河渠泉泽简志》

⑤《太平广记》卷485《东城老父传》

客任悉子粟壹百捌硕陆斗，斗估二十一文”，“壹万肆百伍拾伍硕肆斗壹胜捌合粟，斗估二十七文”，“玖阡贰百肆拾柒硕柒胜肆合粟，斗估三十二文。”取以上三种物价的中等价，即敦煌地区斗粟二十七文，比内地略高。

（2）畜牧业　河西地区土地肥沃，水草丰美，为亦农亦牧之胜地，因此其畜牧业远较内地为发达。祁连山和焉支山是河西地区的天然牧场。《元和郡县图志·陇右道》载：“祁连山在县西南二百里张掖、酒泉二界上，美水茂草，山中冬温夏凉，宜放牧。牛羊充肥，乳酪浓好。”又说：“删丹县本汉旧县，属张掖郡，水草茂美，与祁连山同。”

唐王朝建立之初，就开始经营河西地区的畜牧业。“大唐接周隋乱离之后，承天下征战之弊，鸠括残烬，仅得牝牡三千，从赤岸泽徙之陇右，始命太仆张万岁葺其政焉①”，首先在此地设置监牧。“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杂以牛羊杂畜，不啻百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②。”由于唐政府的高度重视，河西的畜牧业发展极快。“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幅员千里，犹为隘狭，更析八监，布于河曲（《文献通考》卷159作“河西”）丰旷之野，乃能容之。于斯之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③”，这是唐代畜牧业发展的鼎盛时期。

唐王朝对畜牧业的管理十分重视，有一套严密的组织机构④。在河西国家牧场内，“凡马五千匹为上监，三千已上为中监，已

---

①《全唐文》卷226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

②《旧唐书》卷141《张茂宗传》

③《全唐文》卷226张说《陇右监牧颂德碑》

④详见《新唐书》卷50《兵志》

下为下监①。”唐王朝为便于管理，“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皆属七马坊②。”

经过隋、唐王朝的开发，河西地区的社会经济比前代有了长足的发展。“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③。”

2、中西交通的兴盛

隋王朝建立之后，即着手经营西域，以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发展商业贸易。在我国历史上，特别是汉唐之间十来个建都长安的王朝，都注重加强西北方面的防御，尤其重视对河西走廊的经营。这一点早在汉代就认识得很清楚。清代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要》中说：“昔人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合乎逻辑地总结了这方面的历史经验。

隋初，危及丝路畅通的主要是吐谷浑和突厥，这两股势力呈南北夹峙，中断了丝路贸易。裴矩在《西域图记序》中说：“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④。”

隋炀帝把经营西域的事务交给裴矩。大业初，“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裴矩在河西通过胡商对西域情况作了一番调查、了解，并根据其掌握的实际情况写了《西域图记》三卷，上奏朝廷，引起了炀帝的极大兴趣。当炀帝召见裴矩时，他又讲了一些西域、河西的情况及发展丝路贸易的重要性，并说吐谷浑也不难打。“帝于是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甘心将通西域。”自此，隋炀帝把降服吐谷浑、突厥，“混

---

①《唐六典》卷17《太仆寺》

②《旧唐书》卷141《张茂宗传》

③《通鉴》卷216玄宗天宝十二载条

④《隋书》卷67《裴矩传》

壹戎夏”①，交通西域，发展丝路贸易定为国策②。

为了打通丝绸之路，炀帝便西巡河西。大业五年（609年），炀帝由大斗拔谷（今甘肃民乐县扁都口）而“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番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③。”对此次盛况，《隋书·炀帝纪》的记载更为详细，“壬子，高昌王麹伯雅来朝，伊吾吐屯设等献西域数千里之地。……丙辰，上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舞剧《丝路花雨》的某些题材，就是取之于这段历史的。

炀帝的西巡，大大促进了丝路贸易的繁荣。早在裴矩经营西域时，就常常往来于敦煌以至西域之间。隋炀帝在接待西域使者和商人的同时，还派韦节、杜行满等人出使西域。他们到达克什米尔、印度等地，得到了玛瑙杯、佛经、狮皮、火鼠毛等等。在炀帝西巡的翌年正月十五，诸蕃酋长齐集洛阳，贡献方物。大业十一年（615年）正月，突厥等二十六国遣使朝贡，其中许多人来自西域。其后，“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帝许之”，并“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④。”

隋代丝绸之路的兴盛，与道路的畅通是密切相关的。隋代以前，中西交通的路线只有南北两道。隋时，不仅以前的道路更加畅通，而且又增加了新的一道。这样，隋通西域的道路共有三条，即北道（又叫新北道）、中道（汉代的北道）和南道。具体来说：

---

①《通鉴》卷180炀帝大业三年条

②参阅胡戟《炀帝西巡》，载《丝路访古》

③《隋书》卷67《裴矩传》

④《隋书》卷67《裴矩传》

北道：出敦煌至伊吾（今哈密），再经蒲类（今巴里坤）、铁勒部，度今楚河、锡尔河而达西海（今地中海）。在我国境内大致是沿天山北麓而至中亚。

中道：出敦煌至高昌（今吐鲁番），经焉耆、龟兹（今库车）、疏勒（今喀什），越葱岭，再经今苏联费尔干纳、乌拉提尤别等地而至波斯（今伊朗）。在我国境内大致是沿天山南麓而至葱岭。

南道：出敦煌至鄯善（今若羌），经于阗、朱俱波（今叶城南）、渴盘陀（今塔什库尔干），越葱岭，再经阿富汗、巴基斯坦而至印度各地。在我国境内是大致沿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而至帕米尔高原。

中西交通的这三条道路都“发自敦煌”，然后经伊吾、高昌、鄯善而达中亚、欧洲，“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①”，这就清楚地说明了敦煌在中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和枢纽作用。

唐王朝建立后，仍积极经营西域。在消灭北方的劲敌东突厥后，就转而进军西域。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平定高昌，贞观十八年又攻焉耆，二十二年破龟兹，到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终于扼制了西域地区最大的敌对势力西突厥，西域各国的宗主权也正式从西突厥转移到唐朝手中。在唐朝经营西域的这些活动中，敦煌除了作为唐朝进军西域的物质供应基地外，沙州刺史也曾亲自率兵参加了诸如攻取龟兹的战斗。此后，在唐朝与西突厥、吐蕃余部争夺西域的斗争中，沙州是协助安西都护府（驻龟兹）控制西域的重要力量。

唐朝前期，除了高宗永隆二年（681年）“西边不静，瓜沙路绝”和玄宗开元十五年（727年）吐蕃一度攻占瓜沙外，敦煌

---

①《隋书》卷67《裴矩传》

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一直在稳步向前发展，这从前述农业、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水利灌溉系统的完善中就可得到证明。农牧业生产的进步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当时敦煌的集市上，既有内地来的汉族客商，也有从中亚各国来的胡商。“商胡”的来源很多，如阿拉伯、非洲、东罗马帝国、波斯、印度半岛诸国等，都与唐有所谓“通贡”、“通使”的商业贸易关系。敦煌城东的沙州十三乡之一的从化乡，就是由陆续定居下来的粟特商人组成的。敦煌遗书P·3559《唐天宝十载差科簿》中列举了“贰佰伍拾柒人从化乡”，从这250余人的姓名看，基本上都是康、安、石、曹、罗、何、米、史等昭武九姓胡人，这就赋予了从化乡以粟特族聚居乡的特点。而且乡被命名为“从化”，下设里名现知有“慕道里”，可能是取“慕道来归”、“从化内附”之义。由此可以确定，当大批粟特商人定居敦煌后，沙州官府把他们“当作慕义来归，从化内附者，在敦煌划出地域加以安置，并建乡设制，编入户籍　。”

大批的行商坐贾在敦煌从事着中原的丝绸和瓷器、西域的珍宝、北方的驼马和当地的粮食等各种交易，使敦煌这个中转贸易城市繁华一时，更显示了其中西交通的咽喉作用。“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②。”就是对西域胡商入贡贸易之盛况的描写。唐代九姓胡入贡贸易的路线，大体上是发轫于中亚两河流域，经碎叶川、热海道、大碛路，从敦煌入河西走廊，终抵长安。据统计，从武德七年（624年）到天宝十四年（755年）的130年间，唐代九姓胡共入贡89次，其中康3次、石18次、安9次、曹8次、史5次、火寻3次、何1次③。张籍的《凉州词》用“边城暮雨雁飞低，芦

①陈国灿《唐五代敦煌县乡里制的演变》，载《敦煌研究》1989年3期

②鲍防《杂感》，见《全唐诗》卷307

③蔡鸿生《唐代九姓胡贡品分析》，载《文史》31辑，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

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生动诗句，反映了当年运载丝绸等货物的骆驼商队，不畏艰险，日夜兼程，在叮咚的驼铃声中经过敦煌，向西方前进的情景。

不论丝绸之路的路线怎样变化，敦煌都是唯一不变的重要吐纳口。所有商人、使节、僧徒的西去东来，都必须经过敦煌。贞观年间玄奘东归时，太宗就令敦煌吏民“赴流沙迎接”。敦煌以西110里的“兴胡泊”，就是专门接待胡商的。敦煌唐代壁画《维摩诘经变文殊问疾品》中的“各国王子图”，就是对当时现实生活的形象记录。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丝绸之路的畅通，大大丰富了敦煌文化的内容。沙州城内有州县两级学校，教授唐朝规定的儒家经典；大量长安官廷写经的传人，为佛教圣城敦煌进一步灌注了汉地佛教的影响；道经的传写和道观的建立，是李唐王室尊老子为先祖的反映；从化乡的祆神祠和开元年间写的摩尼经经典，透露了粟特人的信仰、传播西亚宗教的信息。可以说，当时的敦煌凝聚了中国、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系统的文化，呈现出异彩纷陈的文化景观 。

3、辉煌灿烂的莫高窟艺术

在尼姑庙里长大的隋文帝，深崇佛教，他曾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在昙延法师面前受“八戒”。仁寿元年（601年），隋文帝诏令天下各州建舍利塔，瓜州也在崇教寺（即莫高窟）起塔，安放释迦舍利。隋炀帝更是“优游于大乘”的“总持菩萨”，曾直接派中使到敦煌建讲堂，在崇教寺修舍利塔。在隋朝统治者崇佛浪潮的推动下，短短三十余年中，莫高窟竟开凿了七、八十个洞窟。此时的佛教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

---

①荣新江《敦煌的兴衰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载《文史知识》1988年8期

唐代前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中西交通的昌盛，文化教育也有了很大进步。对于宗教，也是释道兼崇，因而两教之间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高祖武德年间，由于傅奕的极力辟佛，李渊曾下过《沙汰僧道诏》。李世民继位后，也曾公开表示过“至于佛教，非意所遵①”。其实，他们的真实意图是要把道教摆在佛教之上，并非要废除佛教。到玄奘求法归来之后，唐太宗的态度就明显地转变了。在武德、贞观时期，佛教虽然受到了一些压抑，但并没有达到阻碍佛教传播的程度。

宗教之争常常是政治斗争的反映，初唐的释道之争也反映了武、李两族争夺政权的背景。武则天当权后，为了取代李氏王朝而自立，就大造符瑞图谶作为舆论准备。僧人怀义、法朗等造《大云经疏》，称武则天是弥勒下世。所以，当武则天登位后，立即以诏令形式规定佛在道上，并大造佛寺，广度僧尼。开元年间，凿龛造像之风仍十分兴盛。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敦煌的佛寺更如雨后春笋一样地出现。仅莫高窟现存题记中有名者，就有龙兴寺、大云寺、普光寺、金光明寺等等②。

此时的莫高窟，“前流长河，波映重阁”，空前壮观。正如《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所说：“西连九陇坂，鸣沙飞井擅其名；东接三危峰，泫露翔云腾其美。左右形胜，前后显敞，川原丽，物色新。仙禽瑞兽育其阿，班羽毛而百采；珍木嘉卉生其谷，绚花叶而千光。尔其镌嵘开基，植端桔而概日；礲山为塔，构层台以簪天。刻石穷阿育之工，雕檀极优填之妙。……升其栏槛，疑绝累于人间；窥其宫阙，似游神乎天上。”

隋朝的壁画内容，故事画减少，经变画增多，各种各样的“累世苦修”和“忍辱精神”已由“西方极乐世界”和“方便成

---

①《全唐文》卷8太宗《贬萧瑀手诏》

②参阅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论集·唐代前期的莫高窟艺术》

佛”所代替。经变画的种类有《维摩诘经变》、《东方药师变》、《法华经变》、《涅槃变》、《弥勒经变》、《阿弥陀经变》等。这时候的经变画，虽然种类不多，甚至有的画面简单，画幅不大，但它是唐代大幅经变画的雏形。

中国佛教发展到唐代，“无情有性”的佛教哲理已十分流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作为一种口号而正式提出，在这种情况下，经过“累世苦修”才能成佛的说教，亦随之失去了作用。反映在佛教艺术上，小孩“聚沙成塔”皆可成佛的《法华经变》；庄稼“一种七收”，树上“自然生衣”，人们视金钱如粪土的《弥勒经变》；一心念佛，“九品往生极乐世界”的《阿弥陀经变》；只要念一声“药师佛”的名号，一切无救、无归、无医、无药、无亲、无家等等苦难皆可得救，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药师变》等等，相应而生。此时敦煌壁画的特点，就是通壁大型经变画的出现。它规模宏伟，人物众多，色彩绚丽，是唐前期璀璨夺目的敦煌艺术的充分反映。

隋唐时代的塑像，数量最多制作最精的是与人等高的群像，而巨型佛像的出现，则是唐代前期莫高窟彩塑艺术的显著特点。

敦煌巨型造像的出现，是与唐前期的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的。当武则天夺得皇位宝座后，为了称帝改号，便授意法朗、薛怀义等十个和尚于载初元年（689年）著《大云经疏》，“盛言神皇受命之事”。说弥勒菩萨为化渡众生变为女身，“作阎浮提主”，“以继王嗣”，“当王国土”，“女王承正，威伏天下”，意指武则天应该当皇帝。

武则天收到这部《大云经》后，如获至宝，立即向全国发令，让“诸州各置大云寺”，并将《大云经》“颁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座讲说”，同时改唐为周。敦煌北大像（即第96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建造的。P·3720《莫高窟记》载：“至延载二年，禅师灵隐共居士阴祖等造北大像，高一百四十

尺。”这个窟大概就是敦煌写本中提到的“大云寺”。北大像的出现，是与武则天的一系列佞佛行为分不开的。它内塑33米高的弥勒佛一躯，后经晚唐、宋初、清末和民国的重修，其手势、衣纹、色彩均非原作，只有头部还保存着初唐丰满圆润的旧貌。如果与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乐山大佛相比，在规模上虽然瞠乎其后，但就其艺术而论，则不可同日而语。乐山大佛巍然屹立，气势雄伟，它以大轮廓的形式美取胜，但仅具雏形。敦煌北大像，则形象真实，塑工精湛，它以写实而富丽的风格见长。以彩塑而言，它是当今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也是规模最大的雕塑杰作。

除北大像外，还有南大像。《莫高窟记》说：“开元年中，僧处谚与乡人马思忠等造南大像，高一百廿尺”。南大像即第130窟，内塑26米高的弥勒大像一尊。除其右手为后加者外，基本上保存原状，比例适当，躯体健壮，曲眉丰颐，神态庄静，充分显示了盛唐的风格。

敦煌南、北大像的修建，是莫高窟历史上的创举，同时也是唐代敦煌及整个国家繁荣、强盛的象征。

五、吐蕃的统治与张议潮起义

吐蕃是藏族的前身，很早以前，就居住在青康藏高原上。公元六、七世纪之交，吐蕃在其杰出领袖松赞干布的领导下，建立了统一而强大的奴隶制国家。

唐代初年，唐太宗以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唐中宗时，又以金城公主嫁吐蕃王尺带珠丹（即弃隶缩赞）。唐蕃和亲，不仅加强了唐王朝与吐蕃的政治联系，而且还把汉族先进的农业、手工业和文化艺术带到吐蕃，对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1、吐蕃治下的敦煌

在唐代，唐与吐蕃虽然有非常密切的政治、经济关系，但吐蕃当时仍是一个奴隶制政权，奴隶主贵族为了掠夺土地、财富和人口，不断向外扩张，并和唐王朝发生了一系列冲突。早在高宗时期，吐蕃就在大非川之役中击败了唐朝大军，并占领了“安西四镇”。此后，唐虽一度收复了“安西四镇”，但唐蕃之间的战争却连绵不断，河西地区也处于吐蕃的威胁之下。由于这时唐王朝处于鼎盛时期，在河西及陇右地区设有重兵防守，因而暂时遏制了吐蕃的兵锋。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被迫将河西、陇右及“安西四镇”精兵东调以平叛，吐蕃乃乘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掠夺战争，占领了整个河西、陇右地区。

吐蕃的这次进攻，其战略是先蚕食唐朝边境军事据点，然后重点突破陇右，遮断河西，兵锋直指唐王朝的政治中心长安。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吐蕃兵陷威戎、宣威、制胜、金天、天成等军，入据石堡城、百谷城、雕谷城。翌年，占廓、霸、岷等州及河源、莫门军。宝应元年（762年）陷临洮，取秦、成、渭等州。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又陷洮、河、兰、鄯等州。这样，吐蕃就切断了唐王朝中央与西北边境诸州的联系，整个陇右道就在吐蕃势力的威胁之下了。同年十月，吐蕃攻占了长安，代宗被迫逃往陕州。由于唐朝军民的英勇斗争，吐蕃在长安只逗留13天就撤出了关中。但它回过头来又觊觎河西，从764—776年，先后攻占了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最后终于在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占领了沙州（敦煌），从而整个河西都被吐蕃所控制。

面对吐蕃的步步进逼，河西军民在与内地隔绝无援的困境中，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沙州军民的拒守尤为突出。《新唐书·吐蕃传》载：“始沙州刺史周鼎为唐固守，赞普徙帐南山，使尚

绮心儿攻之。鼎请救回鹘，逾年不至，议焚城郭，引众东奔，皆以为不可。鼎遣都知兵马使阎朝领壮士行视水草。……（阎朝）执鼎而缢杀之，自领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绫一端募麦一斗，应者甚众。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岁，粮械皆竭，登城而呼曰：‘苟毋徙它境，请以城降。’绮心儿许诺，于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从这条记载可知，在周围各州皆已陷蕃的情况下，沙州人民仍英勇抵抗，前后坚持了十一年之久，并在争得“不徙它境”的条件下，才开门纳款。

吐蕃奴隶主所发动的战争，其目的主要是掠夺人口和财产。他们每攻占一地，都劫夺财物，践踏农作物，焚烧房屋，屠杀老弱妇女，而把丁壮年掳去为奴。唐代沈既济说：“初，吐蕃既得河、湟之地，土宇日广，守兵劳弊，以国家始因用胡为边将而致祸，故得河、陇之士约五十万人，以为非族类也，无贤愚，莫敢任者，悉以为婢仆①。”并根据其在河西、陇右的见闻说：“自轮海以东，神鸟、敦煌、张掖、酒泉，东至于金城、会宁，东南至于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镇十四军，皆唐人子孙，生为戎奴婢，田牧种作，或丛居城落之间；或散处野泽之中，及霜露既降，以为岁时，必东望啼嘘，其感故国之思如此②。”

吐蕃奴隶主贵族的暴虐统治与奴役，使河西、陇右地区的汉族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并怀恨在心，时刻盼望着摆脱其统治。建中元年（780年），唐派韦伦出使吐蕃，在他返回路过河陇地区时，当地汉族人民“皆毛裘蓬首，窥觇墙隙，或捶心陨泣，或东向拜舞，及密通章疏，言蕃之虚实，望王师之至若岁焉③。”当穆宗长庆年间刘元鼎会盟吐蕃，行至龙支县（今青海省乐都县

---

①《通鉴》卷226唐德宗建中元年四月条引《通鉴考异》

②《沈下贤文集》卷十

③《通鉴》卷226唐德宗建中元年四月条引《通鉴考异》

南）时，“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密问之，丰州（今内蒙五原县）人也①。”从而可知，当时的敦煌人民十分怀念唐王朝。敦煌曲子词中的“敦煌郡，四面六蕃围，生灵苦屈青天见，数年路隔失朝仪，目断望龙墀②”；“敦煌古往出神将，感得诸蕃遥钦仰。效节望龙庭，麟台早有名。只恨隔蕃部，情恳难申吐。早晚灭狼蕃，一齐拜圣颜③”等，就是这种心情的真实流露。被伯希和劫去的P·2555号《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就是建中年间吐蕃占领敦煌、张掖后，被蕃军押往青海湖东侧监禁的两位唐俘——马云奇和佚名氏的囚诗72首，它“在历史上是很可宝贵的纪行诗，也是研究这段历史的有用的参考资料④。”如“哀哉存殁苦难量，共恨沦流处异乡。可叹生涯光景促，旋嗟死路夜何长！空令肝胆摧林竹，每使心魂痛渭阳⑤”；“戎庭缧绁向穷秋，寒暑更迁岁欲周。斑斑泪下皆成血，片片云来尽带愁。朝朝心逐东溪水，夜夜魂随西月流。数度栖惶犹未了，一生荣乐可能休⑥。”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缚戎人》一诗，也是描写唐俘从吐蕃奴隶主手中逃回的情况：“一落蕃中四十载，遣著皮裘系毛带；唯许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誓心密定归乡计，不使蕃中妻子知；暗思幸有残筋力，更恐年衰归不得。蕃候严兵鸟不飞，脱身冒死奔逃归⑦”。这些诗歌也

---

①《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下》

②王重民先生《敦煌曲子词集·望江南》，商务印书馆1956年出版

③P·3128《菩萨蛮》

④舒学《敦煌唐人诗集残卷》整理稿前言，全诗见《文物资料丛刊》第一集，文物出版社1977年出版

⑤佚名氏《哭押牙四寂》

⑥佚名氏《晚秋》

⑦《白氏长庆集》卷3《新乐府·缚戎人》

都真实反映了当时陷蕃的河陇汉族人民的普遍心理状态。

由于吐蕃奴隶制的残暴统治，使广大陷蕃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为了争得生存权利，不断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建中二年吐蕃占领沙州后，虽用“置毒鞞中”的暗杀手段，杀害了抗蕃运动的领导人阎朝，但沙州人民并没有屈服，反蕃斗争此伏彼起，从未间断。敦煌遗书S·1438号卷子背面有《书仪》残稿177行，反映了吐蕃占领敦煌不久，沙州玉关驿户汜国忠等领导的震动当时的一次反蕃起义。起义者夺取了战马铠甲，杀死了蕃官，“誓众前行，拟救（蕃官）节儿、蕃使，及至子城南门下，其节儿等已纵火烧舍，伏剑自裁，投身火中，化为灰烬。”他们在三夜之间，就越过了从酒泉到敦煌之间的重重城关烽塞。由于采取了“夜越重城”的夜战战术，遂使“东道烽铺，烟尘莫知”，“蕃官慢防，不虞祸至，人力散乱，难与力争。”从而暴露了吐蕃奴隶制统治的外强中干。

汜国忠起义得到了敦煌当地群众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书仪》中所说：“迫胁人庶，张皇兵威”，“勃逆之人，已闻伏法，胁从之类，锢送瓜州”等语就是明证。从“伪立驿户刑兴，扬言拓拔王子”来看，起义者似乎还建立了王号，立驿户刑兴为王，号称“拓拔王子”。

沙州玉关驿户汜国忠起义，是在吐蕃统治集团与役属各部之间矛盾日趋尖锐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起义似乎带有浓郁的反民族压迫的色彩。《书仪》中所说，“戕杀蕃官”、“蕃官慢防，不虞祸至”，“似救节儿蕃使”，“今蕃军将等，或在或亡，不知实数”等，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起义者被捕后的供词中也说：“遂谋杀蕃官是实。”但是，由于起义者缺乏阶级的分析，没有认识到为吐蕃政权服务的汉族“破落官”（即吐蕃俘获的降官、唐官）与吐蕃奴隶主一样都是阶级敌人。以致中了《书仪》作者即某汉族“破落官”的奸计，惨遭逮捕杀害或锢送瓜州的结

局，遂使这次起义失败了①。

在汜国忠起义的同时或同月，还有玉关驿户张清的起义。S·1438《书仪》："推免玉关驿户张清等徙东煞人，聚都逃走，劫马取甲，来赴沙州"，就是这次起义的简略记载②。

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沙州人民的反抗斗争，敦煌藏文文书中也有反映。藏于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编号为Fr80的一件敦煌藏文文书，就提到"赞普占有沙州城堡及汉人臣民"，（汉人臣民）"为争主权而对抗，杀死优秀的蕃人臣民。"又提到，"嗣后，当我能够以极大努力使城市恢复，城市按功劳对我……派我任节儿。"英译者陶慕士认为，这件文书显然提及吐蕃人对沙州的一次夺取，提及一次接着发生的无疑是由汉人鼓动的起义③。

沙州玉关驿户汜国忠及张清等人的起义，预兆着吐蕃奴隶制的墀松德赞朝，正处于从军事扩张的极盛时期转衰的关头。吐蕃占领河西，其"军事上盛极一时，然而，自783年建中会盟及787年平凉劫盟之后，集结在吐蕃王朝的各种矛盾尖锐起来，本教集团与新兴佛教集团的争斗，主战派与主和派的争斗，各属部的失控，奴隶和役属人民的反抗，都预示着吐蕃王朝的走向崩解。"④

在吐蕃王朝逐渐走向崩溃的时候，唐王朝由于藩镇割据，国力衰弱，唐军正穷于对付内地的藩镇势力，尚无暇西顾，只能对吐蕃采取守势。河西人民也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推翻吐蕃的统治。他们一直在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终于在宣宗大中二年

---

①参阅姜伯勤《唐敦煌"书仪"写本中所见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一辑

②参阅史苇湘《吐蕃王朝管辖沙州前后》，载《敦煌研究》创刊号

③陶慕士《新疆吐蕃文书集》第2卷，1951年伦敦出版。转引自姜伯勤《唐敦煌"书仪"写本中所见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

④姜伯勤《唐敦煌"书仪"写本中所见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

（848年）发生了张议潮起义，一举打败吐蕃统治者，收复了沙州及其他各地。

2、张议潮起义及归义军的建立

张议潮，甘肃敦煌人，出生在敦煌已被吐蕃占领的时期。由于他亲身经历了吐蕃的残暴统治，在青少年之际便忧国爱民。他有感于吐蕃统治下民不聊生的凋敝景象，深深同情人民的疾苦，十分崇敬在平定“安史之乱”中被宦官边令诚陷害的著名将领封常清，曾亲笔抄写过《封常清谢死表闻》。宪宗元和十年（815年），17岁的张议潮曾抄下了一首《无名歌》① 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天下沸腾积年岁，米到千钱人失计。附槨（郭）种得二顷田，磨折不充十一税。……舞女庭前厌酒肉，不知百姓饿眠宿。君不见城外空墙匡（框），将军只是栽花竹。君看城外恓惶处，段段芋花如柳絮。海燕冲（衔）泥欲作巢，空堂无人却飞去。”在以后的岁月里，张议潮时刻在考虑着出路问题。他注重韬略，“论兵讲剑，蕴习武经，得孙、吴、白起之精见②。”并曾背井离乡，到过拉萨等地，深入了解吐蕃内情，结识豪杰，犹如“盘桓卧龙，候时即起③。”

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吐蕃达磨赞普去世，达磨无子，佞臣立其妃绨氏三岁的侄儿乞离胡为赞普，许多人都不服，甚至离叛，从而导致了吐蕃国内的大乱。吐蕃本部称作“邦金洛”的奴隶平民也乘机起义。藏文史书说，这次起义“初发难于康，寝而及于全藏，喻如一鸟飞腾，百鸟影从，四方骚然，天下大乱④。”吐蕃原洛门川讨击使尚恐热（即论恐热）亦叛，并篡夺

①P·3620

②S·3329《张氏修功德记》

③P·3556《张氏墓志铭》

④刘立千编译《续藏史鉴》，成都华西大学1945年出版。转引自陈守忠《公元八世纪后期至十一世纪前期河西历史述论》，载《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4期

了吐蕃大权，自称为宰相，与鄯州节度使尚婢婢为争权夺利，自相残杀，更加深了河西人民的灾难。尚恐热“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杀其丁壮，剔刖其羸老及妇人，以槊贯婴儿为戏，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①。”尚恐热在河西的暴虐行径，不仅激起了河西人民的极大愤慨，而且还使他的部下怨望不平，“皆欲图之②。”正在这时，吐蕃国内灾荒连年，“人饥疫，死者相枕藉”，河陇各地吐蕃守将思想混乱，兵防空虚。唐王朝乘此机会，决心收复河湟地区。会昌四年（844年）三月，“朝廷以回鹘衰微，吐蕃内乱，议复河、湟四镇十八州③。”大中元年（847年）五月，河东节度使王宰率代北诸军，于盐州大败尚恐热。次年12月，凤翔节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④”，并一举收复了原州（宁夏固原）、石门等六关和威州（宁夏中卫县）、扶州（甘肃文县西）。唐王朝的军事胜利，给河陇人民带来了希望和鼓舞，而张议潮也正是乘着这个机会举起了起义大旗。

张议潮在沙州首举义旗，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的。自大历元年（766年）河西节度杨休明由凉州徙镇沙州后，汉族军民也纷纷来到敦煌，沙州遂成为当时河西地区汉人的聚集地。当吐蕃略取沙州时，沙州人民坚持斗争，固守达11年之久。后因弹尽粮绝，在“不徙它境”的前提下，才出城投降。这样就使沙州的汉人得以聚存，并将唐朝的思想文化、风俗民情等延续了下来，这就是张议潮首举义旗的社会基础。

张议潮沙州起义，其骨干力量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敦煌的名门望族。如张氏、索氏、李氏等，他们都是沙州一带举足轻重

---

①《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四年九月条

②《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下》

③《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四年三月条

④《通鉴》卷248唐宣宗大中二年十二月条

的家族，在起义和收复河西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第二、释门教首及僧徒。如洪谿虽在吐蕃“知释门都法律兼摄行教授”，但他“远怀故国，愿被皇风”，所以尽力帮助张议潮收复沙州。敦煌乃中西交通要冲，佛教极为兴盛，教徒数量庞大，释门教首及僧徒在百姓中有一定的号召力；第三、豪杰义士。如副使安景旻、部落使阎英达等都是当地豪杰。①

张议潮正是在这些人的鼎力相助下，才明确提出了“归国”的口号，并广泛地组织、团结了各方面的力量。当条件成熟时，他毅然“募兵”集众，发动起义。大中二年（848年）“帅众被甲噪于州门，唐人皆应之，吐蕃守将惊走，议潮遂摄州事”②。当然，张议潮起义并非史书记载的这样简单、容易，而是经过浴血奋战的。在短兵相接之际，“白刃交锋，横尸遍野，残烬星散，雾卷南奔”。③经过一场血肉鏖战后，一举收复了沙州。唐宣宗听到这一喜讯后，竟情不自禁地欣然赞叹：“关西出将，岂虚也哉”。

当张议潮收复沙州时，河西其他州县仍在吐蕃统治之下。为了及时向唐王朝告捷，并确保表文送到长安，他便派遣了十队使者，携带十份同样的表文，分十路赴长安。其中还有由和尚组成的一支，这是因为吐蕃奴隶主也信奉佛教，和尚游方化缘，易于通行。敦煌莫高窟的大和尚悟真就是当时的信使之一，因为他送信有功，被唐王朝于大中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封为“京城临坛大德”。在十队使者中，只有走东北道的一路，经过千辛万苦，才在天德军（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防御使李丕的协助下，于大中

---

①参阅谭蝉雪《统一河西的功臣——张议潮》，载《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

②《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五年正月条

③S·3329《张氏修功德记》

四年抵京。在这两年中，张议潮一方面把沙州作为根据地，整饬军队，发展生产，“缮甲兵，耕且战”。另一方面以沙州为根据地，继续进军，和吐蕃奴隶主展开了进一步的斗争。到大中五年（851年），又相继收复了瓜州、伊州（新疆哈密）、西州（新疆吐鲁番）、甘州、肃州等地区。为了实现“归国”之目的，张议潮于大中五年八月又派其兄议谭和州人李明达、李明振、押衙吴安正等29人奉十一州（瓜、沙、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图籍入长安告捷。至此，除凉州而外，陷于吐蕃近百年之久的河西故地复归唐王朝所有。

唐宣宗接到瓜、沙十一州图籍和张议潮的捷报后，特下诏表扬张议潮等人的忠勇和功勋，诏令说：张议潮“抗忠臣之丹心，折昆夷之长角。窦融河西之故事，见于盛时；李陵教射之奇兵，无非义旅①”。并命使者赍诏收慰，拜议潮为沙州防御使、明达为河西节度衙推兼监察御史、明振为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御史中丞，吴安正等亦授官武卫有差。11月，唐王朝于沙州建立归义军，统领瓜、沙等十一州，以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管内观察处置、营田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特进，食邑二千户，实封三百户。

随着瓜、沙、肃、甘诸州的收复及沙州归义军的建立，吐蕃军队节节败退，最后集中于姑臧（即凉州）。咸通二年(861年）三月，张议潮自将蕃、汉兵七千人克复了凉州，并表奏朝廷，于是，“河陇陷没百余年，至时悉复故地②”。咸通四年唐王朝复置凉州节度，统领凉、洮、西、鄯、河、临六州，治所在凉州，由张议潮兼领凉州节度使。从此，河西走廊又畅通无阻，这对于加强西北与中原地区的政治联系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

①杜牧《樊川文集》卷20《沙州专使押衙吴安正等二十九人授官制》，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

②《通鉴考异》卷22

用①。

张议潮在沙州的起义及率军收复河西地区，使河西各族人民摆脱了吐蕃奴隶主的残暴统治。他们衷心感谢和爱戴张议潮，热忱赞颂张议潮的英雄业绩说：

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
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②

张议潮收复河西及归义军的建立，并非意味着唐王朝有效地控制了河西地区。自从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政治腐败，国力衰微，除置军设使，并以官爵羁縻张议潮外，已没有经营河西的军事能力了。史称张议潮以瓜沙等“十一州来归，而宣（宗）、懿（宗）德微，不暇疆理，惟名存有司而已③”。而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其身兼节度、管内观察、营田支度等使，握有军事、行政、财经大权，经营河西地区的任务也自然历史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当时，河西地区的形势还十分复杂：南面的吐蕃还在伺机卷土重来；北面的回鹘也在觊觎着河西这块富庶之地。另外，吐蕃的奴部嗢末，自“尚恐热作乱，奴多无主，遂相纠合为部落，散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之间，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④”。他们纠合在一起，大肆劫掠河西各地。

张议潮清醒地认识到当时河西的险恶处境。他不得不在没有唐王朝帮助的情况下，领导河西人民与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进行长期的斗争。《张议潮变文》直接记述了大中十年至十一年间的三次战役：第一次是吐谷浑王进犯沙州，张议潮出兵讨伐，乘胜

---

①参阅田廷柱《张议潮传》，载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四辑，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

②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

③《新唐书》卷40《地理志》

④《通鉴》卷250唐懿宗咸通三年条

追击，并大获全胜。“诸川吐蕃兵马还来劫掠沙州。奸人探得事宜，星夜来报仆射（即张议潮）：‘吐浑王集诸川蕃贼欲来侵凌抄掠，其吐蕃至今尚未齐集’。仆射闻吐浑王反乱，即乃点兵，凿凶门而出，取西南上把疾路进军。……其贼不敢拒敌，即乃奔走。仆射遂号令三军，便须追逐。……决战一阵，蕃军大败。……生口细小等活捉三百余人，收夺得驼马牛羊二千头匹，然后唱《大阵乐》而归军幕”；第二次是纳职县回鹘、吐蕃抄掠伊州，张议潮统兵讨伐，大获全胜。《变文》说：“敦煌北一千里镇伊州城西有纳职县，其时回鹘及吐浑居住在彼，频来抄劫伊州，俘虏人物，侵夺畜牧，曾无暂安。仆射乃于大中十年六月六日，亲统甲兵，诣彼击逐伐除。不经旬日中间，即至纳职城。贼等不虞汉兵忽到，都无准备之心。……回鹘大败……收夺驼马之类一万头匹。我军大胜，匹骑不输。遂即收兵，即望沙州而返”；第三次是叛乱回鹘劫夺唐朝册立回鹘使王端章，张议潮闻知大怒。由于下文残缺不全，不知结局如何。《变文》说：“大唐差册立回鹘使御史中丞王瑞（端）章持节而赴单于……行至雪山南畔，遇逢背逆回鹘一千余骑，当被劫夺国册及诸敕信。……仆射闻言，心生大怒”，准备出兵征讨。由此可知，张议潮为了抵御周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骚扰、劫掠，仍然进行着非常艰巨的斗争。《张议潮变文》中所说议潮“朝朝秣马，日日练兵，以备凶奴，不曾暂暇”，就是当时实际情况的真实反映。

咸通七年（866年）十月，“拓跋怀光以五百骑入廓州，生擒论恐热，先刖其足，数而斩之，传首京师①”。其余众逃奔秦州，途中又遭到尚延心的袭击，“吐蕃自是衰绝”。河陇肃清，使唐王朝无西顾之忧。至此，河西地区初步形成了统一局面，“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山

①《通鉴》卷250唐懿宗咸通七年十月条

河，宛然而旧①”。唐王朝的势力，已达陇右诸地。

正是张议潮领导的沙州起义及其战果的不断扩大，河西地区才得以克复，使“百年左衽，复为冠裳；十郡遗黎，悉出汤火②”。对于他在河西重振大唐声威的业绩，人们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四方犷奸，却通好而求和，八表来宾，列阶前而拜舞。北方猃狁，款少骏之駃蹄，南土蕃浑，献昆岗之白璧③”。堪称英雄盖世之功！

河西统一后，张议潮大功告成，急流勇退。唐懿宗咸通八年（867年），69岁的张议潮入朝，留居京师，将河西归义军事务总委其侄张淮深管理。唐朝廷任命议潮为右神武统军、晋官司徒，并赐给田地，在左街宣阳坊赐宅安居。咸通十三年八月卒于长安，享年74岁。

3、渐趋衰退的敦煌艺术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一蹶不振。中国封建社会也由强盛走向衰弱。与这种形势相一致，敦煌莫高窟艺术也从其顶峰滑落下来。

吐蕃占领敦煌后，为了巩固其统治，也任用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上层为各级官吏，利用敦煌世家豪族统治沙州地方，到后期甚至将敦煌地方的部分政权、军权和税收管理权也都交给了豪强大族，从而使吐蕃的统治得以维持60余年④。

吐蕃奴隶主很信佛，可黎可是赞普等在敦煌大兴佛事，广度僧尼，当时仅三万人的沙州便有上千僧尼；在吐蕃统治者的扶持下，寺院经济也空前繁荣，当时有16大寺、17大寺之称。这些寺

①敦煌写本《张淮深碑》

②罗振玉《补唐书张议潮传》，见兰州大学编《敦煌学论文选》上

③P·2762《张氏勋德记》

④参阅史苇湘《关于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

院和内地一样，都有寺户和土地，不受官府管辖，享有种种特权。吐蕃奴隶主还把僧侣的地位抬得很高，甚至让一些高僧直接参与政事。如悟真的师父洪辩，吐蕃时代就是“知释门都法律兼摄行教授”；张议潮女婿李明振的叔父僧妙牟，常在吐蕃赞普左右参与政事，兼“临坛供奉”。此时期敦煌的名僧辈出，如一直留在敦煌的长安高僧昙旷，传授禅宗的摩诃衍，做了“蕃大德”的法成、悟真等，都与洪辩一样，是当地有名的高僧。同时，吐蕃统治者还遣使到长安，“求沙门之善讲者”至蕃地讲经。“至是（建中二年），遣僧良琇、文素二人行，每人岁一更之①”。吐蕃统治者曾不断向中原求取佛经，加以翻译，如名僧摩诃衍就曾将许多汉藏文佛经相互翻译，流行于当时。

由于吐蕃统治者的崇佛，再加上在吐蕃统治下，敦煌躲过了会昌灭佛（844—845年），致使莫高窟艺术不仅未遭破坏，反而不断修建。现存吐蕃时期新开的洞窟48个，并有重修前期的洞窟18个，共66窟。其中有明确建窟纪年的洞窟只有两个，即365窟和231窟。第365窟旧称七佛堂，为沙门洪辩于832—844年所建。231窟为阴嘉政于839年所建。通过对这些洞窟的分析、探讨，可以明显地看到，此时的莫高窟，已失去了盛唐时期那种气势和光彩，艺术水平也渐趋衰落了。

吐蕃统治时期的佛教艺术，在与唐前期一脉相承的大前提下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如在壁画中，根据佛经需要，凡有“国王”出场的地方，吐蕃赞普就会在侍从的前呼后拥下站在“大王小王”之前，159、231、237窟维摩诘像下面的听法图，158窟大涅槃像北壁的举哀图都是如此。从内容方面看，凡是唐前期的题材，吐蕃时期一样不少，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经变画。

吐蕃时期壁画的特点是经变画增多，如《大方便佛报恩经

---

①《唐会要》卷97《吐蕃》

变》、《天请问经变》、《报父母恩重经变》等。这时的经变画，虽然种类增多，但已走向程式化，画面堆砌，一味想表现经变画的热闹场景，实际效果反而单调乏味。盛唐的活泼气氛与那些身躯高大的菩萨行列都在壁画中消失了。每种经变的布局基本相似，也可说完全一样；通壁大画已很少见，而是一壁画几幅经变，因此一窟可画好几种经变，最多可达15种（85窟）。

吐蕃时期的彩塑被毁较多，只有在离地面20多米高崖上的几个窟保存较好，尤其是158窟全长16米的释迦牟尼涅槃像保存很好。佛面呈一种舒适的睡态，毫无痛苦地“右肋而卧”，进入不生不死的佛教最高的理想境界。其艺术造型也很卓越，脸庞丰腴，比例适度，通肩袈裟的衣纹随身体的起伏而变化，圆润流畅。这在敦煌大型彩塑佛像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而整个158窟，又是以壁画和彩塑相结合的方式，显示了敦煌《涅槃变》的最高水平。在大卧佛背后墙上，西壁画诸天龙诸学人等举哀，南壁画十大弟子举哀；由于人物身份不同，其形象、动态和神情也各有特点，无一雷同。它描绘了许多具有个性和独特内心世界的人物群象；同时，如此丰富多采的艺术场面，又完全服务于一个统一的主题、需要；众人的狂热悲痛与卧佛的沉静安祥形成了鲜明对照，相反相成，表现了佛人涅槃的崇高境界。整个洞窟则反映了“涅槃为乐”这一中心思想①。

六、孤悬西陲的归义军

自从张议潮于大中二年率众起义，驱除吐蕃后，便在敦煌建立了以汉人为主的政权。大中五年（851年）唐王朝在敦煌置归义军，任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从此，直到宋仁宗景祐三年

①参阅段文杰《唐代后期的莫高窟艺术》

（1036年）为西复所灭，除张承奉一度称金山国和敦煌国外，瓜沙归义军在张、曹两世家的统治下，共存在了一百八十余年。

1、张氏政权的艰难统治

自大中五年归义军政权建立后，张议潮率众和回鹘进行了几次战争，于咸通二年（861年）收复了凉州，咸通七年彻底摧垮了尚恐热。至此，河西地区初步形成了统一局面。

河西全部收复后，张议潮激流勇退，于咸通八年（867年）入朝，被唐王朝授司徒之职，兼授左神武将军，官居一品。张议潮入朝后，由其侄张淮深执掌河西归义军事务。“太保（张议潮）咸通八年归阙之日，河西军务，封章陈款，总委侄男淮深，令守蕃垣”①。早在大中七年（853年），张淮深便继其父议谭职，任沙州刺史、左骁卫大将军。咸通八年张议潮入朝后，唐王朝加授淮深御史中丞，而其本人则自称节度留后，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并在咸通十三年议潮去世前，多次遣使唐朝，请求皇帝颁赐旌节，但唐王朝并未马上将节度使称号授予他。淮深因向朝廷求节不成，便自称为河西节度兼户部尚书。乾符年间（874—879年）唐王朝才加授淮深为归义军节度使。至迟到光启三年（887年）他又进称尚书左仆射。大顺元年（890年）被杀后，朝廷追赠为司徒。

《张淮深墓志铭》说：“公以大顺元年二月廿二日殒毙于本郡，时年五十有九。葬于漠高乡漠高里之南原，礼也。兼夫人颍川郡陈氏，六子：长曰延晖，次延礼，次延寿，次延锷，次延信，次延武等，并连坟一茔，以防陵谷之变。”

关于张淮深之死，向达先生说：“盖在大顺元年沙州骤乱，变生肘腋，淮深猝未及防，举室殒毙。作乱者即索勋其人也。索

①敦煌写本《张淮深碑》

淮勋既杀深兄弟，遂自立为节度使，故再修功德记并无嗣立之辞①”。对此，孙修身先生提出了相反意见，他认为导致张淮深之死的原因，是淮深曾“勾结田（令孜）朱（玫）李（昌符），致僖宗逃凤翔、兴元，还（派河西兵）随王行瑜追僖宗，立李熅所引起的”。因而僖宗回京后，就决定了张淮深的灭亡。张淮深之死，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以唐王朝的名义赐死，或直接派兵镇压杀死”。另一种是“假手其他方镇势力、军事集团，或者张淮深部下的叛逆者杀死”。并进一步推测，很可能李茂贞“以其将胡敬璋为节度使……派兵入河西，勾结淮深部下的叛将，里应外合，杀死淮深及其六子的”②。

近年来，随着新资料的发现与公布，特别是《伯希和笔记》的出版，学术界对张淮深之死又有了新的认识。在《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末尾，张淮深之弟张淮□，被议潮婿李明振题为：“妻弟前沙瓜伊西河西节度使检校□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张淮□”。1981年法国出版的《伯希和笔记·敦煌洞窟题记》中亦载其录文，而“张淮□”为“张淮鼎”。据有的学者研究，“议谭辈只两兄弟，即议谭、议潮，而议谭仅只淮深一子，则淮鼎当为议潮子无疑”。淮鼎为了和淮深争权夺利，便发动兵变，杀死了淮深③。

张淮鼎于大顺元年二月杀害淮深夫妇及六子后，即成为归义军统治者，但他在位时间不长，至迟在景福元年（892年）去世，死前托孤于索勋。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动呢？这是因为淮鼎杀淮深之事极端隐秘，索、李两家似乎都未参与其事，但索勋并不一定赞成淮鼎之所为，所以他收养了淮深遗女。淮鼎去世时，承

---

①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见《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②孙修身《张淮深之死再议》，载《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2期

③李永宁《竖牛作孽　君主见欺——谈张淮深之死及唐末归义军执权者之更迭》，载《敦煌研究》1986年2期

奉年幼，不能独掌政权，所以才有“托孤”之说。由于这时李明振已死，李氏家族除议潮十四女外，均为晚辈，而索家乃沙州望族，索勋一直握有瓜州军政大权，又是张、索、李三家独存的长辈，故而其地位优于李氏。因此，由索勋辅佐张承奉执政，也就为大家所接受。李氏三子则分占瓜沙军使、刺史之位，掌握实权，相互牵制。景福元年，索勋见承奉年幼，有机可乘，便向唐朝廷请封节度使。892年秋天，朝廷即遣使沙州，正式授予索勋归义军节度使之职，遂独揽了归义军大权。

索勋掌有归义军政权后，即引起了李氏家族的不满与妒忌。894年，嫁给李明振的张议潮第十四女率张、李家族推翻了索勋的统治，立侄男张承奉为节度使。但李氏三子分别任沙、瓜、甘州刺史，实际掌握了归义军实权，到了895年底，李氏家族的势力达到了极盛，并排挤了张承奉而独揽归义军大权。李氏家族的所做所为，必然引起瓜沙一些大族势力的反对，于是在沙州出现了一场倒李扶张的政变。到了896年初，李氏的统治终于被瓜沙一些大族推翻，张承奉得以重新执政①。

张承奉掌有归义军政权后，任归义军节度副使，曾与回鹘进行多次战斗。到光化三年(900年)，唐王朝正式授予张承奉节度使称号。《旧唐书》载：光化三年八月“己巳制：前归义军节度副使、权知兵马留后、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上柱国张承奉，为检校左散骑常侍，兼沙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归义节度、瓜沙伊西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②”。朱温取代唐朝后，张承奉即脱离了中原王朝之控制，于906年建立了西汉金山国。

综观张氏统治归义军的历史，真可谓步履维艰，困难重重。归义军建立之初，张氏曾企图控制整个河陇及西域东部地区。这

---

①参阅荣新江《晚唐归义军李氏家族执政史探微》，载《文献》1989年3期

②《旧唐书》卷20《昭宗纪》

一企图一方面与唐王朝发生矛盾，另一方面，旧有的吐蕃、退浑、龙家和新来的回鹘等民族，也乘吐蕃王国崩溃之际，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特别是位于归义军东西的两支回鹘力量的兴起，终于将归义军钳制在瓜沙一隅。再加上张氏统治者自议潮到承奉，皆好大喜功，但军力不济，终归失败①。

2、西汉金山国与敦煌国

在瓜沙归义军时期，曾经出现了一个以敦煌为中心的西汉金山国和敦煌国。它上承张氏，下启曹家，“继五凉之中兴，拥八州之胜地”②，是归义军时代的一个间断，具有一定的历史重要性。然而，正史只有二十字的记载，《旧五代史·吐蕃传》云：“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新五代史·吐蕃传》同）从这些简略记载中，很难窥见金山国的具体情况。可喜的是，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十多卷有关金山国的材料，特别是《白雀歌》、《龙泉神剑歌》、《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曹议金上回鹘众宰相状》的发现，弥补了正史记载之不足，使“金山国事，有年可稽，有事足纪③”。

敦煌遗书发现后，王重民先生利用有关资料，撰写了《金山国坠事零拾》，基本搞清了金山国的轮廓，“千载坠史，一旦重逢，其快乐有不能言喻者”。近年来，随着敦煌遗书资料整理、研究的进展，不仅对金山国的有关问题愈益明确，而且还发现张承奉时代敦煌地区尚有一个敦煌国存在。李正宇先生《关于金山

---

①参阅荣新江《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初探》，载《敦煌学辑刊》1986年2期

②P·2864《白雀歌》

②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见《敦煌遗书论文集》

国和敦煌国建国的几个问题》①一文，是这方面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性成果，基本搞清了金山国和敦煌国的有关问题。

金山国的全称是“西汉金山国”，“西”乃是指其国所居之方位，它是以中国为座标的；“汉”乃是言其国民族之属性。“西汉”连用，意为西部汉人之国。“金山”又名金鞍山，在敦煌西南，即今甘、青、新三省交界处之阿尔金山。S·5448《敦煌录》说：“金鞍山在沙山西南，经夏常有雪，山中有神祠甚灵，人不敢近”。P·3633《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也说：“沙州本是善国神乡，福德之地……东有三危大圣，西有金鞍毒龙”。

张承奉祖孙三代，都把精力倾注于统一河西，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安定之区。金山国的建立，就是在唐代末年中原战乱频仍，河西失控的形势下，归义军节度使重整河西之志的集中体现。它的建国，其矛头是对准回鹘、吐蕃、羌浑等周围民族的。“东取河兰广武郡，西取天山瀚海军，扫定燕然□岭镇，南尽戎羌逻莎（拉萨）平②”，就是金山国战略宏图的概括反映。从《龙泉神剑歌》的多次强调“打却甘州坐五凉”、“兼拨瀚海以（与）西州”的叙述看，其主要矛头是指向回鹘势力的。

西汉金山国，是作为中原王朝藩镇之一的瓜沙归义军自己建立的王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建立，是脱离中原王朝的分裂割据行动。但是，它的矛头并不是针对中原王朝的，而是对黄巢起义以来，中原王朝自顾不暇，根本无法顾及河西的安危，而任其日益混乱的局势下，张氏政权奋起自振的行动，它是张氏先人“破却吐蕃收旧国”，“赖得将军开旧路”之志的继续。当金山国建立之时，张承奉仍然着意突出一个“汉”字，甚至在后

---

①《西北史地》1987年2期

②《龙泉神剑歌》

来被回鹘打败，发出实同降表的《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中，仍继续强调“沙州本是大唐州郡”，“太保……归唐……承恩至重”，“太保……趁却节儿，却着汉家衣冠”，表明了其归顺中原王朝之心的坚定不移。

众所周知，在金山国建立之时，周围民族不断对敦煌地区进行蚕食，并阻断了敦煌与中原、西域的正常交往。朱全忠杀害唐昭宗，排除异己，加紧了篡唐活动。而中原王朝自顾不暇，听任河西扰乱，使敦煌陷于“四面六蕃围”的孤岛状态中。正是在这种局势下，张承奉才建立了西汉金山国，以图自存。

金山国建立于何时呢？王重民先生根据《白雀歌》卷末题写的“乙丑年二月”字样，推断金山国建立于天祐二年（905年）二月；王冀青先生根据新旧《五代史·吐蕃传》的记载，认为金山国的建立，“定在开平二年（908年）似乎比较妥当些①”。而李正宇先生经过全面、系统地整理、研究金山国资料，认为其成立时间“在天祐三年（906年）五月至十一月之间”。

当朱全忠力逼唐昭宗迁都洛阳后，就于天复四年闰四月十一日改元天祐。八月十一日杀死昭宗，十五日立昭宣帝，仍用天祐年号。对此变故，远离洛阳，且消息隔绝的敦煌，当然是不可能马上知道的，这从其年号仍用“天复”就可得到证明。

到了天祐二年（905年）四月，敦煌才出现了“天祐”年号。天祐纪年的出现，说明敦煌已经知道了中原王朝的巨大变故，并使用了天祐纪年。但是，敦煌使用天祐纪年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一年左右，即从天祐二年四月到天祐三年四月。从十一月起，又改为“天复六年”了。

敦煌从天祐三年改为天复六年，其中四月至十一月的六个月却是空白。这六个月正是从天祐年号转变为天复年号的衔接点，

---

①王冀青《有关金山国史的几个问题》，载《敦煌学辑刊》第三辑

也就是金山国建国、张承奉登天子之位并宣布“改年号”的可能时限。这是因为张承奉自称白衣天子，将河西归义军改为金山国，并废除朱全忠所操纵的假唐朝年号——天祐，继续使用被朱全忠杀害了的唐昭宗年号——天复，以示其忠于唐朝，继承唐统之意。

金山国建立短短六年，于911年7月宣告终结，并为敦煌国所代替。其原因何在呢？

众所周知，金山国的建立及其主要活动，都与回鹘之间的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张议潮时期，归义军统有瓜、沙、伊、西等十一州之地，到金山国建国前后，就只剩八州了，所失三州为甘、伊、西。其中甘州为河西回鹘占据，伊、西两州为高昌回鹘占据。就是所存八州，也不断受到回鹘的骚扰和蚕食。张承奉为了维持瓜、沙的安全，保证八州的完整，并试图恢复祖父的十一州版图，就不得不讨伐回鹘。而回鹘在河西重建政权后，为了保持本民族的生存和扩大势力范围，与金山国争夺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敦煌，也就屡次兴兵攻打金山国。

早在张承奉任归义军节度使初期，大约在光化年间（898—901年），回鹘人就曾打到敦煌近郊，焚烧了金光明寺的佛殿。金山国建立的当年，回鹘更是多次攻击，企图把金山国扼杀在摇篮里。有一次，敦煌东界的防线被突破，回鹘军队长驱直入，直抵敦煌城东安营扎寨。结果金山国天子亲自披甲上阵，著名将领阴仁贵、宋中丞、张舍人等奋力应战，才把入侵的回鹘赶回甘州。

911年，回鹘又大举进攻金山国，“狄银领兵又到管内，两刃交锋，各自伤损，口云索和”。金山国因连年战争，国衰力微，“百姓不安，多□煞伤，沿路州镇迤逦破散，死者骨埋□□，生者分离异土，号哭之声不绝，怨恨之气冲天”。遂不得不与回鹘求和，条件是“可汗是父，天子是子①”。从此，张承奉

①P·2992《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

被迫取消“西汉金山国”国号和“圣文神武白帝”、“天子”之号，并在甘州回鹘的恩准下，屈尊降格而改建了诸侯郡国——敦煌国。

敦煌国是在金山国的基础上改制而诞生的，它称甘州回鹘可汗为“父”，自称为“子”，同甘州回鹘结成了父子之国。从其名号来看，它是甘州回鹘的属邦。其原有地盘之一的肃州被割去，新的封疆只有瓜沙二州，即古敦煌郡的范围，以其地名其邦，故改名敦煌国。

3、曹氏的继续统治瓜沙

当张承奉臣服回鹘，与其结成“父子”关系，建立敦煌国后，便丧失了在瓜沙地区的威望。914年张承奉卒后，就由曹仁贵取代张承奉重建了归义军政权，开始了曹氏政权对瓜沙的统治①。

曹仁贵掌权后，接受了张承奉割据称帝失败的教训，去帝号，奉中原王朝正朔，恢复归义军节度使旧称。在当时中原军阀割据，相继称帝的局势下，远处河西走廊的曹仁贵能够这样做，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这一举动，既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又有利于曹氏政权的稳固。

920年曹仁贵去世后，由曹议金继任执政。“从某种意义上说，曹议金才是曹氏归义军政权的真正开创者，因为此后归义军的内政和外交，基本都是沿着他指定的方针实行的②。”

曹议金执政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并保持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东面结好甘州回鹘，娶甘州回鹘可汗女为妻，又嫁女给甘

---

①参阅唐耕耦《曹仁贵节度沙州归义军始末》，载《敦煌研究》1987年2期

②荣新江《沙州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研究》，1988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论文

州回鹘可汗为妻。在西边，他很重视和于阗的友好关系，嫁女给于阗王李圣天。在他的一些发愿文中，一再求佛保祐“于阗使人，往来无滞。”而于阗来瓜、沙的使者也络绎不绝。据曹氏时期的一残酒帐单记载，在半年之内，于阗曾四次遣使者到沙州，而且居住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正是由于曹议金采取了上述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措施，才使瓜、沙这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形成了相对安定的局面，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曹议金的统治相对稳定后，就上表给中原王朝，求授旌节。“后唐庄宗同光二年五月，以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守沙州长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曹议金为检校司空，守沙州刺史，充归义军节度，瓜沙等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瓜沙与吐蕃杂居，自帝行郊礼，义金间道贡方物，乞授西边都护，故有是命①。”至此，曹议金政权才正式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承认。

清泰二年（935年）二月十日曹议金死后，由曹元德执掌归义军政权。曹元德继位后，不断遣使于辽，与其建立了比较密切的但并不是平等的关系。其使臣甚至卑躬屈膝地向辽主“作本俗舞。”这固然是很不光彩的，但也从反面说明了瓜沙曹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密切关系。另外，这也是曹元德所搞的多边外交，他企图借助辽的势力，牵制回鹘。曹议金执政时期，迫于回鹘的压力，曾低声下气地称回鹘可汗为“父大王”。曹元德继位后，力图改变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清泰四年（937年）他出巡甘州，与回鹘顺化可汗商议“所有社稷久远之事，”“平稳以讫。”在商议过程中，他与回鹘可汗平起平坐，以兄弟相称。曹元德面对强大的回鹘，敢于改变两者的关系，说明了曹氏势力渐趋强盛②。

---

①《册府元龟》卷170《帝王部·来远门》

②参阅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与敦煌莫高窟》，载《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大约在天福五年（940年）初，曹元德去世，曹元深继位。不久，曹元深即于天福七年自称“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司徒，兼御史大夫。①”同年12月27日，曹元深派出的使臣“附于阗使刘再升”朝贡于后晋。次年正月十一日，后晋皇帝便正式下诏，任命“沙州留后曹元深加检校太傅，充沙州归义军节度使②。”

天福九年（944年）三月九日，曹元深卒，弟元忠即位。元忠即位之初，后晋只给了他一个“沙州留后”的职衔，而他在瓜沙却自称“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保。”显德二年（955年），曹元忠遣使朝贡，后周“世宗命以节度使，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铸印赐之。③”不久他又自称“敦煌王。”

曹元忠在瓜沙的统治长达三十年，是归义军节度使中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其时也是曹氏政权的鼎盛期。在其统治时期，继续保持与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不断遣使朝贡。尤其是北宋统一中原之后，他与北宋的关系更加密切。他还继续加强与于阗的友好关系，曾致书于阗王，以甥舅相称。

开宝七年（974年）六月六日曹元忠卒，由其侄曹延恭充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其子曹延禄充归义军节度副使。开宝九年（976年）曹延恭去世后，便由延禄任归义军节度使。

瓜沙曹氏政权在曹元忠执政时期达到了鼎盛，但由于曹元忠及其夫人浔阳翟氏十分佞佛，在莫高、榆林诸石窟中大肆开窟造像，“每窟动计费税百万。”这种劳民伤财之举，势必加重各族人民的负担，激化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到了曹延禄执政时期，这些矛盾已发展到了白热化程度，如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回鹘、达恒及肃州家相合，就大云寺对佛设誓，”“向西行

---

①P·4046《天福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曹元深回向疏》

②《旧五代史》卷81《晋少帝纪》

③（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蕃夷五》198册，7767页，中华书局1957年出版

兵①。”咸平二年（999年）十二月沙州蕃族首领单独朝贡于宋，也从侧面反映了曹延禄统治之不稳。到了咸平五年（1002年）终因“当道二州八镇军民，自前数有冤屈，备受艰辛”，发生政变。他们内外合势，围攻节度使府第，“延禄等知其力屈，寻自尽②。”

咸平五年曹延禄死后，由其族子曹宗寿执掌瓜沙归义军政权。有的学者通过对苏藏敦煌写本《曹宗寿造帙疏》的研究，认为曹延禄之所谓“自尽”，很可能是被曹宗寿搞政变杀害。曹宗寿篡权之后，就将政变之事报告了北宋王朝，把曹延禄的被杀写成“自尽”③。而北宋王朝认为瓜沙地区远离中原，“本羁縻而世荷王命，岁修职贡，乃授宗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太保，使持节，沙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封谯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赐竭诚奉化功臣④。”曹宗寿执政时期，继续保持与北宋王朝的朝贡关系，并请求北宋派遣铸匠及善藏珠者，到瓜沙传授技术。与此同时，还与辽有朝贡关系，如景德三年（1006年），遣使向辽贡大食马、美玉等，辽则以对衣、银器赐之。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四月曹宗寿子曹贤顺继任归义军节度使。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大中祥符七年四月，以归义军兵马留后曹贤顺为本军节度使。弟贤惠为检校刑部尚书、知瓜州归义军掌书记。”曹贤顺继位后，在曹宗寿和宋、辽关系的基础上，继续加强联系，尤其注意加强和辽的关系。他曾多次遣使辽朝，甚至还亲自入辽，受到了辽的宠遇。其统治一直持续到景祐三年（1036年）西夏占领沙州。

---

①P·3412《太平兴国六年安再胜等牒》

②《宋会要辑稿·蕃夷五》198册，7767页

③参阅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与敦煌莫高窟》

④《宋会要辑稿·蕃夷五》，198册，7767页

综观曹氏时期的归义军，其辖地虽然只有二州（瓜、沙）六镇（紫亭、悬泉、雍归、石城、新城、常乐），人口不过万数，势单力弱，但却在中原政权的变幻、交替中，在河西地区支撑了一个多世纪。其主要原因是：曹氏统治者吸取张氏政权失败的教训，更加注意文治，大兴佛事，在千佛洞不遗余力地开洞修龛，利用宗教的力量作为政权的精神支柱，从而使以佛教为主体的沙州文化在这一地区居于首位，由此来博得周围各民族的尊崇；同时，曹氏统治者接受张承奉割据称帝、尽失人心的教训，去帝号，奉中原王朝正朔，恢复归义军节度使旧称，努力争取中原王朝的承认。曹氏历任节度使注意加强与中原王朝的联系，利用旧日唐朝在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声威，在西北诸民族中树立自己的正统地位，曲子词“若不远仗天威力，河湟必恐陷戎夷”，就道出了曹氏归义军政权立国的基本国策。此外，曹氏还强调民族意识，作为立国之本。并与东西回鹘和于阗和亲，使之互相牵制，以图自存。

4、“日落西山”的莫高窟艺术

在张氏家族统治瓜沙的近六十年中，对佛教的提倡是不遗余力的。他们笃信佛教，尊礼名僧。汉僧洪谮、慧苑、吐蕃僧法成等，都受到优待。张氏统治者不仅控制了政权，而且还控制了神权。因此，在张氏家族统治时期，必然会大量兴建石窟。当时兴建的洞窟有六、七十个之多。

在张议潮领导的逐蕃战争中，张、索、李等世家豪族都因立有战功而获得了不同的勋位，执掌了河西地区的政权，因此他们都致力于保护和扩大世家豪族与各大寺院的利益。这时的莫高窟艺术，从总体上看，在形式和内容上没有重大的变化，主要是世家豪族纷纷以“报恩”、“庆寺”为名，营建了不少洞窟，如第94、196、9、85、138、12等窟。但个别洞窟还是出现了一些新形

式，特别是张、索、李三姓与三个僧统在莫高窟开的大窟，反映出河西地区与中原的联系比吐蕃时期有所加强。

这一时期的敦煌艺术，在内容上还是有一些突破。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彩塑中出现了新题材，即高僧塑像。如第138窟中的禅僧像，尤其是第17窟中的洪谨禅定像，面如俗人，神采奕奕，是彩塑肖像艺术中的杰作。其身后北壁上画菩提双树，树上挂经包、水瓶，树下侍女及比丘尼手中各执团扇，分侍左右。其二是供养人画像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与豪门世家的统治息息相关的。当时的河西地区，张、宋、李、索、曹等高门大族，互为姻亲，形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统治集团。他们不仅控制了政权，而且还把持了神权。他们不仅自己出资造窟，图其形于窟中，而且有些僧侣也为他们歌功颂德，开窟画像。如第85窟张议潮像，第196窟的索勋像等。

此时的供养人画像，并非一人一家，大都是家族式的大排列。有的祖宗三代，甚至姻亲眷属都依次排列在一起。如第156窟，就画有张议潮一家，其兄张议谭一家和他们的父母，以及僧尼等等；第138窟中，张承奉夫妇，以及媳妇、侄女、孙子和出家为尼的妹妹等，都并列一窟。这些供养人画像，其意义不仅仅是向佛表示虔诚供养，而是列家序谱，光耀门第，并显示出封建社会的尊卑贵贱之别。

第156窟的张议潮夫妇出行图，是唐代供养人画像中最杰出的两幅作品。每幅画中人物一百有余，场面宏伟，结构严谨，充分反映了张议潮夫妇出行时的历史场面和人物风貌，突出了出行的主题思想①。

这一时期的莫高窟艺术，在风格上也有了不同的时代特点。

在壁画内容上，由于俗讲流行，变文的发展，故往往以变文

①参阅段文杰《唐代后期的莫高窟艺术》

作为依据；其中一些经变的内容，还多超过了佛经原有的内容。

在人物造型上也逐渐比例适度，拟于真人。其身姿手式自然和谐，人物面相形成了一种新的鬓角无花饰的浑圆脸型，从而显得朴实无华。

在线描上，继承了吐蕃晚期的余绪。起稿多用淡墨或土红线，神灵形象和俗人形象，线的色彩也各不相同。一般来说，佛、菩萨多用土红线，俗人则用淡墨线。由于线的色彩不同，形象的整体色感也就不一样。从整个壁画的色彩上看，由于多数以泥壁为底，温暖淳和，使整个色调温润、淳厚、调合、典雅，具有一种独特的美感。

总之，归义军张氏时期的莫高窟艺术，在逐渐衰落的过程中，已失去了唐代前期气势磅礴的精神。但在中原文化和佛教艺术的影响下，仍然保持着唐代统一的风貌，并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①。

在曹氏家族统治敦煌的120余年（914—1036年）中，由于一直保持着中原的制度和文化，并与回鹘、于阗联姻结盟，从而使河西地区出现了一度的稳定与繁荣。曹氏政权为了巩固其统治，大力提倡佛教。曹议金视佛教为“圣力”，认为社会要安定，就必须“虔诚佛理，仰仗慈门”，因此他邀请僧侣“开贝叶之金文，诵真言之宝偈②。”曹议金死后，其子元德、元深、元忠亦“广荣释教，固谒灵岩，舍珍财于万像之前，炳金灯于千龛之内③。”正是由于曹氏的大力提倡佛教，故五代、北宋时期，敦煌境内寺院林立。见于敦煌遗书和供养人题记的就有：圣光寺、龙兴寺、普光寺、报恩寺、显德寺、三界寺、乾元寺、金光明

---

①参阅段文杰《张议潮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载《敦煌学辑刊》第三集

②P·2692《曹议金礼佛疏》

③S·4245《造佛窟功德记》

寺、安国寺、灵修寺、净土寺、开元寺、相国寺、灵图寺、大云寺、大乘寺、莲台寺、奉唐寺、高妙宝龛寺等等。此外还有许多小型的“兰若”，如“马家兰若”、“索家兰若”等等属于名门大族的寺院。

曹氏统治者为了加强其统治，通过加官晋爵等方式来笼络瓜沙望族和大小地主，因而曹氏时期的归义军节度衙门，官员数目庞大，而曹氏的权势也扩大到几乎无所不包的程度。仅就宗教而言，不仅都僧统、僧统、临坛大德、僧正等僧官要由归义军节度使任免，而且僧官、尼主也都为曹氏的贵戚姻亲所把持，就连一般僧尼的度牒都由节度使批授。这样，曹氏的政治、经济势力就比较雄厚，也就有条件和资本大量地修窟造龛了。

为了营造寺院和石窟，就需要有一批从事开窟、造像和绘画的专门人才。为此，曹氏政权仿照中原的方式设立了画院。从莫高、榆林诸窟中的供养人画像题记可知，当时画院里包括了石匠、塑匠、画师和管理画院的“都勾当画院使”，对于这些匠师在生活上还有一定的优待。

正因为有一批技艺纯熟的匠师统一规划、集体制作，才使五代、北宋时期开凿的洞窟具有独特而又统一的风格。

现存曹氏政权时期的洞窟55个。通过对这些洞窟的排比分析可知，归义军曹氏时期的敦煌艺术，是晚唐艺术的继续。但艺术表现的程式化逐渐严重起来，壁画的构图和人物形象日趋公式化。榜题的增多不但使画面显得支离，而且榜题文字大多采用变文形式，也使壁画的图解性质日益增强。因此，艺术境界的创造已被冲淡，艺术感染力也因而降低①。正是从这个总体意义上说，它自然不能与唐代相提并论，但如果用“夕阳无限好”来形容，则无疑是恰当的。

---

①参阅段文杰《晚期的莫高窟艺术》

这时的敦煌艺术，虽然程式化日趋严重，但仍然出现了一些新题材，如《刘萨诃变相》、《五台山图》和《新样文殊》等，反映了佛教进一步中国化并和儒、道思想相结合的过程。在画面上呈现出了多种多样的社会生活场面，为研究当时当地的社会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61窟中的《五台山图》，是敦煌壁画中最大的山水画面，它把现实与想象进一步结合起来，用鸟瞰式透视法将重峦叠嶂、绵延千里的山川景色和风土人情汇集于一壁，气势磅礴，人物情节真实生动。《五台山图》的出现，不仅使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写意情趣已见端倪，而且还进一步取得了山水画的独立地位。

七、丝路的衰落与敦煌的沉寂

唐宋以后，由于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原因，丝绸之路逐渐衰落了，到了元明时期，丝绸之路更趋衰落，敦煌也随之失去了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作用。此时的莫高窟，则是敦煌艺术的“回光返照”，已是近黄昏了。

1、丝绸之路衰落的原因

陆上丝绸之路的逐渐衰落，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兴盛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

第一，唐代中叶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已逐渐南移，到了宋代，中国经济重心已由北方移到了南方。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北方一统的政治重心也被打破。此时长江中下游，尤其是江淮一带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社会经济十分繁荣，从而为对外贸易提供了大量的产品。为了便于南方产品的外销，自然是以就近的海上交通最为适宜，而不会选择远处西北的陆上丝绸之路。

众所周知，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古以来是全国

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最快的地区。可是，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南方地区的经济却不断得到发展。唐代“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北方地区直接经受着战乱，黄河流域一带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而此时长江中下游，尤其是江淮地区的经济却发展较快。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南方的江浙地区经济高度发展，出现了“国家根本，仰给东南”①的局面。

由于经济重心的南移，引起了政治重心的变化。唐代以前，虽然有些王朝曾在南方建都，但大部分王朝都建都于北方，特别是关中的长安。全国的政治重心在西北。封建王朝为了保持其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的繁荣，必然加强西北的建设与巩固边防的工作，大力发展对外贸易，这在客观上促进了陆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与兴盛。唐代以后，在南方建都的王朝逐渐增多，尤其是南宋王朝建都于临安（杭州），更使中国的政治重心移到了南方。此后，虽然元、明、清各朝都曾建都于北京，但再也没有哪一个王朝建都于西北的长安了，从而对丝路的经营逐渐轻视，陆上丝绸之路也随之衰落了。

第二，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与唐宋时期的对外输出品有关。此时的对外贸易中，除了丝绸外，外销的大宗商品是瓷器。

瓷器的外销始于唐而盛于宋。从唐代开始，中国瓷器已远销海外，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宋朝时期，瓷器生产更为发达，并已远销到东西方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为了运输上的方便和减少运送途中的损失，自然会选择海上交通。从而说明陆上丝路的衰落与当时瓷器的输出有关。

第三，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还与唐宋时期的输入物品，尤其是各类香药的进口有关。

古代所谓“香药”，包括的范围和用途都很广泛，它可作药

---

①《宋史》卷337《范祖禹传》

物、化装、熏衣、制炬等等。从唐代开始，在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中，对进口的各类香药发生了浓厚兴趣。到了宋代，对各类香药的需求量更大，进口的各类香药数量也十分惊人。而香药的生产地除了大食外，南海各地也在大量生产。为了加强和南海的香药贸易，必然促使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陆上丝路的渐趋衰落。

第四，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还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着密切关系。

中西交往的陆上丝绸之路，在唐代前期，由于中国领土辽阔，其西部边疆已远越葱岭，丝绸之路所经的大部分地区都在唐政府直接控制和管辖下。因而东西交通空前繁荣，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可说到了“黄金时期”。然而，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唐西北边兵东调长安。自此以后，葱岭以西的中亚河中地区（指今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为大食完全占据，葱岭以东的陇右，则为吐蕃所控制。不久，回鹘政权又割据于天山以北。当时的大食和吐蕃、吐蕃与回鹘之间矛盾重重，争斗不休，其结果使中国内地和西北边疆“道路梗绝，往来不通①”，终于导致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到了宋代，由于长期和西夏、辽、金、元对立，对外陆上交通几乎断绝，陆上丝路更加衰落。元明时期，陆上丝绸之路就彻底衰落了。

第五，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还与我国造船业的发展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有关。

我国的造船业到唐代时已十分发达，当时，全国许多地方都能造船，所造船舶之巨大、坚固以及载重量之大，都是当时的外国船所无法比拟的。到了宋代，造船业更取得了重大成就，其中尤以广州、泉州、明州等地所造的船舶最大。据成书于十二世纪初叶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载，其时客舟“长十余丈，深三

---

①《全唐文》卷464陆贽《慰问四镇北庭将吏敕书》

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篙师水手可六十人①”。

伴随着造船业的发展，我国的航海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其标志是宋代已开始将指南针运用于航海事业中。如《萍洲可谈》一书中记载说：“舟师……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也有“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的记载，这些都是指漂浮的水针。以后，便逐渐用罗盘指示航向了。如《梦梁录》载曰：“风雨晦冥时，惟凭针盘而行，乃火长掌之，毫厘不敢差误。”宋代指南针的运用，引起了航海技术的重大进步，使我国的海上交通逐渐繁荣与兴盛，从而客观上加速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②。

此外，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还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唐代以后，虽然对外关系更加频繁、复杂和密切，但对外交往的国家则比以前更加集中。除了加强与远东、南海一些岛国间的往来外，在西方主要是通过大食与世界各地发生关系。但不论是远东、南海，还是大食，都希望通过海上交通与中国发生联系，从而使陆上丝绸之路渐趋衰落和荒凉了。

2、渐趋沉寂的敦煌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西夏占领敦煌后，设瓜州西平监军司管辖。西夏的地方行政组织也分州（府、军）、县（城、堡）二级制，敦煌仍称沙州。当时的西夏，主要是东向与宋、辽争战，无暇西顾，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沙州地方首领仍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并曾向宋朝“七贡方物”。1068年以后，西夏惠宗为了征发沙州百姓进攻宋朝，开始加强对瓜、沙二州的控制，结果使敦煌更加衰落。1109年，瓜、沙、肃三州发生饥荒，人民

---

①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客舟条”

②参阅杨建新、芦苇《丝绸之路》310—31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流亡他乡。此后，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及陆上丝路的衰落，敦煌失去了丝路贸易中转站的地位。

从1205年开始，蒙古逐渐进入河西，1226年终于攻破沙州，西夏也随之灭亡。蒙古攻占敦煌后，废弃了沙州建置，将其给予成吉思汗的长孙拔都作为封地。元朝建立以后，忽必烈将敦煌纳入其直接管辖范围。1277年蒙古统一中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实行行中书省制度。地方行政组织有省、路、府、州、县各级，又正式设立沙州，属肃州路管辖。1280年，又升为沙州路总管府，下辖瓜州，直接隶属于甘肃行中书省。《元史·地理志》说："沙州路……元太祖二十二年，破其城，以隶八都大王（即拔都）。至元十四年复立州，十七年升为沙州路总管府，瓜州隶焉"。其下注曰："沙州去肃州千五百里，内附贫民，欲乞粮沙州，必须白之肃州，然后给予，朝廷以其不便，故升沙州为路。"元成宗时，为开发河西，曾在敦煌等地实行屯田，大德七年（1303年）"御史台臣言：'瓜、沙二州，自昔为边镇重地，今大军屯驻甘州，使官民反居边外，非宜。乞以蒙古军万人分镇险隘，立屯田以供军实，为便。'从之①。"屯田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未能恢复敦煌昔日的光辉。此外，元初直接统辖的西部边境在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北）与和田，其版图比汉唐王朝都大，敦煌已失去了往日经营西域的基地作用。再加上从中亚到蒙古的北方草原之路的频繁使用，也使敦煌失去了西域门户的地位。

明朝建国后，宋国公冯胜出兵西征，划嘉峪关而守，未曾经营敦煌地区，从而使敦煌成为边外荒凉之地。明成祖永乐以后，曾先后设置了沙州卫与罕东左卫，以经营敦煌，但很快被蒙古部落取代，后来又为新疆境内的少数民族吐鲁番王国占领。从明初划

---

①《元史》卷21《成宗纪》

嘉峪关为界后，中原与中亚的往来干线，就直接由嘉峪关而达哈密了，从而使敦煌更失去了它在丝绸路上的地位与作用。

清朝建立并在中原立足后，康熙便发兵西征，开始经营关外之地，在今安西、玉门一带设立赤金、靖逆二卫。1723年，雍正帝复置沙州所，1725年升为沙州卫，并因原沙州卫城受党河河水侵蚀，东墙坍坏，在党河东新筑卫城，即今县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改沙州卫为敦煌县，隶属安肃道。从雍正到乾隆，清王朝通过移民、屯田、垦荒等措施，使敦煌人口迅速增长，社会经济也逐渐走向恢复。

3、已近黄昏的莫高窟艺术

西夏统治者占领敦煌后，在武力征服的同时，还大力提倡佛教。西夏立国者赵元昊，既“通蕃汉文字”，又“晓佛图学”，甚至提出以“佛图安疆”的口号。西夏统治者曾多次向宋朝请购《大藏经》，并广建佛塔寺院，贮存经藏，还延请各族僧人演译经文，广为刊行。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西夏的佛教十分兴盛，到处兴修石窟寺，如西夏首府今银川附近的须弥山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肃北五个庙以及内蒙古一些地区，都有西夏兴建或重修的石窟。作为佛教圣地的莫高窟、榆林窟和西千佛洞，是所有西夏石窟中数量最多、最集中并比较成系统的代表。

在西夏统治敦煌的二百年间，莫高窟留下了大量的佛教艺术品。但是，它新开的洞窟很少，大部分都是覆盖前代洞窟而成。在西夏新开的洞窟中，只有第409窟窟顶是前部人字披顶，后部平顶，其余都是覆斗形顶或平顶。但西夏在开窟修龛时，和宋代一样，往往同时在窟前营造木构建筑，有的甚至发展为殿堂，如重修第130窟时，窟前修建的殿堂遗址1980年进行了发掘，殿堂阔五间21.6米，进深四间16.3米，地面全用西夏时流行的莲花云头纹方砖铺盖，相当壮观。

莫高窟的西夏洞窟，因为大部分是利用前代旧窟加以修改，在洞窟形制上很少有西夏时代的特点。同时，壁画和塑像内容也都承袭北宋格局，表现上愈趋程式化、简单化。

西夏时期的经变画比前代少了，题材也简单多了，好些经变画只有楼台亭阁、佛说法、天人围绕、莲花、水池、化生，没有任何故事情节，竟不知所画为何名。在重修盛唐的165窟时，也只是重描几幅普贤变、文殊变、阿弥陀经变。大部分壁画只画些垂幔花卉、团花图案、千佛菩萨、供养器、说法图和一些男女供养人，其内容贫乏，简直分辨不出是何题材。从艺术水平和历史价值方面看，409窟的回鹘装西夏男女供养人和窟顶红地团花图案、223窟东壁的文殊普贤变、130窟窟顶的团龙藻井及飞天，可以作为西夏时期的代表作。

1227年蒙古占领沙州后，在佛教圣地敦煌，既宣扬儒家思想，又重视道教，大搞所谓“三教平心”，“以佛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①。”同时，还对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也都兼收并蓄。在佛教中，又特别尊崇喇嘛教。元朝统治者还将西藏名僧八思巴请来，并封为国师，赐给玉印，让他掌管全国的佛教，实际上是做了元朝中央政府的顾问。因此，萨迦派密宗在全国十分流行，河西也不例外。马可波罗路过河西时，见到甘州的佛像“最大者高有十步，余像较小，有木雕者，有泥塑者，有石刻者，制作皆佳，外傅以金。”并说敦煌的“偶像教徒（指佛教徒）自有其语言②。”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莫高窟的速来蛮六字真言碑刻石上，有汉文、西夏文、梵文、藏文、回鹘文、八思巴文，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敦煌，各族人民和佛教徒聚居共事的情况。此碑的施主为西宁王速来蛮及其妃子、太子、公主、

---

①（元）刘谧《三教平心论》，转引自段文杰《晚期的莫高窟艺术》

②《马可·波罗游记》

驸马。他们不仅在莫高窟重修了皇庆寺，而且还开凿了洞窟。正是由于密教萨迦派在元代占有特殊的地位，因此在千佛洞的元代洞窟中就出现了引人注目的西藏式密教艺术。

莫高窟现存元代洞窟十个，它新开的洞窟形制有三：一是方形覆斗顶窟，二是主室长方形后部有中心柱的窟，三是主室方形有中心圆坛的窟。其中后者为敦煌藏密洞窟的典型形式，其坛上塑像，四壁绘满密宗图像。

元代的密宗壁画，既有西夏传下来的汉密系统，又有风格迥异的金刚藏密画派作品。莫高窟第3窟是“汉密”壁画的代表，全窟画满了大大小小的观音，尤其是南北两壁的《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神色庄重，画工精绝，是少有的佳作。其面部端庄慈祥，千臂珠圆玉润，素装无华，婷婷玉立。这一切，都出自艺术家的一条“线”，由于使用“兰叶描”线条，顿挫转折，劲利自然，兼以铁线描、折芦描、行云流水描等多种笔法，将肉体、须发、锦、绢、绵、麻各种不同质感的东西都表现得恰到好处。美术家们普遍认为，此画创作者的线描功夫，可谓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第465窟可以说是“藏密”的代表。其中心圆坛上的塑像已毁，“四壁上部画‘明王像’，下部画织布、养鸭、牧牛、制陶、驯虎、制皮、踏碓等六十多幅人物画，每幅画的侧面，都用纸笺写出画的内容，上半截是藏文语音，下半截是汉语①。”敦煌莫高窟的藏式密教图像，具有明显的来自尼泊尔和印度的影响，又有较多西藏原始宗教——苯教的成分，表现了萨迦派艺术的独特风格②。

元代以后，莫高窟的营建即告中辍。明代的莫高窟孤悬关外，长期陷入无人管理的状态，其“佛像屡遭毁坏，龛亦为沙所

---

①施萍亭《敦煌与莫高窟》

②参阅段文杰《晚期的莫高窟艺术》

埋①”。清王朝时期，又曾一度增补和重修过莫高窟，但内容混杂，技艺低劣，徒然破坏了旧有的艺术效果。就敦煌艺术的发展而言，为数很少的元代洞窟正是莫高窟艺术的尾声。

---

①《敦煌县志》

第 二 章——

艺术瑰宝千佛洞

敦煌石窟包括以莫高窟为主体的古敦煌郡境内的所有石窟，如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东千佛洞、五个庙石窟等，共计有洞窟550多个，壁画约五万平方米。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石窟中，以莫高窟的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据《李怀让重修莫高窟碑》记载，它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到唐代时已有“窟龛千余”。历经千余年来自然和人为的破坏，至今仍保存着十六国到元代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余平方米，塑像2300余身，唐宋窟檐木构建筑五座，是世界上现存最伟大的佛教艺术宝库。有“人类文化珍藏”、“形象历史博物馆”、“世界画廊”之称。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为人类珍贵文化遗产。

一、莫高窟的创建与编号

1、莫高窟之名称

莫高窟的“莫高”二字，是唐代以来在敦煌城沙漠附近流行的一种乡、坊里和山的名称。P·2913《张淮深墓志铭》载：“公以大顺元年（890年）二月廿二日殒毙于本郡，时年五十有九。葬于漠高乡漠高里之南原，礼也。”

又P·2482《阴善雄墓志铭》曰：“（善雄）当清泰四年丁酉岁（937年）八月十四日寿卒于钦贤坊之私第。春秋五十，以其月二十日权葬于州东漠高里之原也。”

同卷《罗盈达墓志铭并序》云：“府君讳盈达，……即以天

福八年，岁次癸卯九月……十六日葬于莫高里扬开河北原之礼也。”

又《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修功德记》中说：“将就莫高山为当今圣主，及七代凿窟龛一所，远垂不朽，用记将来。”

至于“莫高窟”一名，在S·5448《敦煌录》中就已经出现了。《敦煌录》说：“（沙）州南有莫高窟，去州二十五里，中途石碛带山坡，至坡斗下谷中，其东即三危山，西即鸣沙山；中有自南流水，名之宕泉，古寺僧舍绝多。”

“莫高乡”是唐代沙州十三乡之一，“莫高里”是“莫高乡”下辖的一个里名。据有的学者研究，今敦煌城东南七、八公里，去莫高窟中途有佛爷庙，庙东就是戈壁，其地势比佛爷庙高出很多，戈壁上荒冢累累，可能就是莫高里之原。而阴处士在莫高山开凿的窟龛，应当就是今天的莫高窟了。既然敦煌有莫高乡、莫高里，那么附近的原和山，也就有可能称为莫高原、莫高山。因而在这里开凿的石窟也就叫做“莫高窟”。由此可知，“莫高”二字，一定是与高出绿洲的戈壁沙漠有直接关系的①。

对此，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或认为这个石窟建造在鸣沙山崖壁上，而鸣沙山较之周围地形又高，沙漠的“漠”字与莫高窟的“莫”字，古语可以通用，在沙漠高处开凿的洞窟，即叫莫高窟；或认为最初开凿洞窟的乐僔和尚，道行高超，后莫能及，故以他所开凿的石窟称为莫高窟；或认为“莫高”是译音，即突厥语沙碛的意思，莫高窟就是指在沙碛里开凿的洞窟。

至于“千佛洞”一名，实际上是不确切的。因为“千佛洞”是一切刻有佛像的崖洞的通名，如山西大同的云岗、河南洛阳的龙门、甘肃天水的麦积山、新疆的吐鲁番、鄯善等，都有“千佛

①参阅阎文儒《莫高窟的创建与藏经洞的开凿及其封闭》，载《文物》1980年6期

洞”之名。即以敦煌一地而论，也有西千佛洞、东千佛洞等。但自斯坦因将其在敦煌劫夺的全部艺术品汇集成书，取名《千佛洞》后，“千佛洞”一名，也就为莫高窟所专有了。①

2、乐僔法师与莫高窟的创建

关于乐僔法师及其创建莫高窟的文字资料，据目前所见主要有以下几种：

（1）武周圣历元年（698年）五月十四日立《大周李君莫高窟佛龛碑》，简称《圣历碑》。碑文中记载：“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366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僔师窟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于二僧。……遥自秦建元之日，迄大周圣历之辰，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推甲子，四百他岁，计窟室一千余龛。今见置僧徒，即为崇教寺也。”这是我们所见最早记述创建莫高窟的资料。

（2）敦煌遗书P·3720《莫高窟记》：“右在州东南廿五里三危山上。秦建元中，有沙门乐僔，仗锡西游至此，遥礼其山，见金光如千佛之状，遂凿空镌岩，大造龛像。次有法良禅师东来，多诸神异，复于僔师龛侧又造一龛。伽蓝之建，肇于二僧……。”末署“时咸通六年（865年）正月十五日记。”比《圣历碑》晚167年。

（3）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北壁左上方墨书《莫高窟记》题记曰：“右在州东南廿五里三危山上。秦建元之世，有沙门乐僔，仗锡西游至此，巡礼其山，见金光如千佛之状，遂架空□岩，大造龛像。次有法良禅师东来，多诸神异，复于僔师龛侧又

①参阅姜亮夫《敦煌一伟大的文化宝藏》6页

造一龛。伽蓝之□肇于二僧……。”末署“□□□□□□通六年正月十五日记。”据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认为，此壁题记乃是据P·3720卷子本抄录的，P·3720《莫高窟记》为此题记的底本。

有的学者通过对上述三种资料摘句比较、排列分析后认为，后两件《莫高窟记》中的重要记述和主要词句都是从《圣历碑》抄录或略加改动而来的。因此《圣历碑》应该是我们目前所见关于乐僔、法良事迹和莫高窟创建的最早而且是唯一权威性的资料。关于乐僔法师与莫高窟创建的历史，无疑应以《圣历碑》所载为准①。

由以上探讨可知，莫高窟创建于苻秦建元二年（366年），其开创者为乐僔法师。这一年的某一天，乐僔法师仗锡林野，游方到了敦煌的三危山下。这时天已傍晚，时近黄昏，太阳即将沉落在茫茫无际的沙漠之中。乐僔蓦然抬头，奇景在他眼前出现了：对面的三危山一派金光耀眼，好象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虔诚的乐僔法师被这奇景炫惑了，认为这是一块圣地，就立誓在这里开窟塑像，兴建庙宇。于是他就到处化缘，募集了许多钱，请来了工匠，在这块沙漠上开起石窟来。莫高窟的第一个洞窟，于1600多年前便在这块“圣地”上出现了。

从科学的角度看，乐僔当时所见的金光千佛，自然是一种幻觉，但这种奇景，我们今天在莫高窟仍可看到。因为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是剥蚀残山，山上无草木，岩石为黯红色，其中含有石英、云母等矿物质。夕阳返射，常灿烂若金光。电影《海市蜃楼》的开头，就采用了这种原理。当然，乐僔对这奇妙的自然景象无法理解，就完全归之于“佛”了。

不久，乐僔法师又去云游了。许多年之后，法良禅师又从东

①李正宇《乐僔史事纂诂》，载《敦煌研究》第二期

方到此，他朝拜了这个地方，并在乐僔的窟旁开凿了一个窟。此后信佛的人逐渐增多，石窟也慢慢多了起来。

不仅仅是和尚，还有王公贵族，地方上的大小官吏，有钱的商人，普通的市民，手工业者，一直到从良的妓女，都在这个地方修建了大大小小的佛窟。

有的窟是一个人独造的，有的则是一家、一族、一个团体中许多人集资合造的，他们根据不同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作不同的布施功德，都不断地增加着莫高窟的艺术财富。

值得注意的是，莫高窟的创始者乐僔是敦煌本地人，法良也是“从东届此”，这就说明敦煌艺术并不是西来的，而是中华民族固有文化的反映，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3、研究敦煌的锁钥——莫高窟编号

敦煌莫高窟现存洞窟492个，最早的一组北凉窟聚集在崖面中段，距现今地表约十几米。北魏、西魏窟基本上是紧挨这组窟向南、北横向发展。北周、隋、唐窟也基本上按此规律开凿。五代以后的洞窟主要集中于崖面下层及南北两头。另外，由于崖面有限，有些洞窟是“见缝插针”，有的甚至破坏前代洞窟而再修。由于各个时代的洞窟交错分布，若按时代编号的话，不便检索。因此，为了研究工作的方便，各种编号都按现存各窟分布位置，以南北、上下方向为序编号。

莫高窟编号主要有六种，即伯希和编号、敦煌县官厅编号、高良佐编号、张大千编号、史岩编号和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其中以伯希和编号（以大写字母“P”为标志）、张大千编号（以大写字母“C”为标志）和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以大写字母“A”为标志）影响最大，至今仍在沿用。

现以各家编号时间为序，分别介绍如下①：

①详见宁强《敦煌莫高窟各家编号述评》，载《敦煌学辑刊》1986年2期

（１）伯希和编号：1908年伯希和盗劫敦煌遗书时，由其助手努埃特拍摄了莫高窟的大量图片，并首次对千佛洞进行了编号。据伯希和《敦煌图录》计算共182号，其编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摄影记录方便，因此有时十几个洞窟被编作一号，大方向是自南往北，但有时方向不定，上下纷杂，查找困难，弊端甚多。但是，由于伯氏编号配有大量图版照片和立面图，并出版了图集，所以影响较大。

（２）敦煌县官厅编号：1922年，敦煌县衙统领周炳南命营部司书会同敦煌县署警察对莫高窟进行调查编号。此编号与伯希和编号方向正好相反，从北向南，共353号，但其中有空号七个（即155、156、157、158、189、276、277号）。由于此编号既无立面图，又无摄影图版，故影响不大。

（３）高良佐编号：1935年，高良佐随国民党政府要员邵元冲来西北视察，历时四个月，写成《西北随轺记》。在有关莫高窟部分，记载伯希和与敦煌官厅编号，当时“皆已湮没，未能按号游览”，“因重加编号，自洞之北首下层起至三层止，共得二百零七号”。这个编号与敦煌县官厅编号类似，也无多大参考价值。

（４）张大千编号：1941年，张大千先生来敦煌临摹壁画，为了临摹工作的需要，他对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水峡口石窟进行了编号。张大千的莫高窟编号，开始从南向北，而后由北往南，再从南到北，呈“之”字形，共309号。与以前各家编号相比，张氏编号更为全面规范，而且作了初步的断代分期。张氏将窟号与时代同书于洞口或洞内侧壁，粉底墨书，比较醒目，再加上使用方便，所以影响较大。谢稚柳编《敦煌艺术叙录》时就采用了此编号。

（５）史岩编号：1943至1944年，史岩在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期间，由于不满意伯希和与张大千的编号，遂在伯、张编号的

基础上，“舍短就长，折中两者之间，遂成一种新编号法”，共589号，在《敦煌石室画像题识》中附有此编号的立面图。史岩编号只在他自己的著述中应用过，无多大影响。

（6）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1951年，《文物参考资料》2卷5期所附《敦煌千佛洞各家编号对照表》中，正式公布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新编号，共计469号。以后又有增补，最后定为492号。此编号顺序是先由北至南，然后由南往北，再从北到南，呈“之”字形，正好与张大千编号方向相反。实际上这个编号在解放前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就已编好使用，1948年在南京、上海举办“敦煌艺展”时，其目录就使用这个编号。

虽然敦煌文物研究所编号也有其不足之处，但它与张大千编号相比较，对洞窟的关系区分更细致、更系统，断代分期也更准确一些。可以说，它是目前莫高窟各家编号中最好、最科学、使用范围最广的编号。解放后的敦煌学研究者及出版部门，多以此编号为标准。

二、墙壁上的图书馆

——敦煌壁画概述

敦煌壁画是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莫高窟现存壁画45000平方米，其内容非常丰富，是一座博大精美的民族壁画艺术宫殿，所以被法国人称为“墙壁上的图书馆。”

1、敦煌壁画的内容

敦煌壁画从内容上看，大体可分为七类：

（1）佛像画。即佛陀、菩萨等供奉神灵的形像，其中既有释迦牟尼佛、三世佛、七世佛、十方诸佛、贤劫千佛等佛像画，也有观音、大势至、文殊、普贤、弥勒、地藏等菩萨像，还有天

王、龙王、药叉、乾闼婆（飞天）等天龙八部。据统计，现存各种佛像12208身，还有说法图933铺。它描绘的都是佛教崇拜的各种神像。

据佛经里讲，佛、菩萨都为男像，但到中国之后，由于对女性之美及其温柔性格的爱慕，特别是对母爱的崇敬，到了唐代，菩萨逐渐变为女性。虽然有的嘴上还画有蝌蚪胡子，但其中丰腴的面庞，舞蹈式婀娜的姿态，温柔娴静的表情，却是对女性美的典型反映。画师们也多以宫廷美女作为描绘菩萨的蓝本，从而充分表现了女性美。

（2）故事画。是指以佛经故事为依据而作的连环画。由于故事委婉曲折，有头有尾，对观众有较强的吸引力。我国古代的民间画师及佛教僧侣在创作故事画时，充分发挥了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和艺术天才，所画内容丰富多彩，情节动人，生活气息浓厚，具有诱人的魅力。由于故事性质不同，可划分为佛传故事、本生故事、因缘故事和比喻故事四类。

佛传故事是描绘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生平事迹的故事传说。只不过佛经中和壁画上的佛传故事，是经过神化，用宗教色彩修饰过的释迦牟尼生平事迹的故事。经过佛教徒若干世纪的加工渲染，已把许多古代印度和东南亚优美的神话故事、民间故事附会到释迦牟尼的身上，可信的史实已经很少了。现存的佛传故事画实际上是一部佛教神话传奇文学。

敦煌早期壁画中，一般没有完整的佛传故事画，只有乘象入胎、夜半逾城两个代表性的场面。北周时才出现了多幅完整、连环画式的佛传故事画。如290窟六条并列的佛传故事画，长达25米，描写了87个场面，前后衔接，贯通一气，这是我国现存早期最完整的传记性连环画。五代宋初曹氏画院时期，佛传故事画以屏风形式出现，描写了130多个场面，并增加了一些新内容，使佛传故事的内容更为丰富，已经完全中国化了。

本生故事画是描写释迦牟尼前生各种善行的连环画，如九色鹿舍己救人、萨埵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贸鸽等，虽然已打上了宗教的烙印，但仍保持着印度民间故事的本色。依据佛教灵魂不灭、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的思想，释迦前生只有经过无数次的善行转世，才能最后成佛。因此佛教徒便把释迦的前生描绘为与众行善的国王、王子、贤者、良士，或是动物中的鹿王、猴王、象王、狮王等。其真实目的是为了把释迦说得神圣高大、不比常人，从而把许多优美的神话、童话和民间故事都附会到了释迦身上，并在这些故事的前后加上几句话，把其中善良的角色说成是佛的菩萨之身或其先祖、亲属及追随佛的弟子，而把邪恶的角色说成是佛的宿敌或外道师徒。

因缘故事是描绘佛陀度化众生的连环画。它和本生故事的区别是：本生只讲释迦本人前生故事，而因缘则讲佛门弟子、善男信女前生或今世之事。如沙弥守戒自杀、五百强盗成佛、犁耆弥七子娶妇、金财双手献金钱、波斯匿王丑女变美等。有些内容离奇，情节曲折，颇有戏剧性，是敦煌壁画中最引人入胜的内容。

比喻故事是释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给佛门弟子、善男信女讲解佛教教义所列举的故事。敦煌壁画中的比喻故事画不多，主要有饿狼守戒、鹿母子、鬼子母、象护等。这些比喻故事画中虽有佛教的说教成分，但故事的寓意却十分深刻。其中许多故事在释迦降生以前就已由人民创作，在民间口头流传。只不过经释迦的口述改编，又被佛教徒结集记录，保存至今。所以《比喻经》、《百喻经》、《杂喻经》、《法句比喻经》、《杂宝藏经》等，实际上也是古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的寓言、童话故事集。

（3）神怪画（即民族传统神话题材）。是指北魏晚期出现的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以及风雨雷电等汉晋以来体现传统的道家神仙思想的神话题材。如第249窟窟顶壁画，就是很典型的道教题材画面。这类具有神仙思

想的绘画题材突然闯进石窟，虽然与佛教题材不太合拍，但却大大丰富了石窟艺术的内容，而且出现了崭新的意境和中国风格。

道教题材的闯入石窟，乃是流行于北方的佛学禅定思想与道家虚静思想相结合的反映，是佛教思想和艺术中国化过程中突破性的表现。这类题材随着佛教思想与道家、儒家思想的结合而进入石窟，与佛教题材交织在一起，到了唐初才逐渐消失。

（4）经变画。一切以佛经为依据的绘画，都可以称为经变或变相。这里是指按一部经绘成一幅画的巨型经变。莫高窟中的主要经变有《维摩诘经变》、《阿弥陀经变》、《法华经变》、《观无量寿经变》、《药师经变》、《宝雨经变》、《报恩经变》等二十余种。每一经变又包含许多故事情节，如维摩变14品，以文殊问疾为主体，展现了维摩居士的神通变化，反映了当时帝王出行和各国王子使者赴会的场面。

经变画是我国佛教艺术的独创形式，莫高窟的经变画始于隋、盛于唐，五代以后逐渐衰落，据统计有24种1055幅之多。唐代前期的各种经变，形式多样，主题突出，含蓄地反映了唐代前期的历史风貌。到了唐代晚期，便出现了公式化倾向，而后每况愈下，渐趋衰落。

（5）佛教史迹画。是指根据史籍记载，描绘佛教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佛教圣迹及感应故事、戒律画、瑞像图等的画面。其中既有真人真事，也有想象虚构，甚至宗教幻想，据统计有40处67种之多。初唐时期的323窟，是绘制佛教史迹故事最多的一个洞窟，其主室南北两壁绘有8个佛教史迹故事，即张骞出使西域图、释迦浣衣晒衣石、佛图澄变现神异、阿育王拜塔感应事，康僧会建康献舍利、朱应吴松江迎石佛、高悝扬都得金像、隋文帝请昙延祈雨。

佛教史迹画多属本土自造，也有西域乃至印度的，尽管真假混杂，有些已被佛教徒神化，宗教色彩较浓，但也有不少史实，

是研究佛教史、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资料。

（6）供养人画像。即为出资开窟造像的施主所画的功德像，属于肖像画。画像的内容有王公大臣、地方官吏、贵族妇女、各族施主、歌舞妓女、官私奴婢等。画面大小不等，既有二、三十公分的小像，也有高如等身或超过真人的大像。他们都是有名有姓的现实人物的肖像，如《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张议潮夫人宋氏出行图》、《回鹘公主出行图》等，就是真实历史人物的画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现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对于供养人来说，追求的主要是对佛的虔诚，并不要求肖似。所以供养人像往往千人一面，没有个性。只有唐宋时代的供养人像，既写实而又有个性，是莫高窟供养人画像中之佼佼者。

（7）装饰图案。即建造洞窟的建筑装饰，有藻井、平棋、龛楣、圆光、宝座、地毡、桌围、冠服和器物等，其中以藻井和平棋最为突出。装饰花纹随时代变化而各异，主要有植物纹、动物纹、规矩纹、天象纹、人物纹等。装饰图案中的许多纹样并非单一不变，而是经过变形的，特别是一些结合纹样，如忍冬与莲花结合，动物与植物结合等，都是画师们高度想象力的反映。

以上我们从七个方面概略地展示了敦煌壁画无比丰富的内容，虽然它们各有特色，但又是洞窟整体结构的组成部分，显示了我国各族画师卓越的创造才能和高度的艺术成就。

2、形象的历史

敦煌壁画虽然是根据佛典和佛徒的要求创作的，但画工在进行创作时，总是以现实社会为基础的，并从各个角度对现实社会有所反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敦煌壁画是一部形象化的历史。

从总体上说，敦煌壁画是通过间接和直接两种方式反映现实

社会的。

所谓间接反映现实社会，是指通过壁画画面的表象探究其内在含意，发掘它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如第321窟的“宝雨经变”（初唐武则天时期）是根据《宝雨经》绘制的。《宝雨经》是一部戒律典籍，早有译本，但在武则天执政时期，达摩流支重译时，则加入了“尔时东方有一天子，名日月光，……（佛告之曰）我涅槃后……（汝）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的内容。此所谓日月光天子当现女身入主摩诃支那国（中国），当然是指武则天了。在第321窟经变上方绘日月，在薄伽梵说法处画一双手合十拜谢释迦的女王，显然是说武则天乃日月光天子，当入主支那国，登基称帝。为了武则天称帝的需要，和尚法朗、薛怀义等还撰《大云经疏》，说武则天是弥勒菩萨降世，当为女皇。武则天看后非常高兴，于是颁令天下遍造大云寺，塑弥勒佛像，供奉《大云经》。第96窟高达33米的弥勒佛像就是为适应这种形势而建造的。

其他如“药师经变”、“观音经变”、“法华经变”、“弥勒经变”等，都反映了现实社会人们希望消除社会痼疾，免遭自然灾害和向往美好社会的心理状态。

所谓直接反映现实社会，是指壁画中有许多表现生产、生活、历史、风俗的图画。这些壁画的内容很多，既有风俗、风情画，也有生产、交通、商业活动、建筑画，还有歌舞、百戏、体育、服饰画。例如表现农业生产的“耕获图”，就是一部很形象的历史。它将犁地、播种、收割、运输、打场、扬场到入仓等生产过程都绘入画面。还有许多生产工具，如犁、镰、茇茇草扫帚、木杈、木锨、榛枷、簸箕等等，都是具有北方地区生产特点的工具，有些还可看出是西北地区就地取材的产品。特别是第445窟（盛唐）的“耕获图”，画面上的曲辕犁，是我们了解唐代改进农业生产工具，提高生产率的重要形象资料。这种犁把直辕改

为曲辕，改进犁头，使之能左右转动，优点很多。唐陆龟蒙在《耒耜经》中对此犁有文字记载，但无其形，故对其功用很难具体领会。中国历史博物馆依据敦煌壁画之形和《耒耜经》之文进行实物复原，才对此犁的多种功能和较高耕作效率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又如“弥勒变”的“耕获图”中，既有农民交粮、堆粮的场面，也有管事收帐计筹的场面。而“佛传”中的“耕获图”则画了城主高坐宫内，官员雁列两旁的场面。殿下除有交粮者外，还有一人裸身跪于地，一人执鞭挞笞，显然是一幅活生生的逼租画面。

另外，敦煌壁画中有大量的供养人画像，它们描绘的是当时当地现实生活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壁画上不仅图画其仪容，而且还有供养人题记，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供养人情况，直接地反映着现实人物及其活动，是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有些甚至可以填补历史研究的空白。

285窟北壁上有西魏大统四年、大统五年发愿文题记，这是莫高窟现存最早的纪年题记。在这个题记下面，有成排的男女供养人画像。其中一组，画一高鼻长髯长者，头裹幅巾；身后数身均为青年，头戴卷沿毡帽；另有一身，头后垂小辫，身着圆领小袖褶，白布裤，乌皮履。墨书题记为“清信士阴安归所供养……”

阴氏及同窟的贺氏、滑氏，可能是北朝胡姓，褶裤是鲜卑族常服，脑后垂小辫是鲜卑族索头部的风俗，即历史上所谓“索头鲜卑”。从这些画像和题记，不仅可以判断此窟是鲜卑族出资建造，而且对于探讨河西鲜卑的历史，很有参考价值。

在220窟门上，画一男供养人，戴幞头，穿窄袖袍，乌靴。此窟底层初唐壁画于1944年被剥出，根据题记可知此窟乃初建于唐太宗贞观十六年的翟家窟。220窟的题记很多，在“贞观十有六年敬造”题记中有“弟子昭武校尉柏堡镇将……玄迈敬造”等

语。唐代初年在河西设置了许多军镇防戍，大者曰军，小者曰守捉。昭武校尉柏堡镇将，大约属于守捉一类武官，是河西边防军之一。这类题记其他洞窟中也有，它为探讨河西军镇防戍的变迁，提供了新的材料。

建于中、晚唐时代的144窟东壁上，有一女供养人画像，身着汉装，拱手而立。其题记为“夫人蕃任瓜州都督仓曹参军金银间告身，大虫皮康公之女修行顿悟优婆姨如祥弟一心供养。”“仓曹参军”为正八品下小官。所谓蕃任，就是吐蕃统治时期在吐蕃统治机构中作官的汉人的自称。大虫皮即虎皮，吐蕃贵人有战功者，“生衣其皮，死以旌勇①”，后来成为吐蕃官制。在205、231等窟壁画中都有虎皮服装。这类壁画和题记说明，吐蕃政权的官制是唐蕃混合制，它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河西政治形势的形象反映。

这些供养人画像和题记，对于历史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而敦煌壁画中的供养人画像和题记，并非仅仅是上面介绍的这些，而是成千上万，保存到现在有题名结衔的就达一千余条，它反映了河西地区中古时代各民族的活动情况。上自官僚贵族、高官显宦，下至妓女奴婢，特别是敦煌本地的豪门贵族，如李、张、阴、索、翟、曹等氏族及其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敦煌壁画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是研究西北地方史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敦煌壁画中不仅有大量的供养人画像，而且还有许多出行图，如张议潮夫妇出行图、张淮深夫妇出行图、曹议金与回鹘公主出行图、慕容归盈夫妇出行图等。这些出行图，都是表现当时当地历史人物活动的壁画，而且有名有姓，是历史的真实反映，本身内容与宗教无关。其中以张议潮夫妇出行图时代最早，作于唐懿宗咸通六年（865年），其榜题全文是“河西节度使检校司

---

①《新唐书》卷216《吐蕃传》

空兼御史大夫张议潮统军□除吐蕃收复河西一道出行图”。对研究西北地方史及归义军历史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除此而外，敦煌壁画中直接反映现实社会的画面很多，如“弥勒下生经变”中的“婚礼图”，是唐宋时期婚礼习俗的真实写照；壁画中的宫殿一类建筑，虽绘于佛国净土之中，实际上却是人间帝王贵族宫殿建筑的真实反映。

总而言之，敦煌壁画尽管披上了层层圣光，但古代画工在其创作时，仍然离不开自己所处的现实社会，并按照自己对现实社会的理解和体验来反映现实生活，或发挥想象力创造心目中的佛国世界，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敦煌壁画中就出现了许许多多反映现实社会的画面。

本节主要参考资料：

段文杰先生《敦煌壁画概述》、《形象的历史——谈敦煌壁画的历史价值》、《道教题材是如何进入佛教石窟的》，以上均见《敦煌石窟艺术论集》

段文杰先生《敦煌艺术概观》、李永宁先生《敦煌壁画的世俗性》、谢生保先生《敦煌壁画中的佛教故事画》，以上均见《文史知识》1988年8期

三、彩塑艺术的杰作

莫高窟彩塑，是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一千多年以后，现在还保存着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北宋、西夏、元、清时期的塑像两千余身，此外还有影塑一千余身。象敦煌莫高窟这样，保存古代彩塑的数量之多，延续时代之长，塑绘艺术又很高的石窟，不仅在我国，而且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它既是我国珍贵的民族艺术遗产，也是全人类的珍贵文化遗产。

1、丰富多彩的敦煌彩塑

敦煌彩塑的主要题材有佛、菩萨、弟子、天王、力士等。它们是石窟里的主体，被布置在显著地位，并在周围以绚丽多彩的壁画相衬托。

佛像是佛教艺术最主要的崇拜偶像，有弥勒佛、阿弥陀佛、三世佛（过去、现在、未来）等。另外还有与佛传故事有关的形象，如表现释迦牟尼在树林里苦修的形象，传布教义的说法像和坐在菩提树下的降魔像等等。对于佛像的塑造有比较严格的规定和要求。此外，对于菩萨、弟子、天王、力士们的高低大小和排列次序也有一定的规定。当然，在实际制作中，对造像只能规定一些比较明显的外形特征，对于其内在精神的表现是很难严格规定的，其中关于比例的规定是随着时代的更迭而不断演变的。莫高窟彩塑题材范围虽然比较狭窄，但古代匠师们在千余年的制作过程中，并非千篇一律，而是继承了我国悠久的民族艺术传统，并吸收外来因素，不断创新，从而塑造了各时代不同风格的作品。

根据敦煌彩塑的发展、演变过程，大体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发展期）包括北魏、西魏、北周；中期（极盛期）包括隋唐两代；晚期（衰落期）包括五代、宋、西夏、元朝。

莫高窟早期塑像，在北魏孝文帝改制以前，人物面相一般是丰圆或者丰满而略长，鼻梁高隆直通额际，眉长眼鼓，肩宽胸平。佛像穿右袒式或通肩式赤布僧伽犁（红色大衣），有着密集的装饰性衣纹，给人以薄纱透体之感，史称“曹衣出水”。如259窟的北魏坐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艺术的整体风格来看，此时的塑像体态健美，神情庄重，色彩明快，造型厚重，手法简朴，从中既可以看到中原地区传统雕塑艺术的影响，又能领略西域佛教艺术的优美风采。

太和改制以后，中原汉式衣冠在敦煌流行，南方“秀骨清像”的艺术风格也传到了敦煌。从西魏开始，彩塑的主要形象是面貌清瘦，眉目疏朗，身体扁平，眼小唇薄。西魏285窟的禅僧就是这种形象的具体表现。此时塑像反映的内容比以前有所增多，性格的类型化逐渐明显。如佛的庄严慈祥，菩萨的清秀恬淡，飞天的飘逸闲畅，力士的威猛粗犷等，都有了各自的表现形式。

从早期彩塑艺术看，佛教艺术的内容和形式虽然是外来的，但是传入中国后，通过溶化、改造，逐渐地反映了华夏民族的风度、气质和审美意识，民族形式和华夏传统便逐渐在佛教艺术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隋代彩塑虽然是前代的继续，但并没有因循套用前代的程式，从而在艺术实践上有了卓越的成就。

隋窟的中型和小型彩塑大都比例适度，为标准的东方型人体形，但也出现了一些头大体壮下肢粗短而形成大型彩塑的新造型。有的塑像高达四、五米，由于窟顶高度及引伸距离的局限，作者有意识加大了头部体积及上肢的比重，兼有自上而下的倾斜度，使匐伏于地的朝拜者仰视佛面时，有一种庄严肃穆感。这样既渲染了宗教气氛，又强化了大型雕塑的表现力。特别是天王力士像，头大如斗，躯干及两臂夸张到生理解剖限度之外，但丝毫不损其威武雄猛之势。407窟是隋代规模最大的洞窟，全窟共有塑像28身。人物造型表现了隋代塑像在外形上的显著特征，即头大、体壮、腿短。

莫高窟的唐代彩塑，无论其规模、数量，还是题材的广度和艺术成就都是空前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身大佛像，即北大像和南大像。

涅槃像是唐代规模最大的群像。148窟中，李太宾建于大历十一年（776年）的涅槃像长达16米，右肋而卧，围佛侍立的“七

十二弟子”中，有菩萨、天龙八部、十大弟子和各国各族徒众。158窟吐蕃时期的涅槃像，在规模上与148窟相当，长约15米，但周围徒众均绘成壁画。这尊涅槃像造型端正，睡态安详，全无濒死前的痛苦和恋世之感，完全是一副睡美人的神态。

隋唐时代的塑像，数量最多，制作最精的是与人等高的群像。在一铺像中，佛是最高统治者，是石窟里的主尊，形体最大，居中位。其次是观音、势至等大菩萨和天王。迦叶、阿难虽是佛的近侍，但由于道行等级不高，形体比菩萨小些。乱跪在莲座上的供养菩萨，等级更低，形体更小。

唐代的彩塑佛像一般七身一铺，多则十一身，形成完备的整体。在这些整体塑像中，至高无上的主尊，深睿智慧的弟子，沉静安谧的菩萨，威严无敌的天王、力士以及温厚虔诚的供养菩萨等，都按其职位等级有次序地安置在形同殿堂的龛坛上。同时，匠师们凭借其天才和智慧，把未塑像的八弟子、诸菩萨以及天龙八部绘制在佛像后面的龛壁上，由此衬托并弥补了由建筑的局限而造成塑像空间深度的不足，从而使局限的佛龛化为相对无限，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艺术建筑、雕塑、绘画三者互为依存，密不可分的传统特点。

唐代僧侣的社会地位很高。敦煌彩塑中也有少数高僧的肖像，如第17窟（藏经洞）中的洪谮像，是莫高窟现存数身高僧肖像中最好的一身。他身披通肩袈裟，作禅定状，坚毅自信，端方持重。作者以含蓄的眼神，紧闭的嘴唇以及细微的面部皱纹，表现了这位高僧深沉的内心境界。

莫高窟唐代塑像的艺术风格，是在隋代不断探索与创造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例如迦叶像是北周时代开始出现的，到了隋代，其面相和体形已有了不少发展和变化，直到唐代，才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老诚持重”的典型。菩萨像也是如此。唐代的菩萨像，在体形、面相、神态上尽管千差万别，但都具有“人物丰

浓，肌胜于骨”的共同特征。如第205窟的“游戏座”菩萨，虽然色彩已变，肢体已残，但从其丰满的身躯，自然倾斜的姿态，以及富有装饰性的锦裙褶纹里，都表现出唐代艺术所普遍崇尚的“浓丽丰厚”的时代风格。

晚唐、五代时期，莫高窟艺术已呈现出明显的衰颓迹象，造像之风远不及隋和唐前期之盛。此时的彩塑，虽丰腴华丽，但神情呆板，缺乏个性，许多作品坠入程式化。不过偶尔也有几尊塑像，继承了盛唐风格，但功力犹存，气派不足，只不过是盛唐艺术的回光返照罢了。

由于五代宋初的洞窟多在崖面下层，因此破坏较大，现存塑像已不多。在曹元忠建造的55窟里，还保存着一铺完整的宋塑，有佛、菩萨、弟子、天王、金刚力士等十余身。其形象衣饰仍保持着唐代遗风，在规模上甚至超过了唐代。

宋代、西夏、元、清各期的彩塑保存不多，佛像大都呆板迟滞，缺少活力，尤其是清代塑像，俗不可耐，根本不能和隋唐塑像相提并论。

莫高窟的彩塑艺术，虽然是被封建统治者利用来宣扬宗教迷信思想的，但是作为古代遗留下来的艺术作品，它却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才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宝贵艺术遗产。

2、敦煌彩塑的制作方法和特点

由于敦煌石窟开凿在砾岩上，不能雕刻，因此一开始就采用了传统的泥塑方法。古代的匠师们用捏、塑、贴、压、削、刻等传统泥塑技法，塑出简洁明快的形体后，再用点、染、刷、涂、描等绘画技法赋彩，以润饰皮肤，画出细节，体现质感。

（1）泥塑的制作技巧和敷彩

从一些已经残破的彩塑上，我们可以了解到泥塑骨架制作的

奥妙。小型彩塑一般是用木头削制成人物的大体结构，表面塑上薄薄一层细泥。那些木胎本身已经可以看出人物的大体造型和动态。一些比较大型的彩塑骨架，一般都用圆木根据塑像姿势的需要扎制。现已发现古代匠师巧妙地按照塑像动态选用适当弯曲的木料，如197窟前室的力士像，就用了一根粗大而弯曲的圆木，仅仅在脖子的位置砍细了一些，由此就能清楚地看出力士仰头挺胸的生动神态。有的塑像用木板制作手掌，用戈壁滩上的红柳枝条做手指，然后敷泥，第158窟的佛像就是这样制做的。一些高达二、三十米的泥塑，是不用木制骨架的，而是在开凿洞窟时预留塑像石胎，然后在石胎上凿孔插桩，再于表层敷泥塑成。

用圆木搭制的骨架，上泥前需用芨芨草或芦苇捆扎成人物的大体结构，这样既省泥又可减轻圆木立柱的负重。另外，在骨架上还有一些横向的木桩楔入背后壁上凿出的孔里，把塑像固定起来。

敦煌彩塑用泥都是当地河床沉淀的一层泥土，即澄板土，它质细而无胶性，制泥时需加入适量的细砂和纤维。根据加入的纤维不同，大体分为两种，即粗泥和细泥。粗泥用澄板土加麦秸，以塑人物大样。细泥用澄板土七成、细砂三成，再加麻刀或棉花合成，以塑造人物表层及五官、衣褶、佩饰等细部。由于古代匠师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制泥和塑造经验，使泥塑完成后收缩小，不开裂，保存久远。从已残破的敦煌泥塑中可以看出，塑泥有明显的层次，每层表面都留有抹泥的指纹，这说明泥塑是分层敷泥的，并且每敷一层都不能过厚，而是待其水分适当挥发后再敷。最后加工表层的细泥，一般较薄，在其干燥过程中，需用塑刀反复按压收紧，从而使泥塑完成后不再变形和开裂。

同时，古代匠师们还广泛使用了泥范（即泥制的模具），用以制作中心柱或窟壁上的浮雕和圆雕人物身上的璎珞、串珠和花冠等装饰。此外，还采用了预制头部、手指、脚指等局部的方

法。这样既节省工时，又考虑到了细部装饰及指、趾容易损坏的情况。

敦煌彩塑在敷彩上，各时代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敷彩比较简朴沉稳，主要用土红、石绿、石青、白、黑等几种颜色。佛像大都用土红色大面积平涂通肩衲衣。菩萨像一般用石青、石绿等描绘裳、裙及飘带的形体转折变化。面部及手、脚，则用白色或肉色。隋唐两代，敦煌彩塑的敷彩发展到了辉煌灿烂的时期。隋代塑像上出现了许多织锦图案和五光十色的璎珞装饰。唐代的敷彩更加绚丽，除了描绘丰富多彩外，许多地方还有装金，至今仍闪烁着光彩。五代以后，在敷彩上逐渐演变为比较清雅的色调，装銮技艺已不能和唐代同日而语了。

（2）塑造上的特点

敦煌彩塑在塑造上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塑雕的结合。泥塑与石雕，都是立体造型艺术，具有共同特点。为了稳固，雕塑必须靠山崖或背屏，并与山崖背屏相连接。其雕凿工艺一般是先雕出大的体积，然后逐渐加工细刻。泥塑则是先制作骨架，再以非常柔软的砂泥逐步分层塑制，这样既易于表现大的动态和飞舞的飘带，又易于表现细部更加细微的变化，达到生动活泼的效果。雕刻和泥塑虽然是两种不同的制作技艺，但在可能的范围内又往往相互影响、吸收、借取。敦煌彩塑就具有泥塑比较生动活泼、刻划细腻等特征，又在不少地方运用了石雕的表现手法，这在早期的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如第432、248等窟中心柱四周的菩萨像，其头部前倾，身体紧靠中心柱，体积扁平。而靠近身体的一只手却平贴在身上，这些都是借用了浮雕的处理方法。

第二，绘塑结合。敦煌彩塑一般都在大型龛中或须弥坛上，塑像的造型、着色都与四周壁画统一协调，相得益彰，在金碧辉煌的色彩中，更能衬托出塑像在窟中的主体地位。

绘塑结合常常用来处理大形与细部的关系。如唐代天王像，铠甲只塑出大体外形，甲的细部鱼鳞、锁子等，多以金箔装饰和青绿彩绘。塑像的颜面和肢体敷以重色，菩萨像涂白色，以表现皮肤的洁白莹润。弟子、天王涂肉红色，或赭红色。人物的眼、眉、须、发以黑线或赭红线描画，同时以浓墨点睛，朱红涂唇。色彩上的夸张有助于人物性格的表现，从而收到了泥塑不易达到的效果。由于绘塑的巧妙结合，大大增强了佛像的艺术感染力。

第三，现实性。敦煌彩塑属佛教艺术的范畴，但它并没有严格遵守佛教造像的清规戒律，而是普遍运用了“夸饰”的手法。如彩塑菩萨，一般都长眉入鬓，嘴角深陷，项下加三级，加长手指等等。这些虽然都违反生理现象，但由于“夸而有节，饰而不诬”①，不仅无损于形象的真实性，反而更好地表现了菩萨的女性特征，增强了形象的典型性和艺术魅力。

敦煌彩塑能够获得高度的艺术成就，正是由于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佛教造像的清规戒律，并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大胆地以“妓女”、“宫娃”、“胡商”、“梵僧”、“将军”等现实人物为蓝本，并加以夸张、想象、概括、提炼，才塑造了富有社会生活气息的宗教人物形象。

本节主要参考资料：

孙纪元先生《谈谈敦煌彩塑的制作》，载《敦煌研究文集》；《略论敦煌彩塑及其制作》，载《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文物出版社1987年出版

段文杰先生《敦煌彩塑艺术》，载《敦煌研究》试刊第一期

杜永卫先生《莫高窟彩塑艺术（敦煌艺术小丛书之十六）》，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①《文心雕龙·夸饰篇》

四、飞天新装挥舞迎

——敦煌的飞天艺术

飞天是佛教艺术中最生动活泼的形象，是佛经中的乾闼婆（天歌神）与紧那罗（天乐神）的合称。她们的职能是侍奉佛陀和天帝释，因能歌善舞，周身还散发着香气，所以又叫香音神。

1、敦煌飞天的产生

乾闼婆，乃汉译佛经八部众之一的乐神，原来是古印度婆罗门教的群神之一。据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以及《薄伽梵往世书》的神话传说，他是天神和阿修罗从乳海中搅出来的。

紧那罗，乃印度古神话中的神。据唐慧琳《音义》载："真陀罗，古作紧那罗，音乐天也。有微妙音响，能作歌舞。男则马首人身能歌，女则端正能舞。次此天女，多与乾闼婆为妻室也。"后来逐渐演变为佛教八部众之一。

在印度、中国以及中亚的石窟艺术中，飞天是常见的形象。至于"飞天"一词，就目前所知，最早见于《洛阳伽蓝记》。该书卷2载："石桥南道有景兴尼寺，亦阉官等所共立也。有金像辇，去地三尺，施宝盖，四面垂金铃七宝珠，飞天伎乐，望之云表。"杨衒之所记乃公元六世纪初的情况，其金像辇上的"飞天伎乐"到底是什么样子，目前已无法见到了。但通过考古发现，我们却有幸看到了南朝"天人"的形象。

"天人"形象，是1968年南京博物院在江苏省丹阳县胡桥吴家村和建山金家村出土的两座南朝萧齐时期的墓葬中发现的。其中的砖纹壁画《羽人戏龙图》和《羽人戏虎图》特别引人注目。在龙和虎前都刻一羽人，羽人腰束飘带，衣袖、裤管作羽翼状。

在龙、虎上方，各有三“天人”（据砖文自铭）凌空飞翔①。对这铭刻有“天人”的形象，或称之为“飞仙”，或称之为“飞天”。

“天人”也称为“天众”、“天部”（复数），大凡佛传中降生、出家、说法、涅槃等场合，以及佛本生故事中行善业之际，依其场合与情节的不同，天人（或天众、天部）或以歌舞供养，散花祝愿，表示对佛的礼赞歌颂出现于空中；或以佛的侍从、护法的身分出现于空中。因此，在绘画和雕塑中也就创作了飞行空中的天神形象。

上述南朝墓葬中的“天人”形象，并非佛涅槃时的最后供养，而是陪伴和引导墓主人乘龙乘虎以升天的。这里的“天”，已不完全是佛教传入以前中国原有的仙山之上的“天”，而是带有佛教“西方净土”的意味了。因为这时佛教已在江南广为流传，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融合。在这种情况下，把中国传统的羽人飞仙与佛教天人熔为一炉，画出中国化的“天人”形象，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在古代中国，“飞仙”似有两个系统：一是中国固有的，另一是印度传来的。中国固有的飞仙，就是指羽人，是神仙家思想的产物。南朝墓葬中的天人没有长羽毛，这和甘肃酒泉丁家闸5号墓壁画中的羽人不同。丁家闸5号墓的羽人，虽然也是飞仙模样，但保留了双肩背后的羽翼，没有天人的成分和形象。南朝大墓中的戏龙、戏虎图，都是羽人和天人并存于同一画面上。这种情况，似已说明“天人”已不完全属于中国固有的飞仙，而属于源于印度而中国化了的飞天。这种羽人和飞天并存的情况，在敦煌也有发现。如莫高窟第249窟壁画、第290窟残塑等，都是羽人和飞天共存。由此可知，羽人进入了佛窟，天人进入了陵墓，它们相互交起了朋友。这种情况，既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

①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载《文物》1980年2期

又反映了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

飞天出自印度，公元前二世纪的雕刻和壁画中就已出现了飞天形象。随着佛教的东渐，飞天也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中国。但是，印度飞天并不是直接进入莫高窟的，而是飞越千山万水，途经许多国家和地区，并不断吸收、融合当地的艺术后，才辗转传入中国的。它首先经阿富汗，特别是犍陀罗，吸收了希腊、罗马和波斯的艺术之后，便形成了最早雕刻佛陀形象的犍陀罗艺术，然后又进入西域，在龟兹诸石窟和寺院安家。到十六国时期，又从西域继续东传，飞越玉门关、阳关，才在莫高窟落户。

由以上叙述可知，敦煌飞天，既不是印度飞天的翻版，也不是中国羽人的完全继承。而是以歌舞伎为蓝本，并大胆吸收外来艺术营养，促进传统艺术的改变，从而创造出的表达中国思想意识、风土人情和审美思想的中国飞天。

2、飞天的发展变化

从佛经的描述看，飞天的形象似人非人，头上长角，并不美。但经过艺术家之手，却都成了形貌俊美的天男天女，还精于幻术，能作宫殿楼阁，其中还有行人出入。

敦煌壁画和塑像中的飞天，与莫高窟同时出现。从十六国开始，跨越了十几个朝代，历时近千年。直到元末，随着莫高窟的停建而消逝。现存飞天六、七千身。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政权的更替，历史的发展变化，飞天的形象、姿态以及意境、情趣、风格等，都在不断发展变化。

十六国时代的飞天，大多出现在本生故事画中。其脸型椭圆，直鼻大眼，大嘴大耳，或结队旋绕，向佛陀歌舞飞翔，或挥手起舞，自由舒展。有的还在波状形的动律中袅袅上升，呈现出无声的节奏感。

十六国的飞天，身材粗短，上身半裸，腰裹长裙，头顶大

髻，并涂有白眼珠、白鼻梁，和西域石窟尤其是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形象、姿态、色彩、线描和绘制过程都相似，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基本特征仍与龟兹飞天相同，故可称为西域式飞天。

北魏时期的飞天，虽然还保留着西域飞天的鲜明特点，但在具体形象上却有了显著变化。其脸型已由椭圆变为条长而丰满，五官匀称谐调，身材比例逐渐修长。姿态也多种多样，或对面私语，或横游太空，或振臂腾飞，气度豪迈大方，势如翔云飞鹤。飞天起落处，彩云飘扬，天花乱坠，颇有诗意。这些变化，显然是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敦煌地区魏晋十六国壁画造型的影响。因此，这时的敦煌飞天，本土特色已经形成。

北魏晚期，东阳王元荣出任瓜州刺史，他将中原的文化艺术带到了河西，同时还带来了南朝秀骨清像派飞天，从而改变了佛教艺术的流向。从此开始，受到南朝神仙思想和艺术影响的中原佛教艺术向西传播。因此，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在壁画中出现了道教题材和佛教题材同窟表演，竞相争辉的局面。在同一石窟中，既有佛教天人，也有道教神仙。出现了道教的羽人、飞仙和佛教的飞天以各自独特的风姿，同欢共乐在一个洞窟的艺术现象。这种现象是佛道思想相互融合在飞天形象上的反映。

鲜卑族建立的北周，既吸收中原文化，又加强和西域的联系。特别是建平公于义任瓜州刺史时，不仅保留了西魏秀骨清像飞天和北魏本土型飞天，而且还从东面接受了中原面短而艳的新型飞天，同时还从西域迎来了龟兹旧式飞天，从而使各种风格的飞天共居一窟，竞相争艳，各展风姿。

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出现了裸体飞天。她们全身裸露，挥臂扭腰，脚尖指地，其激烈有力的舞姿，与潇洒飘逸的西魏中原式飞天迥然不同。

北周以前，乾闼婆与紧那罗虽然同时出现，但她们都有各自的活动领域和职能。乾闼婆比较自由，到处都有其活动场所，而

紧那罗则被禁闭在天宫楼阁里，无法自由翱翔。到了北周，紧那罗冲破了天宫楼阁的束缚，与乾闼婆相会，形成了浩浩荡荡的伎乐队伍。

隋统一南北后，中国封建社会又走上了大一统的局面。与此相适应，佛教乃至佛教艺术不同的流派也逐渐趋于一致，各种飞天也逐渐融合为一，并呈现出大一统的时代风格。隋代飞天有清秀型和条丰型两种脸型。人体比例适度，既有不同的衣裙和发髻，也有不同的表现方法，但就总体而言，正在探索中形成统一的时代风格。

隋代是飞天最多、流行最广的时代，不仅寺院、石窟里画飞天，而且还在帝王的宫廷里雕刻飞天。隋炀帝的宫廷图书馆巧设机关，以两身木雕飞天自动上下飞翔，为炀帝卷帘开道，侍奉人间帝王。

唐代是佛教艺术的黄金时代，也是飞天发展的最高峰。唐代飞天多以个体单独活动，有的脚踏彩云徐徐降落；有的双手抱头，从空中俯冲而下，势若流星；有的昂首挥臂，蛙游太空；有的并肩遨游，窃窃私语，舞带随风悠悠漫卷；有的围绕宝盖，相互追逐，形成了圆环旋转形式。但也出现了双飞天，她们一个在前面飞，一个在后面追，舞带彩云随风飘荡，前者回首呼应，扬手散花。可以看出，唐代飞天创造了一个优美而空灵的想象境界，正如李白咏仙女诗的《古风》中所描写的那样："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浮升天行。"

唐前期的敦煌飞天，和前代的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丰满"上。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连绵，社会动荡，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多灾多难之秋。为了适应这种社会现实，佛教强调"苦修"，为争取来世的幸福而忍耐。此时的飞天，面容瘦削，形体修长，和唐代的飞天相比，表现了一种"清秀"的风格。到了唐代前期，由于国家统一，经济繁荣，人民的生活也相对安定。为了适

应这种社会现实，佛教不再强调“苦修”，而是主张诵经即可成佛，并竭力宣扬“极乐世界”，以“极乐”引人。这时的飞天形象，一方面吸收了伊朗萨珊王朝（224—651年）的细密工致、色彩绚丽的手法，使装饰风格日趋浓厚；另一方面又吸取了印度笈多时期的丰满特征，从而形成了体态丰满的唐代美人风格。

中晚唐时期，唐王朝由盛而衰，文化艺术也渐趋衰退，这时期的飞天，也从浓丽丰厚的风格，走向清雅逸丽。虽然其中仍有一些别具风采的佳作，但从总体上说，她已开始渐趋衰落，极乐国里的飞天已经黯然失色。

五代宋初，曹氏画院的匠师们继承了唐代余绪，但在飞天的造型上，逐渐出现千篇一律的公式化倾向，渐渐失去了艺术生命力。

回鹘、西夏时期，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飞天，她们一部分沿袭宋式，一部分具有西夏的独特风格。头饰珠翠，世俗性较浓。但舞带短而身量沉重，飘浮飞动感不强。

元代流行密教，飞天很少。有一类飞天，作女童形象，眼视前方，情态含蓄。虽然缺少轻盈飘渺的动感，但却具有另一种意趣。

总之，敦煌的飞天艺术，经历了千年岁月，展示了不同的时代特色和民族风格，其中许多优美的形象，欢乐的境界，永恒的艺术生命力至今仍然吸引着人们，给人以美的享受。

3、敦煌飞天的艺术风格

敦煌飞天，虽然是外来艺术，却是在中国大地上盛开的花朵。为了适应各民族人民的思想意识、风土人情和审美理想，她必然不断发生变化。到隋唐时期，达到了飞天艺术发展的高峰，创造了具有中国气派、体现中国审美理想的时代风格和民族风格。

第一，创作方法和表现技巧

敦煌飞天的创作方法，与敦煌壁画总的创作方法一样，经历了一系列的形象思维过程，即现实——想象——意象——艺术形象。所谓现实，就是百戏和歌舞伎。所谓想象，就是无翼而飞。它体现了中国绘画美学思想中的“寓形寄意”、“立象以尽意”，甚至“得意忘象”等等重意象、重意境的特色。因此，敦煌飞天是古代画师根据现实生活形象，加上主观想象（包括联想、迁想、幻想）并倾注思想感情，熔铸而成的意象的显现。她具有中国人的风貌和神彩，不长翅膀，不生羽毛，非男非女。借助云彩而不依托云彩，仅仅凭借一条舞带凌空腾飞。这就是隋唐时代审美理想的体现。高度的想象力，赋予了飞天以永恒的艺术生命力。

敦煌飞天的表现技巧，主要突出在线描造型上。中国的毛笔，和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因而在描线时，运笔、运力、运情三者融为一体。使线本身及其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富有生气和音乐般的韵律感，这是中国线描独具的特色。

飞天的线，不仅在于造型，更重要的是表意，特别是蜿蜒曲折的长线所表现的舒展与和谐的意趣，与“极乐世界”中“天人合一”、幸福愉快的境界是吻合的。

第二，飞天艺术的主要特征——飞动之美

与整个敦煌艺术的发展相适应，敦煌飞天经历了兴、盛、衰三个阶段。不同阶段的表现，主要在飞动之美的消长上。

敦煌飞天是在中原传统的羽人、南朝的飞天和西域式飞天融合的基础上，发展创造出来的。因此她体现了古代中国和印度美术中的一些特色，尤其是飞动之感，如跳跃、悬腾、浮游、翻飞等姿势。

敦煌飞天的飞动特色，主要表现在翻飞的升腾和俯冲姿势上，尤其是俯冲的姿态特别优美，它也是敦煌飞天与印度飞天在形象上的显著区别之一。当你在千佛洞漫步欣赏时，就会看到各

种姿态的飞天，或象飞鸟从高空直下，或斜掠疾扫，变化无穷。虽然有的姿态看似惊险，但却无失坠之感。

敦煌飞天的飞动之美，除了表现在本身外，还以飘带衣裙和云气飞花为辅助和补充。正是飘带衣裙和云气飞花的作用，才解决了体重问题。由于人体的动势和衣带、云气、飞花的相互映衬，才使飞天俊美的面相和体形得到了充分表现，从而开阔了敦煌飞天飞动之美的新天地。

第三，飞天艺术的美学思想

在敦煌飞天的艺术风格中，还体现了独特的美学思想。

由于敦煌飞天并非直接来自印度，而是经过阿富汗、新疆龟兹石窟辗转传入敦煌，并与中原飞天和南朝羽人相融合。因此敦煌飞天是多种艺术因素的合成形象。尽管如此，但她仍然显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

敦煌飞天的出现，反映了古代艺术家们的丰富想象力。在现实生活中，人当然是不会飞的。但是，不论是宗教还是世俗的绘画中，飞翔的人物却是经常出现的。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中就有“嫦娥奔月”，山东武梁祠的汉画中也有飞翔的“羽人”。敦煌飞天，虽然没有张开的翅膀，但通过那迎风飘摆，流动如飞的风带的衬托，同样给人以飞舞飘动之感。

西方臂生鸟翼的天使，中国身长绿毛的羽人，都没有得到发展普及。然而由于敦煌飞天充分运用了想象力，并以抽象充实意像，却创造了不生双翼，不长绿毛，非男非女，亦男亦女的敦煌飞天。

敦煌飞天和全部敦煌艺术一样，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是在中国传统艺术基础上吸收并融合了外来艺术营养而发展起来的。她打破了儒家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所形成的风俗习惯和风土人情，大胆地吸收人体解剖原理和人体美的表现方法，以及变形造形、五官和手脚的夸饰等手法，使人物的自然形态化为理想的艺

术形象。同时，还从佛教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因素，创造了没有男女生理特征的艺术形象，使人们在艺术欣赏中进入超人境界，使佛教的净化与艺术美的净化作用结合起来了。

本节主要参考资料：

段文杰先生《飞天在人间》，载《文史知识》1988年8期；《飞天——乾闼婆与紧那罗》，载《敦煌研究》1987年1期

谭树桐先生《敦煌飞天艺术初探》，载《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下》

刘凌沧先生《敦煌飞天》，载《文物天地》1982年2期

五、反弹琵琶伎乐天

——敦煌的乐舞艺术

在敦煌艺术中，独具一格的乐舞艺术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壁画及遗书中，有大量的乐舞资料，如壁画中千姿百态的舞蹈，名目繁多的乐器，遗书中的曲谱、舞谱等等，都是十分珍贵的材料。

1、敦煌曲谱的解译

在敦煌遗书P·3808《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的背面，发现了二十五首曲谱，包括《品弄》、《倾杯乐》、《伊州》、《水鼓子》、《西江月》、《瀛府》、《长沙女引》、《撒金砂》、《心事子》、《胡相问》及《急曲子》、《慢曲子》、《又曲子》等。对这些曲谱，或称为“工尺谱”，或称为“敦煌琵琶谱”，我们暂称为“敦煌曲谱”。

据有的学者考证，“敦煌曲谱”的抄写年代是公元934年闰正月，抄写地点是洛阳，抄写人是被后唐敕封为“僧政，临坛供

奉大德，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梁幸德的三位助手①。从而可知，这些乐曲的存在年代距今已有一千多年了。由于这些乐曲早已失传，记录乐曲的记谱法已被遗忘，解译敦煌曲谱便成为难题了。

1937年，日本学者林谦三、平出久雄开始了对敦煌曲谱的研究。1938年发表了他们的《琵琶古谱之研究》，这是当今世界上敦煌曲谱的最先解译者。后来，林谦三在其《敦煌琵琶谱的解读研究》②一书之“跋”中曾追忆说：“开始知道有《敦煌琵琶谱》是1937年初夏，在某处偶然见到了这乐谱的几张照片，就决意要把它解释明白，要把它读通。于是由于友人平出久雄的协助，和《天平琵琶谱》合并在一起，作了一篇解读的试论发表了，这就是《琵琶古谱研究》。其所论的核心和今日所考虑的并无大差，不过暗中摸索的繁缛冗长的考察及其反面推论之未熟的地方却不少。”

1954年，任二北先生在《敦煌曲初探》一书中指出，敦煌曲谱里有“板眼”记号：“口”是“板”，“·”是“眼”；由此更进一步得知，敦煌曲谱如配上相应的歌词来唱，由于“声多辞少”，便决不可能“一字一音”，进而作出结论：唐至五代的“曲子词”与“声诗”决不可能“一字一音”呆板地唱，应当有流畅、完美、动人的曲调。任先生虽不是专业音乐工作者，也未能将敦煌曲谱译为现代曲谱，但他的“两论”，即“板眼论”和“非一字一音论”，却是值得重视的论点。

日人林谦三虽然首创用琵琶来解释敦煌曲谱，但他最初依据的仅仅是日本古籍《三五要录》、《琵琶诸调子品·二十八调定弦法》等及今天日本雅乐“乐琵琶”的“二十字记谱法”，并无

---

①何昌林《敦煌琵琶谱的来龙去脉》，载《阳关》1984年5期

②潘怀素译，上海音乐出版社1957年出版

更直接的敦煌学材料为证，故他自觉依据不足。

可喜的是，在敦煌遗书P·3539《佛本行集经忧波离品次》写卷背面，发现了二十个谱字。从谱字旁的文字来看，这二十个谱字正好合于唐代四弦四柱琵琶上的二十个音位，所以现在就称之为“琵琶二十谱字”。“琵琶二十谱字”对谱字音位记载得十分明确，如果将敦煌曲谱二十五曲所有的音高谱字归并起来，也正好是二十个，而且其谱字形态，亦和现存几种琵琶谱字基本相同。由此可知，用琵琶来解译敦煌曲谱可以说是一条正确的途径，并被认为是解译敦煌曲谱的第一把钥匙①。

1959年，赵元任先生之女、哈佛大学赵如兰博士赴日参加音乐会期间，将赵元任先生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翻拍的“琵琶二十谱字”照片送给了正在致力于探索敦煌曲谱解译的林谦三。林氏见此照片后，如获至宝，于1962年发表在他的《正仓院乐器之研究》一书中，进一步论证了他以往用琵琶解译敦煌曲谱的正确性。

八十年代初，上海音乐学院叶栋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曲谱又进行了更加细致、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了巨大突破。1981年12月，在山东音协召开的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上，叶栋先生宣读了《敦煌曲谱研究》的论文。上海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1982年第1期正式发表了叶栋先生的论文《敦煌曲谱研究》。1982年5月，在《上海之春》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上，叶栋先生又以“琵琶二十谱字”作为用琵琶解译敦煌曲谱的重要论据，对以前的研究作了补充。

叶栋先生对敦煌曲谱的研究，虽然是在林谦三和任二北先生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但又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如对二十五曲

---

①参阅陈应时《解译敦煌曲谱的第一把钥匙——“琵琶二十谱字”介绍》，载《中国音乐》1982年4期

的节拍节奏形式的解释与林氏的译谱大不相同，认为敦煌曲谱二十五首是“由一系列不同分曲组成的唐大曲”，“全曲由三种音阶——燕乐音阶、清乐音阶和古音阶（一称雅乐音阶）组成”；认为敦煌曲谱“全曲兼具词曲音乐联套的特点”，“该套曲谱同曲辞与声乐”的关系“密切”。并列表将二十五曲与大曲曲式作了比较。

《敦煌曲谱研究》发表后，引起了国内舆论界的广泛关注。《文汇报》（2月21日）、《新民晚报》（2月24日）、《上海音讯》（1982年2期）、《解放日报》（5月11日）、《音乐爱好者》（1982年2期）、《上海画报》（1982年3期）、《光明日报》（5月18日）以及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上海电视台等都相继对叶栋先生研究敦煌曲谱的事迹进行了报道，并一致给以肯定性的评价。认为叶栋先生对敦煌曲谱“破译成功”，使“绝响千年的唐乐重新变成音响”。

对于叶栋先生的这一研究成果，学术界虽然有不同看法，但还是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评价。何苍伶先生说：“叶栋同志于1982年发表的《敦煌乐谱》的五线谱译稿，第一次将1938年林谦三的见解与1954年任二北的发现结合了起来，因此，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①。”林友仁、孙克仁、应有勤、夏飞云先生说：“《敦煌曲谱研究》虽然只是提纲挈领地阐述叶栋同志的研究成果，但我们透过字里行间，仍可窥见他如何在前人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探索方法和缜密认真的求证手段，将这些成果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将从叶栋的研究方法中得到有益的启示，而它所发挥的作用与产生的影响，决不亚于解读《敦煌曲谱》本身的价值②。”

---

①何苍伶《研究敦煌乐谱的新进展》，载《音乐文摘》第二辑，1982年8月出版

②林友仁等《〈敦煌曲谱研究〉给我们的启示》，载《人民音乐》1982年11期

2、名目繁多的乐器

莫高窟壁画中有大量的古代乐器图像。它反映了历史时期各种乐器的形制和演变、演奏方法、组合形式以及当时的社会音乐风尚，从而为我们研究乐器史及中国音乐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历史依据。

据有的学者调查、考证，莫高窟壁画中现有各种乐器4000余件，共有44种，即：

（1）气鸣乐器：横笛、风笛、异形笛、竖笛、筚篥、排箫、笙、角、画角、铜角、贝、埙；

（2）弦鸣乐器：琵琶、五弦、葫芦琴、阮、弯颈琴、琴、筝、箜篌、凤首箜篌、胡琴；

（3）打击乐器：腰鼓、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羯鼓、节鼓、檐鼓、齐鼓、鞉鼓、鸡娄鼓、大鼓、军鼓、手鼓、扁鼓、方响、铙、钹、柏板、钟、锣、串铃、金刚铃[①]。

现将其要者介绍如下：

横笛：即今日流行之竹笛，乃吹管乐器中之主要者。在壁画中的数量很多，仅莫高窟统计，就绘有500余只。敦煌所绘横笛，始见于北凉，历代延续不断，直至宋元。从其形制挖孔及演奏方法看，都与今日之横笛基本一致。壁画中横笛的主要特征是不用笛膜。

筚篥：属管乐类乐器，自西域传入，用竹管作成，形状粗短，上口安装芦簧即哨子发出声音，竖式吹奏。后又在下端加一喇叭，就成了现在的“唢呐”。敦煌所绘筚篥，大多出现在壁画伎乐里。

排箫：古代编管乐器。敦煌壁画中的排箫位置显著，造型华

---

①详见郑汝中《敦煌壁画分类乐器考略》，载《敦煌研究》1988年4期

丽，极富仙乐幻觉的意境。莫高窟绘有排箫300余只，形态不尽相同，根据其竹管的长短，分为底箫和洞箫两种。壁画中的排箫始自北魏，直到元代，大部分伎乐里都有排箫，可见其在当时乐队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笙：是竹制簧管类乐器，由斗子、簧管、吹嘴三部分组成。大的称竽，小的叫笙，是中原旧有乐器。笙在壁画中很普遍，莫高窟共绘有300余只，从北魏出现一直延续不断。壁画上的笙，早期只具轮廓，不易辨别细部，唐以后逐渐具体，形制也趋向一致，但其大小长短比例和管数却很悬殊。莫高窟159窟西壁中唐所绘《文殊变》中，有一吹笙伎乐，神态极为逼真。

角：也叫胡角，用牛角或羊角制成，是一种最简单的原始乐器。游牧民族擅长吹奏，它也最先出现于游牧民族。由于它发音宏大，高亢凌厉，适于远传声音，所以为古代军营所使用。

从敦煌壁画中，能够很清晰地看出角的演变过程，即角——画角——铜角。角在敦煌早期壁画中就有绘制，如北魏275窟北壁有两个吹大角的供养乐伎。兽角在早期天宫伎乐、药叉伎乐中也多有所见，如北魏431、435窟。此后，角在壁画中便逐渐消失，这可能是因其发音单调粗犷，只能发一音，不适于参加乐队。

琵琶：为弦鸣类乐器中的弹弦乐器，又称“曲项琵琶”、“龟兹琵琶”。其杆长头细，近似新疆维吾尔族的热瓦甫。自西域传入，多用木拨子弹奏，也有用手指弹奏的。琵琶在古代诗词中反映最多，在壁画伎乐中也广泛运用，几乎每组伎乐中都有琵琶。在敦煌壁画中，琵琶的图形最多，仅莫高窟就绘有700余只，居所绘乐器之首位。凡画有音乐形象处必有琵琶，具有音乐的象征意义。如天宫伎乐中就有大量的琵琶飞天，以及反弹琵琶者。从而可知琵琶在当时是主要乐器，也在民间广为流传。古代音乐家还为它专门创作了琵琶谱。

五弦：是一种比琵琶多一条弦的琵琶，也称“五弦琵琶”。

五弦与琵琶同时在壁画中出现，为姊妹乐器。据文献记载，五弦出现于北朝之后，隋唐时期盛行。

阮：又称阮咸，因晋代竹林七贤之阮咸善弹此器而得名。唐武则天以后，才有阮的名称。其形态为正圆形共鸣箱，长柄，十二品柱，四弦（或五弦），与琵琶十分近似。

箜篌：古代框箱弹弦乐器。箜篌可能源于西方，但在中国也有千余年的流传历史，并被逐渐改造，成为中国的民族乐器了。敦煌壁画中的箜篌相当多，仅莫高窟就绘有200余只。早期画得简单，形体小，一手持，一手弹，弦数也较少。唐以后的箜篌，多为大型彩绘，华丽壮观，边框饰有团花、团龙、团凤等纹样。

腰鼓：其特征为细腰，形状如两个碗，底部对接而成，两端张以皮革，以绳收束，使皮膜绷紧，敲击发音。腰鼓的演奏方式是系于腰间，或置于面前，踞地演奏，用手拍或杖击发音。敦煌壁画中的腰鼓，从北凉到元代，一贯始终，从未间断，而且形类繁多，几乎每一只，都有其特色。在经变画中，常有腰鼓独舞者，或与反弹琵琶合组的双人舞蹈场面。它不仅出现于乐队中，而且是舞伎表演的重要道具，是一种具有高度工艺水平的装璜性乐器。

方响：古代有音律的打击乐器。文献记载始于南北朝之梁代，在莫高窟220窟伎乐图中可见此乐器。通常用十六枚大小不同、厚薄不一的长方形铁片组成，并分为两排，悬在架上，用小铁槌击奏。其状似编磬，古代雅乐和俗乐都将方响列入编制，是隋唐燕乐中常用之乐器，多用于宫廷，民间很少使用。

锣：锣为一扁平之圆盘，古时也曾称为钲、铜锣、沙锣。在千佛洞220窟《东方药师变》乐队中，有两个乐伎演奏铜锣，表演姿态特殊，击响后抛入空中。另外，在飞天乐伎画中也有锣。

3、千姿百态的舞蹈

敦煌壁画中的舞蹈图像，数量极多，姿态各异。尤其是各种各样的乐伎，出现于壁画的各个角落，别开生面地展现了一幅幅古代乐舞活动的场景。它通过浪漫的艺术想象，把人们带到一个绚丽多彩、扑朔迷离的极乐世界，早已摆脱和超越了原有的宗教内容。

据有的学者考察、研究，敦煌壁画中的乐伎分为伎乐天和伎乐人两大类，其中伎乐天又分为天宫乐伎、飞天乐伎、化生乐伎、护法神乐伎、迦陵鸟乐伎、经变画乐伎。现依据郑汝中先生的研究成果，将其依次简要介绍如下①：

天宫乐伎：据佛经讲，凡佛国上界，一切从事乐舞活动的菩萨、神众，都可称之为天宫乐伎。就敦煌壁画而言，天宫乐伎是指窟顶与四壁交界处，环窟四周，绘有带状之宫门栏墙，绘无数并列之方格，从而呈天宫圆券城门洞形。在每个门洞之中，踞一奏乐或舞蹈之天人，这些天人，就是所说的天宫乐伎。

天宫乐伎是敦煌早期壁画的一种固定形式，从北凉开始一直延续到隋代，此后，这种形式逐渐消失，被飞天乐伎所取代。

天宫乐伎的造型生动、质朴，无固定模式。其姿态也不断变化，各不相同，或持各种乐器，或持彩带、花环，或以手势及身体的扭动呈歌舞状。在安排上，似无一定规律，有的洞窟以奏乐者为主，有的则以舞蹈者为主，一般为乐舞相间。

敦煌的天宫乐伎是音乐舞蹈图形在壁画中最初期的形式，以后逐渐扩散，在壁画的各个角落都相继出现，使洞窟不仅肃穆，而且充满欢乐气氛。

飞天乐伎：敦煌莫高窟有大量的飞天艺术，其中飞天乐伎

---

①详见郑汝中《敦煌壁画乐伎》，载《敦煌研究》1989年4期

（持乐器的飞天）就有600余身。

早期洞窟中的飞天，为男性特征，所持乐器品种不多，而且画得简陋，看不出演奏细节。隋代飞天，身体逐渐灵活，人物形态变化明显，由男性逐渐转为女性。进入唐代后逐渐丰富，乃至高潮。后期飞天乐伎，已进入程式化的衰落阶段，但所持乐器品种增多，如胡琴、手鼓、锣等，都是在乐队中未曾绘制的乐器。而且随着画技的提高，在描绘演奏状态时也有所突破，充分反映了当时的音乐水平。

化生乐伎：化生为佛教常用术语，即莲花中所生。化生乐伎和天宫乐伎、飞天乐伎一样，是对佛的礼赞和奉献，它的特点是比较分散，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出现。敦煌壁画中的化生乐伎表现得最为丰富，变化纷繁，形式多样，凡是在莲花上的乐伎都可称为化生乐伎。

护法神乐伎：护法神，即护持佛法之神，它是佛国的警卫系统。凡护法神中持乐器或作舞者，皆称为护法神乐伎。敦煌壁画中的护法神乐伎可分为天王乐伎、金刚乐伎和药叉乐伎三种。如金刚乐伎，就是指持乐器的金刚力士。莫高窟壁画中的金刚力士很多，特别是密宗洞窟，一般手持金刚杵及金刚铃。在148窟，有一手持乐器之六臂金刚，其六臂持三种乐器：即金刚铃、横笛和琵琶，作同时演奏状。

伽陵鸟乐伎：在敦煌壁画中，有一种鸟身人首的图形，身体类似仙鹤，翅膀张开，两腿细长，头为童子或戴冠之菩萨首状。这种人首鸟身的图形，在壁画中被称为伽陵频伽鸟，其中有部分持乐器或作舞者，称为伽陵鸟乐伎。

经变画乐伎：敦煌经变画中，绘有乐舞内容的佛经有27部，其中最多的是《药师经变》，莫高窟绘有64铺。其次为《观无量寿经变》，62铺，《阿弥陀经变》（即西方净土变），37铺。

经变画中的乐队，最早见于隋代。隋以前的音乐演奏，都是

单身独奏的形式。从隋代开始就有了小型乐队的合奏。到了唐代，便出现了大型乐队的经变画，如第220窟，即有28人的乐队，中间舞伎4人。这个乐队是敦煌经变画中人数最多的一组，而且乐器的品种也最多，绘制得十分精细。

敦煌经变画中，佛殿前沿两边排列的乐队，称为礼佛乐队。由于经变画大小不等，礼佛乐队的规模、阵容也各不相同，一般可分为大、中、小三种。大的乐队为每边18人以上者，小的多为一边2至4人。中间舞蹈者，有1人、2人或4人者不等。

有的大型经变画，多达三层乐队。两侧乐队席地而坐，中间有舞伎表演，有的空手而舞，有的则反弹琵琶或持腰鼓。从敦煌壁画乐、舞伎的排列形式和乐器使用范围来看，它基本上是隋唐燕乐的编制，经变画就是以此为模式进行绘制的。

伎乐人：在壁画中，凡是描绘人间世俗的活动，其中奏乐作舞者，都是伎乐人。伎乐人也称“供养乐伎”。伎乐人在壁画中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它是社会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世俗乐舞，现实性较强。

敦煌壁画中的伎乐人有供养人、出行图乐伎和晏饮图乐伎三种。

敦煌壁画中的舞蹈图像，除了大量的乐伎外，还有许多乐舞细节的描绘①。如159窟西壁佛龛北侧的文殊变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文殊菩萨前的吹笙者，全神贯注地演奏着乐器。他耷拉着眼皮，思维已全部沉浸在所奏乐曲的境界中。但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他是静中有动的。他正在默默地按着节拍，但并非摇晃着身子，也没有摆动头部，而是用右脚脚指的翘动来按拍的。另如112窟南壁有反弹琵琶作舞者，在其伴奏的左方乐队中，有一伎乐菩萨执鼗击鸡娄鼓，与北壁报恩经变中演奏相同乐器的

①详见费秉勋《敦煌壁画与古代舞蹈》，载《阳关》1984年6期

伎乐菩萨的动作形成有趣的对比，其击鼓的右手不是紧握成拳，而是散开五指轻轻拍击，由此可知，这种反弹琵琶的舞蹈，动作轻盈，节奏平静徐缓。

舞者反弹琵琶的场面，莫高窟中有许多反映。除112窟外，196窟南壁、174窟南壁、98窟北壁西侧、156窟南壁西侧等都有。尤其是156窟，因反弹琵琶作舞的伎乐菩萨背向我们，因此，可以清晰地看到她右手所持的斧刃形拨子。我们知道，唐代琵琶有两种弹法：一种用拨子弹奏，为拨弹；另一种用手指弹奏，为挡弹。拨弹在前，挡弹在后。据文献记载，挡弹大约出现于七世纪初。莫高窟中的这一画面印证了史籍的记载。

敦煌壁画中这种舞者同时奏乐的舞蹈形象，既是民间固有舞蹈形式的反映，又可能接受了西域乐舞的影响，所以除了唐代经变中反弹琵琶、击腰鼓作舞的形象外，早在北朝的洞窟中，奏乐作舞兼于一身的形象在天宫伎乐和药叉中是经常可以看到的。

4、令人费解的舞谱

敦煌遗书中除了曲谱和“琵琶二十字谱”外，还发现了两个舞谱残卷。一为P·3501残卷，刘半农先生编入《敦煌掇琐》，开始用“舞谱”命名，至今仍在沿用。该卷系一长卷，中无断裂，前无总题，起自《遐方远》谱，止于《风归云》谱，末端残阙，共存六名十四谱，即《遐方远》五谱、《南歌子》一谱、《南乡子》一谱、《双燕子》一谱、《浣溪沙》三谱、《风归云》三谱；二为S·5643残卷。该卷原拟为一蝶装小册，共十六面（七整页，首尾两半页），舞谱抄在第七至十五面，前接《波罗蜜多心经》写本，亦无总题。由于该册中背上部被撕去了一些，所以舞谱文字也有残阙。共存十谱，依次为：阙名二谱、《蓦山溪》二谱、《南歌子》二谱、《双燕子》二谱、阙名二谱。

以上两个舞谱残卷共录舞曲名七种，舞谱二十四篇。通过对这些舞谱的整理分析，可以明白其抄写格式及内容，即开头标明该谱所用的曲调名称（谱名）；中间为序词，它是一段提纲挈领的说明性文字，简练地说明该谱的节奏、节拍；最后为字组，它是由“合”、“舞”、“掇”、“据”等谱字按一定的节拍、节奏要求排列组合而成的字谱。

敦煌发现的这些舞谱残卷，究竟是唐人打令谱，还是大曲谱，或者是宗教活动的舞谱？学者们虽然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仍然是众说不一，均无确证。

现依据柴剑虹先生的研究成果，将这些舞谱残卷简要介绍如下①：

（1）《遐方远》谱

“遐方远”调名不见于史籍记载，唐崔令钦《教坊记》“曲名”下有“遐方怨”名（古代“远”、“怨”通用）。敦煌舞谱残卷中标明为《遐方远》的共有五谱，均抄于P·3501卷。原卷在抄写上颇不规则，序词部分较为复杂，字组部分出现的谱字也最多。

（2）《南歌子》谱

“南歌子”调名见于《教坊记》“曲名”，《全唐诗》卷891收有温庭筠《南歌子》词七首；敦煌遗书中也有《南歌子》曲子词（P·3137）。敦煌舞谱残卷中的《南歌子》舞谱共有三个，其中P·3501写本中一个，另两个在S·5643写本中。

（3）《双燕子》谱

“双燕子”调名不见《教坊记》记载，敦煌舞谱残卷中的《双燕子》共有三谱，其中P·3501卷一谱，S·5643卷二谱。

①详见柴剑虹《敦煌舞谱的整理与分析》，载《敦煌研究》1987年4期，1988年1期

（4）《南乡子》谱

“南乡子”，《教坊记》“曲名”中有记载，《全唐诗》卷896也收有欧阳炯《南乡子》词八首。舞谱残卷中标明为《南乡子》的仅一谱，抄录在P·3501写卷内。

（5）《浣溪沙》谱

“浣溪沙”一名最早见于《教坊记》所列“曲名”中。《全唐诗》卷889—897收有李璟、韩偓、张曙、韦庄、孙光宪等所作《浣溪沙》71首，均属晚唐五代作品。王重民先生《敦煌曲子词集》中收有《浣溪沙》九首，《云谣集杂曲子》中亦有《浣溪沙》二首。舞谱残卷中的《浣溪沙》共有三谱，全部在P·3501写卷内，另外，S·5643写卷内有阙名二谱，其节奏组合与此《浣溪沙》谱相同，极有可能也为《浣溪沙》谱。

（6）《风归云》谱

“风归云”调名始见于《教坊记》“曲名”中。《云谣集杂曲子》中有四首《风归云》词。舞谱残卷中的《风归云》共有三谱，都抄在P·3501《浣溪沙》谱后，因已是该卷写本的末尾部分，故末端有残阙。

（7）《蓦山溪》谱

“蓦山溪”调名《教坊记》中无载。舞谱残卷中的《蓦山溪》共有两谱，都在S·5643写卷内，其中一谱序词完整，字组部分有残阙；而另一谱则序词部分残阙，但字组部分完整。两谱可相互补充。

（8）不知名谱A

此卷抄录在S·5643写卷《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之后，是该卷十个舞谱的开头两谱，因写卷残破，故开头序词部分残阙，无谱名，现拟名为“不知名谱A”。通过对该谱的整理与分析可知，该谱可能是与《浣溪沙》谱相应的舞谱。

（8）不知名谱B

此谱抄录在S·5643写卷不知名谱A之后，因 写卷残损，所以谱名阙佚。通过对该谱的整理、分析可知，该 谱与P·3501卷《浣溪沙》三谱相同，因此，极有可能也是《浣溪沙》谱。

虽然敦煌的曲谱、舞谱还无法完全解译，也不能全部运用于现代音乐、舞蹈中，但我国的乐舞工作者经过努力，已将敦煌壁画舞姿运用于舞台艺术实践中。早在二十年代，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就创作了《天女散花》，五十年代，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创作了双人舞《飞天》。尤其是甘肃省歌舞团创作演出的敦煌舞剧《丝路花雨》，更使敦煌乐舞大放光彩。《丝路花雨》的出现，除了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外，更大的意义是为复活敦煌壁画中的舞蹈作出了巨大贡献。从其演出开始，敦煌乐舞便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此外，海政文工团创作的《敦煌彩塑》也在吸取、融化敦煌壁画和彩塑舞姿的舞台艺术实践中取得了成功。紧接着，甘肃省艺术学校在高金荣校长的主持下，制定了《敦煌舞基本训练教学大纲》，在舞蹈班开设了敦煌舞，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敦煌流派的新舞种——敦煌舞。“因为人们把敦煌文物的研究叫做‘敦煌学’，相应地就把这种展现敦煌壁画的新颖别致、独树一帜的舞蹈艺术称为‘敦煌舞①’”。我们坚信，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敦煌的音乐、舞蹈艺术一定会作到“古为今用”，走进千家万户，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六、人间天国多楼台

——敦煌的建筑艺术

莫高窟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宝库，除了壁画和彩塑外，还有大量的古建筑资料；洞窟内外保存有五座唐宋木构窟檐和一些宋

①高金荣《敦煌舞风格浅探》，载《阳关》1982年5期

元土木古塔；壁画中有大量的各个时代的古建筑形象，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史极其珍贵的形象史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1、古建筑实物

莫高窟现在的外观是六十年代洞窟加固之后的面貌。现在窟崖上仅保存着五座唐宋窟檐，从这些窟檐建筑可以想见，千百年前人们出于宗教动机建造的几百座窟檐殿堂，檐翼相接，画柱雕梁，的确十分壮观。

现存唐末宋初的木构窟檐共五座，其中完整的四座，另一座残缺。完整的四座是：第427窟窟檐建于宋初开宝三年（970年），第444窟窟檐建于宋初开宝九年（976年），第431窟窟檐建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第437窟窟檐虽无纪年，但其结构形式与邻近的第427、431窟窟檐相比较，时代是接近的。残缺的一座是196窟窟檐，它上部残毁，仅存四根檐柱及梁枋构件，造于晚唐末期，窟檐与洞窟是同时建造的。

以上几座窟檐，虽然在规模尺度上稍有差别，但其结构和形式则基本相似，它们都是三间四柱，深约一间，正中一间开门，左右两间开窗。所有的梁柱都为八边形，柱上有斗拱，柱下无柱础，柱立于地袱之上，袱下有挑出岩体的悬臂梁，梁间铺设木板即成为洞窟之间的往来栈道。

现存各窟窟檐的外观形制古朴，斗拱的风格以及八边形柱与中原同期古建筑的风格有较显著的差异。这可能是因为敦煌地处边陲，在建筑技术上保存了较多的古老传统。如427窟窟檐的木结构梁柱额、枋、斗拱、椽、檩等构件都保存完整。其六铺斗拱，制作准确。檐下圆椽一层，飞头一层。檐端平直，两翼不翘飞，与壁画中所画建筑的形象相同。这些窟檐虽是小型木构建筑，但年代确切，保存完好，内部彩画如新。

第96窟外层的九层楼，是一座形式特殊的高大窟檐，楼总高43米，建于1927—1935年。窟檐九层，下面七层依山靠岩而建，上两层是保护33米高的弥勒像头部的顶盖。整个楼身的建造充分利用了地形地势，白壁丹楹，宏伟而秀丽，为莫高窟增添了光彩。

在莫高窟窟前园林中，还有一座小巧的亭阁式塔，木檐土身，单檐八角攒尖顶，上有覆钵相轮的塔刹。塔身正面有门，门额上墨书“慈氏之塔”。门内有方形小室，各壁及穹窿顶均有壁画。此塔小巧精致，比例适度，是难得的古建筑小品。这种亭阁式的土心木檐的小塔，是我国遗存至今的唯一孤例。根据塔形和结构特点分析，此塔可能建于宋初，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此塔原在三危山中，为了便于保护，1981年迁建于莫高窟园内。迁移时，对塔刹及檐部作了复原处理。

另外，莫高窟周围和大泉河两岸有几十座佛塔和墓塔。现在塔身已经残破斑驳，但幢幢古塔屹立在沙丘之中，它们古老的身影为莫高窟悠久的艺术生命力更增添了庄重、古朴的风姿。

2、壁画中的古代建筑

敦煌壁画中有大量的建筑物形象，其中有宫殿、阙、佛寺、塔、城垣、住宅，还有监狱、坟墓、高台、草庵、穹庐、帐帷以及桥梁、栈道等等，有许多还是以完整的组群形式出现的，可以明确地显示出建筑的群体构图。“礼失而求诸野”，在实物例证如此缺乏的情况下，敦煌壁画无疑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最好的材料。

敦煌壁画中的建筑形象，上起十六国，下迄唐宋，各个时代的都有，其中尤以唐代的最多，表现最充分。唐代敦煌地区的佛教净土宗比较流行，洞窟内普遍有《西方净土变》、《观无量寿经变》、《弥勒净土变》、《东方药师变》等经变画。这些大幅经变画，比较集中地描绘了建筑群的组合和各种类型的单体建筑

物形象，内容极其丰富。佛国天堂的景象就是人间宫室、寺院的影子。净土世界中殿阁、楼台、宝池、栏杆等形式多样、结构精巧的建筑，就是唐代建筑水平的反映。

（1）殿堂：殿堂是壁画中最多的一种建筑形象，一般来说，殿与堂没有多大的区别，高大的堂就是殿。凡宫室、寺院、道观中的主要建筑都可以称为殿。殿下有台基，大都是砖砌素平台基。唐代中期发展为装饰华丽的须弥座台基，正中设台阶，也有设左右双台阶的；台基边沿有栏杆；台上殿堂面阔三开间或五开间，也有七开间的；殿身上覆单檐庑殿顶，也有极少数作歇山顶。如第285窟（西魏）“五百强盗成佛”故事中的大殿为单檐歇山顶，殿身上部有一组类似现代结构的桁架，上下桁条之间有人字形的支撑，形成一组横向的承重结构，这是其特殊之处。又如第423窟（隋）的“兜率天宫”中有一座大殿，其两侧各有三层的楼阁。大殿面阔五间六柱，下部为砖砌的素平台基。两侧的楼阁画得极其概括，与汉画像石中常见的一殿两阁的平面格局相似。

对于宫殿的内部情况，壁画中表现的不多。这是因为敦煌壁画是宗教画，意在宣传佛教，若非必需，一般并不表现宫殿。另外，当时一般的画家恐怕也不能经常出入于宫殿朝堂之间，无法窥其究竟。只在《观无量寿经变》画中，画出了频沙王被阿阇世太子囚禁的未生怨故事，对宫殿的内部情景有部分表现。盛唐第148窟的未生怨图，把国王被囚、王后探视、太子肆虐和国王冥想、佛为现身说法等情节都画了出来，从中可以窥见宫殿内部的少许景象。

（2）宅第：古敦煌民间对修建家宅十分重视，他们有一种牢固的风俗观，认为“宅者，人之本，人者，以宅为家，居若安，即家代昌盛①”。民间对住宅有诸多考究，要求避免“五

①P·3865《宅经》

虚”，符合“五实”，“宅小六畜多”。古敦煌对六畜早有规定，S·5755卷说是马牛羊猪狗鸡，这六畜多与人丁兴旺有密切关系，六畜多即意味五谷多，养活的人口多，是家庭兴旺的象征。

在修建房屋时，要在梁、上内壁和院墙上，雕刻绘画，进行工艺美术的装饰。他们把中国民间吉祥的象征物——龙凤，带入外来的佛寺中。在堂阁上绘画，与在梁上雕龙描凤，出于同一种建筑风俗，这在莫高窟第296窟（北周）福田经变的“画堂阁”壁画中有反映。唐代壁画里的住宅以晚唐第85窟为代表，这是《法华经变》中的一座住宅。它为方形院落，以廊庑分为前后二院，正面为二层楼阁式的大门。前院横长，后院方阔，其中心有一楼，似为主人住处。四周不仅有廊庑，同时也有住房。宅的左侧附建畜厩，也分为前后院，向外一面有大门，门内一小院，有一人躺卧在地上。后院畜厩内有马匹及奴仆。宅外有农夫耕作，表明这是一座地主宅院。

（3）塔：塔是随佛教传入我国的一种建筑物，具有宗教纪念的性质。但它的造型，由现存成熟期的塔形来看，都是以中国固有的重楼为基本要素，上加印度覆钵式塔作为刹部融合而成的，并且完全中国化了。它往往和名山大川相结合，成为风景名胜的景观。莫高窟壁画中的塔有楼阁式、亭阁式、窣堵婆式、金刚宝座式等，造型多样，结构奇巧。

301窟东顶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故事中，有埋藏萨埵那尸骨的舍利塔一座。塔下有简单素方基台，塔身正面有半圆券门，顶具受花、覆钵、相轮、宝珠。

257窟南壁沙门守戒自杀品画面中，绘埋藏沙门遗骨的单层墓塔一座。此塔的基座，作直线组成的须弥座式，束腰部分较高。座正面设斜道，塔身平面方形，正面开半圆龛，上覆单檐庑殿顶，绘出瓦垄，出檐深远，从形体色彩上看，屋顶似为木构，

其余则砖石建造。

428窟西壁画“金刚宝座”式塔一组，由五座方塔组成，中央一塔比较高大，下设两层成阶梯状的素平基台，上为基座，基座本身又以平座栏杆隔为二段，下段中央辟半圆门，由此可以进入塔内，上段正面绘四个力士。塔身两层，覆钵上为相轮基座。

（4）城和城楼：壁画中有宫城、州城、县城，其布局大同小异。城一般都作方形，按轴线对称布置，四周有夯土城墙，两面或四面有城门。门上有单层或重层的城楼，城转角处大多有角楼，是防御性和装饰性相结合的建筑。如北周第296窟中画须阇提故事中的王城，此城为方形，前后两侧有城门，门上有三间城楼，后侧两转角处，有突出墙体的台。城内轴线上有国王的殿堂，面阔三间，下有台基，台基一周及台阶边沿设栏杆。殿堂后方有不甚对称的院落状房屋。此图中的城门、宫殿等建筑基本上沿轴线对称布局，反映了隋唐以前城市规划已注意到了对称、均齐的特点。

另外还有晚唐第8窟《维摩诘经变》中毗耶离城的城楼。其下层是突出城墙的城台。开三门，门首作梯形，周边有木构架支撑。正中一门可以看到半开的门扇，上有九行门钉。门洞上小下大，显得高耸狭窄。城台表面有菱形图案，可能表示一种装饰性的面砖，城楼面宽五间，深三间，门楼一周设平座栏杆。

上面仅仅介绍了壁画中主要的几种建筑形象，实际上敦煌壁画中的建筑形象很多，内容极其丰富。除了以上介绍的外，还有楼阁、台榭、阙等等。并且还有一些建筑图，如初唐321窟《宝雨经变》中就有一幅施工图，此图画一座正在施工即将建成的房屋，房屋三开间，檐柱不施斗拱。双扇大门不在中间，而在右侧。中间有一工匠正在用抹子往墙上抹泥，另有一人在后协助。屋顶也有工匠在劳作。所有工匠都赤裸上身。这类施工场面在壁画中是很少见的。

总之，莫高窟的建筑延续千余年，表现了人间天国的建筑风俗及要求，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建筑技术和艺术水平。壁画中所反映的古代建筑形式，虽然与古代建筑实物有一定距离，但它提供了研究我国古代建筑的大量形象资料，是一笔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

本节主要参考资料：

孙儒僩先生《莫高窟壁画中的古建筑（敦煌艺术小丛书之十五）》，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萧默先生《唐代建筑风貌——从敦煌壁画看到和想到的》，载《文艺研究》1983年4期

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敦煌莫高窟北朝壁画中的建筑》，载《考古》1976年2期

高国藩先生《古敦煌民间建筑风俗》，载《文史知识》1988年8期

第三章

扼腕愤谈伤心史

——敦煌遗书与文物被盗记

敦煌遗书的发现，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不幸的是，敦煌遗书发现于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中国的时代，许多遗书被帝国主义国家的所谓“学者”、“考察团”窃去，部分为国内官僚地主及私人收藏，造成了我国文化事业不可估量的巨大损失。早在1930年，爱国学者陈寅恪先生就沉痛地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1]”。现将敦煌遗书之发现及各国“学者”、“考察团”的盗窃情况，分别叙述于后。

一、震惊世界的大发现

我们伟大祖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我国各族人民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和文物资料，为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文化典籍和文物资料，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之后，有些已失佚不传；有些还遗存于地下，或密藏于洞窟山岩。可能有一天，它们将被发现而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一部分。

在古代，曾有两次文物典籍的发现，即汉代的孔壁古文和晋

---

①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

代的汲冢竹书，都与文化有极大的关系。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我国的典籍文物，又有几次大的发现，即河南安阳殷墟甲骨、西陲汉晋简册、明清两代的内阁大库档案、敦煌千佛洞遗书。这些文物典籍的发现，尤其是敦煌遗书的发现，震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并由此在世界上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

1、藏经洞遗书的发现

敦煌藏经洞遗书的发现，距今尚不足百年。但由于现存记载相互矛盾，更由于缺乏可靠的历史证据，其发现时间及过程还有待于更深入地研究。

据王道士墓志——《太清宫大方丈道会司王师法真墓志》记载，藏经洞发现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即公元1899年。王道士墓志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赵玉明、方至福为其师、师爷道士王圆箓去世百日而立。墓志嵌于莫高窟对岸王圆箓墓塔上，为木质阴刻，面南，高174厘米、宽75厘米。碑首中央篆刻“功垂百世”四字，其两旁各刻一龙。墓志全文如下①：

民国廿年古七月卅日，为吾师王法真仙游之百日。门弟子咸愿碑记行略，请命绅耆，众皆曰可，何幸如之！夫吾师姓王氏，名圆箓，湖北麻城县人也。风骨飘然，尝有出世之想。嗣以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历尽魔劫，灰心名利。至酒泉，以盛道道行高洁，稽首受戒，孳孳修练。迨后，云游敦煌，纵览名胜，登三危之名山，见千佛之古洞，乃慨然曰：“西方极乐世界，其在斯乎！”于是建修太清宫，以为栖鹤伏龙之所。又复苦口劝募，急力经营，以流水疏通三

①录文经李永宁先生整理，刊于《敦煌研究》试刊第二期

层洞沙，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惊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此光绪廿五年五月廿五日事也。呜呼！以石室之秘录，千百年而出现，宜乎价重连城，名驰中外也。观其改建三层楼、古汉桥，以及补葺大小佛洞，积卅余年之功果，费廿多万之募资，佛像于焉壮严，洞宇于焉灿烂；神灵有感，人民受福矣！惟五层佛楼规模粗具，尚未观厥成功。陆前县长嘉其功德，委为道会司以褒扬之。今者羽轮虽渺，道范常存。树木垦田，成绩卓著，道家之香火可继，门徒之修持有资。实足以垂不朽而登道岸矣！夫何必绝食练形而后谓之飞升哉！

千佛洞太清宫徒**子：赵玉明**
孙：方至福稽首谨志

《墓志》所说的太清宫，俗称下寺，与藏经洞所在的16号窟，近在咫尺，东西毗邻，原为王道士的法堂及居室。

立《墓志》者乃王道士的徒子徒孙，并且距藏经洞发现的时间已有三十年之久。《墓志》中所述情节与实际情况又不完全相符，内有虚构、浮夸之词。所以此说虽有根据，但未必准确，学术界鲜有附会其说者。

另一说发现于光绪二十六年，是年为庚子年，即公元1900年，此说目前为学术界所公认。庚子发现说，最早见于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光绪三十年。《日记》说："初七日夜敦煌王广文来云：莫高窟开于光绪二十六年，仅一丸泥，砉然扃镭自启，岂非显晦有时哉。"

叶氏记此事之年，距发现藏经洞只有三年，比较可信。

1900年发现说也见于《重修千佛洞三层楼功德碑记》。此碑为木质阴刻，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碑嵌于三层楼下层洞窟、今编16号窟甬道南壁。碑高230厘米，宽89厘米。《功德

碑记》全文如下①：

三危为敦煌望山，其西麓有千佛洞。稽诸志乘，即古雷音寺，未详创始何代。梵宇立唐时残碑尚云再修。历年邈远，迄今无考。但倚幽崖深谷间，疏岩凿石，缔造佛像万计。或装塑宝座，或绘画悬壁，色相庄严，灿然妙善，足征西域当年修佛之盛也。后经兵燹蹂躏，佛像屡遭毁废，龛亦沙压倾圮，梯级多断，攀缘莫逮。千百载而下，追溯古迹，每足动人感慨之思。然兴者不废，废者复兴，尤存乎其人而已。丁酉之岁，邑从九戴君奉钰倡首续修，聚众善之赀力，营艰大之工程，左提右挈，其运意为独挚矣！始构大雄之殿，继兴大士之宫，畴昔荒刹萧索，不蔽风雨，今则洞宇峥嵘、观瞻辄资景仰。苟非竭诚补葺，即阅五六年，殊难告厥蒇功。而鄂省羽流圆箓，又能宏乐善之心，不辞劳瘁，不避星霜，旋睹迤北佛洞寂寥，多为流沙所掩没，因设愿披沙开洞。庚子孟夏，新开洞壁偏北，复掘得复洞，内藏释典充宇，铜佛盈座，侧有碑云唐大中五年沙门洪警立。参考正史，建中二年沙州沦陷吐蕃后，逾七十年，刺史张公议潮正于大中五年以瓜沙等十一州收复归唐。遂改沙州为归义军，以议潮作节度使。由大中而至于今，且千有余岁，是圆箓孤志劈画，吾乡人众创见千岁遗蕴之物，亦甚异。圆箓测度藏经佛龛，结造三层楼，仍属戴君奉钰提倡而振作之，庙貌焕乎维新。功既竣，请余援笔而付剞劂。谨略述其梗概。若夫润色鸿业可大可久，更于继起有厚望焉！是为记。

敕授文林郎，侯铨试用知县、丁酉科选拔联捷举人郭璞谨撰并书。

例授登仕佐郎、吏部候选巡政厅、从九品、经理社首戴

①录文经李永宁先生整理，刊于《敦煌研究》试刊第二期

奉钰督修。

例授修职郎、吏部注册即选儒学训导、岁贡生、社首习登瀛监修。

例授修职郎、吏部注册候选儒学训导、附贡生、社首马育江监修。

经理社首戴号公　陈正言　杨春洲　殷善言　戴化勋

胡从义住持王圆箓

徒王赵明发裕仝修。

大清光绪三十二年岁次柔兆敦牂孟夏之月上浣毂旦　立

此碑所记“庚子孟夏”发现说，有可能源于王道士之口，因为王道士曾亲自参与三层楼修建之事，所以其说比较可信。

1900年发现说，还见于王道士的《催募经款草册》（又名《王道士荐疏》）。此件为梅红纸墨书，现存敦煌研究院。《草册》是以王道士名义写出，上报催拨经款的。《草册》说①：

湖北省麻城县人，现敦煌千佛洞住持王圆箓，敬叩，伏俯叩恳

天恩活佛宝台座下，敬禀者：兹有甘肃敦煌古郡迤郡东南方距城四十里，旧有千佛洞，古名皇庆寺。其洞在石山之侧，内有石佛石洞泥塑佛像，俱有万万之像。惟先朝唐宋重修，碑迹为证。至本朝光绪皇帝年内，因贫道游方至敦，参拜佛宇，近视洞像，破燬不堪。系先年贼匪烧损，贫道誓愿募化补修为念。至贰拾陆年伍月贰拾陆日清晨，忽有天炮响震，忽然山裂一缝，贫道同工人用锄挖之，欣出闪佛洞壹

---

①《草册》原文引自子青《记王道士催募经款草丹》，载《西北日报》1945年5月22日。姜亮夫先生《莫窟高年表》附录也录有此《草册》

所，内有石碑一个，上刻大中五年国号，上载大德悟真名讳，系三教之尊大法师。内藏古经万卷，上注翻译经中《印度经》、《莲花经》、《涅槃经》、《多心经》，其经名种颇多。于叁拾三四年，有法国游历学士贝大人讳希和，又有阴国教育大臣司大人讳代诺二公至敦煌，亲至千佛洞，请去佛经万卷。异日覆蒙天恩赐银壹万两，近闻其名，而未得其款，以将佛工不能成就。区区小县，屡年募化，至今创修寺院，以及补塑佛像，重修楼殿等项费用，过银二万有余。缘为经款，叩恳青天佛祖电鉴，特修草丹上达，肃此

谨禀

《草册》对藏经洞的发现时间说得十分具体，即1900年6月22日，与庚子孟夏之说吻合。而且还提到贝希和、司代诺（即伯希和、斯坦因）二人“请”去佛经历卷之事，故此件应写于1908年之后不久，应当说是可信的。

此外，伯希和、斯坦因等人，都说藏经洞发现于1900年，他们二人必亲闻之于王道士，所以与庚子发现说一致。

还有一种说法，即王圆箓做了道士，来到敦煌后，生活无着，投宿于莫高窟。此时的千佛洞寺院，多为红教喇嘛，诵的是番经，唯独王圆箓能诵道经，说中原语言，所以人们大都求他礼忏。其生活因此渐渐好了起来，于是就雇一杨某写经。杨某在第16窟甬道中置一桌案，经常在此伏案写经。抄经休息时，常以芨芨草点旱烟吸之，也经常把燃余之草插在墙壁裂缝中。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夜半，杨某又在此伏案写经，这次他与往常一样，吸完烟后就把燃剩的芨芨草插在背后墙壁裂缝中。奇怪的是这次却草插而不可止，用手击之，发现内中是空的，因而甚感惊异。杨某把此事报告了王道士，王道士即与杨某合力破其壁，内有一门，高不足容人，用泥块封塞，把泥块去掉，则为一小甬道，入内为一复洞，由此发现了藏经洞。此说没有旁证，也近于

传奇，聊备一说，仅供参考。

2、土地庙遗书发现记

敦煌遗书，主要是指1900年藏经洞发现的大批遗书而言。除此之外，还应包括1944年土地庙残塑中发现的少量遗书。

1944年7月初，前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准备拆除中寺后院中的土地庙，先将庙内土地、山神、牛王、马王、药王等五尊残塑像搬出，放置在土地庙外西墙根下。8月30日上午11时许，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职工（警长）窦占彪打破其中三尊残塑，发现残塑体内中心支柱上缠裹着一些经卷，当即由警长窦占彪和泥工秦司等将这些经卷持送到所长常书鸿同志的办公室。常书鸿同志让研究人员苏莹辉、刘荣曾共同检视包封。下午四点，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常书鸿、董希文、李浴、张琳英、陈秀芝、邵芳、苏莹辉、陈延儒、辛普德、刘荣曾等留所全体同志，在考古组启封检点，“并敦请中研院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夏作铭（鼐）、向觉明（达）、阎述祖（文儒）三先生莅场监视，以昭郑重！”由苏莹辉、李浴、刘荣曾记录登记。

8月31日，窦占彪又持来经卷一包，说此乃研究所临时雇员泥瓦工马志华、秦志和将另两尊残塑打破，从土块夹缝中获得的。

1944年8月30日和3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从五尊残塑中所获经卷，经过检查清点，计有佛家经、咒、疏等79件，编为61个目录号。孝经2件一个编号，诗经、记帐单、北朝幢将花名册、抄经起讫记录单等各一件，各占一个编号。此外，尚有写卷

---

①苏莹辉《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新发现北魏写经颠末记》，载《西北日报》44年12月1日

碎片32件，分做两包，各占一个编号，由苏莹辉整理编目①。

土地庙遗书的发现，当时即引起了学术界重视。中央社为此发的《六朝藏经敦煌发现》②的消息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于八月三十日修建职员宿舍，于后园土地庙残塑中，发现六朝藏经杂文共六十六种、碎片三十二块，……此种意外收获，致使震动世界学者之'敦煌学'，更增加若干资料。"苏莹辉当即介绍了土地庙遗书的发现始末，并很快发表了藏经目录③。

土地庙发现的遗书，共68卷，除苏莹辉所编目录之第11号《诗经残卷》，1951年在首都举办敦煌文物展览时携至北京，一直为故宫博物院保存外，其余67卷均藏敦煌研究院。1977年《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公布了施娉婷、刘忠贵整理的《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遗书目录》，该目录包括土地庙遗书。为了与藏经洞遗书相区别，在每卷卷名末尾注一"土"字，混编于院藏目录之中。

3、大胆的推测

除了藏经洞遗书和土地庙遗书外，敦煌是否还有其他的批量遗书发现？即莫高窟是否有第二个藏经洞？敦煌研究院刘永增先生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索④。

1974年10月，日本龙谷大学百济康义先生曾赴斯德哥尔摩瑞典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调查回鹘文写本，对该馆所藏回鹘文写本进

---

①土地庙遗书的发现情况，部分系李正宇先生访问两位当事人窦占彪、常书鸿所得。详见李正宇《土地庙遗书的发现、特点和入藏年代》，载《敦煌研究》第三期

②《西北日报》1944年10月12日

③苏莹辉《记本所新发现北魏写经（附目）》，载《西北日报》1945年4月24日、5月9日

④刘永增《回鹘文写本与莫高窟第二藏经洞》，载《敦煌研究》1988年4期

行了编目、定名等整理研究。此后百济先生又几次访学斯德哥尔摩，并对日本各家所藏的回鹘文写本与瑞典藏本进行了对比，从中发现一些写本出自敦煌，但并非藏经洞（即第17窟）所出，因为它晚于藏经洞封闭的时间。

1982年，百济先生又据法国国立图书馆藏伯希和编号181窟（敦煌文物研究所编464窟）出土资料，得知一批写本（主要是回鹘文写本）确实出自464窟，而且其中一部分和大英图书馆藏斯坦因劫去的敦煌遗书为同一写本。这批回鹘文写本有：瑞典民族学博物馆藏41件；日本藤井齐成会有邻馆藏西域古语资料27件；羽田亨氏藏西域古语摄影资料75件（下落不明）；法国国立图书馆和英国大英图书馆均收藏若干件。由此推断，这批写本估计同出于敦煌蒙古期（元代）建造的窟中，书写年代在13—14世纪。由于伯希和在资料中明确说得自他编号的181窟，从而可知，这批资料出自敦编第464窟。

这批回鹘文经典既有写本，也有印刷本，时间在13—14世纪间。其书写者是蒙古人，而使用的语言却仍是沙州回鹘语。其中继速来蛮西宁王之后，其子阿速歹、速丹沙、养阿沙仍崇信佛教，书写印刷佛典。速来蛮西宁王之后坐镇沙州的后继人史无明载，从这批资料可知为速丹沙，从而证明西宁王之王统一直延续到元朝末年。

464窟为元代重修，其东壁门南、北有回鹘文题记。该窟的封闭时间，从回鹘文文献年代看，最早应是明代初年。这批写本的发现和开始流失应在1907年斯坦因到敦煌时，伯希和也劫走了464窟的一些回鹘文文献。其后，瑞典人似亦涉足敦煌，窃走一部分回鹘文写本。至于日本各家所藏，除天理图书馆的藏品乃张大千先生赠送外，其他情况都不清楚。

二、千古之谜谁解说？

——敦煌藏经洞封闭之谜

敦煌藏经洞，即莫高窟第17窟。由于在该窟发现了约五万卷经卷遗书而得名，并震动世界，由此在世界上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然而藏经洞的情况如何？其封闭于何时？原因何在？八十年来中外学者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藏经洞原为洪谮（音辨）影窟

洪谮其人，正史中少有记载。根据《吴僧统碑》①、《唐敕河西都僧统洪谮告身碑》②、《大唐敦煌译经三藏吴和尚邈真赞》③及其他有关资料，可略知其生平。

洪谮，俗姓吴，即吴和尚、吴僧统。祖籍不详，但并非敦煌旧族。其父吴绪芝，曾任建康军使，后戍军甘、肃两州之间。吐蕃占领凉州后，河西节度使杨休明移镇沙州，并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发建康军戍镇沙州。吴绪芝及其子也随军移驻敦煌。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吐蕃攻占沙州，吴绪芝隐居不出，“糜践公门”、“曲肱处于仁里”，拒不出任吐蕃官职。谮之长兄滔，早逝。次兄季连，曾任“试太子家令”，后辞官归里，笃信佛教。

洪谮“童子出家”，以“约法化人，盛于佛事”。由于其悉

---

①伯希和4640号卷子

②马世长录文载《文物》1978年12期；李永宁录文载《敦煌研究》试刊第一期

③伯希和2913号卷子

心研读汉经梵典，兼习番文藏语，成为出色的译经僧，故被吐蕃赞普委任为“知释门都法律兼摄行教授”十数年，后又“迁知释门教授”，主持译场寺院中贵族子弟学校的文化教育及其他宗教事务工作。

洪辩虽“栖心释氏”，但终不负父辈之重望，积极参加敦煌人民的抗蕃斗争。张议潮大中起事后，辩即遣弟子悟真随议潮所派入朝使同赴长安。唐宣宗赞其“惟孝与忠，斯谓兼美”，于大中五年（851年）敕授洪辩为“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及“河西释门都僧统知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赐紫衣及各色信物，并亲示诏书，勉辞委婉、问慰“夏热”，恩宠殊异①。

唐懿宗咸通三年（862），洪辩“掷钵腾飞”，逝于沙州。洪辩去世后，其下属僧徒或吴姓本家，改寺庙“廪室”（存放粮食的地方）为影堂（洪辩的纪念室）。这个影堂就是今编第17窟，即藏经洞。

作为洪辩的纪念室，自然有一番布置。首先是塑了一尊洪辩的真容，然后在北壁中部画有两棵枝叶交接的菩提树。东侧树枝上悬挂一个净水瓶，西侧树枝上挂着一个挎带。树东侧画比丘尼一身，着袈裟，双手捧持绘有对凤图案的团扇一柄。树西侧画执杖的近侍女。壁画中的物品和人物，与僧人生活和供奉僧人有关。

西壁壁龛内，嵌有石碑一通，即洪辩告身敕牒碑。1900年发现藏经洞时，此碑即在窟内，斯坦因、伯希和劫经时碑尚立于该窟。后被王道士移至第16窟甬道南壁，196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复将此碑移入藏经洞，嵌于壁龛原处。碑高1.5米，宽70厘米。碑文三段，从上而下是：洪辩告身、敕牒诏书、敕赐衣物录本。

---

①参阅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一）》，载《敦煌研究》试刊第一期

藏经洞塑洪晉像，画有关他的生活场面壁画，刻告身碑等，其用意是为了“标范奉祀”。碑文前特别注明：“当家告身依本镌石”和“诏书本”，就在于显示唐王朝对洪晉的器重和褒奖，“庶使万岁千秋不朽不坏”，以作永久性纪念①。

2、藏经洞封闭之谜

洪晉的影窟为什么变成了藏经洞？它是何时封闭的，其原因何在？由于没有发现可信的文字记载，它的封闭时间及原因，就成了一桩历史公案。中外学者根据各种旁证材料，提出了多种假说，试图解开这一千古之谜。现将争论情况介绍如下：

（一）避难说

（1）宋初避西夏之乱说

最早论及藏经洞封闭时间及原因者，是法人伯希和。他在《敦煌石室访书记》②中说：藏经洞中的“卷本所题年号，其最后者为宋初太平兴国（976—983）及至道（995—997年），且全洞卷本，无一作西夏字者，是洞之封闭，必在十一世纪之前半期，盖无可疑。以意度之，殆即1035年西夏侵占西陲是也。洞中藏弆，至为凌乱，藏文卷本，汉文卷本，绢本画幅，缯画壁衣，铜制佛像，及唐大中刻之丰碑，均杂沓堆置，由是可见藏置时必畏外寇侵掠而仓皇出此。”此后，英人斯坦因及我国学者罗振玉、姜亮夫等皆持此说。

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③中，斯坦因认为藏经洞之封闭，“一定在十一世纪初期左右，其时西夏人征服此地，有危及

---

①参阅马世长《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载《文物》1978年12期

②载《法国远东学院院刊》第8卷，1908年安南出版。陆翔译文见1935年《北平图书馆馆刊》9卷5号

③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华书局1936年出版

当地宗教寺宇之势，因而如此。”罗振玉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①一文中说：“一洞藏书满中，乃西夏兵革时所藏，壁外加以象饰，故不能知其为藏书之所。”姜亮夫先生在《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②一书中说：“据莫高窟所发现的材料推知，宋时西夏之乱，千佛洞下寺僧人，欲避乱他乡”，便把经卷佛像杂书等藏入洞中封闭。

1980年，阎文儒先生发表了《莫高窟的创建与藏经洞的开凿及其封闭》③一文，更全面地阐述了这一论点。认为藏经洞的封闭年代，应注意到统治敦煌的民族和洞内的藏经。敦煌曾受到非汉族的统治多年，在洞内仍然保存着吐蕃人应用的藏文经，但另一少数民族西夏同样也统治了这一地区相当长的时期，这个民族是有自己文字的，而且也信奉佛教，但洞中却看不到西夏文字的经卷。这是因为1035年西夏占领瓜、沙时，藏经洞已被封闭了。

公元1035年，即宋仁宗景祐二年，亦即西夏人入侵敦煌时，当地的人们不可能知道这个民族也信仰佛教，仓促之间，将各寺的写经，都集中起来，收藏在洪谨的影堂内，并且将窟门封闭，重绘了16号窟壁画。据敦煌文物研究所对西夏洞窟的调查与排年，16号窟应该属于西夏早期的创作。因此，我们只能认为藏经洞是为避乱而封闭的。同时，按人情事理来推论，这种封闭一定是由于一个大的政治变乱而引起，而这个变乱，根据敦煌历史，最大的应是西夏占据瓜、沙、肃诸州，故藏经洞也封闭于此时，即1035年。

对于西夏侵扰说，马世长先生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在《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伯希和的西夏侵扰说，其

---

①载《东方杂志》6卷10期（1909年）

②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

③载《文物》1980年6期

理由之一是藏经洞中的遗书纪年最晚是太平兴国和至道。其实并非如此，现在已发现了1002年的卷子，可能还有更晚者。伯希和的另一理由是藏经洞中未发现西夏文写本。这虽然是事实，然而据此一点，即肯定藏经洞在1035年前封闭，则未必妥当。西夏未创文字之前，使用汉文和藏文。西夏文字之创，在李元昊大庆元年（1036年）。一种文字，从初创到比较广泛地流行使用，必须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况且敦煌地区主要是汉族，以往一向使用汉文，因而敦煌地区西夏文的流行，则应当更晚一些。从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可知，西夏占有瓜、沙地区之后的二、三十年内，西夏文在这一地区还没有流行起来，所以西夏侵扰说是值得商榷的。

（2）宋绍圣说

1979年，殷晴先生在《敦煌藏经洞为什么要封闭》①一文中认为，藏经洞的封闭与伊斯兰教东传有关。信仰伊斯兰教的哈拉汗王朝大肆毁坏佛教艺术。宋绍圣（1094—1098年）中，“他们向宋朝要求出兵攻打西夏，宋朝表示赞许”。他推测“这一消息在佛教徒中所引起的恐慌，因而采取了封闭藏经洞的保护措施”。谭真先生在《从一份资料谈藏经洞的封闭》②一文中说：“敦煌遗书P·3810《呼吸静功妙诀》后，有养生神仙粥食方，其中山药一名，于探讨敦煌藏经洞的封闭时间颇有益。”并详细阐述了这一问题。

山药，原称薯蓣。宋人顾文荐撰《负暄杂录》云：“薯蓣，因唐代宗名豫，避讳改为薯药，又因宋英宗讳署，改为山药。故宋英宗之后医药方书改薯蓣为山药。”既然有山药名称的遗卷在藏经洞出土，那么藏经洞封闭很可能在宋英宗登基（1064年）以

①载《文物》1979年9期

②载《敦煌研究》1988年4期

后。并认为藏经洞“封闭上限1064年，下限1116年，1093—1097年间可能性较大。”

关于洞窟封闭之原因，谭真也认为“与伊斯兰教东传而躲避异教焚掠有关。”公元971年至十一世纪初，以喀什为第二首都的信奉伊斯兰教，对佛教采取严厉镇压政策的哈拉汗王朝，挥师东进，经过二十多年的残酷战争，终于在1000—1009年占领了西域的佛教中心于阗。经过七八十年的养精蓄锐后，又想继续东进。“可以想象哈拉汗王朝东进的消息，传到敦煌后，必然引起敦煌上自官府下至百姓，特别是佛教徒们的恐慌。加之下述诸因素的影响，瓜沙地区上层统治者便采取了封闭藏经洞的保护性措施。”

西夏建国早期，政权本不巩固，外部又有黄头回纥的干扰及宋廷的威迫，扬言举兵攻打于阗，致使上层瓜沙统治者预感到战争即将临头，不得不做充分准备，便有条不紊地封藏各大寺院的经典、画卷，顺便把官府与寺院的一些社会文书等也收藏进去。从收藏的经卷与社会文书所涉及的范围来看，当时是有计划地密藏，决非短期内仓促所为。另外，藏经洞洞口外壁现存表层壁画是属于西夏早期的创作，它也是判断其洞口封闭年代的依据之一。“综上所述，从1093年于阗向宋廷请战不许开始，至1097年实攻甘沙肃三州为止，凡五年，瓜沙统治者自然有计划有步骤地封闭藏经洞的。”

（3）宋皇祐之后（1054年）说

持此说者为陈垣先生，他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通考载，大中祥符末，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贤顺，犹表乞金字藏经。景祐至皇祐中，朝贡不绝，知此等经洞之封闭，大约在皇祐以后。”

1978年，马世长先生在《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中也持此说，并对伯希和的西夏侵扰说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种种迹

象和材料表明，“藏经洞的封闭不在西夏占据敦煌之前，而是在西夏占据敦煌之后的某个时期。其相对的大致年代，陈垣先生推断在皇祐之后的意见，可能较为切近实际，而封藏遗书的原因，则一时还难于肯定。估计或许与西夏对瓜、沙等州的控制进一步加强，曹氏家族彻底失去对此地的统治有关”。

（4）曹氏封闭说

白滨先生在《试论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年代》①一文中力主此说。认为从现有情况可知，敦煌遗书纪年最晚者是宋咸平五年（1002年），这只能说明到咸平年或稍后的年代藏经洞已被封闭了。“所以我认为藏经洞的封闭当在宋咸平年间或稍后的年代里是比较合理的”。

白文还说，许多论者都认为16号窟北壁壁画是西夏早期的作品，其实，曹家晚期洞窟与西夏早期洞窟壁画，如无供养人题记与可靠记载是很难区分的。那么，第16窟北壁重绘壁画有什么可靠证据可以确认为西夏早期壁画而不是曹家晚期重绘呢？“我认为第16窟重绘壁画应定为曹家晚期，即在西夏占领瓜沙之前，上限为咸平之后，曹宗寿或其子曹贤顺初期所为。”

贺世哲先生在《从一条新资料谈藏经洞的封闭》②一文中，从另一角度研究了这一问题。据刘玉权的分期，57个西夏洞窟中，包括16窟和130窟。可知130窟现存表层壁画与第16窟甬道表层壁画大致上属于同一历史时期重绘的。据伯希和1908年记录，第130窟主室东壁南侧表层壁画中有供养人题名：“故叔勅谒（竭）诚□（奉）化功臣河西一十（下缺）。”在瓜沙曹氏中有“竭诚奉化功臣”头衔者，只有曹延禄与曹宗寿两人。而第

---

①载《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②载《西北史地》1984年3期

130窟的“竭诚奉化功臣”是曹延禄。它是曹宗寿当权时期（1002—1014年）重绘并题名的，所以称“故叔”。那么第16窟甬道表层壁画重绘时间大体上也应在此时期或稍后。因此，“被这层壁画覆盖着的藏经洞的封闭年代，亦应在此稍前或同时。”

藏经洞封闭的原因，贺世哲认为是东边甘州回鹘政权与西边于阗李氏政权相继被消灭或即将灭亡，等于切断了瓜沙曹氏政权的左右臂，构成了东西夹击的威胁（主要是东边西夏的威胁），为了防患于未然，瓜沙曹氏政权对于可能即将临头的战争危机，不得不有所准备，其中也包括密藏佛教典籍、画卷。在密藏佛教典籍、画卷时，顺便把官府与寺院的一些社会文书收藏进去，也是合乎情理的。

（5）元初说

关百益在《敦煌石室考略》①一文中说：“石室地址，为元朝以前之大佛寺，经历年之搜集，宝藏甚富。元太祖成吉思汗西征，其军师道士邱处机，最为信任，与佛教为仇，道经敦煌之先，到处毁坏佛寺，迫僧徒蓄发，改易道装，寺中沙弥，早有所闻，预将所有贵重古物，作石室以封固之，免遭浩劫。及元太祖师次敦煌，即逐僧毁寺，改为道观，直至前清未之能改。至伯希和等闻石室之名，前往发掘时，仍须商得观中道士同意也。”此说既没有联系藏经洞中之遗物，又没有从藏经洞封堵之实况出发，纯为臆断，故鲜有附和其说者。

（6）元明之际说

张维在《陇右金石录》中，论及《重修皇庆寺记》时提出此说。《重修皇庆寺记》石碑立于元至正八年（1348年），为僧守朗立石，奢蓝令旃刻。张氏认为“元末兵乱，瓜沙沦没……石室

①载《河南博物馆馆刊》第一集，转引自白滨《试论敦煌藏经洞的封闭年代》

闭扃，其时盖即在元明之间，或即为守朗、奢蓝合楠及其徒众所为。”此说与事实相去甚远，无人赞同附会。

（二）废弃说

以上关于藏经洞封闭的六种意见，从总体上看，都属于“避难说”。对此，方广锠先生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在《敦煌遗书中的佛教著作》①一文中，认为“避难说”实难自圆其说。这是因为藏经洞内没有整部大藏和其他珍贵物品，大多是残卷断篇，夹有不少疑伪经，甚至还有不少错抄之废卷与涂鸦之杂写，乃至作废的文书与过时的契约等等。在藏经洞封闭时，即曹宗寿当政时期（1002——1014年），敦煌已向内地乞求配齐了藏经，也曾从朝廷乞求到一部金银字大藏经，还有锦帙包裹、金字题头的《大般若经》，如系避难，它们理应珍藏其中。为何整部大藏未被收藏，所藏的反而是残部破卷？因此其真正的原因并不是避难，而是在于“这一批文书对当时的敦煌僧众来说已完全失去了实用价值，故而废弃”。提出“废弃说”的理由是：

（1）中国人一直有敬惜字纸的传统。在古代，纸张比较珍贵，对地处西陲的敦煌来说更是如此。据敦煌遗书中的抄经记录记载，当抄经时，每人所领纸张均要记帐，如果抄错，必须凭废纸换好纸。废纸并不抛弃，而是留待他用。

（2）佛经经过长期使用之后，难免会破损，但对这种不堪再使用下去的经典是不允许抛弃的，而是另行收藏。

（3）从现存遗书可以知道，敦煌寺庙经常清点寺内的佛典及各类藏书，查看有无借出而没有归还的，或有无残破而不堪使用的。

（4）宋代，四川的刻本经典传到敦煌，朝廷又颁赐了金银字藏，敦煌的经典大为丰富。大概在曹宗寿当政时期，敦煌进

---

①载《文史知识》1988年10期

行了一次比较彻底的大规模的寺藏图书清点活动，将清理出来的一大批无用的另部残卷和各种无用的文书与废纸，挑选了一个不太重要的洞窟，统统封存进去，然后在外面重新画上壁画。由于是一堆无用的东西，自然不会有人把它们放在心上，年深日久，也就被遗忘了。

（三）书库改造说

在1979年巴黎国际敦煌学术讨论会上，日本学者藤枝晃提出了“书库改造说”。他在《敦煌“藏经洞”的一次复原》①一文中认为，大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折叶式的刊本经卷，已从中原传到敦煌，因此，必须改变藏书室的位置，故将使用起来不方便的卷轴式佛经以及许多一直分散的杂物一并封入石窟。

何昌林先生在《敦煌“藏经洞”之谜》②一文中同意此说。认为改造书库，就需把废弃的卷轴式佛经“藏”起来，以便腾出地方来存放折叶式佛经。莫高窟每年有多次庙会和佛教节日，四面八方的来客很多，人多手杂。为了防止入藏的卷轴式佛经被人拿走，每次庙会或节日都得派出一人看守“藏经洞”，而庙里的人手又少。入藏者毕竟是古物，对于后世僧侣们来说，许多东西都是很神圣的，少了哪一件也不行，因此，就干脆砌上墙，封起来了。

以上对藏经洞封闭时间及原因的研究情况作了简单介绍。从以上所述可知，对这一重要问题的看法，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进一步挖掘旁证资料。这一千古之谜究竟由谁来解？我们期待着、盼望着早日解开这一历史之谜。

---

①译文载《西北师院学报》增刊《敦煌学研究》，1984年10月出版

②载《阳关》1984年2期

三、斯坦因敦煌劫宝藏

马克·阿弗勒尔·斯坦因原为匈牙利人，1862年生于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里，后来加入英国籍。在匈牙利受中等教育后，由于其父母相继去世，就离开了匈牙利。

1、斯坦因与西北考察

斯坦因富有语言天才，会匈、德、英、法、希腊、拉丁、波斯、梵文等语，又学过克什米尔话和突厥语。中文虽学过一些，但不能算会，更谈不上好。

1883年，当斯坦因21岁时，他从德国的杜宾根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匈牙利政府的两年奖学金。于是他第二年去英国，在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研究东方语文和考古学。一年后回国服兵役，在测量学校学习测量地形和绘制地图。

1886年斯坦因再到英国，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和牛津的阿希摩兰博物馆研究古代钱币。两年的奖学金学习结束后，他前往印度，任旁遮普大学注册主任兼东方语言学校校长。在此期间，他曾到克什米尔作考古旅行，并在拉荷的博物馆里熟悉了当时外界尚不甚了解的犍陀罗艺术风格①。

1889年，经英国东方学家劳林逊的推荐，斯坦因被任命为印度拉合尔东方大学的校长。在这里，他成了罗德亚德·吉卜林父亲的朋友。这个人是“奇屋”也就是小说《基姆》中所提到的那个收藏印度和犍陀罗不朽艺术的博物馆馆长。斯坦因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当时著名的中亚佛教艺术和印度肖像画法。

---

①参阅金英华《斯坦因—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载台湾《汉学研究》1986年4卷2期《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专号》

1898年9月，斯坦因向印度政府提出了前往我国新疆和阗发掘古代遗址的计划。为什么他要选择和阗呢？这是因为当时孟加拉《亚洲学会学报》上刊载了一篇在和阗附近发现的写卷残片之研究，从而估计去那里可能会有收获。

当时的英国对中央亚细亚具有野心，认为和阗是在其势力影响范围之内的，觉得和阗在回教盛行前的佛教文化能够说明印度和中亚在从前的关系，可以古为今用。又因为测绘那一地区路径和地形的实际需要，斯坦因的计划在那年年底被批准了。批准之初，并不公开，以防俄国介入。①

1899年，斯坦因任加尔各答玛然拉斯大学校长。还担任过英印当局印度西北边境的总视学。1904年又进入印度古迹调查局任职。在我国西北地区考察并窃取大量历史文物后，就长期从事于这方面的写作和研究工作。直到1943年，他已81岁，计划从阿富汗出发，进行最后一次中亚旅行时，死于阿富汗。

斯坦因曾先后四次来我国西北进行考察。第一次是1900年5月至1901年4月，活动地区主要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回印度后他写出了《古和阗》这部享有世界声誉的巨著。第二次是1906年4月至1908年11月。这次考察除了新疆外，还到了甘肃河西及内蒙古额济纳旗等地。《沙漠契丹废址记》一书详细记述了这次考察的结果。第三次是1913年至1916年，这次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塔里木盆地南北，河西南、北山。考察结束后，他陆续完成了《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部考古记》、《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等著作。1930年，斯坦因第四次来我国进行考察，由于当时新疆和西北地区政局紊乱，故此行收获不大。我们这里主要介绍斯坦因第二次考察期间对敦煌千佛洞宝藏的劫夺。

---

①斯坦因1899年2月2日致兄函，参阅金荣华《斯坦因—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

早在斯坦因考察我国之前，已有不少人在我国西北地区进行过考察，并攫取了许多古代文物，其中有不少各种文字的文书。这些古文书在欧洲学术界引起很大震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英国人鲍威尔在我国新疆库车地区考察期间，盗窃了许多印度梵文古文书。1890年他将这些古文书送给在印度的英国学者霍林勒研究，以后又送到欧洲，被认定是公元五世纪以前的写本。不久，又有许多古印度语写本从我国喀什、和阗等地传入印度，从而引起了当地梵语学者的极大关注。但对这些写本的真伪、出土地点等问题，却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使研究工作不能深入。于是这些学者呈报英印当局教育部，要求派人前往我国新疆进行考察。懂得梵文和其他多种文字的斯坦因遂被选中。斯坦因的中国之行，得到了印度总督冠松的大力支持。1899年，冠松“通知驻北京的英国公使，请中国当局给斯坦因发一张经由喀喇昆仑进入中国土耳其斯坦的护照。这张护照连同印度政府对于远征的批准书一并按时到达。中国的公文命令当地的办事大臣要保护好斯坦因。更重要的是要处处给他以方便，不能限制他的行动①。”

2、千佛洞骗宝

敦煌石窟艺术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宝库之一。早在1879年，匈牙利地理学会会长洛克齐在我国西北考察地质期间，偶然看到了敦煌石窟艺术，使他惊讶万分，赞不绝口。1902年，汉堡举行国际东方学会议，到会者有英、法、德、俄等国的学者。洛克齐在会上报告说：敦煌千佛洞美术，博大优美。他的讲话，大大地促进了斯坦因前往敦煌考察之野心。这正如斯坦因自己所说：“在第一次中亚探险队以后几

①（英）彼得·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66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年，我便从事计划第二次的探险，并很想将这一次的探险扩展到中国西北边界上的甘肃省去。我的朋友匈牙利地质调查所所长故洛克齐教授曾同我说及敦煌东南的千佛洞佛教石窟寺，因此更大大的促进了我的愿望①”。

1904年，斯坦因加入了英国籍。同年，他提出了第二次远征中国的计划书：地区扩大至敦煌，时间两年，经费26000卢比。这个计划书于第二年年底被批准，经费由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共同负担。

1906年4月，斯坦因再次跨上征途，进行第二次远征。这一次的主要目标是斯文·海定所谓神秘的楼兰遗址。他沿着丝绸之路东行之前，在喀什聘请了一个中国师爷——蒋孝琬，作为他的翻译和助手。3月12日早晨，斯坦因首次到达敦煌，当时他还不知道千佛洞发现藏经洞的事。原准备只在敦煌呆十天，简单地考察一下千佛洞，并在敦煌补充一些粮食和饮水，然后就去罗布泊沙漠进行考古发掘。但到达敦煌不久，他就从一位定居在敦煌的乌鲁木齐穆斯林商人扎依德·贝格那里，听到了几年前王园禄在莫高窟发现藏经洞遗书之事。他认为藏经洞发现的“这种宝物很值得去努力侦察一番②，”所以就迫不及待地向千佛洞跑去。

3月16日，斯坦因到了千佛洞。当时，藏经洞已装上了门锁，钥匙由千佛洞主持道士王园禄亲自掌管。而此时王道士带着两个徒弟外出化缘，只有一位小和尚在千佛洞。斯坦因进不了藏经洞，只得暂时离去。他拜见了敦煌的地方官王某及驻军首领林某后，就去安西、南湖考察。

5月15日，斯坦因再次返回敦煌，由于此时千佛洞正值庙会，香客很多。为不引人注目，更怕众怒难犯，未敢下手。斯坦

---

①斯坦因著、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37页，中华书局1936年出版

②《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41页

因只得在县城多呆几天，他的解释是："敦煌之民虽至今日，犹皈佛教。余等去敦煌之日，正敦人瞻礼之期。市民村民来谒千佛洞者，数以千计。可知寺宇虽残，犹为礼拜之地。故余于此地就画壁造像深加敬护，除照影绘图外，不敢有所希冀，恐伤人民之情也①"。

5月21日，斯坦因带着考察队，再次来到千佛洞。据斯坦因说，这时"王道士已在那里等候。他看来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极其狡猾机警。他不知道他所保管的是甚么，他对于有关神同人的事充满了畏惧，因此一见面就知道这个人不易于捉摸。……要想急于接近那一屋大藏书是不容易的②"。因此，斯坦因说他是来千佛洞拍摄壁画照片的，只字不提藏经洞的事，只让其中国翻译蒋孝琬去和王道士周旋。过了很久，蒋师爷回来向斯坦因说，他要求王道士让斯坦因看一些写经，但王不置可否。当蒋提出斯坦因愿慷慨地捐一笔功德钱时，王便同意斯坦因看部分卷子。当蒋暗示说斯坦因实际上想买一些卷子时，王一下子就变得焦躁不安，刚才同意让斯坦因看一部分卷子的事也几乎泡汤。正如斯坦因自己所说："我尽我所有的金钱来引诱他同他的寺院，还不足以胜过他对于宗教的情感，或者激起众怒的畏惧，或者两者俱有所畏亦未可知③"。

金钱没有打开藏经洞之门，斯坦因只得再想他策。当他请王道士领着参观洞窟及其维修工程时，王对斯坦因渐渐有了好感。斯坦因提到圣僧玄奘时，引起了王道士的共鸣。斯坦因一看有机可乘，便大讲特讲他是玄奘的忠实信徒，"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

---

①斯坦因述、王国维译《中亚细亚探险谈》，载《王国维遗书》第十四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

②《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42页

③《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42页

国话向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①”。这样王道士特意把斯坦因领到画有唐僧故事的壁画面前，给他进行热情的讲解。在王道士请人画的这些壁画中，有一幅对斯坦因特别有利。画面上，玄奘站在一条湍急的河流岸边，他的坐骑驮着佛经站在旁边，一只大龟向着玄奘游去，要去帮助他把佛经驮过河去。这天深夜，蒋师爷来到斯坦因的帐篷里，首次给他带来了一小捆经卷。蒋说这是王道士藏在衣服下面刚才悄悄交给他的。然后，蒋孝琬又把一小捆经卷带回他自己的小屋，连夜进行识别研究。

第二天天刚亮，蒋孝琬面带惊愕的神色向斯坦因报告，有些经卷上有题署，有的题署表明，佛经是玄奘从印度带回并亲自从梵文译为汉文的。听了这一消息，斯坦因也很惊讶，并让蒋师爷去报告王道士。王道士听后更是惊愕不已。蒋孝琬说，只有一种解释才说得过去，即阴曹地府的玄奘亲自选定这一时辰，把这些神圣的佛经展示在斯坦因面前，以便这位来自遥远印度的虔诚信徒和弟子能把它们带回印度老家去②。在蒋孝琬这种半神性话的影响下，王道士终于向斯坦因打开了藏经洞之门。斯坦因说“从道士所掌微暗的油灯光中，我的眼前忽然为之开朗。卷子紧紧的一层一层的乱堆在地上，高达十呎左右，据后来的测度，将近有五百方呎。小室约有九呎见方，两人站了进去，便无多少余地了③”。

洞子太小太黑，不便阅读，王道士就允许斯坦因把几捆卷子移到洞窟前室的一间小屋里。为预防被前来进香的善男信女发

---

①《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43页

②参阅张德明《斯坦因千佛洞盗宝详情》，载《阳关》1986年4、5期

③《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44页

现，就把窗户用纸糊上了。而后王道士就把卷子一捆一捆地搬到小房里让斯坦因、蒋孝琬研究。由于卷子越来越多，所以斯坦因放弃了原来准备叫蒋孝琬给卷子编目的计划。洞中除了佛经外，还有许多绢画与帛画。斯坦因自己说："余于开一大包裹时尤警，……其包裹以粗棉布为之，中藏种种绢画、纸画、幡盖、锦缯、刺绣之供献物，不可胜计。其画绢画布，盖寺中之旌旗。卷藏甚谨，及展视之，皆为诸佛菩萨像，或纯用印度画法，或以印度画为本，而参以中国画①。"

王道士对"经"很重视，对佛画则兴趣不大。斯坦因和蒋孝琬一面阅读，一面迎合王道士的心理说些恭维话，又许诺捐纳一大批功德钱。斯坦因把挑选出的一些佛经和佛画放在旁边，王道士看见后也没有提出异议。当天，他们三人一直干到天黑。离开洞窟时，斯坦因又和王道士进行了长谈。他们走到画有唐僧牵马驮经从印度返回的壁画前面时，斯坦因故意停住，以便再次引起王道士对该画的注意。蒋孝琬站在他们后面，竭尽说客之能事，并再次强调，斯坦因将会给寺庙捐献非常可观的功德钱（在此之前，斯坦因已经给寺院捐奉过若干银两）。但王道士仍然犹豫不决，斯坦因明白，最好的办法是让蒋师爷一个人去采取行动。

在蒋孝琬的一再劝说和欺骗下，王道士终于答应了斯坦因的要求。"到了半夜，忠实的蒋师爷自己抱着一大捆卷子来到我的帐篷之内，那都是第一天所选出来的，我真高兴极了。他已经同道士约定，我未离中国国土以前，这些'发见品'的来历，除我们三人之外，不能更让别人知道。于是此后单由蒋师爷一人运送，又搬了七夜，所得的东西愈来愈重，后来不能不用车辆运载了②。"

---

①斯坦因述、王国维译《中亚细亚探险谈》

②《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47页

这时王道士越来越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越来越害怕失去那些他认为十分神圣的卷子。因而向斯坦因宣称，要把这些“经”交给他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这些“经”如果缺少的话，施主肯定会发现，所以他必须去和施主们商量商量，在此之前，不得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当晚王道士就把甬道上的经卷全部搬进藏经洞，并锁上了门。这使斯坦因大吃一惊，但感到庆幸的是，他已经到手的那些为数众多的珍贵绘画、非汉文写卷及其他文物仍在自己手里，并用两个晚上的时间，把已经到手的东西从帐篷里搬到了他自己的储藏室。

这时，王道士又去敦煌绿洲进行其有规律的化缘了。一周之后返回千佛洞，由于其秘密仍未泄露，王道士的声誉也一如既往，所以王道士也不再胆小怕事了。斯坦因乘机对王道士欺骗说：把这些经卷幽闭在这里，迟早是会散失的，我把它们救出来，以供西洋学者研究，是很虔诚的举动。因此，他们双方立约：“用施给庙宇作为修缮之需的形式，捐一笔款给道士作为酬劳①。”

正在这时，斯坦因的信使吐尔迪从于阗来到千佛洞，给他带来了大批的邮件，包括170封信，都需他处理。另外，敦煌的地方官告诉斯坦因，兰州的总督来了命令，指示地方官奉劝斯坦因在考古发掘中一定要注意外交礼节。再加上斯坦因在敦煌呆的时间过长，已引起了人们的警惕，因此斯坦因决定离开敦煌。6月13日，他率领由骆驼、马匹以及新增加的五辆马车所组成的浩荡队伍，满载着敦煌宝藏，离开了千佛洞，向安西进发。

四个月后，斯坦因在返回安西途中，给王道士写了一张字条，蒋孝琬拿着字条又秘密地去了一次千佛洞。斯坦因说，这一次，王道士“还概允蒋师爷代我所请，送给我很多的中文同西藏

---

①《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48页

文写本，以供泰西学术上之需。十六个月以后，所有满装写本的二十四口箱子，另外还有五口内裹很仔细的装满了画绣品以及其他同样美术上的遗物，平安的安置于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我到那时才真正的如释重负①。”“此乃余最终之慰藉也②。”

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来中国“探险”时，再次来到千佛洞，通过王道士又骗去了五大箱敦煌卷子。斯坦因自己说：“王道士欢迎我有如老施主一般，……王道士曾乘便将他的帐目给我看，上面载明我所有施给寺院的银钱总数。他很得意地指给我看，石窟寺前面的新寺院同香客住宿的房屋都是用我所捐的钱修建的③。”斯坦因这次所得卷子，大部分是敦煌遗书运送北京时，王道士密藏起来未交者。少部分是当地官僚窃去和散佚在民间的，当时就已经有人在出售。《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说：“一整捆的唐代佛经卷子，在1914年即曾有人拿来向我兜售过。我到甘州去的途中以及在新疆沿途便收到不少从石室散出的卷子。”斯坦因这次所窃卷子的数量，在其自述中说：“我第二次巡礼此地的结果，许我带去的还足足装满五大箱，有六百多卷佛经，——自然，又得布施相当的数目④。”

3、盗劫后的评说

斯坦因对敦煌文物的劫夺，使他获得了很大的实惠与极高的声誉。英国国王授予他印度王国武士勋位（两年后又提升为骑士勋位）；皇家地理学会授予他金质奖章；牛津和剑桥大学都赠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而德国则给他一笔巨额的现金以祝贺他的成

---

①《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48页

②斯坦因述、王国维译《中亚细亚探险谈》

③《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49页

④《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49页

就；在布达佩斯，他被奉为立了大功的好儿子。更使他高兴的是，终于加入了英国国籍，实现了其梦寐以求的愿望。此外还使他喜上加喜的是，那个为他帮了大忙，对盗窃敦煌文物立了殊勋的蒋师爷——蒋孝琬，也获得了他所渴望得到的奖励：当上了喀什英国领事馆的汉文秘书。

斯坦因对敦煌文物的劫夺，得到了欧洲学术界的极力赞扬。中亚细亚旅行家和历史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教授曾经把斯坦因称作是“他的同时代人当中的一位集学者、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于一身的最伟大的人物”。铀元素的发现者伦纳德·伍利爵士把斯坦因在中国西北的探险，说成是“一个考古学家对古老世界所进行的一次最大胆和最冒险的突击①。”并说斯坦因对敦煌遗书的劫夺，“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考古学上的大发现。”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宣称，“任何一个考古学家都没有作出比这更多的惊人的发现②。”

然而，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友好人士对斯坦因的劫夺，却有正确的看法，并表示极大的愤慨。早在1935年，英国埃里克·泰克曼爵士就在其《土耳其斯坦旅行记》一书中说：“运输队把中国土耳其斯坦③的寺院、石窟、坟墓和废墟中的无价之宝，一批一批地运往外国的博物馆，从而使中国永远地失去了这些珍宝。对此，中国人无不怨声载道，而外国人也无法加以否认④。”英国东方学专家阿瑟·韦利对于斯坦因的劫夺，“表示强烈的不满，认为这无异是对‘敦煌书库的劫掠’行为”。并说要了解中国人民对敦煌遗书被盗的情感，其“最好方法是去设想一下，假

---

①转引自《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62页

②转引自《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65页

③中国土耳其斯坦，即我国新疆地区

④转引自《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作者前言

使一个中国的考古学家来到英国，在一座废弃的寺院内，发现了中古时代文书的一个窖藏。他贿赂这里的看守人，把这些东西拿出来运到北京去，那时我们将作何感想①。”

众所周知，敦煌遗书发现后不久，甘肃学政叶昌炽就建议当局全部运到兰州保管。后因运费无力筹措，才于1904年命令敦煌县府先行检封，并由王道士就地保管。“从法理上说，从那时开始，这批文物已是中国政府的财产，王道士是无权出卖的。斯坦因若不知底细，误买了，乃是买了赃物，事发之后，仍应交出。何况斯坦因不仅明了王道士无权卖，实际上根本是他和蒋孝琬‘说服’王道士演出这幕‘监守自盗’的②。”

当然，斯坦因是付了一些钱，但并非是他自称的那样“公平”，因为他只付了200两银子。斯坦因明白，这是低得近乎荒谬的价钱，在把东西运抵西安后，他就得意地给朋友写信说，这批文物只花了130英镑，买一个梵文贝叶写本和一些古旧物品就要这些钱了③。

斯坦因在中国所窃去的全部收藏品，按照资助他的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之间在其出发前所签署的分配方案，写本部分，凡用汉文、粟特文、突厥文和回鹘文书写者，归英国博物馆保存；凡用于阗文、龟兹文、藏文书写者，归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保存；梵文写本，用佉卢文书写者归前者，用婆罗谜文书写者归后者。其它发现品如钱币、绘画等，在印度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和英国博物馆之间平分。但斯坦因回国后却改变了分配办法：为了研究方便，文书部分归大英博物馆收藏，印度方面只取若干样品；图画部分

---

①转引自《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75页

②金荣华《斯坦因—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

③1906年10月14日斯坦因致艾伦函。参阅金荣华《斯坦因——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

归印度博物馆所有，大英博物馆只取若干作样品。据有的学者检视两地博物馆所藏斯坦因所窃各物，“发觉大英博物馆所谓的留取若干，实际上是尽取精华；印度博物馆的留取若干，则无论质量，都无足轻重[1]”。1973年，英国图书馆东方部与英国博物馆分立，保存在原博物馆东方图书与写本部中的斯坦因所获文献，移入了新建的英国图书馆藏书楼保存。

关于英国所藏敦煌遗书，长时间不知其详细情况和数量。1954年，英国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将所藏敦煌卷子制成缩微胶卷公开出售，这套胶卷共收录了6980个卷子，它不仅未包括古藏文及其他民族文字的卷子，就是汉文卷子也是不完全的。1957年，翟理斯编成了《大英博物院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该目录共收录了8102个敦煌汉文卷子，但并没有完全反映英国所藏敦煌汉文卷子的收藏情况。“英国图书馆流水帐式的草目现在标号到S·11604为止，实际上，还有数百片不到一尺见方的小碎片从来就没有编过号[2]”。由此可知，英国所藏敦煌汉文卷子约12000卷。

英国所藏的敦煌古藏文和其他中亚古民族文字的卷子，原来估计总数约2000余卷[3]。根据近年来的统计、调查，估计总数可达3000卷左右。这样就可以确定，英国所藏敦煌遗书共有15000卷左右。

四、“汉学大师”取菁华

斯坦因捷足先登后，紧接着来了法国人伯希和。由于伯希和是世界上著名的汉学家（“汉学”又称“中国学”），所以盗去了

---

①金荣华《斯坦因—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

②荣新江《欧洲所藏西域出土文献闻见录》，载《敦煌学辑刊》1986年1期

③参阅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后记》

敦煌遗书中最菁华的部分。

1、法国的“汉学”研究

保罗·伯希和于1878年出生于巴黎，父亲是商人，兄弟七人，他排行第三，中学毕业后入法国汉学中心之一的现代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汉语，并成为法国中国学权威沙畹的高足和追随者，投身于中国学研究的行列。1899年被选拔为印度支那古迹调查委员会的寄宿生，到了河内。1900年，该会改为法兰西远东学院，伯希和成了该院的首批成员。1900年2月，他被派来我国北京，为法兰西远东学院图书馆和博物馆收集藏书。当时正值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侵入我国北京的混乱时期，伯希和利用这一时机在北京骗购了一批我国古籍和文物，其中有原版的《图书集成》、明版的《道藏》及藏文和蒙文的《甘珠尔》。以后他又多次从河内到我国骗购古籍。

1904年伯希和回到法国，不久又返回河内。这时，欧洲及俄国的一些“考察家”、“探险家”纷纷涌入我国西北地区，连续发现了许多古代遗址，并窃走了我国大量的稀世珍宝。对此，法国的中国学研究者，十分眼红，也不甘落后。于是由法国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以及亚细亚学会出面，组织了一个“考察”我国西北地区的法国考察团，伯希和被选拔为这个考察团的团长。

法国组织考察团，并派伯希和来我国西北地区“考察”，是与法国国内中国学的发展分不开的。欧洲人对中国的全面了解，最早来自于《马可波罗游记》。到了十六世纪后半叶，葡萄牙、西班牙人相继来到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在进行其所谓“商业”活动的同时，写了许多有关我国的著作，如《中华大帝国史》、《中国耶稣基督教的起源》、《鞑靼史》、《中国新地志》、《中国最早期的历史》等等。这些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地理和语言，很快在欧洲流行起来，引起了欧洲人研究中国的极

大兴趣，对欧洲汉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些著作在欧洲被译为各种文字，很快传播开来，其中尤以法文译本出版最快、最全。早在1588年，法国大作家和哲学家米凯莱·戴·蒙泰湟在校阅《中华大帝国史》的法文译本时，就曾写道："尽管我们没有接触中国，也不了解它，中华帝国的政体和艺术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我们。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该是多么辽阔而变化无穷，无论是我们的前人，还是我们自己，都没有彻底了解它①"。十七世纪，法国有人把孔丘奉为"哲学之王。"由此可知，法国的知识分子一接触中国，就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因此，到了十七世纪末，欧洲的汉学中心就由意大利移到了法国。

十九世纪时，法国的汉学研究有了新的发展。1814年法兰西学院设立中国学讲座，这是西方高等院校第一次把中国学列为正式学科。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也开始讲授汉语。同时在法国还出现了一批专职的汉学研究者。

法兰西学院中国学讲座的第一个主持者是雷慕沙。到了1893年，由沙畹主持法兰西学院的中国学讲座，从此以后，法国的汉学研究更是大放异彩。沙畹一生培养了许多汉学专家，其中有三位成绩最为卓著，即伯希和、马伯乐和葛兰言②。

2、伯希和敦煌劫宝藏

伯希和的"考察团"只有三个人，除他之外，还有负责测绘地图、采集博物和其他自然科学标本的路易·瓦兰博士，另一个是远征队的摄影师查尔斯·努埃特。

---

①《戴密微汉学论文选》，1971年荷兰莱顿出版。转引自杨建新、马曼丽《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8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②参阅杨建新、马曼丽《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

1906年6月17日，伯希和率领的考察团离开巴黎，搭上火车经由莫斯科前往塔什干，然后经俄国中亚进入我国。路途中伯希和学会了突厥文，熟练了俄语。

同年8月底，伯希和到达我国喀什。在喀什，他们居住在俄国的总领事馆内，同时，还对当地官员进行了外交上和礼节上的拜访与问候。六个星期后，他们到达库车，考察了这里的几座佛教石窟，在库车东面的马槽地，发现了一批梵文和龟兹文写本、龟兹文木简以及印玺、古钱和商队通行证等。

伯希和考察团在库车共进行了八个月的考察，收获颇丰。库车考察之后，他们就转移到乌鲁木齐，以便补充生活必需品，准备越过沙漠前往敦煌。这时，他们还不知道敦煌藏经洞发现遗书之事，更没有听说斯坦因对敦煌文物的劫夺。只是计划去敦煌进行拍照，并研究千佛洞的壁画和塑像。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伯希和得到了敦煌发现藏经的消息。当他们在乌鲁木齐停留时，伯希和遇见了一个清廷某宗室的兰公爵。此人原是北京警察总监，义和团运动时期在北京与伯希和等外国侵略者相互为敌，后来被终生流放到乌鲁木齐。伯希和后来写道："在1900年，我们彼此之间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宿怨已早冰释，我们借着饮酒谈心，重温旧谊①。"这个时候，伯希和在乌鲁木齐街头已听到了传说，在千佛洞发现了一个藏着手稿的秘密洞窟。这个被流放的公爵拿了一份据说是来自敦煌的手稿让他看，"伯希和刚一打开这个卷子，他就认出了这是八世纪以前的东西②。"伯希和见到这个卷子后，大为惊喜，于是急迫地离开了乌鲁木齐，马不停蹄地兼程东行，往敦煌飞跑而去。

---

①转引自《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81页

①转引自《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81页

1908年初，伯希和一行终于到达敦煌。这时藏经洞的门紧紧锁着，王道士不在千佛洞。但伯希和不甘于在寂寞中等待，不久就在市镇上找到了王道士。这时，伯希和还不知道斯坦因已在一年以前从这里盗走了大量经卷，所以根本没有提到斯坦因。这对王道士来说，无疑是吃了一颗定心丸，说明斯坦因是信守誓言的。“他发现这些‘洋鬼子’对于这项秘密，都能守口如瓶，使他感到非常放心。而且他已经开始用斯坦因的捐献来进行他的修复工作。当前，无疑是他寻找另外一笔捐助的时候了①。”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努力，王道士才允许伯希和进入密室。当然，和斯坦因相比，伯希和已很顺利了。3月3日，伯希和进入藏经洞后，“惊得呆若木鸡”。据他粗略地估计，洞内的手稿大约在一万五千至二万之间。伯希和在其《敦煌石室访书记》中说：“（1908年）3月3日侵（清）晨，入此扃秘千年之宝库。发露迄今，已逾八载，往来搜索，实繁有徒，藏弆之数，意必大减。迨入洞扉，令人警愕！洞之三隅，积累之深达二迈当又五十，高过人身。卷本二三大堆，至巨大之藏文写本，则与版挟之，堆置洞隅②”。如果要将每个卷子都打开，并进行适当翻阅的话，至少也得花六个月时间。伯希和自己说：“余私自忖度：洞中藏弆，尽加展览，其事至繁，然欲悉其内函，考其关系之轻重，又不得不每卷展开③”。因此他并没有犹豫，立即作出决定：“一定要把整个书库检查一下，那怕是粗略的检查也好。”“至少我必须打开每一件，认识一下它的性质，同时看一看，它是否提供过任何新的东西④。”

---

①《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82页

②转引自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10页，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

③伯希和《敦煌石室访书记》

④《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82页

伯希和在藏经洞内进行了整整三个星期的挑选。在挑选中，他把卷子分为两堆，一堆是其中的菁华，不论多么艰难，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弄到手；另一堆为凡品，也是需要的，但不是必不可少的。在挑选中，他还经常偷拿其中的精品。瓦兰说："他的外套里塞满了他最喜欢的手稿……。有一天晚上，他拿给我们看的是一份圣约翰斯托里福音；另一次，他拿来一份有八百年历史的描写一个奇异小湖的文稿。该湖位于敦煌之南的很高的沙丘上。再一次是一份有关这个寺院的帐目①。"经过每天大约一千份的紧张挑选后，伯希和基本上将石室遗书检查一过，他说："我并没有放过任何一件主要的东西。我不但接触了每一份手稿，而且还翻阅了每一张纸片——天知道，共有多少断片碎页……②。"

挑选工作结束后，伯希和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征得王道士的同意，把挑选出来的手稿卖给他。为此，伯希和与王道士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了多次会谈。瓦兰在回忆中说："会谈的结果是，我们自己也必须在极端保守秘密的情况下才能提到有关发现书库的事，即使在我们的信件里也必须如此③。"在伯希和保守秘密的前提下，王道士最后同意了这笔交易，其代价是伯希和仅仅付给他五百两白银（约90镑）。伯希和将所得到的文物仔细包装后，就用船舶运往法国。"只是当努埃特带着满装我们的选品的箱子上了轮船之后，伯希和才公开地谈到这些东西，并携带着一箱手稿的样品前往北京④。"

在伯希和盗劫藏经洞遗书的同时，还让努埃特拍摄了数百幅黑白照片，给莫高窟当时已发现的所有洞子都照了相，共376幅，

---

①转引自《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83页

②转引自《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83页

③《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84页

④《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184页

这些图片共有六大本，以《敦煌的洞窟》为名，于1920年—1924年在巴黎出版。这是关于敦煌佛教艺术图录的最早出版物，对我们今天研究敦煌石窟艺术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这是因为在伯希和离开敦煌几年之后，当白俄士兵被拘留在那里时，千佛洞的石窟艺术曾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另外，伯希和还详细查看了千佛洞的洞窟，对每个石窟都作了描述，特别是详细记录了洞窟中的壁画题记。“他沿着石窟的内壁反复察看，清理了全部可以解读的题识，并且还仔细研究了全部画面。”在他的考察笔记里，“除了记载有关每个石窟的位置及其在整个石窟地区的分布方位外，还指出了每条题识、每幅画面、每尊彩塑和每座石碑的具体位置。对洞壁和洞顶的内容也常常进行考证。有时候，某些内容无法进行精确的考证，则可借助于题识来进行解释。当遇到复杂的组成情况时，作者还画了草图以说明画像的布局，这种周密的考虑大大方便了后人对各种场面的理解。”

伯希和除了对壁画的描述之外，还很详细地记录了洞窟中的各种题识，如带有各种神像名称的题识、佛经或变文中的摘录以及用不同文字（蒙古文、回鹘文、婆罗谜文）所刻写的题识。长期以来，由于莫高窟不断遭受人为的和自然的破坏，洞窟的许多题记已模糊不清，甚至什么也看不见，因此，伯希和的这些记录，就成了很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是研究敦煌学，特别是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

正是由于伯希和在敦煌的考察笔记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所以引起了敦煌学研究者的关注与重视。从1981年开始，法兰西学院亚洲研究所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以《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

---

①（法）旺迪埃—尼古拉《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第一卷序言，耿升译文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4年2期

为名，陆续刊布这些笔记，到1986年，已出版了五卷，估计一共要出版六卷。《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的每卷开始部分都是旺迪埃——尼古拉写的序言和莫尼克·玛雅尔夫人写的前言，并附有伯希和、张大千、史岩和敦煌艺术研究所各家对敦煌石窟的编号对照表及其时代。每卷笔记的第一部分都是整理后的排印文字，第二部分是手稿的影印件，最后附一批伯希和当时拍摄的千佛洞外貌及各洞壁画的大幅照片图版。

3、菁华犹在巴黎藏

伯希和盗劫的敦煌遗书共约6600卷，其中古藏文卷子2700卷，非藏文卷子3900卷，全部收藏在巴黎国民图书馆。

伯希和来敦煌盗劫遗书，虽比斯坦因晚一年，但比斯坦因有着更优越的条件。他懂得汉文、俄文、藏文、突厥文等十多种文字，特别是他多次来中国，并于1902——1904年在法国驻华使馆任职，对汉文尤为熟悉，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著名的汉学家。正是由于伯希和的汉学知识渊博，所以，他窃去的敦煌遗书，在数量上虽然没有斯坦因多，甚至还没有俄国人盗走的多，但却是敦煌遗书中最菁华的部分，其中有许多孤本。

敦煌遗书中标有年代的卷子本来不多，却大部分为伯希和所得。据有的学者统计，在伯希和原编的2700号草目中，标有年月的有515件，占19%，即将近五分之一；斯坦因所窃部分，有年月的卷子占4.3%，不到伯希和的四分之一；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年月的卷子仅占0.58%，是伯希和的三十二分之一；苏联所藏敦煌遗书中，有年月的卷子为1.36%，是伯希和的十四分之一。“人所共知，卷子上的年月记载完整多半表示卷子的首尾较少残缺，有纪年的卷子对于科研的价值自然大为增高。只

此一端，人们也可以体会巴黎所藏卷子的重要性①。”

敦煌遗书中的佛教卷子约占90%以上，所以有人称敦煌遗书为佛教遗书。世俗文书，即直接关系社会政治经济的非佛教经典，数量很少，但伯希和盗去的卷子中这部分的比重却很大。目前法国所藏的世俗文书数量最多，研究价值最大。据统计，现在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95%以上为佛经卷子；英国所藏的佛经卷子约为85%；苏联所藏的佛经卷子也为85%；而在巴黎所藏的3900卷汉文卷子中，佛经仅占65%左右，约为2500卷②。由此可知，伯希和所盗的敦煌遗书，佛经的数量最少，世俗文书的数量最多。现将巴黎所藏敦煌遗书，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1）《水部式》

《水部式》编号为P·2507，是研究唐代水利灌溉和水上运输的重要著作。此卷首尾皆残，没有书题。早在二十年代，罗振玉就将此卷影印入《鸣沙石室佚书》之中，并撰有详细跋文。“检宋本《白氏六帖》卷二十二（水田类）引《水部式》：‘京兆府高陵界清白二渠交口，置斗门堰，清水恒佳为五分，三分入中白渠，二分入清渠。若雨水边多，即上下用水处相开放，还入清水。三月六日已前，八月二十日已后，任开放之’云云，正在此卷中，知此书为《水部式》也。……有唐初叶，式凡四修：曰永徽，曰垂拱，曰神龙，曰开元，此卷不知属何时矣③。”首次确定了《水部式》的篇题。其后，日本学者仁井田升、那波利贞也对《水部式》残卷进行了研究。仁井田升根据《水部式》中的京兆府、河

---

①张广达《国外近年对敦煌写本的编目工作》，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12期

②参阅周丕显《敦煌佛经略考》，载《敦煌学辑刊》1987年2期

③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20页，转引自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126页，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南府等地名，确定现存《水部式》的制作年代为开元十三年以后的开元年间。北京大学《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三集发表了王永兴先生的《敦煌写本唐开元水部式校释》，将该写本全文发表，并利用大量资料进行了详细校释，是目前所见最好的校录本。

（2）《沙州都督府图经》

该写本编号为P·2005、P·2695，唐代的沙州，约当今天的敦煌，《沙州都督府图经》就是一部唐代敦煌的地方志。它保存了中古时代有关敦煌历史、社会、地理、文学、宗教、自然资源、中西交通等方面，如河流、水渠、池堰、古城、学校、殿堂、歌谣、祥瑞、驿站以及北凉、西凉史事等多方面的丰富资料，从未为类书、史书、史注所征引，有极大的史料价值。

此卷首尾残缺，伯希和曾考为《沙州记》。1909年罗振玉借得伯希和所印该卷照片，易名为《沙州志》，收录在《敦煌石室遗书》中。1913年，罗振玉又认识到它是唐代的“图经”著作，又易名为《沙州图经》，收入《鸣沙石室佚书》中。1916年，伯希和在通检其所窃敦煌遗书时，发现P·2005残卷，内容与《沙州图经》基本相同，而此卷（P·2005）末尾有“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字样，至此，才知道P·2695与P·2005都是“沙州都督府图经。”

（3）《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编号为P·3532。该书发现后，罗振玉即据照片校录，收入《敦煌石室遗书》中，并撰有《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校录札记》：“此卷首尾残缺，楮纸写本，每行自二十七字至三十字不等，记周游五天竺行程，及国土、宗教、物产、民风。初不省其书名及作者之姓氏，检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百有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就其《音义》，证以此卷，合者凡十五条，其次第并与此

符，知此即《慧超传》矣①。”首次确定了该卷的篇题和作者。1912年，日本著名东方学家藤田丰八根据罗振玉的刊本，用汉文写出了《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证》，对这部行记进行了详细的考定，至今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的记述比较详细，可以与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互为补充，学术价值很大，是研究中西交通史、中亚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4）《众经别录》

该卷编号为P·3747。它是我国现存第一部最古佛经目录，也是仅次于《汉书·艺文志》的第二部最古目录。约在1937年至1938年初之间，王重民先生在巴黎得见P·3747号原件，将其摄制照片带回国内。1948年12月，北京大学纪念建校五十周年，由向达和王重民主持举办“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敦煌考古工作展览”，展出此卷照片。其《展览概要说明》内记载：“P·3747，六朝写本，存九十七行。据《历代三宝记》，知为刘宋时所撰《众经别录》，为今存经录之最古者②。”这是《众经别录》残卷以照片形式在国内首次公开露面。1951年，苏晋仁先生依据周叔迦先生所藏照片，写成《敦煌写本〈众经别录〉残卷》，③首次公布了该卷录文。

1956年7月，王重民先生为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的重版作“后记”说：“原卷首尾残缺，没有原来的书名，仅有书内的‘类目’名称：‘三乘通教经录’第二和‘三乘中大乘录’第三。按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五所记的《众经别录》类目，第二、第三正是这两个类目，还记‘三乘通教录’著录的佛经是

---

①转引自《敦煌古籍叙录》267页

②转引自白化文《敦煌写本〈众经别录〉残卷校释》，载《敦煌学辑刊》1987年1期

③载《现代佛学》1卷7期

‘五十一部，九十七卷’，残卷所载的也正是五十一部。所以，可以断定这个残卷就是《众经别录》的残本。”从其内容可知，其“残存部分是《众经别录》第一卷中的中间部分①。”

敦煌写本《众经别录》所著录的佛经，都有简略的解题。解题内记载着译人和译时，尤其是还极其扼要地揭示了佛经的宗旨和体质，这是后来的佛经目录所没有的。这一种体例是我国古代目录学遗产中的新发现，值得重视与研究。

伯希和最后于1909年10月24日回到巴黎，其后他立即与老师沙畹等共同研究他所带回的文书。并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上发表了《甘肃发现的一座中古书库》，详细介绍了其盗劫敦煌遗书的经过。同时，伯希和还着手编写所窃敦煌遗书的目录。二十年代初他就把其中的一部分编成了一本目录，共著录了1532个汉文卷子，即从2001——3511号，以及从4500——4521号，在六十年代以前，这个目录一直是我们参考巴黎敦煌遗书的一部最好、最有用的目录。为什么伯希和的目录从2001号开始呢？这是因为他所窃遗书中有许多藏文卷子，当时估计有二千卷。故2000号以前的序号是他生前留给藏文卷子的估计数字。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伯希和于1914年应征入伍，整理、研究敦煌遗书的工作暂时停顿。大战期间他曾出任法国驻北京公使馆武官，1918年回到西伯利亚。战争结束后，他又回到巴黎，在法兰西学院工作，该院专为伯希和开设了中亚语言、历史和考古学讲座。1921年5月6日，被选为法国碑铭与古文字学院院士。1927年，巴黎大学成立高等汉语学院，伯希和被任命为中国语言学、文字与艺术教研室教授。从1932年起，伯希和又负责主编关于远东研究的重要刊物——《通报》。1935年，他出任法国亚细亚学会主席，并担任苏联列宁格勒科学院的院士。1939年，

---

①转引自白化文《敦煌写本〈众经别录〉残卷校释》

被聘请为中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支持盟军，反对希特勒的侵略战争，于1945年10月26日因患癌症死去。

五、姗姗来迟的桔瑞超

当英国人、法国人都来敦煌盗宝时，日本人也不甘落后，便组织了大谷光瑞考察队，来我国西北盗劫文物。

1、大谷光瑞与西北考察

早在1899年的罗马第十二届东方学会议上，就决定成立中央亚细亚探险的国际组织。1902年，在德国汉堡召开了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会议，到会者有英、法、德、俄等国专家。斯坦因在会上报告了和阗发掘经过，各国会员决定成立国际中亚及远东探险协会总会，由各国派遣探险团体到中亚及远东各地探险。在这两次国际会议上，许多国家的学者还公布了中亚考察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引起了各国学者的极大兴趣，从而使我国西北地区更加成为东方学家和探险家们注目的地方。各国组织的考察团、探险队，不断来我国西北地区，由此形成了一股争相考察中国西北的热潮。对此，日本人也不甘寂寞，便由当时正在英国留学的大谷光瑞组织考察队，来我国西北进行考古发掘。

大谷光瑞是日本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的第二十二代长老。1900年他到英国伦敦留学，对欧洲人在我国西北地区考察的成果比较了解。在两次国际东方学会议的影响下，大谷光瑞决定组织考察队，到我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探险，使日本人也跻身于这个考察中国西北的热潮之中。

大谷光瑞共组织过三次考察。虽然他自己只到我国新疆南部很少一部分地区进行过很短时间的考察，而且到敦煌盗劫宝藏的

也是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但由于这三次考察都由他组织，所以人们习惯上也就把这三次考察统称为大谷光瑞考察队了。大谷光瑞考察队反复、重点考察了古佛教中心于阗、库车一带的千佛洞，以及敦煌、吐鲁番等佛教遗址，窃去了大批敦煌、吐鲁番文书。

1902年8月，大谷光瑞在英国伦敦组成由渡边哲信、堀贤雄、本多惠隆、井上弘圆和他自己在内的五人考察队。他们在于阗、库车一带进行了考察发掘，并游历了焉耆、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然后经甘肃河西走廊，于1904年东返日本。

三年以后，大谷光瑞又组织了第二次考察团，实际上这个考察团只有两人，即桔瑞超和野村荣三郎。桔瑞超当时刚满十七岁。1908年6月，他们二人从东京到达北京。在北京准备了两辆马车，雇请了两个仆人和两个马车夫，就直奔西北而来。他们考察了吐鲁番、罗布泊、楼兰、尼雅遗址，绕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一周。1909年11月他们二人在克什米尔与大谷光瑞会合，桔瑞超随大谷到伦敦，结束了第二次考察。

大谷光瑞带桔瑞超到伦敦后，即开始筹划第三次考察。次年，大谷光瑞派桔瑞超和一个英国随从霍布斯二人来我国，他们经俄国彼得堡，于1910年10月到乌鲁木齐。桔瑞超在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古墓群进行挖掘后，于12月到达罗布泊地区，又考察了楼兰遗址。1911年初，霍布斯因天花病死于喀什，桔瑞超安葬了霍布斯后，又转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以南的于阗，继续进行考古发掘。

这时，中国国内的局势也十分吃紧。日本人很久没有听到桔瑞超的消息，其下落如何不得而知，甚至有人传说他已死在中国。对此，大谷光瑞十分担心，便于1911年5月专门派遣吉川小一郎到敦煌寻找桔瑞超。吉川于同年十月到达敦煌，在敦煌没有得到桔瑞超的任何消息，他就给若羌的官员写了一封信，打听其下落。当时正值桔瑞超翻越昆仑山失败，只好沿着塔克拉玛干大

沙漠南缘向甘肃前进。当他走到若羌时，看到了吉川小一郎寻找他的信，便立即日夜兼程，前往敦煌。1912年元月，桔瑞超与吉川小一郎会合于敦煌。他们两人曾在千佛洞滞留了将近八周的时间，曾在莫高窟428窟和444窟署名留念，对敦煌石窟进行了大量摄影和调查，并从王道士的密室中得到了大约六百份卷子。桔瑞超带着所窃取的宝物经过乌鲁木齐，再次改乘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快车，离开中国回日本了①。而吉川小一郎留在我国继续考察，他在新疆地区进行考察后，于1914年月2月又专程来过敦煌，然后转道回国，结束了大谷探险队对我国西北地区的第三次考察。

2、日本的敦煌遗书

日本所窃去的敦煌遗书，到底有多少？由于日本没有公布所藏敦煌卷子的详细目录，特别是由于其收藏分散，有的已与吐鲁番文书相混，不大容易分别，因而其数量一直模糊不清。目前所能见到的收藏目录有：《日本大谷大学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目录》，计34卷；《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目录》，计7卷；《日本人中村不折所藏敦煌遗书目录》，计164卷；《日本诸私家所藏敦煌写经目录》，计185卷；《日本未详所藏者敦煌写经目录》，计105卷②；《日本桔瑞超氏敦煌将来藏经目录》，计429卷③。这些目录所记载的敦煌遗书约1000卷。

大谷考察队所获敦煌文物，当时主要收藏在龙谷大学、旅顺博物馆和南朝鲜的汉城博物馆。据1986年《东洋文库》报道，大谷光瑞由于不善理财，使西本愿寺的金库现业银行严重亏损，负债额高达五百余万之巨，由于寺院财政上的亏损，大谷光瑞不得不于

---

①参阅杨建新、马曼丽编著《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②以上目录见《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遗书散录》

③见罗振玉《雪堂丛刊》

1914年4月11日引咎辞去西本愿寺法主职位，并变卖二乐庄和在我国西域盗掘品来处理善后。现南朝鲜汉城博物馆所藏所谓大谷文物，就是大谷光瑞卖给当时朝鲜总督府的文物。1916年《考古学杂志》、《大阪每日新闻》、《京城日报》、《朝鲜汇报》都报道了两千余件西域历史文物即将到达当时朝鲜总督府和于1916年9月10日在朝鲜总督府博物馆展览的情况。

现存旅顺博物馆的大谷文书是大谷光瑞寄存于当时关东厅的。由于日本气候潮湿，不便保存，将它由二乐庄寄往旅顺保存的。旅顺博物馆本是1917年设于旅顺的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于1918年改称博物馆。1919年因关东都督府改制，故称关东厅博物馆。1934年因关东州和厅分立，又改称旅顺博物馆[①]。

龙谷大学所藏西域文化资料，以佛教经典类为最多，此外还有古文书（汉文、胡语、胡汉两种语言的文献）、绘画、雕塑、染织品、古钱、印本、木简、植物标本及其他杂品等。

龙谷大学图书馆所藏大谷探险队带来的西域出土文书，由于来自大谷探险队而习惯上称之为“大谷文书”。1948年10月大谷光瑞去世，在西本愿寺整理其遗物时，从仓库中发现了一个长方形木箱，这些大谷文书就是和经卷、贝叶绘画、拓本、木简、钱币、布片、陶器等一同收藏在这个木箱中的。1949年春，按照大谷光照门主“希望对古文书进行综合性调查研究”的嘱咐，立即将这一系列的资料，移交给了龙谷大学图书馆。为此，龙谷大学图书馆于1966年建成了专门收藏珍贵图书的书库——“龙谷藏”。现在，“龙谷藏”中的大谷文书，已全部附上了整理号码，即从1001—8147号。全部文书分为五组：第一组是汉文及回鹘文资料，编号为1001—5840号；第二组是藏文书写的残片，编号为

---

①参阅镇姜庆译《南朝鲜汉城博物馆藏大谷发掘品目录和旅顺博物馆藏大谷文书目录》，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6年2期

6001—6070号；第三组文书全是西域古代文字断片，其中大部分也是回鹘文资料，编号为6101—6434号；第四组是胡、汉两种文字的文献，这些文书都是在纸的正面用汉文书写（几乎全是佛经），纸的背面用回鹘文、梵文、佉卢文、突厥文、粟特文书写，编号为7001—7550号；第五组是《西域考古图谱》所发表文书的一部分，编号为8001—8147号。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这组文书中的8001—8039号的39件文书，皆为李柏尺牍稿残片。此外，龙谷大学西域文化研究会还从桔瑞超那里接受了一批文书，这些文书被统称为“桔文书”。其内容由佛经13件、汉文文书13件、西域文字资料19件共45件组成。另外还有大约六百片碎片未经整理。这些大谷文书，大部分来自吐鲁番①。

大谷探险队所攫取的一部分文物，后来编成《西域考古图谱》二册，于1915年出版。考察队队员的部分论文、调查记等汇编为《新西域记》二册，于1937年出版。桔瑞超将其个人窃去的文物辑成《二乐丛书》，分四册出版。当龙谷大学得到大谷文书后，便于1953年1月组成了龙谷大学西域文化研究会，并接受了文部省拨发的研究经费，研究会由龙谷大学校内外二十几名研究人员组成，分成佛教、历史、胡语、美术四个部门，从而推动了各个领域的研究。1958—1962年间，陆续出版了《西域文化研究》六卷七册②，即第一《敦煌佛教资料》、第二、三《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资料（上下）》、第四《中央亚细亚古代语文献》、第五《中央亚细亚佛教美术》、第六《历史与美术的诸问题》。这套书收集了数十位日本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论文，是对大谷光瑞探险队三次考察活动在佛学、历史、考古、地理、文化、美术等

---

①参阅（日）小田义久撰，李德龙译《关于龙谷大学图书馆所藏大谷文书》，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5年2期

②参阅（日）小田义久撰，李德龙译《关于龙谷大学图书馆所藏大谷文书》

方面最有价值、最全面的介绍和论述。被学术界誉为包括敦煌学在内的日本中亚研究的金字塔。

在《西域文化研究》出版之前，西域文化研究会还于1956年3月编制了《大谷探险队带来的西域出土古文书目录·社会经济关系其一》，又在同年7月编制了该目录的《社会经济·其二》。关于这些目录编纂的动机，小笠原宣秀在该目录的序言中说："龙谷大学所藏的古文书，究竟有些什么内容？这是学者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因此，在一方面进行彻底的个别研究的同时，现在又编成了这个尽管有些不充分的《古文书目录》以回答学者们的问题①。"

据1979年4月10日发行的《龙谷大学广报》第二号介绍，"西域出土佛典研究"组计划整理一千件正面是汉文佛典背面是维吾尔文书的断片并编成目录，出版敦煌出土佛典中价值较高的佛典图版并附解说，出版大谷光瑞携归的尼泊尔梵文写本及其研究。此外还将出版《西域考古图谱》中的《佛典及佛典附录》、大谷所藏《无量寿经》梵文四种，敦煌出土写经和尼泊尔梵文写本悉达太子修道因缘、本草集注第一序录等。"大谷文书整理研究和总目索引"组则计划出版李柏文书、土地买卖文书、长寿二年张怀寂告身、甘凉瓜肃所居停沙州逃户文书、土地给否文书、均田文书、河西诸官请领笔纸墨牒等②。

六、不甘落后的鄂登堡

当斯坦因、伯希和、桔瑞超等纷纷来敦煌盗宝时，俄国人也不甘落后，积极筹措，前来"分享"珍宝。事实上，早在1879

---

①转引自（日）小田义久撰，李德龙译《关于龙谷大学图书馆所藏大谷文书》

②参阅那向芹《日本的敦煌学研究概况》，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9期

年，沙俄军官出身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在第三次中亚探查行记中，就已经提到千佛洞；罗波洛夫斯基在1893—1895年探查报告中也简略提到了千佛洞，而沙皇俄国劫掠敦煌遗书的代表人物则是鄂登堡。

1、组织考察的“俄国委员会”

鄂登堡对敦煌遗书的劫夺，是在所谓的“俄国委员会”①主持下进行的。

“俄国委员会”是号称研究中亚及东亚的俄国委员会的简称。原来，1899年10月在罗马举行了第十二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会上，俄国东方学家拉德洛夫介绍了克列门兹在吐鲁番的盗掘活动及所劫走的文书，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垂涎。会上，一些人“吁请”俄国政府及有关机构继续进行克列门兹的工作。拉德洛夫遂向大会提出了建立一个国际协会的提议。他的提案被通过，于是决定成立“中亚和远东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研究国际协会，”而以彼得堡俄国委员会为协会的中心委员会。俄国学者受委托拟订协会的章程草案。1902年在汉堡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批准了这一章程草案，并由拉德洛夫和鄂登堡负责筹组俄国中心委员会。1903年2月，俄国委员会的章程草案经沙皇批准生效，俄国研究中亚及东亚委员会遂告成立，并由俄国财政部拨款五千卢布作为经费。

“协会”以及它的“俄国委员会”的出现，是西方殖民政策的产物。早在十九世纪中叶，英、俄帝国主义者利用新疆境内发生的少数民族起义，企图进一步阴谋染指我国西北边陲，因此就

---

①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俄苏中国学手册》119—12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姜伯勤《沙皇俄国对敦煌及新疆文书的劫夺》，载《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3期

需要了解我国西北部的地理和历史。而沙俄军队对伊犁地区的侵占，则有助于俄国学者、商人、军官、旅行家自由进入这一地区，其他经过中亚和中俄边疆前往中国西北部的外国人也都需要得到俄国方面的协作，而俄国人也需要外国学者的研究作为交流，这就是成立国际中亚和远东协会及其俄国中心委员会的背景。正如日本敦煌学家金冈照光所指出的那样："俄国南进要求海港"，英国人也向中亚挺进，"以与俄国对抗"，"这种中亚探查的流行，是十九世纪后半列强政治意图的结果，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①"。于是沙俄政府以"科学考察的赞助者"的姿态出现，协助其他各国学者到中国西北考察。沙皇政府的眼前目的，显然就是"与学术界分享资料②"。这样，所谓"俄国委员会"，就成为沙俄政府插手的在中国西北等地窃取科学情报的前哨组织。

"俄国委员会"是这样一个组织，即会章所申明的宗旨："团结研究远东和中亚的俄国学术机关的代表们和（政府）各部的代表们，从而比负有更广泛任务的其他学术机构更能积极地从事有关中亚和东亚的研究工作。"就是广泛利用有学术兴趣的学者们的力量以组织一支专门队伍为帝俄侵略中国西北地区完成学术研究的任务。会章第一条规定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是研究现存古迹，向当地人士和机构探明，首先应该研究那些古迹，在不远的将来应对那些民族作语言学和民族学方面的研究，以便进行"科学上的抢救"。所谓"抢救"，实质上就是盗掘、抢劫由于气候特殊而保存下来的古代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等稀世文物和刺探各种情报。委员会的人员组织也十分明显地证明它是帝俄政府一手策划的以学术为幌子的殖民主义先遣队。会章规定，委员会由科

---

①（日）金冈照光《敦煌的民众——其生活与思想》21页，转引自姜伯勤《沙皇俄国对敦煌及新疆文书的劫夺》

②达布斯《中国土耳其斯坦探查发现史》，黄振华译为《新疆探查史》

学院、彼得堡大学东方系、考古委员会、地理学会、俄国考古学会及宫廷事务部、外交部、陆军部、财政部、国民教育部、内务部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并置于外交部的直接管辖之下。外交大臣有权确定委员会成员及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和两名秘书的人选。委员会成员中宫廷事务部的代表是俄国殖民政策最积极的推行者乌赫托姆斯基公爵，陆军部的代表是总参谋部亚洲处主任瓦西里耶夫少将。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是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系主任茹科夫斯基，秘书为巴托尔德院士和民族学家施坦贝格。重要的俄国东方学家都参加了委员会。

“俄国委员会”从1903年成立到1918年结束，其实质性活动是派遣个人和考察队进行考察。它策划了一系列在我国的“探查”活动，委员会发起人之一鄂登堡的两次中国西北之行也是由它派遣的。

2、鄂登堡与敦煌盗宝

鄂登堡（1863—1934年），是沙俄“汉学家”瓦西里耶夫院士的门徒。他1889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系，研究梵文和佛学。1900年成为沙俄科学院院士，1904年起任科学院常务秘书。1916年任亚洲博物馆馆长①。1917年，又在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中当过“教育部长”。他是劫夺中国敦煌遗书的主谋者和急先锋②。

早在1903年11月1日，协会就接受了鄂登堡“关于装备克列

---

①亚洲博物馆成立于1818年，是今天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前身。1930年5月，在亚洲博物馆佛教文化研究所、东方学家委员会和突厥语文学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该东方学研究所1960—1967年曾改名为亚洲民族研究所。1950年东方学研究所迁至莫斯科时在列宁格勒设立了分所。该分所于1956年在原东方学研究所东方手稿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

②参阅姜伯勤《沙皇俄国对敦煌及新疆文书的劫夺》

门兹领导的吐鲁番、库楚考古考察队的建议”，政府也赞同这一决定，并拨出一项专款用于考察。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使俄国大规模的中亚考察未能实现。

1908年，协会在皇室乡间行宫举办了一次有关东土耳其斯坦的展览，向展览会提供的艺术品和考古文物是俄国协会从边疆运抵的。这次展览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政府乃决定拨出专款用以组织到东土耳其斯坦进行新的考察，并委托鄂登堡制定一个更大范围和规模的考察计划。1908年12月16日，俄国协会就鄂登堡报告中拟定的研究计划和预算，决定组织一个以拉得洛夫为首，其中包括维谢洛夫斯基、克列门兹、鄂登堡、什切恩别尔格在内的筹备小组，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商讨。然后决定拨款85000卢布进行为期二年的考察。“而1909年只能拨出35000卢布，指派鄂登堡偕同杜丁和一个考古学家进行八个月的考察，第二年再派一个大一点的考察队，并预先从中国史料中收集有关古代地区的文献资料。”在1909年2月11日俄国协会的会议上，正式宣告政府同意这一计划。

1909年6月6日，以鄂登堡为队长的俄国考察队正式从彼得堡出发，其队员有画家兼照相师杜丁、矿业工程师兼地形测绘员斯米尔诺夫、考古学家卡缅斯基、考古学家助手彼特连柯。当考察队于6月22日到达楚古恰克后，鄂登堡又雇了一名翻译——霍托①。他们考察了喀什、吐鲁番和库车地区的古代遗存，盗掘劫走了大量考古文物，还进行了地形测量和绘图。鄂登堡就其考察结果在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的一次会议上作了简单报告。这次考察所劫取的文物和资料分存于爱尔米塔什博物馆②和东方学研究

---

①（苏）纳季洛娃《谢·菲·奥里登堡对土耳克斯坦和中国西部的考察（档案材料概述）》，续建宜译文载《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2期

②爱尔米塔什博物馆成立于1764年，所属东方部成立于1920年。鄂登堡对东方部的建立给予过积极支持。该部主要收集、整理和研究东方文物、绘画及其他文献资料

所档案馆。

这次考察结束后，鄂登堡于1910年4月5日在俄国协会的会议上对考察工作作了总结。会议遂决定：（1）在协会的《消息报》上刊登总结材料；（2）以协会的名义对考察队的全体成员以及给予帮助的人士致以谢意；（3）考察队运来的材料协会保有所有权。在10月2日的会议上，鄂登堡就搜集书籍、抄本、古物和民族学方面的文物情况作了演讲，并出示了考察队研究过的四本照片图册和古建筑的平面图图册。1914年，鄂登堡公开发表了考察的初步研究成果报告，这个报告作为科学著作被俄国考古协会授予最高奖赏——一枚大金质奖章。

由于鄂登堡在新疆考察中劫获了非常丰富的文物考古资料，使沙俄更加垂涎中国西北的宝藏。再加上英、德、法、瑞典等国考察队都相继来到中国西北盗窃劫掠，沙俄政府绝不愿居人之下，便对俄国委员会的拨款与日俱增，到1913年竟达十万卢布。因此，委员会于1914年5月又组织了规模更大的第二次考察队。

沙俄第二次考察队仍以鄂登堡为领队，成员除杜丁和斯米尔诺夫外，还有画家宾肯贝格、民族学家罗姆贝格及十名辅助人员和一名中国翻译。考察的地点是敦煌石窟。这是因为斯坦因、伯希和、桔瑞超等人都在敦煌劫获了大量珍贵文书，鄂登堡怎甘落伍呢？还在第一次新疆考察劫掠时，鄂登堡就对柯兹洛夫表示，他有前往敦煌的“宿愿”。现在得到了政府十万卢布的拨款，不是能够如愿以偿了吗！因此鄂登堡便于1914年5月率考察队来到我国敦煌考察劫掠。

鄂登堡到敦煌考察的借口是寻找对中国西北地区佛教艺术遗迹进行断代的可靠依据并鉴定其各种风格，其真实目的是劫夺千佛洞的稀世珍宝。为了劫夺、考察千佛洞，俄国协会组织了第二次赴中国西北的考察队。1914年3月29日，协会同意了由鄂登堡制定的为时一年的考察莫高窟方案，这次考察的基本目的在于全

面彻底研究古老的敦煌洞窟。而后，在完成预定目的的情况下，再前往吐鲁番绿洲，在那里一直考察到春天①。

俄国协会的第二次中国西北考察始于1914年5月1日，终于1915年4月底。在考察期间，俄国协会不时收到考察队在旅途和考察地寄来的工作情况报告，鄂登堡也定期给协会写信。他在1914年6月2日从楚古恰克寄给协会的信中，附有两件维吾尔抄本的片断。7月10日，信寄自乌鲁木齐，8月4日寄自哈密，8月30日寄自安西，6月3日和10月20日寄自敦煌，最后一封信谈的是研究结果。从6月3日到10月25日，鄂登堡致卢德涅夫的所有信件和电报都谈到了考察队的工作和队员动身出发时的情况，这些信件和电报都在1914年11月1日协会的会议上宣读过。

考察队是1914年8月20日到达千佛洞的。到达的前三天是总的参观，而后绘制平面图，制作壁画残片和记述洞窟情况、拍照。根据考察，他们确认“古代洞窟的凿成时间是1500多年以前，壁画保存至今是由于气候干燥之故”。千佛洞的考察一直持续到10月25日。10月25日这天，杜丁、斯米尔诺夫和宾肯贝格由于天气寒冷回到哈密，11月6日，他们由哈密返回俄国。鄂登堡则和罗姆别格留下继续搞研究，一直到1915年2月②。他们在敦煌期间，偷绘了443个洞窟的正面图，拍摄了二千多帧照片，劫走了多种壁画（片断）、布画、绢画、纸画、丝织品和写本。

鄂登堡考察结束后，于1915年5月2日在俄国协会的会议上，出示了照片资料、部分平面草图、在洞窟发现的供印刷用的维吾尔文活字，随后报告了研究的结果。就在这次会议上，协会

---

①参阅（苏）纳季洛娃《谢·菲·奥里登堡对土耳克斯坦和中国西部的考察(档案材料概述)》

②参阅（苏）纳季洛娃《谢·菲·奥里登堡对土耳克斯坦和中国西部的考察(档案材料概述)》

还接受了鄂登堡提出的建议，决定奖励那些顺利完成工作任务的考察队队员，在1915年10月24日的会议上，鄂登堡向协会提交了由罗姆贝格在考察期间、主要是在千佛洞中所完成的彩色图画，这些画还附有简短的文字说明。但是，由于鄂登堡及其考察团成员的旅行记及其他资料都未公开发表，收藏在苏联科学院的档案中，所以我们很难了解鄂登堡在敦煌的活动及盗窃遗书的详细情况。

苏联科学院院士费德林说，鄂登堡在敦煌盗窃的遗书，是其“借助于现代科学方法，在发掘1914年已经以为是空了的莫高窟藏书室时，发现了这些写本，并于1914年—1915年俄国进行的土耳其斯坦考察中，合法地运了来①。”所谓“发掘”，这是违背敦煌遗书之发现基本常识的。苏联另一学者蒙西科夫说：鄂登堡“成功地从当地居民中间搜集了许多写本”。他认为发掘工作在鄂登堡的搜集中很可能仅占无足轻重的地位，大部分写本是从敦煌地区居民的手里所获得的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苏联所藏敦煌遗书，为什么大部分是碎片，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1910年北京政府运走敦煌文书时，把许多文献，主要是一些碎小的遗书都遗弃而留下来了。另外，政府当局对藏文文献毫无兴趣，也没有收集运走，就在当地遗留了大量的藏文文献，从而使鄂登堡也劫获了一部分藏文文书③。

---

①费德林《敦煌写本（论文学的相互关系）》，载《远东问题》1975年2期。转引自姜伯勤《沙皇俄国对敦煌及新疆文书的劫夺》

②蒙西科夫《论古代中国的写本文献》，载《苏联科学院通报》1967年5期，耿升译文载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译丛》，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③参阅（日）藤枝晃《敦煌写本概论》，耿升译文载《敦煌译丛》

3、苏藏敦煌写本概况

苏联所藏敦煌写本情况，很久不为世人所知。这主要是鄂登堡及其“考察团”成员的旅行记和工作日志，都藏在苏联科学院档案库，一直没有公布。

1915年，鄂登堡所劫遗书运抵彼得格勒。1929年，交给列宁格勒亚洲博物馆。现在文物部分收藏于列宁格勒爱尔米塔什博物馆，写本部分则收藏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敦煌特藏”中。实际上，“敦煌特藏”中的一部分文书，并非来自敦煌，而是从新疆等地搜劫的。

1920年，阿列克谢也夫的《苏联科学院亚洲博物馆汉文和朝鲜文藏卷》①，1922年鄂登堡的《千佛洞》②都只透露了点滴情况；1917年日人矢吹庆辉，1931年法人伯希和对其稍有接触，但也只是简单地提及和介绍过其中的几卷写本。三十年代，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弗鲁格为列宁格勒所藏敦煌卷子编了部分简目，即《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藏汉文写本（非佛经之部）简报》③、《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藏汉文佛经古写本简目》④。由于弗鲁格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编目工作中断，苏联所藏敦煌卷子也再次消踪匿迹。

1957年，郑振铎先生在苏联访问期间，曾看过部分敦煌文献。由于郑振铎于1958年10月遇难，没有来得及公开发表其见闻，只在写给徐森玉先生的一封信中有些反映。这封信写于1957年11月18日晚上，信中说：“我于前天到了列宁格勒，立刻开始

---

①载圣彼德堡出版的《科学通报》

②载《东方学杂志》2卷

③载《东方目录学》1934年7期

④载《东方目录学》1935年8－9期

工作。莫斯科的人告诉我，在列宁格勒有一万卷以上的敦煌卷子和一万多卷的西夏文佛经。所以，我很急于到这里来。在莫斯科的工作一结束，当夜就乘夜车赶来。上午九时半到。休息了一会儿，十二时就到东方研究所去看敦煌卷子，因为时间不多，只将他们放在手边的几十卷翻阅了一下，就发现有‘维摩诘经变文’二卷，都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昨天是礼拜天，不能去续看，……今天上午，又到了东方研究所，续看敦煌卷子。共看了二三百卷。下午，……急急忙忙地看，又看了二百卷左右，都是他们事前挑选出来的；未被挑选的，不知还有什么‘宝物’在内。就这几百卷东西，内已有不少十分惊人的，象庄子一卷（渔父篇），文选一卷（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韦孟讽谏一首，张茂先励志诗一首，曹子建上责躬应诏一首），孝经二卷，论语子路第十三一卷，左传二残卷，老子第七十一至八十章一卷，还有王梵志诗，五更转，十二时等等。目不暇给，手不停钞。可惜已经到了他们下班之时，天色已经黑了。只好‘留以有待’①”。由于这封信直到1986年才公开发表，所以此前世人对这些情况都不知道。

真正引起学术界震动是在六十年代初。1960年，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五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期间，苏联宣布了有关敦煌卷子的消息。并由列宁格勒分所陈列了敦煌文书若干件，供与会各国学者参观。至此，国际上才知道苏联还藏有数量惊人的敦煌文献，但具体情况和内容、数量都不大清楚。

1963和1967年，苏联东方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孟西科夫主编的《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两册，著录了2954号文书。据编者称，这两册目录所著录的写本约当总数的三分之一弱。由此推知，列宁格勒所藏敦煌文书约有一

①徐文堪《郑振铎与列宁格勒所藏敦煌文献》，载《读书》1986年10期

万件左右。蒙西科夫也说，鄂登堡在敦煌所劫文物，包括“1.2万卷写本，还有许多艺术品以及代表着物质文明的物品①”。但由于苏联所藏敦煌资料公布很少，目录也只出版了两册，所以直到八十年代，其确切情况也不得而知。法国敦煌学专家戴密微曾说：“当鄂登堡于1914—1915年在突厥斯坦探险时，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搜集到手一大批敦煌汉文写本的。在数量方面甚至可以同伦敦、巴黎和北京的那批藏卷相媲美，因为人们声称列宁格勒共藏有一万多卷，但具体数目却始终没有弄清楚②”。

1983年秋，法国国立科学研究所的吴其昱先生奉法国国立科学研究所之派遣，前往列宁格勒访问苏联科学院列宁格勒分院东方学研究所，阅读了所藏部分敦煌写本，并尽十日之力，对苏联所藏敦煌写本情况进行了初步了解。1986年，吴其昱先生参加了在台北举行的“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他提交会议的论文是《列宁格勒所藏敦煌写本概况》③，比较详细地记录了苏联收藏品的基本情况。从此文并结合其他材料，可以了解苏藏敦煌写本的大致情况。

首先，碎片特多。苏联所藏敦煌文献，共11375号，大致可分为五部分：（1）Fl至325，即三十年代弗鲁格所编之号码。（2）Dh1至2800，此为东方学研究所图书馆藏书号。Dh指敦煌。上列二项已编入孟西科夫的两册目录中，孟目编至2954号，与旧藏号码不同，旧编一号，孟目有分为二号或数号者，又旧编Dh1至2800号中，有孟目未收入者，但绝大部分均收入孟目。按写本长度超过62公分者，经初步统计，仅259号。又写本长度不

---

①蒙西科夫《论古代中国的写本文献》，载《苏联科学院通报》1967年5期，耿升译文载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译丛》，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②（法）戴密微《列宁格勒所藏敦煌汉文写本简介》，耿升译文载《敦煌译丛》

③《汉学研究》1986年4卷2期《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专号》

及31公分者，经粗略统计共约1849号。（3）Dh2801至9584号，共6784号，大都为手掌大小或更小之碎片。（4）Dh9585至10150号，共566号，是鄂登堡于1909年秋从黑水等地劫获的，并非敦煌所出。外加孟目9号，亦出自黑水，共575号。（5）Dh10151至11050号，共900号，残叶约一纸上下或更小碎片。其中11号有号无书，实际只有889号。从上述可知，遗书总数为11375号，减去黑水所得575号，敦煌文书共10800号。其中小碎片6784号，再加孟目中纸张不及31公分，其中亦有相当数量之小碎片，约1849号，二者共有8633号。长度等于或超过31公分者，约2200号。

其次，佛经特多。据孟西科夫主编目录第一、二册初步统计，佛经约占86%，其比例与伦敦所藏相近。

再次，时有孤本珍本。如《郑虔残札》（Dh10839）、《孟兰盆经讲经文》（Dh10734）、《曹宗寿造帙疏》（孟目第一册第767页影印件）、《建中三年三月廿七日授百姓部田春苗历》（孟目1570）等。

另外，鄂登堡曾到莫高窟各洞搜劫遗书，所获来源非一，故苏藏敦煌写本并非全部出自藏经洞（即第17号窟）。其所劫文书在起讫年代上也很值得注意。在苏藏一万多号文书中，纪年最早的是北凉缘禾三年（即北魏延和三年，公元434年）《大方等无想大云经》，较晚的“大宋咸平五年”即公元1002年（孟目1696号）。另外，φ·229号卷子，正面为《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192，反面为《景德传灯录》卷11及《大悲心陀罗尼启请》。《景德传灯录》写于1006年，作者并将此赠予宋真宗，故该件不能早于1006年，是苏藏纪年最晚的卷子。从而打破了伯希和所说敦煌没有十一世纪初年卷子的陈说，在敦煌学研究上具有很大意义。

七、带来厄运的华尔纳

自从斯坦因于1914年最后离开中国后的近十年中，再没有一个外国“考察家”从中国的西北盗走任何东西。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使所有的外国人都停止了他们新的远征。另外，国内地方军阀之间为争权夺利相互混战，“那时在全国范围内，法律和秩序已遭到了彻底 的 破 坏。但尽管如此，美国人还是决心要碰碰运气①”。于是在1923年，便由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兰登·华尔纳和宾夕法尼亚博物馆的霍勒斯·杰恩，再加上翻译员王秘书和四辆简陋的双轮马车，组成了第一次到中国西北的美国远征队——哈佛大学考古调查团。

1、第一次盗劫

在第一次远征中，虽然华尔纳和杰恩决不愿空手而回，但并不打算大量搬走艺术作品。引用华尔纳的话来说，这是一次“侦察性的旅行”。也就是去看一看那些经过六个国家的“考察者”们已挖掘过的遗址和已盗走的文物之后，如果还有剩下的话，究竟还剩些什么。“同时他们还希望解答艺术史上一些难以捉摸的问题。其中之一是要在哈佛大学实验室的帮助下，弄清唐朝壁画名家所使用的究竟是什么颜料 以 及 这 些 颜 料 是 从 何 处 得 来 的②”。

中国当局曾派了一支武装的护卫队把华尔纳的远征队一直从北京护送到古城西安。1923年 9 月 4 日，当华尔纳在西安向武装护送的十个人告别后，这次远征就正式开始了。华尔纳后来在其

---

①《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210页

②《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210页

所写的《在中国的漫长古道上》一书中叙述这次旅行时说："从印度来的圣徒们越过世界的屋脊……蒙古的游牧部落，皇帝的使臣，从印度来的绿宝石，从中国来的丝毛织品，马贩、乞丐——在旅行中所见到的比历史还要古老的壮丽景象、污秽肮脏、呻吟痛苦以及辉煌成就——凡此种种都是不可否认的，也是经常出现在我们眼前的①"。

华尔纳远征队的第一个目标是黑城喀喇库图。他们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经过兰州、肃州，最后于11月13日到达了目的地——喀喇库图，即马可·波罗所说的额济纳。

在华尔纳到达喀喇库图之前，柯兹洛夫和斯坦因已来过这里，并进行了大量的挖掘，搬走了当时能发现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包括所有的壁画在内。华尔纳的远征队在这里虽然发现了一些小的物品，其中包括几件壁画残片，但与柯兹洛夫和斯坦因相比，却使华尔纳深感失望。正如他自己所说："这次额济纳的远征已经证明了，除非用大量的劳力和进行长时间的挖掘，否则，在这个地方已经不可能希望再找到更多的东西。柯兹洛夫和斯坦因已经把这个地方挖掘得那样干净，使后来的人简直无物可挖了②"。

在额济纳挖掘后，华尔纳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敦煌。敦煌壮丽的艺术风格，他们从伯希和考察团成员——努埃特所拍摄的照片中，早已洞悉无遗。他们鉴于在额济纳的失望，同时又知道斯坦因、伯希和、桔瑞超和鄂登堡都已经到过敦煌，而且还盗走了他们所能下手的每样东西，因此去不去敦煌，他们也犹豫不决。然而，华尔纳毕竟是一个艺术史家，而不是一个语言学家，因此对于手稿并不特别感兴趣。作为一个艺术学家，他很想去看一看只

---

①转引自《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210页

②转引自《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216—217页

有很少几个东方学家才见到的这个世界艺术画廊。“况且，哈佛大学的各实验室还很希望能得到即使不是整幅的壁画，就是一些碎片也好，以便为他们作实验之用。这个远征队的目的是为以后的野心更大的冒险铺平道路①”。

当华尔纳到达敦煌千佛洞时，王道士又外出了，但这并没有妨碍华尔纳，他直接进入了那些有壁画的洞窟里。一连十天，除了吃饭和睡觉外，他很少离开洞窟。《在中国的漫长古道上》一书说：“我除了惊讶得目瞪口呆外，再无别的可说……现在我才第一次明白了，为什么我要远涉重洋，跨过两个大洲，在这些烦恼的日子里，蹒跚地走在我的马车旁边。”千佛洞成千上万的优美画像，把华尔纳惊得呆若木鸡，不知如何是好。他说：“我到这里来原是为了核对古物年代，是为了能轻易地驳倒那些学者教授们，并且也是为了发现艺术影响的。现在我站在一所佛堂中央，双手插在衣袋里，陷入了沉思之中②”。

华尔纳经过沉思之后，决心要剥夺这里的优美壁画和彩塑。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的任务是，不惜粉身碎骨来拯救和保存这些即将毁灭的任何一件东西。若干世纪以来，它们在那里一直是安然无恙的，但在当前看来，它们的末日即将到来。”“就是剥光这里的一切，我也毫不动摇③。”

在华尔纳给王道士相当多的礼物后，王道士也就同意华尔纳剥走一些壁画。但当华尔纳又提出要一些塑像时，他却显得非常倔强，坚决不同意。后来他知道，华尔纳并不是要他新的、光辉灿烂的彩色塑像时，他就同意分给华尔纳一尊古老陈旧的、三呎高的一只腿跪着的唐代圣像。这是今天在福格博物馆的藏品中最

---

①《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217页

②转引自《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220页

③转引自《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220，221页

珍贵的文物之一。

华尔纳用来剥离壁画的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溶液。然而当时敦煌正值隆冬，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每当华尔纳爬上梯子，将固定剂用刷子涂在壁画上，溶液还没有渗入并凝结在灰泥以前时，就已经结成了固体，同样，那些浸透了胶水的纱布还未粘附在壁画上，就已经冻硬了。尽管条件如此艰难，但他盗劫敦煌壁画的野心不死。经过五天的盗剥，华尔纳终于移下了十二件壁画。这“是极可宝贵的珍品。我们在美国还从未见过与此类似的东西。同时这些东西和德国人从土耳其斯坦的灰泥墙壁上锯下来的变成了方形的壁画相比，也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忌妒①。”

华尔纳盗劫敦煌壁画，使他得到了极大的荣誉。同时哈佛大学的福格收藏所也因为有了这些艺术品而永久闻名于世界。尽管如此，华尔纳并不满足，其野心越来越大。他决定带一支更大的队伍，在敦煌盗劫更多的壁画。华尔纳自己说：“在（千佛洞）那些墙壁上，我们应当找出中国的绘画风格的起源，亦即风景画学派的起源。在这方面中国大概已经超过了我们所有的人。用半年的时间对那些原来的艺术作品，进行仔细而深入的研究，一定可以找到敦煌艺术大师们在绘画上的秘诀。并且，要是幸运的话，下一次远征还可能给福格这个小收藏所再添加许多中亚的珍宝②”。然而等待华尔纳的到底是什么呢？

2、罪恶阴谋未得逞

华尔纳的第二次远征，不仅带有偷剥壁画的“胶水桶”，而且还请了配制这种“胶水”，并在一年前告诉他如何使用固定剂的一个年轻壁画专家——丹尼尔·汤普森。华尔纳吸取了前一次

---

①转引自《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222页

②转引自《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223页

的教训，为避免配制剂再次发生冻结的危险，他把这次远征安排在春天进行。“这一次不但要研究石窟中的艺术史，而且还要挽救（即盗窃）更多的敦煌壁画①。”

在华尔纳的远征队离开北京前，北京大学的爱国学者马叔平、沈兼士先生约请当时也在北大的陈万里先生谈话，希望陈先生能随同西去。这时候，中国人民还不知道华尔纳第一次盗窃敦煌壁画的罪行。两位先生说：“有一批美国人要去甘肃敦煌考察，北京大学可以设法派人同去……看一看这一批外国人到敦煌去，是捣什么鬼的。因为敦煌的国宝被斯坦因、伯希和一班文化侵略者捆载而去了不知多少，我们不能不密切注意②”。

1925年2月16日离开北京后，陈万里先生才从王翻译那里知道了华尔纳第一次盗窃敦煌壁画的罪行，“因此我就时时注意他们的行动。同时在我们的大车行列中，果然有一大车的布匹，我更时时警惕我所负的任务。本来我从北京出发时候，已经知道华尔纳的行径，我们决定应该密切监视，设法防护③。”

在长期的旅途中，陈万里先生才知道，华尔纳远征队这次来中国的唯一目的，就是用胶布大规模的盗窃敦煌壁画，为此他请来了专门配制、使用这种胶水的壁画专家汤普森，其盗窃的对象，就是伯希和所编的120窟，即敦煌研究院编285窟。该窟为西魏时开凿，上有“大代大魏大统四年岁次戊午八月中旬造”题记。华尔纳企图粘去这个洞里的所有壁画。为了阻止华尔纳盗窃敦煌壁画的企图，保护国宝，陈万里先生每到一地，如兰州、酒泉、敦煌后，“一一先与地方当局接洽说明，并研究我们如何保存国宝的方法④。”正是由于陈万里先生及其他爱国人士的共同

---

①《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225页

②③陈万里《美帝偷劫敦煌壁画的阴谋》，载《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2卷1期

④陈万里《美帝偷劫敦煌壁画的阴谋》

努力，华尔纳远征队原拟在千佛洞停留半年的计划，未被地方当局同意，而以华尔纳第一次剥离、破坏、盗窃敦煌壁画，作为拒绝他们的唯一理由。

5月19日，华尔纳的“考察团”到了敦煌后，翟荫（即杰恩）等人即去县府接洽，杨县长态度很坚决，不许他们在千佛洞住宿。并于当日下午召集开会商议此事。出席会议的除杰恩外，还有各界代表七、八人。杰恩在会上首先说明来意：“此来本拟剥离一部分壁画，运赴北京陈列，以便中外人士，得就近研究，曾以此意商之陆省长，未蒙许可，嗣后即一意摄影，希望能得各界谅解，予以充分时间①”。杰恩虽竭尽欺骗、说谎之能事，但觉醒了的中国人民是不会上当的。大家一致表示：前年华尔纳剥去千佛洞壁画二十多块，地方人民曾向县知事提出质问。当年庙会的时候，还有许多人向王道士责问，所以这次到千佛洞考察，无论如何，时间不能太长，而且要制定详细的具体规定。

正是由于中国人民的觉醒，敦煌人民和地方当局对华尔纳的“考察团”作了如下规定：（1）华尔纳及“考察团”的团员不准留宿千佛洞。（2）“考察团”的团员全体去参观千佛洞时，必须受人民的监视，并必须当日返城。（3）不准触毁壁画及其他一切文物②。我们知道，千佛洞离敦煌县城四十多里，牛车往返要走八小时，这样华尔纳及“考察团”每天“参观”千佛洞的时间就很少了，再加上经常有人监视，无法下手盗窃壁画。因此，他们在千佛洞游览了三天，即5月21日——23日，就离开了敦煌。

华尔纳这次来到敦煌，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华尔纳自己说：“情况变得十分棘手。约有十多个村民放下他们的日常

---

①陈万里《西行日记》

②参阅常书鸿《控诉美国强盗盗窃敦煌文物罪行》，载《光明日报》1951年4月15日

工作，从大约十五哩之外的地方跑来监视我们的行动；并且他们使用一切手段来诱使我们触犯他们的规定，以便对我们进行袭击，或者用武力把我们驱逐出境。”我们“一个不注意的错误，即使是一次愤怒的表情，也可能使他们倾巢出动，骂不绝口，甚至置我们于死地①”。英国人彼得·霍普科克也说：对于华尔纳的这次远征，北京“并没有提出什么反对的意见，可是这些美国人现在突然发现他们每走一步，不但受到怀有敌意的民众的阻挠，而且还受到地方当局的刁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放弃对千佛洞所怀抱的希望，放弃搬走任何东西的意图②”。正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敦煌人民团结了起来，将华尔纳及其“考察团”驱逐出境，使华尔纳大规模盗窃敦煌壁画的阴谋没有得逞。

3、损失惨重难挽回

华尔纳对千佛洞壁画的盗窃与破坏，造成了敦煌艺术不可弥补的损失。1923年冬天，当华尔纳第一次来到千佛洞时，就曾计划用钢片铲刀窃取壁画。但因为千佛洞壁画是画在从砾崖基础上搪泥的墙壁上，泥墙与石壁之间又呈现着起伏不平的表面，所以他在毁坏了几幅壁画后，发现无法达到其很快盗窃壁画的企图，便改用了胶布贴粘的办法。华尔纳这次盗窃的壁画，据常书鸿先生统计③：

323窟　初唐壁画三方
329窟　盛唐壁画三方
320窟　盛唐壁画五方
335窟　盛唐壁画五方
361窟　盛唐坐式观音一尊

---

①②转引自《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225页

③参阅常书鸿《控诉美国强盗盗窃敦煌文物罪行》

373窟　初唐壁画一方

关于华尔纳盗窃壁画的具体数量，《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说有“十二幅中型的壁画”。这里说的十二幅，实际上是十二件，其中一件刚拿到美国就弄坏了。目前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收藏九件，其中日常陈列的有五件，另外四件在地下仓库保管。其余两件至今下落不明。从技术上说华尔纳的剥离方法是失败的，残片大半图像不清，补笔补彩部分也不少，其损失是令人痛心的①。陈万里先生《西行日记》81页说“翟荫君在肃州复新雇一周姓木匠，同人咸呼之为老周。老周前年曾随华尔纳、翟荫二君赴肃州北黑城子及敦煌佣工数月。今日告我：华尔纳君在敦煌千佛洞勾留七日，予道士银七十两，作为布施。华以洋布和树胶粘去壁画二十余幅”。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②，对华尔纳盗窃、破坏壁画的罪行，也有部分反映和揭露。该书119页第323窟说：南壁“上画千佛，中画佛教史迹画 西晋 吴淞江石佛浮江、东晋杨都出金像（大部被美国人华尔纳盗劫破坏）”；东壁“门北画佛教戒律画（部分被美国人华尔纳盗劫破坏）”。121页第329窟说：北壁“画弥勒经变一铺（被美国人华尔纳盗走二方）”。117页第320窟说：南壁“画千佛，中央阿弥陀经变一铺（1924年被美国人华尔纳盗劫两方）”。据敦煌文物研究所调查资料表明，华尔纳在第320、321、323、329、331、335、372等窟盗窃精美的壁画二十六方，共计32006平方公分③。

被华尔纳所破坏、盗窃的壁画，大部分是敦煌艺术中最优秀的代表作品，尤其是323窟北壁的张骞出使西域图。该图为一送行场面，送者和行者，面面相对，作离别之状：送者面西，共有

---

①参阅（日）秋山光和《敦煌壁画研究新资料》，载《敦煌研究》试刊第一期

②文物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③见潘絜兹《敦煌莫高窟艺术》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八人，一人骑高头骏马，举手挠指作讲话之态，自由随便；身后一人，手执伞盖；其余六人，有的鞠躬施礼，有的举手作嘱托之状；行者面东，其中一人，着宽袍大袖衣，朝笏遮面，跪于地下，态度恭谨；身后数人，当是其侍从；再后就是拴束好的马匹行李，为整装待发时的情状。其标题书作："前汉中宗既获金人莫知名号乃使博望侯张骞往西域大夏国问佛名号时[1]。"

从这篇题记可以证明，这个洞窟的壁画，并不象其它洞窟那样完全是宗教教义的传述，乃是中华民族历史极为宝贵的典故。华尔纳的盗劫、破坏，不仅摧毁了一壁千余年前的艺术宝藏，而且毁灭了我民族文化史实上一段珍贵的参考资料。

八、劫余断篇又遭劫

1、遗书的流散

敦煌遗书发现后，即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与研究。遗书发现之初，王道士就请城中绅士来参观。绅士们不知其可贵，只认为这些佛经流落于外，诚大造孽，都叮嘱王道士仍藏洞内。"王道士颇机诈，思借之以贸利，私载经卷一箱至酒泉，献于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廷栋不省，以为此经卷其书法乃出己下，无足重。王道士颇丧沮，弃之而去，时嘉峪关税务司比国人某将回国，来谒廷栋，临行，廷栋出数卷赠之。此比国人行过新疆，复谒长庚将军（亦满人）及道台潘某。相与道敦煌事，复以经卷分赠长庚与潘道台[2]"。

1902年，敦煌知县汪宗瀚把王园禄送给自己的部分敦煌遗

---

①孙修身《从〈张骞出使西域图〉谈佛教的东渐》，载《敦煌学辑刊》第二集。

②谢稚柳《鉴余杂稿·敦煌石室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

书、遗画和拓片等，转送给了甘肃省学台、金石学家叶昌炽。叶昌炽深知这些文物的重要价值，立即建议甘肃省当局，要求将藏经洞全部文物运送兰州保管，而政府当局则以经费困难为由拒绝了这一建议。1904年3月，甘肃省藩台令敦煌知县汪宗瀚对藏经洞出土文物进行清点并封存。汪宗瀚乘机择其精品，送给了新疆、甘肃等一些地方官员。敦煌遗书从此开始在外界流传。

斯坦因、伯希和盗劫遗书后，藏经洞文物才开始为人们所知，并引起了政府的重视。1908年，清朝政府责令敦煌知县并王园禄“将此项经卷，妥为保存，毋再遗失私卖，致于咎戾①”。于是将残存卷子分装两大木箱，名为“转经筒”，藏于第367窟。但狡诈的王道士还是私藏了不少经卷，偷偷出售。当1909年敦煌遗书运送北京时，由于王道士做了手脚，并没有全部运完，因此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敦煌时，又从王道士手中买去五六百卷。当时在新疆一带也不时有人向外国人兜售。后来又在莫高窟发现了一批藏文佛经，甘肃省政府教育厅便令敦煌知县：“将该项番字经卷，悉数运送来省，交由省图书馆保存②”。并派人会同敦煌县地方政府共同清理查验，共清理出藏文经卷94捆，重440余斤；带夹板经书11打，重1744斤。这些藏文经卷由敦煌劝学所、莫高窟寺院和甘肃省图书馆保存。

2、运京途中遭劫记

伯希和盗劫敦煌遗书后，于1908年5月从敦煌出发往东，途经西安并停留了一个月，再经郑州、北京，于1908年12月12日到了河内。

1909年伯希和又来北京，为远东学院购买汉文古籍。这次他

---

①转引自卢秀文《敦煌学编年》，载《敦煌研究》1988年4期

②转引自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24页

于5月21日从河内出发，夏天到达北京。经田中庆太郎（东京文求堂店主）介绍，罗振玉等人于中秋节访伯希和于苏州胡同寓所。伯希和出示随身所带敦煌遗书《老子化胡经》、《尚书》残卷等十余种，并送给罗振玉一些敦煌文献照片。

关于伯希和在北京及敦煌遗书的流传情况，田中庆太郎也有记载，可以使我们了解得更详细一些。田中用救堂生这个笔名将当时的见闻题为《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发表在北京日侨主办的《燕尘》杂志2卷11号（1909年11月1日出版），文章说：

> 佛兰西东方考古学校教授伯希和氏获得藏在甘肃省境敦煌县石室中的经卷古书。得知归国途中在北京停留，立即赴八宝胡同旅舍通名片求见。未曾有过什么交往的伯氏把我让进了客厅。伯氏系三十岁左右的青年绅士，颇有学者风度。虽然是西方人，却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
>
> 伯氏怀研究中国西陲地理古迹的目的，一年前从本国出发，经俄属中亚细亚进入新疆省，在库车停留八个月，在乌鲁木齐停留二个月，在吐鲁番又停留数周，连续地考察。在乌鲁木齐会见了长将军，得知敦煌石室的消息，随即取道巴里坤、哈密，出安西，在安西知州某人以一卷古写本相赠，立即可以确定这是唐写本。去年冬天离开敦煌县三个多月，弄到了藏在当地三危山下石室之中的写经和别的文物。
>
> 虽说大部分已被送往本国，还是出示了随身携带的几十件。全是炫人眼目的珍品，如唐写本、唐写经、唐刻及五代刻的经文、唐拓本等，纸质有黄麻、白麻、楮纸三种。其中《老子化胡经》不次于最好的《太平经》，《尚书·顾命》残片文字雄健，的确是唐人书法。……听说伯氏带来奇书，不但北京士大夫中的学者，就连对古书怀有兴趣的人也都相继往访他的寓所，见到带来的珍品，无不惊讶。
>
> 九月四日，北京学者主办的伯氏欢迎会在豪华的大饭店

举行了。当天出席者有：宝侍郎（宝熙）、刘少卿、徐祭酒（徐枋）、柯经科监督（柯劭忞）、恽学士、江参事（江翰）、吴寅臣、蒋伯斧、董比部（董康）等十余人，成了名流齐集的盛会，遗憾的是罗叔言氏因感冒而缺席。……伯氏把摄影誊写的要求一一允承下来。伯氏与北京士大夫应酬之后，于九月十一日晚，乘坐前门开出的列车经西伯利亚归国。约定以后发表各种整理报告①。

罗振玉在伯希和处见到敦煌遗书后，大为惊奇，如获至宝。立即就伯氏所带的部分卷子写了一分提要——《鸣沙山石室秘录》，刊入《国粹学报》。又约其他同志一道影照残卷十余种，编为《敦煌石室遗书》一书，由武进董康诵芬室刊行。

当与伯希和会晤时，伯希和说敦煌石室中尚有卷轴八千余卷，其中以佛经为多，可早日购归，以免再为人夺去。罗振玉得到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刻请学部发电报致护陕甘总督毛实君（庆蕃），托其将劫余敦煌卷子购送学部，并拟好电文上呈堂官，电文中说明购买卷子的经费先请垫付，由学部偿还。堂官允许发电，独把“还款”语删掉②。这样，8月20日学部致电甘肃：“行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③”。电报发出一月后，甘肃省就复电到学部和大学，说已购妥，共八千卷，三千元。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由于学部发给甘肃的电报没有“还款”二字，罗振玉考虑到甘肃比较贫穷，未必能予垫款。于是提

---

①转引自（日）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

②参阅罗继祖《庭闻忆略》40页，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编辑出版

③见《学部官报》104期，转引自姜亮夫《莫高窟年表》6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

议请大学出款，大学总监督刘幼云（廷琛）也推说无款。罗振玉说，大学如无款，可由农科节省经费来购，不然，可将我个人俸给全部捐出。罗当时任京师大学堂的农科大学监督，由于他下了最大的决心，一再坚持，堂官才没有再明确反对①。这一点罗振玉《鸣沙石室遗书序》中也有反映："往者伯君告余，石室卷轴取携之余，尚有存者。予亟言之学部，移牍甘陇，乃当道惜金，濡滞未决，予时备官大学，护陕总督者适为毛实君方伯（庆蕃），予之姻旧，总监督刘幼云京卿（廷琛），与同乡里，与议购存大学。既有成说，学部争之。"当初学部"惜金"，恐怕价格昂贵，不肯购买。及知仅三千元时，"学部争之"，决定留部，不给大学。

从甘肃敦煌押解经卷至北京，不知为什么原因，学部委托新疆巡抚何秋辇（彦升）担任接受和押解，押解差官是江西人傅某。当载经大车到北京打磨巷时，何彦升之子何震彝（鬯威）先将大车接至其家，约同其岳父李盛铎（木斋）及刘廷琛、方尔谦等，就其家偷选，将残卷中之精好者悉行窃取。而后又把卷子中较长者，破坏截割为二、三，甚至五、六段，以充八千之数②。罗振玉《姚秦写本僧肇维摩诘经残卷序》亦记其事曰："江西李君与某同乡，乃先截留于其寓斋，以三日夕之力邀其友刘君、其婿何君及扬州方君，拔其尤者二三百卷，而以其余归部。李君者富藏书，故选择尤精，半以贻其婿，秘不示人；方君则选唐经生书迹之精者，时时截取数十行鬻诸市。"当时移藏部立京师图书馆的卷子是8697号，民国十八年（1929年）移交北平图书馆时增为9871号。

官僚世宦窃取敦煌遗书之事，当时社会上就有了一些传闻。罗

---

①参阅罗继祖《庭闻忆略》40—41页

②参阅谢稚柳《鉴余杂稿·敦煌石室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出版

振玉《鸣沙石室遗书序》所说："比至运京，复经盗窃"即指此而言。此事也"为学部侍郎满人宝熙所悉，谋上章参奏，会武昌起义，事遂寝①"。宝熙上奏，因辛亥革命爆发而没有查问。但这毕竟是一桩大案，学部为掩人耳目，只把押解员傅某扣留，最后还是经人说情而释放。吴昌绶《松邻书札》中致张祖廉一札云："顷鬯威（何震彝）同年来，谓访公未值，有言托为代致，甘省解经之傅委员，淹留已久，其事既无佐证，又系风流罪过，今穷不得归，日乞鬯威为道地。弟闻前事已了，堂宪本不深求，可否仰仗鼎言，转恳主掌诸君，给札放行，其札即由公交鬯威亦可，渠既相嘱，特为奉致，望径复之②。"将这样大的盗窃公案，以"风流罪过"，巧于开脱。最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结案。

被窃卷子当时就流到了市场上，罗振玉说："遗书窃取，颇留都市，然或行剪字析，以易升斗；其佳者或挟持以要高价，或藏匿不以示人③"。如方尔谦所盗窃的遗书，当时就拿到市场上出售，"故予箧中所储，方所售外，无有也④"。李盛铎所窃，1935年一次就卖给了日本人四百多卷。

---

①谢稚柳《鉴余杂稿·敦煌石室记》

②转引自罗继祖《敦煌藏卷劫余小记》，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2辑。该文为"给批放行"，而罗继祖《庭闻忆略》改为"给札放行"，今依后书改

③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序》

④罗振玉《姚秦写本僧肇维摩诘经解残卷校记序》

第四章——

敦煌遗书

——百科全书式的宝藏

自敦煌遗书发现以来，就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大力研究。这除了其本身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外，还在于它全部出自当时人之手，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种原始记录，没有经过后人的加工改造，是最能客观反映当时社会实际的第一手资料，所以被称为“学术的海洋”，我国中古时期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乃至宋初，官府档案早已荡然无存。敦煌所出社会生活文书，虽然大部分残缺不全，但却是这一时期仅存下来的官府档案，对它的分析和研究，必然会使我们对魏晋隋唐五代及宋初的历史有许多新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使这段历史的研究获得新进展。由于敦煌遗书的内容十分丰富，包罗万象，在许多方面都提供了新资料，因此，在这一章里，我们将从各个角度和不同侧面对敦煌遗书的丰富内容加以评介。

一、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敦煌遗书中的历史学资料极为丰富，有的可以补充史料记载之不足，有的可以纠正史籍之讹误，特别是一些有关西北边陲史地研究的资料，尤为可贵，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

1、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敦煌遗书中的史学材料包括法制文书、官府文书、田制文书、户籍、手实、差科簿及与计帐有关的资料、赋役制文书、寺院经济资料、各种契约以及有关公廨钱等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之事，因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例如律、令、格、式是唐代法制文书的主体。唐律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但令、格、式却大多都散失了。保存在《唐律疏议》、《唐六典》、《通典》、《唐会要》等书中的令、格、式，大多已不是完整的原貌，因而无法了解唐代令、格、式的详细情况。而敦煌遗书中保存了许多唐代的令、格、式，如《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残卷》（P·4634、S·1880、S·3375、S·11446）、P·2819《开元公式令残卷》、P·3087和S·4673《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S·1344《开元户部格残卷》、周字51号《开元职方格断片》、P·4978《开元兵部选格断片》、P·4745《贞观吏部式断片》、P·2507《开元水部式残卷》、P·2504《天宝令式表残卷》等等，虽然都有残缺，但却能使我们看到唐代令、格、式的大致原貌。这些令、格、式为研究者提供了有关唐代官制、法制及水利灌溉多方面的原始史料，可补一般文献史籍之不足①。

《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残卷》，虽然首部和中部残缺甚多，但还是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东宫诸府的职员分布及职掌，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唐代令的一些具体情况。如东宫“司经局：洗马二人（掌经史图籍，判局事），书令吏二人（掌行署文案。余局书令吏准此），书吏四人（掌同书令吏），校书四人（掌雠校经籍），正字二人（掌刊正文字），典书二人（掌四部经籍，行署

①参阅王永兴《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载《文史知识》1985年6期

校写功程料度文案），装书生四人（掌装潢经籍），楷书令史三十人（掌写经籍），掌固四人。典膳局：典膳监二人（掌监膳食，进食先尝，判局事），丞二人（掌检校局事。若监并无，则一人判局事。余准此），书令吏二人，书吏四人，主食六人（掌调和鼎味之食），典食二百人（掌造膳食及器皿之事），掌固四人。药藏局：药藏监二人（掌合和药，判局事），丞二人，书令吏一人，书吏二人，侍医四人（掌和药、诊候），典药九人（掌供进药），药童十二人（掌捣筛诸药），掌固六人”。这卷文书共215行，钤有多方“凉州都督府之印”，卷首并有“沙州写律令典赵元简初校”、“典田怀悟再校”及“凉州法曹参军王义”等字样，这说明此卷唐令残卷乃凉州都督府作为正式文书保存之官写本，其权威性无可置疑①。

在赋役、田制方面，敦煌遗书的价值也是如此。如S·0113《西凉建初十二年（416年）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户籍残卷》，是目前所知留存下来的十六国时代唯一的一件户籍，该写本前残后缺，只保留有兵裴晟、散阴怀、兵裴保、散吕沾石、兵吕德年、大府吏隋嵩、散隋杨、散唐黄等八户的户籍。从这八户户主前的称谓可知，当时将户分为兵、散、大府吏等类，每户的人口又据年龄性别区分为丁男、次男、小男、女几种，这基本上是西晋户调式的延续，但在丁、次的标准上又略有变通。《晋书·食货志》载：“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少。”但在西凉户籍残卷中，女口不分丁、次，吕沾石和吕德年17岁的男子都为小男，裴晟25岁的男子仍为次男，与晋初的情况不同。这或许与当时敦煌国泰民安、人口较多有关。即使这样，这份户籍残卷对我们了解西晋至十六国时期户籍制的演变，还是十分重要的。

---

①见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

再如 S·0613《敦煌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残卷》，是目前所知反映北朝均田赋役制度的唯一出土文书。由于北朝均田制的情况，文献记载过于简略，致使许多问题无法得到圆满的解决，因此，文书残卷乃成为深入研究北朝均田制度的宝贵资料。此件文书的内容非常丰富，有关均田制的实施、受田标准、丁中年限、赋税数额等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如田制就有应受田、已受田、未受田、足、未足、麻田、园、课田、不课田、正等等内容；丁户有老、丁、女、贱、婢等等；纳税量词有石、升、斗、斤、两、匹、丈、尺、围等等。通过对这件文书的多角度和各个侧面的研究，可以了解北朝田制及赋税制度的许多问题，解决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

2、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进展

敦煌遗书的发现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纠正或补充了一些课题的已有结论，并使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如关于唐代均田制的研究，是我国史学界多年探讨的重要课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唐代的均田制是否实行？其实行的情况与唐田令的规定是否一致？对此学术界进行了长期而热烈的讨论，但未取得一致的意见。通过对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整理研究，从而证明唐代均田制确实实行了，并基本上是按照唐田令的规定实行的。

据历史文献记载，唐初武德七年田令规定："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①"。

唐开元七年田令规定："凡应收授之田，皆起十月，毕十二月。""若应收受（应作授）之田，皆起十月，里正勘造簿历，

---

①《旧唐书》卷48《食货志》

十一月，县令亲自给授，十二月内毕①”。

这两次田令中规定的“收田”（从受田农民方面讲就是“退田”）、“授田”，也就是“给田”（从受田农民方面讲就是“受田”），是实行均田制的两个重要环节。因此，要了解均田制是否真的实行以及实行的具体情况，就要找到关于退田、给田以及欠田的具体记录，然而这样的具体记录在一般文献中是找不到的。而保留至今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退田文书、给田文书和欠田文书恰好是当时的具体记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材料②。

敦煌文书P·2822《唐先天二年沙州敦煌县平康乡籍》、P·3877《开元四年沙州敦煌县慈惠乡籍》、P·3897、3877《开元十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籍》、P·2684《开元十年沙州敦煌县莫高乡籍》、P·2719《天宝三载敦煌郡敦煌县神沙乡弘远里籍》、S·4583《天宝六载敦煌郡敦煌县效谷乡□□里籍》、《天宝六载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P·2596、3354等）、S·0514《大历四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等等，都有许多有关实行均田制的具体记载。如P·3669《武则天圣历三年帐后沙州敦煌县效谷乡户籍残卷》所载某户田籍：

贰拾捌亩已受

合应受田捌拾壹亩

三十三亩未受

一段拾贰亩永业（四至略）

一段五亩永业

一段五亩三亩永业，二亩口分。

一段六亩口分

---

①《唐六典》卷三“县令之职”条

②参阅王永兴《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

同卷所载常罂才户田籍：

十八亩永业

拾捌亩已受

合应受田壹顷叁拾壹亩　一亩居住园宅

一顷一十三亩未受

上引文书将每户应受田数、已受田数、未受田数、已受永业田和口分田总数，都登记得清清楚楚。其他文书中还有许多有关退田、欠田的记载。通过对这些文书的整理研究，可以得出结论：均田制确实实行了。至于授田亩数严重不足等，则是均田制实行过程中的问题。

另如玄武门之变，乃唐代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但唐太宗李世民为何能夺取玄武门的控制权？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为何能杀死建成、元吉，夺取皇帝的宝座？长期以来，学术界根据文献记载进行了深入探讨，但终不得其解。可喜的是，敦煌文书中的有关资料，为我们了解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提供了一把锁钥。

《通鉴》卷191高祖武德九年六月丁已（六月一日）条载：

尉迟敬德曰：王（太宗）今处事有疑，非智也；临难不决，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余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德已乎！

庚申（六月四日），世民帅长孙无忌等入，伏兵于玄武门。

由此可知，此时世民与建成、元吉的矛盾到了你死我活的最后时刻。在这种危急关头，太宗居然能够把亲兵八百人执枪被甲地遣入宫内，并在六月四日亲自率长孙无忌埋伏到宫廷要地——玄武门。其原因何在呢？

从史料记载双方的激战可知，武德九年六月四日，以玄武门宿卫兵及世民秦府兵为一方，以建成东宫兵及元吉齐府兵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从战斗情况看，太宗的情势是很危险

的，因此，常何及其所领宿卫兵是否忠于太宗，则是关系到世民成败的关键。由此可知玄武门事变中太宗之成功，主要是由于玄武门之宿卫常何及其部下转向太宗。同时说明，常何在玄武门事变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建立了重大功勋。

我们知道，在六月四日事件中，玄武门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建成、元吉为何不加防备？太宗死党为何能事先占据此要害之地？这都须从当时玄武门守将常何处去找答案。

常何，乃隋末唐初的一个重要人物。但由于《隋书》中未提到常何，两唐书只在《马周传》、《东夷传·高丽》、《李密传》和《太宗本纪》中简略提及，且语焉不详。因此长期以来对常何的研究甚少。可喜的是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一卷李义府撰《常何墓碑》，从而为我们研究常何其人及隋末唐初的政治史提供了宝贵材料。

据P·2640《常何墓碑》载：

> 太宗文皇帝出讨东都，以公为左右骁骑。……令从隐太子讨平河北，又与曹公李勣穷追贝朗……（武德）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赐金刀子一枚，黄金卅挺，令于北门领健儿长上。仍以数十金刀子委公赐骁勇之夫。趋奉藩朝，参闻霸略，承解衣之厚遇，申绕帐之深诚。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

从《墓碑》记载可知，在玄武门事变之前，常何曾于武德四年随李世民出讨东都，一年后又从建成讨平河北。之后又成为李勣的部下。与世民、建成都没有特别密切的关系，更不是他们的心腹亲随。而这正是太宗能够用重金收买常何及其部下的有利条件，而建成也因常何是其旧部而不怀疑。正由于此故，所以“太宗能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预伏其徒党于玄武门，而守卫将士亦竟不之发觉。建成、元吉虽先有警告，而不以为意者，殆必以常何辈守

卫玄武门之将士至少非太宗之党徒也①”。

太宗收买常何后，将其安插在玄武门驻守，帮助其发动事变，争夺皇位。《墓碑》所说“趋奉藩朝，参闻霸略”，即指此而言。

关于太宗杀兄夺位之事，S·2630《唐太宗入冥记》中也有曲折的反映。玄武门之变的真相在唐代是讳莫能言的，但《唐太宗入冥记》则巧妙地让冤魂在冥司诉讼。它将人世间的行私舞弊丑剧，移在地狱演出，让至高无上的皇帝也向司命判官营私行贿。

《唐太宗入冥记》在叙述太宗到了地狱冥司的种种心态后，接着写道：

> 皇帝遂依崔子玉所请，进步而行。崔子玉前，皇帝随后，入得屏墙内东面，见有廿所已来，皇帝问从者：“第六曹司内有两人哭为何事？得尔许哀”。崔子玉奏曰：“不是余人，建成、元吉二太子。”皇帝闻之，□□语崔子玉曰：“朕不因卿追来到此，凭何得见兄弟□？”崔子玉奏曰：“二太子在来多时，频通款状，苦请追取陛下对直。称诉冤屈，词状颇切，所以追到陛下对直。陛下若不见兄弟，臣与陛下作计校有路；陛下若入曹司，与二太子相见，恰是冤家相逢，臣亦无门救得陛下，应不得却归长安。惟陛下不用看去，甚将稳便。”帝闻此语，更不敢多问，遂匆匆上厅而坐。……（崔子玉对皇帝）问：“大唐天子太宗皇帝在武德七年，为甚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

《唐太宗入冥记》虽然属于小说家言，其主要内容也不是讲玄武门之变，但它与敦煌写本《黄仕强传》一样，“都是中国化了的富有民族特色、带有浓烈时代色彩的文学作品，它们一定要

---

①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载《金明馆丛稿 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反映某一时期中国社会的现实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它也曲折、隐晦地反映了玄武门事变的部分真相。

3、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

敦煌遗书的发现，填补了历史研究、尤其是晚唐五代西北史地研究的空白。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占领河西，中断了河西与长安的联络。此后，史籍文献对河西地区的情况鲜有记载，即使某些零散记述，也多属传闻，不太准确。幸而敦煌遗书中有许多晚唐五代宋初的社会文书，使河西地区的历史借此得以明瞭。

《元和郡县图志》卷40载：“沙州，建中二年陷于西蕃”。敦煌写本《寿昌县地境》也说“建中初陷吐蕃”。至于张议潮率众起义，赶走吐蕃统治者，收复沙州的时间，史籍文献均载在大中五年（851年），而敦煌遗书则载为大中二年，如S·0788《沙州图经》曰：“建中初陷吐蕃，大中二年张议潮收复”；P·3636《辛未年七月西汉金山国文件》载：“沙州本是大唐州郡，去天宝年中，安禄山作乱，河西一道，因兹陷没一百余年，名管蕃中。至大中三年，本使太保起敦甲兵，□却吐蕃，再有收复”；S·3329《张氏修功德记》曰：“敦煌、晋昌收复已讫，时当大中二载，题笺修表，纡道驰函（沙州既破吐蕃，大中二载，遂差押牙高进达等驰表函入长安城，上献天子）。上达天闻。”

从以上敦煌文书的记载可知，沙州收复在大中二年，然而由于河西阻隔，表文无法顺利到达长安，故在大中五年使者才将表文送达朝廷，故史书均载为五年。由此看出，唐实录及诸史所记地方事，常以消息或表奏到达朝廷日为准，而当时当地实物所记则最为可靠。

---

①柴剑虹《读敦煌写卷〈黄仕强传〉札记》，载《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吐蕃占领沙州六十余年，其推行的制度是什么？这是学术界一直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据S·3287背《子年汜履倩等户手实》、S·2729《辰年三月僧尼部落米净辩牒》等文书内容可知，吐蕃占领沙州后不久，约在788年即派出“莫使”进行了勘查户口的活动，790年又将基层居民分成部落制形式来管理。据两件《吐蕃沙州诸户口数地亩簿》（S·4491、S·9156）分析，吐蕃在沙州实行了按户计口授给“突田”的突田制，不分男女老少，每人一突即十亩①。

S·2103《酉年沙州灌进渠百姓李进评等牒》曰：

> 城南七里神农河母，两勒汎水，游淤沙坑，空地两段共三突。右南沙灌进渠用水百姓李进评等，为已前移灌进口，向五石口前逐便取水。本无过水渠道，遂凭刘屯子边，卖合行人地壹突用水。今刘屯子言：是行人突地，依籍我收，地一任渠人别运。……

文书中提到“空地两段共叁突”。可见空地可以用“突”来计量。从李进评等从刘屯子边买得“行人地壹突用水”亦可知，“突”是土地计量单位。另外，S·4661文书第一行有“八突”字样，其后则有明细的亩数记录。另如P·3410《崇恩析产牒》4至5行有“无穷地两突，延康地两突”等，都是以“突”作为土地计量单位的。

作为土地计量单位的“突”，一突是多少呢？通过对《沙州诸户口数地亩簿》的分析可知，一突等于唐制十亩，半突等于五亩。

通过对以上文书的分析探讨，使我们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即吐蕃奴隶主在管辖河西地区的同时，其奴隶制社会发

---

①参阅陈国灿《敦煌吐鲁番文书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6年1期

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其中如从大规模杀掠徙民政策转变为丈量土地收取税收。吐蕃为了对沙州进行有效地统治，曾进行过地亩清查和登记户口、田亩的工作，并适应汉人地区的情况将一“突”换算为唐制十亩，向土地耕作者收取赋税——突税，依附农民还要向土地占有者提供地租——突课①。

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收复沙州后，被唐廷敕封为归义军节度使。咸通八年，议潮东入长安，由其侄淮深代行归义军事务。大顺元年，淮深全家暴卒，由淮鼎继为归义军统治者，紧接着又由议潮婿索勋继任。到了896年初，张承奉又掌归义军之权。这期间归义军的权力交替变故情况，文献史料基本上是空白。幸赖《张淮深墓志铭》、《张氏勋德记》、《索勋纪德碑》、《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诸文书及莫高窟题记才得以明了，然其中的细节过程还不十分清楚，隐伏的问题还不少，仍有待于史学界与敦煌学界的深入探讨。

新旧《五代史·吐蕃传》载：“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这是史籍上对金山国及张承奉自称白衣天子的唯一记载，更多的情况却无从得知。而敦煌遗书P·2864背《张永进上金山天子白雀歌》、P·3033背《龙泉神剑歌》、P·3633《辛未年七月沙州百姓万人上回鹘天可汗书》、P·2992背《曹议金上回鹘众宰相状》等文书却具体记述了这部分历史，从而使“金山国事，有年可稽，有事足纪，千载坠史”，终被填补。

敦煌遗书中有许多反映归义军时期人民生活的各种文书，如租佃、质典、买卖、雇佣、便粮油历、社司转帖以及民间各种诉状、辞牒等，都是研究唐末五代及宋初这一地区人民生活的宝贵材料。其中的寺院经济文书，是研究唐五代寺院经济的绝好材

---

①详见姜伯勤《突地考》，载《敦煌学辑刊》1984年1期

料；再如民间俗文学作品，如《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都反映了当时人物的经历和事件，是研究河西历史值得参考的重要资料。

敦煌遗书中还有许多地方志材料，如《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城土境》、《沙州地志》、《寿昌县地境》、《沙州伊州地志》、《西州图经》、《瓜沙两郡史事编年并序》、《敦煌录》等等，均是研究西北史，尤其是敦煌史地的宝贵材料。通过对其挖掘、整理、探讨，可以填补地方史研究的空白。其中尤以《沙州都督府图经》最为重要。

《沙州都督府图经》为历来官私目录所未著录，也未为类书、史书、史注所征引。这卷文书保存了中古时代有关敦煌历史、地理、自然资源以及中西交通方面如水渠、泊泽、池堰、古城、驿站、学校、殿堂、祥瑞、歌谣等史料，其内容极为丰富，对汉唐丝路研究及古城考证，极有价值。

综上所述，敦煌遗书直接补充和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如果将文书与史籍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钩沉稽佚，层层深入，并由微观到宏观作出分析认识，必将会促进历史研究的发展，同时也会开拓敦煌学研究的新局面。

二、宗教研究的新材料

敦煌是汉唐丝绸之路的咽喉，中西交通的一大都会，是最先接受外来思想的地方，也是外来宗教传入我国的最早落脚点。佛教、景教、摩尼教等，都是经敦煌传入中原地区的，因而敦煌遗书中有关宗教的卷子特别多，通过对其挖掘、整理，可以为宗教研究提供新的材料。

1、“佛教遗书”甲天下

在敦煌遗书中，大约90%以上的卷子都是佛教文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将敦煌遗书称为“佛教遗书”。

从敦煌遗书纪年题记看，佛教卷子最早的是日本中村不折氏藏《譬喻经》（散746），该卷尾端有“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于酒泉城内□□中写迄”题记。此甘露乃前秦苻坚年号，即公元359年。其次为S·0797《十诵比丘戒本》，其尾题有“建初元年岁在乙巳十二月五日戊时，比丘德佑于敦煌城南受具戒”题记，可知此卷乃西凉李暠建初元年抄卷，即公元405年写本。最晚者为北图收字4号《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法门戒品》，该经有“至道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灵图寺”题记，可知乃公元995年写本。其次，苏藏《曹宗寿造帙疏》有“大宋咸平五年壬寅岁五月十五日记”题记，可知此卷为公元1002年写本。另外，据报道苏藏229号为《景德传灯录》残卷。《景德传灯录》成书于宋真宗景德三年，即公元1006年。如果情况属实的话，那么此经之抄写，便不得早于1006年。

敦煌佛教卷子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外地流传而来。中原的帝王将相、世家豪族，不乏崇信佛教者。他们常常做这种“写经功德”，将写经分送全国各大寺院“供养”。张、曹归义军时期，每当向中原朝廷进贡时，还附带“请经”，而朝廷的回赐物中，也常常有佛经。如S·2140《沙州乞经状》曰：“沙州先得帝王恩赐藏经，即今遗失旧本，无可寻觅欠数，却于上都乞求者”。另外，求法的僧侣、东西往来的商人也或多或少地带来了一些佛经。二是本地的译经、疏释、著录及刻写本。从现有题记可知，敦煌早就有了自己的译场，从北魏开始就有了专门的写经生。这些写经生靠替施主抄写佛经而生活。除此之外，还有僧众学习用的佛经和注解，有敦煌州县学校讲给学生听的课本和学生

听讲诵习记下来的笔记等等①。

敦煌佛经的内容十分庞杂，根据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经、律、论类，即佛教的“三藏”。敦煌遗书中，佛教各宗派的卷子都有，有些甚至很多，如《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金刚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妙法莲花经》、《维摩诘经》等，多则几千号，少则也有数百号。尤为宝贵的是不少经卷附有题记，如北图藏生字24号和闰字96号《净名经关于释抄》的题记说：“此经翻传，总有六译：第一后汉刘氏灵帝代临淮清信士严佛调，于洛阳白马寺译两卷《维摩诘经》。第二吴朝孙氏大皇帝月氏国优婆塞支谦于武康译三卷，名《维摩诘所说不思议法门经》。第三西晋司马氏武帝沙门竺法护，西域人，解三十六国语，于洛阳译一卷，名《维摩诘所说法门经》。第四东晋惠帝西域沙门竺叔兰，元康六年洛阳译三卷，名《毗摩罗诘经》。第五后秦姚兴弘始八年三藏沙门鸠摩罗什于长安大寺译三卷，名《维摩诘所说经》，即今所译之本是也。第六大唐朝三藏沙门玄奘贞观二十一年于长安大慈恩寺译六卷，名《无垢称经》。”这条题记，将《维摩诘经》的翻译情况交待得清清楚楚，其对佛教翻译史的研究甚有意义。又如P·2094《金刚经》前有抄经者所加的《持诵金刚经灵验功德记》，其尾题云：“于唐天复八载，岁在戊辰四月九日，布衣翟奉达写此经赞验功德记，添之流布，后为信士兼往亡灵及见在父母合邑等，福同春草，恶若秋苗，必定当来俱发佛会”。《金刚经》后记云：“布衣弟子翟奉达，依西川印出本内，钞得分数及真言，于此经内添之，兼遗漏别也。”由此我们可以了解此经的流传过程。再如S·2278《宝雨经》残卷，乃达摩流支于则天长寿二年所译该经的第三个译本，

①参阅袁德领《敦煌遗书中的佛教文书简介》，载《敦煌研究》1988年1期

与前两个译本相比，它多了一段武则天为自己称帝而造舆论的所谓“佛授记”，卷末题记中有许多武周新字，而领衔的是“大白马寺大德沙门怀义监译”。说明这一佛记的出笼与薛怀义关系密切，于唐代政治史的研究甚有价值。此外，敦煌佛经上还有一些私人题记，写明某人为了某功德而敬造某经典，是我们研究当时佛教现状及佛典崇拜、功德思想的重要资料。

（2）藏外佚经，即《大藏经》中未收的佛经。按照我国的传统，凡属翻译的域外佛教典籍，一般都应入藏。那为什么会有许多藏外佚经呢？这是由于唐末五代时，我国各地寺庙逐渐以《开元录·入藏录》所著录的1076部5048卷佛典为大藏的标准数目，并以此组织本地大藏。而一些《开元录·入藏录》未著录的佛典便被排除在外。就敦煌而言，曾有一个陷蕃时期，当时的高僧法成翻译了一批著作，仅在敦煌流传，未被编入《开元录》，后又被藏入藏经洞①。

敦煌藏外佚经发现后，即引起了佛学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当1910年清学部将劫余敦煌遗书移交京师图书馆后，我国佛学专家李翊灼迅速对其通检一遍，将未入“藏”的佛经编成《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疑伪外道目录附）》一卷，著录了160种藏外佛经。在李目的影响下，日本的佛学团体和佛学家，利用英、法、日所藏，又校订出近200种藏外佛经，辑入1924至1928年编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卷内的《古逸部》和《疑伪部》中。

敦煌藏外佛经的发现，为佛教史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如其中有些经典署名为马鸣、龙树、世亲著，他们都是古印度佛教大师。这些典籍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印度佛教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汉藏佛教的交流，印度佛学大师的生平、著作及影响都提供了新

①参阅方广锠《敦煌遗书中的佛教著作》，载《文史知识》1988年10期

的研究课题 。

（３）疑伪经。一般说来，佛经是由印度梵文、巴利文，或中亚古语言文字翻译成汉文的佛教典籍。所谓“疑经”，是指真伪未判的经典；所谓“伪经”、是指中国人假托佛说而撰述的经典。实际上，中国人撰述的经、律、论、章、疏，反映了中国的佛教特点，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宝贵材料。但历代政府在组织编制《一切经》或《大藏经》时，一般不把这种所谓“疑伪经”编入，有的甚至禁止在《大藏经》内附“疑伪经”目录。因此，这类经典不仅为《大藏经》所未收，而且在内地也保存极少①。敦煌佛经中，则保存有丰富的疑伪经，据初步整理，已有70余种。

（４）各种目录。敦煌遗书中各类佛经目录的数量不少，其中既有全国性目录、品次录、藏经录，也有点勘录、流通录、转经录，还有乞经状、配补录、写经录等，它全面反映了敦煌僧众围绕佛经所进行的各种活动。其中有许多珍贵资料，如《人集录都目》，是现存关于三阶教经典的最完整目录；《某寺历年配补藏经录》，为我们解开佛教帙号这一千古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②；尤其是《众经别录》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古典目录学，特别是佛经目录，提供了宝贵材料。

以上只是介绍了佛教遗书的几个主要方面，此外还有历史、寺院文书、音韵文学、逻辑（因明）学等方面的资料，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介绍了。

敦煌佛经在佛学研究上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其在校勘上的价值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足以校勘唐代以后开雕的各藏。敦煌写经，尤其是隋唐时期的写经，所用底本多是最好的本子，而且书写后，由校勘人多次校正，错讹情况较少。如S·6208《勘经僧名签》上有

①参阅周丕显《敦煌佛经略考》

②参阅方广锠《敦煌遗书中的佛教著作》，载《文史知识》1988年10期

“李涓写，勘了；义泉勘了；王昌像海勘两遍了；常海慧炬勘了。”S·4117《壬寅年三月二十九日再勘写经人及校字人数》载：“小马正书错画点，茂字、着字、本字、幼、旦、捐。王法律易。刘法律错书囊、波、疑……”。由此可知，其写经态度一丝不苟，是校勘上的最佳品。

第二、梵汉对照佛经。在敦煌佛经中，有一部分附有梵文原经，如P·2025、2798《大般若波罗密多经》，P·2739《大智度论》，P·2026《金光明最胜王经》,P·2783《妙法莲花经》等，均附有梵文原经。而这些梵文原本，在印度本土也早已散佚了。现在就有可能利用这批梵文本再移译，修正古译本在译文上的缺点和不足，更正确地认识这些佛经的宗旨①。

2、道教典籍

敦煌乃佛教圣地，留存的文书当然以佛经为主。不过，六朝，尤其是隋代以后，道教兴起，凡有佛教的地方大致上也有道教。再加上唐朝皇帝姓李，自称是老子后裔，故崇奉老聃，因而敦煌卷子中也有为数不少的道家典籍，并且其纸之品质，书法之工整，品式之考究等，都在其他一切写本之上。

《道德经》乃敦煌遗书中的主要道教典籍，在道教研究及中国文化史上都有一定的价值。今本《道德经》二卷，乃唐以前的定本。但在唐以前也有以《道经》为下卷，《德经》为上卷者，却不为学人所习闻。敦煌遗书中则有明确的反映，如P·2584、2420、2421，皆题曰《道经下》或《老子道经下》，P·2417、2347皆题曰《老子德经上》。1972年山东银雀山发现的本子也是《德经》上，《道经》下。由此可知，以“德”、“道”为上下是战国以来就存在的，唐写本还保存了旧本，这是很

①参阅周丕显《敦煌佛经略考》

宝贵的①。

敦煌《道德经》主要是河上公注本。自后汉以来，《道德经》就流传着两种注本：一是王弼注本，主要讲《道德经》的理论，是给读书人看的；另一是河上公注本，是给道士看的。河上公注本往往把道教的许多东西，如《洞玄经》等，都放在《道德经》后面。

敦煌另一主要道教典籍为《老子化胡经》。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就与道教、儒教发生了关系，并相互批评、攻击。道家反对佛教的东西，最重要的莫过于《老子化胡经》。敦煌遗书中保存有《老子化胡经》的四个卷子（P·2004、2007、3404、S·1857），通过对其整理、校勘，可知大概情况。《老子化胡经》说，老聃曾经到西藏、印度去讲学，结果把胡人都感化了，都从了老子的道，甚至还说释迦牟尼佛是老子的弟子。另外，道家的寺观里有三清殿，所谓老子一气化三清，就是中间老子，左边释迦牟尼，右边孔子。

除了《道德经》及《老子化胡经》外，敦煌遗书中还有一些道教佚经，即《道藏》未收的经典，如《太上洞玄灵宝妙经》（P·2454、2724）、《老子说罪福大报应经卷七》（P·2818）、《洞真三天正德经》（P·3327）、《诸经要略抄义》（P·2467）等十余卷。

3、景教文献

“景教”是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的一个支派，这个支派是以聂斯脱利命名的所谓“聂斯脱利派”。聂斯脱利是公元五世纪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大主教。公元431年，在以弗所举行的一次教会

①参阅姜亮夫《敦煌经卷在中国文化学术上的价值》，载《思想战线》1981年1期

主教会议上，他被指控为主张所谓“二位二性”神学的“异端”而被革了职，后被流放致死。从此以后，凡是同情和支持他的人都被称为“聂斯脱利派”。

在唐朝太宗时期，聂派传教士就把基督教传入中国。但在17世纪以前，人们并不知道这一史实，直到明代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在西安市西郊发现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我们才知道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传教士确实在太宗贞观九年来到了中国。“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建立的，它是景教传入中国最有力的物证。但由于景教文献很少，因而我们无法对其在中国的流传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可喜的是，在景教碑于1625年出土后，又过了近三百年，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了七种有关唐朝景教的文献，丰富了景教研究的内容①。这些文献都为黄麻纸卷轴的手抄本，现将其简介如下：

（1）《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被伯希和劫往巴黎，编号为P·3847。这是教会普遍使用的“荣归主颂”的叙利亚版的唐代译本，带有佛教语气。所谓“三威”，就是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威严；“蒙度”就是得蒙救赎的意思。从其内容可知，此件写成于公元八世纪，有的学者推测其为景教碑碑文的作者景净译出的。

这篇景教颂文，就其重要性而言，仅次于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而有些方面则比它更有意义。敦煌本《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无残缺，共分三段，第一段为《三威蒙度赞》，第二段是圣徒名单和圣经目录，第三段是历史简述。我国教会1940年出版的《普天颂赞》曾将它放在第二首，为礼拜时会众歌颂之用。

---

①七种景教文献的录文及详论，参见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知识出版社1982年出版

（2）《尊经》，此卷亦为伯希和劫往法国，其开头为“敬礼妙身皇父阿罗诃，应身皇子弥施诃。证身卢诃宁俱沙。已上三身同归一体。”然后列举了22位圣徒，其名字多由叙利亚文译音而来，其中能辨认的有13位，多系《新约》、《旧约》中的人名，如瑜罕难即约翰、庐伽即路加、摩矩辞即马可、明泰即马太、牟世即摩西、宝路即保罗等①。其后列举有《宣元至本经》、《志玄安乐经》、《牟世法王经》等35部经书，其中多由叙利亚文译音或译意而来，能辨认的很少。

《尊经》的最后有一段附录，颇有史料价值：“谨案诸经目录。大秦本教经部五百卅部，并是贝叶梵音。唐太宗皇帝贞观九年，西域大德僧阿罗本届于中夏、并奏上本音。房玄龄、魏征宣译奏言。后召本教大德僧景净译得已上三十部，卷余大数具在贝皮夹，犹未翻译。”从其提到景净可知，《尊经》的著作时间当在他撰景教碑文的建中二年前后，即阿罗本来长安后约146年之事。在这146年中，景教诸经总共有530部，当时已经译成中文的只有35部，其他仍在贝叶皮夹中，尚未译出。在《尊经》所列举的35部中，有三种并非景教文献，而是属于摩尼教的。在现在已经发现的几种经中，只有《三威蒙度赞》是译作，其他多是用中文解释景教教义之作。

（3）《志玄安乐经》，原为李盛铎收藏，现下落不明。最先研究此经的是日本羽田亨教授，他于1928年秋和杉村勇造氏同到天津向李氏请求借阅并准予抄录进行研究，翌年三月在《东洋学报》第18卷第1号发表《志玄安乐经》全文并加考释。

《志玄安乐经》共一千多句，据羽田亨说，本经是写在敦煌经卷常用的黄麻纸上，细栏界上下和行间，首行前面和159行后

---

①参阅（英）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

面，均有《志玄安乐经》题字，足见其首尾完整，但最初九行的下半截残缺。字体和《三威蒙度赞》很相近，为晚唐之物。

《志玄安乐经》是景净编撰的一本宗教小册子，它采取对话体形式，首先叙述弥施诃（即耶稣基督）和岑稳僧伽（西门彼得）以及其他群众在约旦河边某圣殿里集会。西门彼得问耶稣基督说：如何能得安乐道？耶稣回答说：通过“四法”（即无欲、无为、无德、无证）就可以得到安乐道。此外，对人间事物的认识，必须用十观法，即十种观点，否则就达不到目的①。

（4）《序听迷诗所经》，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梵文教授高楠顺次郎于1922年所得。据羽田亨研究，所谓“序听”即“序聪”，唐音读耶稣。“迷诗所”当为“迷诗诃”，即弥赛亚（基督）的音译，今可译作“耶稣基督经”。全经共有170行，每行约17字。其经文字聱牙难读，可能是景教经书中最古的一种。全文内容，始于迷诗所向众说法，作者在经文开头部分首先谈到上帝无人得见而又无所不在，然后谈人对上帝的依靠及偶像崇拜的兴起，如何区别干净食物与不干净食物，接着谈到人的三大义务（事天尊、事圣上、事父母），最后叙述了迷诗所的一生行事。该经字体与《一神论》相似，而且均不见《尊经》经目。据学者们推测，此经为早期译作，是阿罗本及其徒众翻译的。

（5）《一神论》，此经为日本京都大学的富冈谦藏于1916年所得。它是由《喻第二》、《一天论第一》、《世尊布施论第三》三个小卷集合而成。此经首部残缺，现存405行。文字艰涩难读，断句都很困难，估计是景教早期的文献。原本的顺序被倒置了，《喻第二》反列为首卷，《一天论》却被列为第二，这可能是抄写人大意所致。此件的错字、别字、漏字也很多。至于内

---

①参阅陈增辉《敦煌景教文献〈志玄安乐经〉考释》，见《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文会集·文史、遗书编下》

容，《一天论》主要讲景教的神学和哲学，《喻第二》则用种种比喻来说明唯一神的种性，《世尊布施论》引用《圣经》最多，约760字，主要是述说《新约·马太福音》第6、7章的前半，只删去了“主祷文”。其中提到的“六百四十一年”，当指公元641年，即景教第一个传教士阿罗本来华的第六年。另外，它与《序听迷诗所经》的体裁、纸幅与书体均颇相似，估计也是景教早期作品，可能出于阿罗本等人之手。

（6）《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即《尊经》所列的《宣元至本经》，在诸经目录中占第二位。可惜只留有断简残篇。此残卷初由天津李盛铎收藏。前10行由罗振玉公布于《敦煌遗书》四册内，标题为《宣元本经》。1943年，日本小岛靖君从李盛铎遗物中发现此经的后30行，并拍成照片，寄佐伯好郎。原件为小岛靖君藏。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教授佐伯好郎说，他于1937年获得该经的前面10行，1943年又获得卷末30行，均载入1951年出版的英文著作《有关中国景教文献与遗迹》。该经最后有“开元五年十月廿六日，法徒张驹传写于沙州大秦寺”题记。可知作于公元717年。其文字也和景教碑文相似，可能也是由景净写作的。

（7）《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即《尊经》所列的《通真经》。此卷原为李盛铎收藏，1943年为小岛靖君所得。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小岛从天津撤退，其所藏原件于此时遗失，现藏何处不得而知。日本的佐伯好郎声称，1943年末，小岛靖君曾给他寄去《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全文的照片。这是一首关于耶稣上了高山后，在门徒面前改变形象的颂辞。全文不到200字，最后有“沙州大秦寺法徒索元定传写教读，开元八年五月二日”题记。

4、摩尼教经典

摩尼教是公元三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所创立的一个宗教。在现代世界中，它已没有什么信徒了。但在古代中世纪的一千余年中，摩尼教却曾在伊朗、叙利亚、埃及、巴勒斯坦、北非、欧洲、小亚细亚、中亚细亚以及中国内地广为流传。其经典也曾由古叙利亚文先后译成拉丁文、希腊文、科普特文、亚美尼亚文、中古波斯文、突厥文、粟特文、汉文、回鹘文、阿拉伯文等十余种文字。摩尼教是古代历史中的一个世界性宗教，在其所到之处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在中亚，它曾形成独立的教团；在唐王朝时的中国内地，它曾广为传播，并影响到唐以后的多次农民运动。

对于摩尼教的研究，在本世纪以前，主要是依靠间接资料，即依靠古代与摩尼教对立的一些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的记载；而摩尼教本身，由于屡遭迫害，没有留下什么经典和资料。因此，学者们对摩尼教的研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直到本世纪初，才为敦煌、吐鲁番及其他考古的大量新发现所打破。

敦煌发现的摩尼教重要文献，主要是三种汉文摩尼教残卷①。它们均被收入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4卷，现将其简要介绍如下：

（1）《摩尼教残经一》，现藏北京图书馆，编号为宇字56。该残卷最早由罗振玉以《波斯教残经》为名，刊于1911年的《国学丛刊》第二册。罗氏为刊布该经而写了按语，并将此册《丛刊》赠与日本学者羽田亨，羽田亨遂于次年在《东洋学报》上发表论文，考定该经乃为摩尼教残经。与此同时，法国的沙

①敦煌发现的三种摩尼教经典录文及详论，见林悟殊《摩尼教及其东渐》，中华书局1987年版

畹、伯希和也发表了《中国发见的摩尼教经典》一文，专门研究中国的摩尼教。1923年，陈垣先生发表《摩尼教入中国考》①，文中提及这部经，并疑其为延载元年波斯摩尼僧献给武后的《二宗经》。1983年，林悟殊先生发表了《〈摩尼教残经一〉原名之我见》②一文，详细论证了该残卷的有关问题。以为《残经一》并非《二宗经》，而是本自摩尼本人的著作。并得出结论："《残经一》的原名很可能就是《仪略》所提及的摩尼第五部经典《钵迦摩帝夜》，即《证明过去教经》。"

（2）《摩尼光佛教法仪略》，该写本由两截残卷组成，前半截被斯坦因劫往伦敦，编号为S·3969，后半截被伯希和劫往巴黎，编号为P·3884。前半截卷首题有"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一卷"。1925年，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发表《敦煌发见〈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中的若干词语》一文，首先宣称两半截残经本来是连在一起的，并就其中的一些用词作了考证。同年，伯希和也发表文章，肯定S·3969残卷是P·3884的前半截。

《仪略》卷首题目之下署有"开元十九年六月八日大德拂多诞奉诏集贤院译"题记，因此许多论者都认为它是公元731年在华摩尼教传教士奉诏翻译的。但林悟殊先生认为，汉文《仪略》并非译作，而是著作。由于唐玄宗自始对摩尼教不感兴趣，便于开元二十年七月下诏敕禁摩尼教："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以其西胡等既是乡法，当身自行，不须科罪者③"。在敕禁之前，"很可能是朝野对原来武后优容摩尼教的政策持有异议，玄宗为了弄清摩尼教的真面目，以便对它采

---

①《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

②载《文史》21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通典》卷40《职官二十二》

取必要的措施，故下诏辨清摩尼教，令在京城的拂多诞到集贤院去书面奏闻其教的真实情况；拂多诞为了应付皇帝的要求，便撰写了《仪略》①”。

敦煌本《仪略》残卷共约1540余字，除末两行因残缺不全无法确定内容外，其余所述很完整。它共分为六章，每章各有题目。《讫化国主名号宗教第一》介绍教主摩尼创教的历史；《形相仪第二》是描述教主摩尼的神圣光辉形象；《经图仪第三》是列举摩尼的主要典籍；《五级仪第四》专述摩尼教团的组织结构；《寺宇仪第五》专谈摩尼教寺院制度；《出家仪第六》专言该教出家僧侣应掌握的基本教义，即二宗三际论。由此可知，它是相当全面的。是了解摩尼教整个概况的重要著作。

（3）《下部赞》，该卷被斯坦因劫往伦敦，编号为S·2659。敦煌本《下部赞》基本完整，只有开头部分稍有损缺：计有七言诗1254句，还有少量四言和五言诗，此外，尚有音译文字三段和其他一些说明。据林悟殊先生考证，《下部赞》并非中国摩尼教徒自己撰写的经典，而是唐代后期的一篇译作。它是中国摩尼教徒举行宗教仪式时用的赞美诗，在现存各种文字的摩尼教赞美诗中，数它最为完整，内容最为丰富。《下部赞》是研究摩尼教教义、宗教仪式及其在中国变化的重要资料。

三、科学技术的珍宝

敦煌遗书中有许多科技史资料，如数学方面有算术、算经；物理学方面有力学、计量学；化学方面有冶炼、炼丹术；天文学方面有历史、星图、天文图；造纸与印刷术的资料也极为珍贵。

---

①《摩尼教及其东渐》171页。

此外，还有医学、建筑、纺织、酿酒、熬糖以及矿业开发与利用、兵器、手工业等技术史方面的材料。它们对我国科技史的研究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是学术海洋中的一颗颗珍宝，值得我们重视与研究，下面仅就天文学与印刷术两项略加介绍。

1、丰富的天文学资料

天文学资料包括历日与星图两个方面。敦煌遗书中的历日写卷已知有40余件，且均比《会天历》为早，最早的为北魏历日，最晚的为北宋历日。

吐蕃占领以前，敦煌一直使用唐王朝的历书；吐蕃占领敦煌后，象征王权的中原历书也无法颁行到那里了。吐蕃使用地支和十二生肖纪年，这既不符合汉人用干支纪年、月、日的习惯，也无法满足敦煌汉人日常生活的需要。因此敦煌地区便出现了当地自编的历书。张议潮收复沙州后，由于敦煌地区自编历书已成习惯，民间仍继续使用自编历书，并一直延续到宋初，前后达两个世纪之久。

敦煌历日大部分为敦煌地区自编，只有三件例外。一件是唐中和二年（882）“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日”，它是由成都流落到敦煌的私撰历日，只残存三行文字。另一件是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和十二年历。这件历书是现存敦煌历日中年代最久的一件，也是现知唯一的北魏历书实物。第三件是《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印本历日》，此历存二月廿日至年末（中有残缺），是现存敦煌历书中内容最丰富的一件。

敦煌地区自编的历日有30多件，现知最早者为《唐元和三年（808）戊子岁具注历日》，是一个只存4月12日至6月1日的断片，最晚者为P·3507《宋淳化四年（993）癸巳岁历日》。此外还有P·3900《唐元和四年己丑岁（809）具注历日》、P·3492《唐光启四年戊申岁（888）具注历日》、P·4983《唐景福元年

壬子岁（892）具注历日》、S·2404《后唐同光二年甲申岁（924）具注历日》、P·2623《后周显德六年己未岁（959）具注历日》、P·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986）具注历日并序》、P·2705《宋端拱二年己丑岁（989）具注历日》等。

敦煌历日的朔日与同一时期的中原历不尽一致，常有一到二日的差别；闰月也不一致，比中原历或早或晚一、二月。但纪年干支却同中原历十分一致，表明中国由来已久的干支纪岁法并未因地方自编历日而中断。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来自基督教的星期制度最早引入我国历法是从敦煌历开始的。一星期的各日在敦煌历日中都有特定的术语，如蜜（星期日）、莫（星期一）、云汉（星期二）、嘀（星期三）、温没斯（星期四）、那颉（星期五）、鸡缓（星期六）。一般来说，敦煌历要在正月一日注上星期几，如P．3403《雍熙三年丙戌岁具注历日并序》，在正月一日顶端注“那颉日受岁”，意即这天是星期五，以后只在星期日那天注一“蜜”字。个别历日只在当年正月初一注上星期几，以下不注而由此推算。至于这些名称究竟来自哪里，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观点，但所注的星期日除偶有抄误外，基本正确无误。

敦煌历日在我国历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古代历书如何演进发展，以前因实物太少而很难了解其发展轨迹。我国原有古历日，除西陲简牍载有少许汉代历谱外，以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的《会天历》为最古，清代学者钱大昕孜孜访求数十年才得到，被学界视为秘宝。敦煌历日的发现，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有助于我们对古代天文学知识的探讨。吐鲁番出土的《唐显庆三年具注历日》和《唐仪凤四年具注历日》，虽然其内容比较丰富，但也只是同敦煌发现的简本历日大体相仿。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的繁本历日，其内容更为丰富，基本上奠定了宋至清代历日的格局。敦煌历日所存的繁、简两种形制，恰好反映了古历由

简到繁的演进过程。

在敦煌文献中，还有两幅精美的古代星图，一幅是S·3326《全天星图》，现藏英国图书馆；另一幅是《紫微垣星图》，现藏甘肃省敦煌市博物馆，画在敦博076号《唐人写地志》残卷的背面。其中《全天星图》是世界上现存星数最多（1359颗），也是最古老的一幅星图，早就引起了中外科技史专家的重视。英国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家李约瑟教授首先研究了这幅星图，认为在所有文明古国流传下来的星图中，这是最古老的一种，并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天文部分中选用了两幅局部黑白照片。S·3326卷首已残，无标题，内容为气象杂占，星图居于卷中，卷末题“其解梦及电经一卷”，其旁绘一执弓射箭的“电神”。中国学者通过对这幅星图及整个写本绘画、书法、电神服饰和文字中的避讳等进行考察研究，推断该星图的抄绘年代在公元705—710年间①。

《全天星图》从12月开始画起，根据每月太阳位置的所在，把赤道带附近的星分成12段，利用类似麦卡托（1512——1594年）圆筒投影的方法画出来，最后再把紫微垣画在以北极为中心的圆形平面投影图上。在欧洲，麦卡托投影是由荷兰数学家兼地理学家雷梅尔（麦卡托即雷梅尔的拉丁语名字）首创的。他在1568年刊印了第一幅“麦卡托投影”航海图。敦煌唐代星图的发现，证明了中国天文学家使用圆筒投影的时间要比麦卡托早七、八百年。可见敦煌星图在画法上是相当进步的，即使现在星图的画法仍然采用这种方法，所不同的只是把南极附近的星再画在一张星图上。

我们称这幅星图为《全天星图》，是因为它囊括了当时北半

---

①马世长《敦煌星图的年代》，载《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

球肉眼所能见到的大部分恒星，当时看不到的南极及其附近恒星自然不在其中，这是它同现代《全天星图》的不同之处。

《紫微垣星图》原件高31厘米，残长299.5厘米。1944年向达教授在敦煌从事考古发掘时从民间发现，这卷文书的正面为《唐人写地志》残卷，背面有《占云气书》一卷，残存的《观云章》和《占气章》有彩绘的云气图形，图的下面附有作为说明的占辞，卷末有图无文，在《占云气书》的前面有一幅紫微宫图，即《紫微垣星图》。据向达教授研究，《唐人写地志》残卷撰于天宝初年（八世纪中叶），但抄写年代可能要晚些。背面星图和《占云气书》的抄写年代比正面还要晚，字体近于五代（十世纪）写本。

《紫微垣星图》也是彩绘，画在两个同心圆上。在紫微垣近阊阖门处，标注“紫微宫”三字；垣的东西两侧分别注“东蕃”和“西蕃”，意即“蕃卫”；内圆（即紫微垣）画成一个封闭的圆圈，垣的前后面都没有缺口作为垣门。图中的星点用红、黑两种不同颜色，外圆直径26厘米。根据其中传舍、八谷和文昌等星推测，这幅星图观测地点的地理纬度为北纬35°左右，相当于西安、洛阳等地。

除此之外，敦煌遗书中还有一些天文学资料，如P·2512是一卷重要的天文著作，残存内容包括四部分：即星占的残余部分；《二十八宿次位经》和甘德、石申、巫咸三家星经；《玄像诗》；日月旁气占。P·3589卷内也有一《玄像诗》。所谓《玄像诗》，就是以韵文诗歌的形式来介绍全天星官，这样便于背诵记忆。它反映了古人记忆星官的一个重要阶段，使我们得以明白古代这类作品的演进和发展过程。

2、雕版印刷术的实证

印刷术，包括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

一，是我国人民对人类文化的伟大贡献。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文中说："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级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东传朝鲜、日本，南传越南等国，向西则通过丝绸之路逐渐传入埃及和欧洲各国，并进而传遍全世界，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由于没有实物为证，再加上年代久远，史籍记载缺乏，对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代，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可喜的是，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一些印本书。在这些宝贵文献中：雕版印刷产生的过程，从原始传拓本到整版开雕的印本都有留存，其中有些还附有纪年题记，这就为我国雕版印刷发明的时间和演变，提供了可贵的实物例证资料。从文献记载及敦煌所出拓本、印本书卷来看，雕版印刷起源于捶拓，而刻石及石经的出现导致了捶拓方法的兴起和演变。

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三种初唐和中唐时期的捶拓本，即伯希和编号P·2976唐太宗书刘瑕《温泉赋》，P·4510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P失号元和会昌间柳公权书《金刚经》。这些捶拓本的问世，使我们看到了原始拓本的情况，为研究雕版印刷的产生提供了实物证据。

捶拓方法的广泛使用，促进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敦煌遗书中的雕版印刷品及文字记载，为研究雕版印刷的发明时间及原委，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现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一）唐咸通九年（868）《金刚经》

原卷为斯坦因劫去，翟理斯目录编为8083号，斯坦因原编为SP·002号，《斯坦因劫经录》中未曾著录。此卷首尾完整，由

七张纸粘接而成，每张长76.3厘米，阔30.5厘米，全长约534厘米。卷首有一幅释迦牟尼说法图，其余是《金刚经》全文。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年月题记一行，这是世界上现存第一部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这件印刷品的时代，早于被认为是欧洲最早印刷品的1423年德国《圣克利斯道夫》木板画像约500多年，因而被誉为“世界印刷史和版画艺术的冠冕”。此卷不仅年代早，而且已是一卷完整而又正规的书籍。王玠可说是现知最早的自己出资印书人。

（二）曹元忠舍资雕造的印刷品

公元944—974年，曹氏政权在曹元忠执政时期达到了鼎盛。曹元忠及其夫人浔阳翟氏十分佞佛，除在莫高、榆林诸石窟中大规模开窟造像外，还舍资雕版印刷佛像、佛经。敦煌遗书中就发现了一些曹氏舍资雕造的印刷品，如：

（1）观音像：翟理斯编号为8087，P·4514内有5份。图为观音立莲台上，右手提净瓶，左臂上曲作说法印，周身有飘带飞扬。右榜题“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曹元忠造”，左榜题：“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题记为“弟子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开国侯曹元忠雕此印版，奉为城隍安泰，阖郡康宁；东西之道路开通，南北之凶渠顺化；疠疾消散，刁斗藏音。随喜见闻俱沾福祐”。“于是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记”。“匠人雷延美”。

（2）毗沙门像：翟理斯编号为8093，P·4514内有11份。P·3879号残存下半部（题记全）。其图左榜题“大圣毗沙门天王”。题记为“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主领天下一切杂类鬼神。若能发意求愿，悉得称心；虔敬之徒，尽获福祐。弟子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曹元忠请匠人雕此印版，唯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道路和平，普天安乐”。“于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记”。

以上的观音像和毗沙门像，都是曹元忠等发愿出资，由雷延美雕造的。开运四年七月十五日为公元947年8月4日。

（3）木刻印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巴黎本P·4514、P·4516和伦敦本翟理斯编 8084 号均为此经。其题记为“弟子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兼御史大夫谯郡开国侯曹元忠普施受持”，“天福十五年己酉岁五月十五日记”。“雕版押衙雷延美”。此经刻印时间为公元949年6月4日。

由以上曹元忠舍资雕造的印刷品实例，可以得知以下重要情况：雷延美是现知最早存姓名于印刷品实物中的刻印工匠；“雕版”、“匠人”、“雕版押衙”、“印版”、“雕此印版”、“请匠人雕此印版”等雕版印刷专门术语和有关词句，在印刷品实物中均为首见；曹元忠在短期内大量印造经像，并在衙署内开办木刻印刷工场。这个工场是现在已知的世界上第一家印刷工场。它对促进当时敦煌地区印刷业的发展进步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大随求陀罗尼》

此卷子极为著名，现存二本：伦敦藏本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有著录。巴黎藏本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之“戊录”七页有题记。此件上图下文，右上榜题“施主李知顺”，左上榜题“王文沼雕刻”。题记最后为“太平兴国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雕版毕手记”。此“手记”时间明确，即公元980年8月8日。王文沼是继雷延美之后，在敦煌汉文遗书中留下名字的第二位刻字工匠。“雕刻”、“雕版毕手记”也是印刷史上的宝贵记录。

（四）木刻印本历日

敦煌汉文遗书中所发现的木刻印本历日有两件，一件为“丁酉年具注历日”，翟理斯编号为8099号。此丁酉，翟理斯定为877年，即唐僖宗乾符四年，可信。上有墨笔题记：“四月廿六日都头守州学博士兼御史中丞翟为答报翫大德永世为父子莫忘恩也。”

另一件为《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翟理斯编号为8100。上有“中和二年具注历日凡三百八十四日”的明确题记，即公元882年。此卷虽然只残存三行，但刻印时间、地点、刻印书籍铺的题名俱全，是非常珍贵的印刷史资料。

（五）木刻印本韵书

现存木刻印本韵书主要有P·2014、P·2015、P·4747、P·5531《大唐刊谬补阙切韵》。据周祖谟先生《唐五代韵书集存》著录分析，这四号印本并非一版，而是包括六种不同的刻版。

（六）文字记录“京中李家印”

敦煌遗书P·2675号正面为“阴阳书”写本残卷，其尾题有“咸通二年岁次辛巳十二月二十五日衙前通引并通事舍人范子盈、阴阳氾景询二人写记”。背面为“新集备急灸经一卷”，书题下有“京中李家于东市印”一行。咸通二年为公元861年。

P·2633号《崔氏夫人要女文》（S·4129同文抄本首题《崔氏夫人训女文》）抄本，尾题“上都李家印《崔氏夫人》壹本”，背题有“辛巳”、“壬午”、“癸未”记年，“辛巳”最早亦为公元861年。

从以上有关雕版印刷术的实物和文字资料中，可以窥见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时代和原委。尤其是《金刚经》的发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金刚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日期的印刷品，其正文前有一幅题为《祇树给孤独园》的图，画着释迦牟尼在祇园精舍向长老须菩提说法的故事，与正文接成一长卷。从画面看，这幅佛说法图特别精细，人像衣褶简劲，面容逼真。释迦佛之慈祥，须菩提之古老苍劲，都刻画得淋漓尽致。图画之后为《金刚经》本文，经文每行约19字，字体古朴纯简，多存真趣。

《金刚经》的正文和图画都雕刻得浑朴凝重，精美异常，墨色浓厚匀称，清晰显明。这一切都表明是印刷术发明已久，技术

已臻熟练，绝不是印刷术发明初期的作品。如果没有一、二百年的发展过程是很难达到这样的技术水平的，从而为研究我国印刷术的起源问题提供了实物依据。

但是，要完全确定印刷术的发明年代是很困难的。这是因为印刷术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方法，而是由印章、捶拓等逐渐演变而来的，很难说出中间的截然界限。另外，印刷术是由人民大众逐渐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它最初只流行于人民群众中间，随后为佛教徒所采用，最后才为统治阶级政府和知识分子所接受，因此，要确指一个具体的年、月、日是不可能的。

虽然很难确指印刷术的发明年代，但从敦煌遗书《金刚经》等实物来看，印刷术至迟产生在《金刚经》雕刻之前二百年左右，即唐代初期。到了唐代后期，版刻已相当发达并逐渐普及。

本节主要参考资料：

邓文宽先生《敦煌文献中的天文历法》，载《文史知识》1988年8期

王进玉先生《敦煌石窟中的古代科技成就》，载《科学》1988年4期

舒学先生《敦煌汉文遗书中雕版印刷资料综述》，载《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四、有待发掘的医学宝库

——敦煌医学概述

敦煌石窟中有许多医学方面的内容，尤其在敦煌遗书中，有许多珍贵的医药文献，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发掘整理，可以丰富祖国医学的内容，填补一些领域的空白。有些甚至可以古为今用，在现代医学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1、古本草学的新发现

“本草学”为古代的药物学，其学由来已久。现知最早的本草书为《神农本草经》，它名为古代神农氏所作，疑为汉晋间张机、华陀辈所为，计收药365种，以应周天之数。梁陶弘景复增汉魏以来名医所用药365种，并为之注，名曰《本草集注》。

《神农本草经》三卷，《本草集注》七卷，宋代以后均成亡佚之册。敦煌遗书发现之前，唐本草已属罕见，更不要说六朝本草了。

据目前研究可知，敦煌遗书中有6种古本草残卷，重要的有三种，即梁陶弘景《本草集注》、唐李勣、苏敬《新修本草》、唐孟诜《食疗本草》。

敦煌本《本草集注》，原卷被桔瑞超于1914年从敦煌劫往日本。此卷前佚数行，后均完好。卷后题“本草集注第一，序录，华阳陶隐居撰”。书题后又有“开元六年九月十一日尉迟卢麟于都写本草一卷，辰时写了记”题记，可知其为开元写本。

《本草集注》为梁以前本草学总集，有“本草正典”之称，至初唐仍然是“名医继轨，更相祖述，罕能厘正。”敦煌残卷为其首卷，前为弘景序文，后为诸病主药，序中述及他“祖世以来，务敦方药”，“不限贵贱，皆摩踵救之”；同时，又吸收了劳动人民的医药知识，“或田舍试验之法，或殊域异识之术，如藕皮散血，起自疱人；牵牛逐水，近出野老”。他根据药物的自然属性，分为玉石、草木、虫鱼、禽兽、果菜、米食、有名无实七类，对产地、采集、炮制、煎服法、真伪鉴别等均有详细论述，如采药时间：“其根物多以二月、八月采者，……春宁宜早，秋宁宜晚，其华、实、茎、叶乃各随其成熟耳”；炮制及煎服法方面，凡丸散药“先切细暴燥乃捣之，有各捣者，有合捣者……其湿润药，如天门冬、干地黄辈，皆先切曝独捣令扁碎，

……若逢阴雨，亦以微火烘之，即燥，小停冷乃捣之”，其论至今仍在沿用。他还指出部分药物的解毒法及服药食忌例，如“半夏有毒，用之必须生姜”，这一宝贵经验，至今仍用于临床。

《食疗本草》残卷被斯坦因劫往英国，编号为S·0076。《新唐书·艺文志》有“孟诜《食疗本草》三卷”的记载。《证类本草》载：“《食疗本草》，唐同州刺史孟诜撰，张鼎又补其不足者八十九种并旧二百二十七条，凡三卷”。原书久佚，《证类本草》中存有其文，《本草纲目》引其药17种，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食品疗法专著。敦煌本《食疗本草》前残后缺，王国维、唐兰等据《证类本草》校考为《食疗本草》残卷。残卷共载药26种，每药都载有主治、配方、服法，后面还附有食忌、采集时月、炮制方法等，其中不少论述至今仍在临床使用。同时，该残卷对唐代外国药物的传入也有部分反映，如“石蜜，寒，右心腹胀热，口干渴，波斯者良”。

《新修本草》残卷被伯希和、斯坦因劫往法、英两国，编号为P·3714和S·4534。《新修本草》是唐显庆四年（659年）由国家颁行的我国第一部药典，它收药844种，是李勣、苏敬等人在《神农本草集注》的基础上编写而成，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比欧洲最早的纽伦堡药典（1542年）将近早九百年。该书由本草、药图、图经三部分组成，这种图文对照的写法，开创了世界药学著作的先例。该书两《唐书》有著录，但中土久佚，日本尚存十余卷（卷三至五、卷十二至十五、卷十七至二十），清代傅云龙已将其模刻收入他的《纂喜庐丛书》中。敦煌本《新修本草》，据王重民先生考证为卷十、卷十七和十九两个残段，其中卷十残卷存药物30种，可补日本传本所缺。此卷朱墨杂书，背有“乾封二年（667）”字样，说明该书距颁发仅八年时间。

另外，P·3822号“无名本草”残卷，也是很重要的本草学著作，已有学者对其进行探讨。

2、丰富的医经

据目前所知，敦煌遗书中的医经残卷有十余种，主要有《内经》、《伤寒论》、《脉经》的片断及《五脏论》、《新集备急灸经》等。

敦煌所出《内经》残卷，主要见于P·3287和P·3481。P·3287残卷的内容，散见于《素问·三部九候论》、《素问·脉要精微论》；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之《伤寒例》、《辨脉法》；《脉经》卷一之《脉形状指下秘诀第一》、卷二之《平三关病候并治宜第三》等。现存的《黄帝内经素问》是唐宝应元年(762)由王冰编次注释的，敦煌所出《内经》残卷却有武周新字，可知其书写年代当在武则天时期，即在王冰编次之前，因此，可利用敦煌遗书校勘王本，以正其缺讹。

敦煌所出《伤寒论》残卷，主要见于S·0202 和 S·5614。S·0202的内容与《伤寒论》辨脉法篇大致相同。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自汉代问世以来，历经兵火战乱而散佚。晋代王叔和曾对其进行编次整理，宋朝林亿等人经过整理，分编为《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金匮玉函经》三书。金人成无己首次为《伤寒论》系统作注，成《注解伤寒论》一书。但宋本已散佚，现存的则是明清刻本。据有的学者研究，敦煌本《伤寒论》是宋代整理编次前的《伤寒论》写本，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伤寒论》原卷抄写本，与传世本《伤寒论》相异者约70余处。它的某些内容是今本所缺，或较今本为优，可用来校勘今本《金匮玉函经》、《伤寒论》及《注解伤寒论》。

敦煌所出《脉经》残卷，主要见于P·3287、P·3477和S·5614。P·3287残卷共149行，每行22—27字不等，该卷的 部分内容亦见于《素问》、《灵枢》、《难经》、《脉经》中。写卷不但对我们研究中医的脉学理论很有启发和帮助，而且其中谈到的

一些诊法、医方，都是宝贵的文献资料，对于医史研究有着重要价值。P·3477写本卷首有“《玄感脉经》一卷”题记，内容由三部分组成，首论三部九候脉法、辨尺寸阴阳荣卫度数、平脉早晏法；次为《脉类形状》，内容与《脉经》卷一之“持脉轻重法第六”、“平脉视人大小长短男女逆顺法第五”及“脉形状指下秘诀第一”等相似；最后为《阴阳逆乘伏》，仅存一行。S·5614中的“《平脉略例》一卷”，有类《脉经》卷一之“持脉轻重法第六”、“平脉早宴法第二”、“辨尺寸阴阳荣卫度数第四”、“两手六脉所主五脏六腑阴阳逆顺第七”等篇的内容。此外还有论寸、关、尺三部脉象及主病的条文。

敦煌所出《五脏论》残卷，为斯坦因劫往英国，编号为S·5614，卷首有书题“《五脏论》一卷，张仲景撰”。其内容主要是论述五脏与五官五体、人与自然相应、药性歌赋及鉴定炮制要点，为一本学医的基础读物。

残卷墨笔抄写，共83行，约1440余字。文中提及的东晋和南北朝一些医家及其著述，如葛洪、陶弘景、徐之才等，均是张仲景之后的人，但未提及孙思邈和《千金方》。据此推测，残卷可能是隋或初唐时的著作，托名张仲景以自重之。

敦煌写本《五脏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五脏论》写本，它汇集了隋唐以前医药学界的一些精萃，收集了当时流行的国内外民间的一些医药经验。它以脏象为中心，并论及整体观念、病因病理、脏腑辨证、药物鉴定、常见病症的药疗等，是我国珍贵的中医药学文献。

敦煌所出《新集备急灸经》残卷，被斯坦因劫往伦敦，编号为S·2675。其卷首有“《新集备急灸经》一卷，京中 李家于东市印”，卷末有“咸通二年……写记”题记，可知此乃唐人写本。我国的针灸著作，以前所见最早的是宋、元以后的刻本，敦煌写本是现能见到最早的原本针灸著作。它前有小序，说明本书

系汇集诸家灸经，为偏远州县及交通不便之村坊草野疗治疾病参考。中为人体正面明堂图的上半身，并标注穴位名称，主治及施灸壮数等说明文字，很有实用价值。

S·6168也为一灸经残卷，它画有人体明堂图，并标 明穴位名称、主治及灸法，但无书题及著者。

《敦煌古藏医灸法》残卷，据学者考证为八世纪中 期 的 著作，比汉文《新集备急灸经》早近一个世纪，是现存最早的灸方专书。此外，敦煌遗书中还有一部古藏医临床手册——《藏医杂疗方》，其内容涉及临床各科，对诊断、药物炮制、病因病理、疗法等均有叙述。

3、珍贵的医方

敦煌遗书中的医方残卷，据目前所知约30多种，其内容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科疾病的治疗。有的医方对药 物 的 组成、炮制、服法和禁忌等都有详细的叙述，如P·2565和P·2662是唐人医方残卷，此两个残卷字体相同，据罗振玉考 证 原 为一卷，后断裂为二，内有武周新字，知为唐武则天时写本。此卷中治《孩子两三岁至五六岁患赤白脓血热痢黄连散方》就很详细："黄连十二分，乌梅肉八分，阿胶七分，犀角 末 七 分，黄柏八分，茜根六分，黄芩六分，龙骨八分。右 捣 筛 为散，两三岁已（以）米饮服半钱许，二（日）再服，稍稍加至一钱；四五岁已（以）上量大小以意加服之，二（日）并再服，忌食猪鱼生冷油脂蒜面等"。

敦煌医方最珍贵的价值是它在现代医学中仍能发挥其作用。如P·2882残道经背面有《染须及发方法》医方，其中 有"天宝七载正月十三日"题记，可知为唐朝写本。这 个 医 方约一百多字，对药物和医染方法均有明确记述，说明用针砂、矾石、没石子等炮制的药方，可以染白须、白发为黑色，其中有用"玉门矾

石一钱”，“夜间欲卧时，即取黄矾汁轻刷须发”之语。药方中提到了四种医染过程，程序也较复杂。医方最后写道，经染治后头发“得三载大黑效”，即染治后三年的头发都是黑的。这个将白发染黑和催生黑发的中医医方，说明早在唐代，我国就已经能医治白发病了。

这个古老的医方科学吗？据用现代医学手段对其药理分析证明，该药方中有一种中药，具有明显的可使头发黑色素细胞活性增强的效用，同时，所用药的含铅量比现在普通使用的化学染剂低得多，因此，已有医疗工作者将此配方用于临床。

除了现成的医方外，医学研究工作者还利用敦煌遗书中的医药文献，重新组合配方，其中“萎胃灵1号”就是由甘肃中医学院王道坤先生根据敦煌遗书医方配制而成的药剂。“萎胃灵1号”有益气通络、和胃生新的功效，经两年多对400多例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观察治疗，有效率达95%以上。

经过临床实践和多次的观察治疗，敦煌卷子中的医方配剂对黄疸、痢疾、胃痛腹痛等数种急重症和慢性疑难症都有很好的疗效。目前，医学工作者已能运用敦煌医方治疗肝炎、痢疾、慢性胃炎、急性胃肠炎、急性胰腺炎等多种疾病。

本节主要参考资料：

赵健雄、徐鸿达、王道坤等《敦煌石窟医学史料辑要》，载《敦煌学辑刊》1985年2期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经卷表明，北宋以前我国已能医治白发病》，《光明日报》1986年1月27日

《敦煌医学有很大的发掘潜力》，《光明日报》1990年2月1日

赵健雄先生《敦煌写本张仲景〈五脏论〉简析》，载《敦煌研究》1987年4期

赵健雄先生《敦煌写本〈伤寒论·辨脉法〉考析》，载《敦煌研究》1989年4期

五、通俗文学的重要一页——变文

敦煌变文是唐代民间说唱文学的主要形式，是在汉魏六朝乐府、小说、杂赋等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的新兴文体。通过对变文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我国说唱文学的兴起、发展和繁荣，还可以回答文学史上曾长期不能解决的宋、元、明、清民间文学的渊源问题。

1、什么是变文

1920年4月，王国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在王氏所称之“通俗诗”、“通俗小说”中，有“季布歌”、“孝子董永传”、“目连救母”、“李陵降虏”及“唐太宗入冥小说”、“伍员入吴小说”等多种。后来人们才知道，其中的多数乃是我国失传已久的变文。

但由于当时大部分敦煌遗书都没有公布，人们对变文的认识尚属初级阶段，因此对这种失传已久的文体难免会产生种种隔阂。1924年，罗振玉辑印《敦煌零拾》，其中有“佛曲三种”，这是国内外最早刊布的敦煌变文作品。但因这三种敦煌写本都首尾残缺，罗氏不知其原名，只好名之曰“佛曲”。以后，随着变文作品的不断发现及其研究的进展，人们对变文的认识也逐渐明确。1929年，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①一文首先采用了“变文”这一名称，他说：“这种俗文虽可说是佛曲的起源，却并不是佛曲；‘变文’之体，似更近于佛曲，所以我们应该更正确的名之曰‘俗文’，曰‘变文’。”后来郑氏编著《插图本中国文

①《小说月报》20卷3期

学史》①、《中国俗文学史》②，又用相当多的篇幅对“变文”加以阐述。在郑氏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大力倡导下，“变文”之名便逐渐流行，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但是，什么是变文？它是如何得名的？却是一个长期困扰着学术界的难题。七十年来中外学者进行了深入地探讨，现在倾向性的意见是：变文和另一种叫做变相的图画有关，变文之“变”，即变相之“变”，大约是变化、变现、变异之义；变相是类似于连环画的故事画，变文本是变相的文字说明，后来变文脱离变相而独立，便演变成为一种通俗文学体裁。如白化文先生明确指出：“变文是配合一种故事性图画演出的。这种图画称为‘变相’。现在我们见到的‘变相’，主要是佛教故事画，如莫高窟中的‘维摩变’、‘劳度叉斗圣变’等。变文配合变相演出，大致是边说边唱边引导观看图画。因此可以说，变文是一种供对听众（也是观众）演出的说唱文学底本。有材料说明，变文常在专门开设的‘变场’演出③。”

在敦煌遗书中，明确标名为“变文”或“变”的作品，现知有以下8种：

（1）《破魔变》一卷（P·2187尾题）；

（2）《降魔变文》一卷（S·5511首题）；

《降魔变》一卷（S·4398首题）；

（3）《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P·3107首题，又S·2614首题）；

《大目犍连变文》一卷（S·2614尾题，又北图藏盈字76号尾题、P·2319尾题）；

---

①1932年12月朴社出版

②商务印书馆1938年8月出版

③白化文《变文与俗讲》，载《文史知识》1988年8期

《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P·2319首题、又P·3485首题)

(4)《八相变》(北图藏云字24号卷背题);

(5)《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S·3491首题);

(6)《汉将王陵变》(S·5437首题,又北大图书馆藏本封面题);

(7)《舜子变》(S·4654首题);

《舜子至孝变文》一卷(P·2721尾题);

(8)《刘家太子变》一卷(P·3645尾题);

《前汉刘家太子传》一卷(S·3645首题);

以上8种有关变文的原始材料,每种至少有一件是明确标题为"变文"或"变"的。我们探讨变文,应该以它们为讨论基础①。通过对以上作品的研究可知,它们在体制上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共同特点:

第一、散韵组合,说唱兼行。说是表白讲述,即艺人以第三人称口吻铺陈情节,敷演故事。唱是行腔咏唱,用来叙述故事,抒发感情。前者是散文,后者是韵文,二者相互配合。当然也有全用韵文歌唱,不用散文讲述的,或全用散文讲述,不用韵文歌唱的。但一般都是散韵相间,由韵文和散文交互组合而成。如《八相变》云:

……太子既生之下,感得九龙吐水,沐浴一身。举左手而指天,垂右臂而于地,东西徐步,起足莲花。凡人观此皆殊祥,遇者顾瞻之异端。当尔之时,何道言语:

九龙吐水浴身胎,八部神光曜殿台。
希奇瑞相头中现,菡萏莲花足下开。

①参阅颜延亮主编《敦煌文学·变文》(张鸿勋先生执笔),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第二、有习用的过阶提示语。完整的变文写卷，其结构形式都是散韵相间，在由散文说白变为韵文歌唱之际，必然存在着某些表示衔接过渡的惯用句式。它们是“……处”、“看……处，若为……”、“遂为陈说”、“当尔之时，道何言语”等，如《汉将王陵变》：

二将斫营处，谨为陈说……

说其本情处，若为陈说……

又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

看目连深山坐禅之处，若为……

即至五道将军坐所，问阿娘消息处……

再如《降魔变文》：

舍利弗共长者商度处，若为……

且看诘问事由，若为陈说……

而《八相变》却是：

当尔之时，道何言语……

于此之时，有何言语……

由以上例句可知，这些惯用句式都是用来向听众表示即将由白转唱，并有指点听众在听的同时“看”的意图。“由此可以推论出，变文是配合变相图演出的，大致是边说边唱引导观看图画。说白叙述故事，唱词加深印象。变文是一种供对听众（也是观众）演出的说唱文学底本①”。

第三、由以上叙述可知，演唱变文，往往配合图画。这从《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的标题中就可看出。虽然此图没有保存下来，但原卷有图则是无容置疑的。P·3627《汉将王陵变》尾题标作《汉八年楚灭汉兴王陵变一铺》，文中又有“从此一铺，便是变初”的话句，而所谓“铺”，正是一幅

①白化文《什么是变文》，见《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或多幅佛像图画的意思。尤其是P·4520《降魔变文》，不仅有图6幅，而且卷背还抄录着与画图内容相应的唱词，更是变文配合画图的实物。

根据变文的这些特点，对敦煌遗书中已失去标题的说唱作品进行研究探讨，可知伍子胥故事、李陵故事、王昭君故事、张议潮故事、张淮深故事等都属于变文作品。

2、变文的题材和内容

现存的敦煌变文，从内容上看，其题材大体有三类：

一是历史故事类。如《伍子胥变文》、《王陵变》、《李陵变》、《王昭君变文》等，都是以历史人物为中心的。还有一些作品则写了当代的历史事件，如《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就是以当时当地的英雄人物为描写对象的。它们大多以一个历史人物为主，撷取历史事件中的轶事趣闻，再吸收些民间传说，进行加工渲染而创造的。这类作品，不但形象地再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面貌，而且几乎成为人民褒忠贬奸、评价历史的“教科书”。如《伍子胥变文》现存15000多字，除卷尾残去伍子胥遇难的内容外，是一篇故事情节基本完整的变文。它与《左传》、《吕氏春秋》、《史记》等记载相比，既以史籍记载为依据，又不为史书记载所局限，而是适当增加了某些细节描写，从而提高和丰富了故事的真实感。在记载伍子胥逃亡吴国的经过时，《史记》说：“伍胥惧，乃与胜俱奔吴。到昭关，昭关欲执之。伍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后。至江，江上有一渔夫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剑曰：‘此剑直百金，以与父’。父曰：‘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珪，岂徒百金剑邪！’不受。伍胥未至吴而疾，止中道，乞

食。至于吴”①。变文作者则以伍子胥逃亡为主线，增加了打纱女赠食自沉，伍子胥见妻遇姐，外甥追舅以及渔人救渡后覆舟自尽等情节，把伍子胥历经艰危、壮怀激烈的命运同人民的真诚相助联系在一起，反映出打纱女、渔父等人不贪富贵和视死如归的高尚品质，在一定程度上使作品更具有现实意义。因此，《伍子胥变文》远远超出了史籍记载的范围，在民间得到了广泛流传②。

再如《张议潮变文》和《张淮深变文》，虽残缺过甚，但仍可看出当时民间艺人如何通过变文说唱，热情讴歌张氏叔侄领导敦煌地区人民抵御外族入侵，保境安民的英雄业绩。然而两唐书却未为他们立传，只在其他传记中有简略记载，因而这两篇变文作品便成了补充晚唐西北边陲历史的极好史料。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义潮阴结豪英归唐。一日，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虏守者掠走，遂摄州事。缮甲兵，耕且战，悉复余州”。变文作者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经过适当的提炼和概括，集中描写了张议潮领导归义军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三次战斗，展现了其威武壮烈的战斗场面：“展旗帜，动鸣鼙，纵八阵，骋英雄。分兵两道，裹合四边，人持白刃，突骑争先。须臾阵合，昏雾涨天。汉军勇猛而乘势，拽戟冲山直进前。蕃戎胆怯奔南北，汉将雄豪百当千。”《张淮深变文》描写归义军与回鹘的战斗场面说：“先锋远探，后骑相催，铁□千队，战马云飞。分兵十道，齐突穹庐。鞞鼓大震，白刃交麾，匈奴丧胆，獐窜周诸。头随剑落，满路僵石。回鹘大败。”表现了归义军将士勇敢无畏的精神和“生死大唐好”的爱国热情，这种以现实为依据的描写手法，为变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二是民间传说类。如《孟姜女变文》、《舜子变》、《前汉

---

①《史记》卷66《伍子胥列传》

②参阅张锡厚《论敦煌变文从宗教到文学的转变》，载《文学评论丛刊》第18辑

刘家太子传》等，它们讲述的是与一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地方古迹、社会习俗等有关的故事。如《舜子变》虽宣扬了愚孝思想，但通过舜几番机智地逃脱后母的陷害，反映了封建社会家庭内部的矛盾斗争。后母之狠毒、瞽叟之昏愦、舜子之机智至孝等都描写得比较突出。变文叙事采用反复手法，质朴单纯；又用传统的三灾三难的“三迭式”结构，均具民间讲故事的趣味。

又如《孟姜女变文》，则以想象夸张和真实描绘相结合的艺术手法，铺叙了千里寻夫、哭倒长城的孟姜女故事，抨击了封建社会繁重的兵役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比起佛寺禅门的空幻说教要具体、深刻得多。变文作者为了突出主题，便巧妙安排了游魂陈诉、哭倒长城、指血验骨、众魂相托等情节，从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如：

其妻闻之大哭叫：“不知吾在长城夭。
既云骸骨筑城中，妾亦更知何所道？”
姜女自扑哭皇天，只恨贤夫亡太早。
妇人激烈感山河，大哭即得长城倒。

髑髅既蒙问事意，已得传言达故里。
魂灵答应杞梁妻：我等并是名家子。
被秦差充筑城卒，辛苦不禁俱役死。
铺尸野外断知闻，春冬镇卧黄沙里。
为报闺中哀怨人，努力招魂存祭祀。

这些血泪斑斑的控诉，使作品具有了一定的批判力，并且它奇特的想象，也使悲剧的意义更加深化了。

三是宗教类。如《太子成道经》、《八相变》、《降魔变文》、《破魔变》、《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频婆娑罗王后宫彩女功德意供养塔生天因缘变》等。它们主要讲述释迦精心修道、断绝苦因、追求佛家最高理想的故事和佛法战胜邪道的故

事。其宗旨虽在于弘扬佛教，无多大意义，但有些故事还是曲折地反映了人间现实生活的一些侧影。如根据元魏凉州沙门慧觉等译《贤愚经》卷十《须达起精舍品第四十一》演绎的《降魔变文》，主要描写了舍卫国大臣须达，在赴王舍城为子求媳时，偶然遇见了释迦，于是悟性顿开，皈依佛法。他为了请释迦亲临舍卫国说法，便出重金购太子祇陀园地起精舍，以作道场。六师外道听到这一消息后，依仗国王的支持，便要求与舍利弗斗法，并约定：若舍利弗胜，则外道皈依佛祖；若外道胜，则不仅不能起精舍说法，而且太子、须达亦将“受诛”。劳度叉与舍利弗先后六次分别变化成高山、金刚；水牛、狮子；宝池、大象；毒龙、金翅鸟；黄头鬼、毗沙门天王；树、风。激烈拼斗，在争斗中舍利弗节节胜利，最后以大风席卷劳度叉阵营而获全胜，变文也以外道皈依佛法而告终。其主旨虽在于宣扬佛法宏大，威力无边，只有归心向佛，才能解脱，自不足取。但故事写得相当热闹生动，又多次设置悬念，因而极富戏剧趣味。如描写舍利弗与劳度叉最后两次变化拼斗说：

六师自道无般比，化出两个黄头鬼。
头脑异种丑尸骸，惊恐四边令怖畏。
舍利弗举念暂思维，毗沙天王而自至。
天王回顾震睛看，二鬼迷闷而擗地。
外道是日破魔军，六师胆慑尽亡魂。
赖得慈悲舍利弗，通容忍耐尽威神。
驴骡负重登长路，方知可得比龙鳞？
只为心迷邪小迳，化遣归依大法门。

六师虽五度输失，尚不归降。……忽于众中化出大树，婆娑枝叶，蔽日干云，耸干芳条，高盈万仞。……于时见者，莫不惊嗟。舍利弗忽于众里化出风神，叉手向前，启言和尚：“三千大千世界，须臾吹却不难；况此小树纤毫，敢能当我风

道！”出言已讫，解袋即吹。于是地卷如棉，石同尘碎，枝条迸散他方，茎干莫知所在。外道无地容身，四众一时唱快处若为：

六师频□输五度，更向王前化出树，
高下可有数由旬，枝条蓊蔚而滋茂。
舍利弗道力不思议，神通变现甚希奇，
辞佛故来降外道，次第总遣大风吹。
神王叫声如电吼，长蛇□树不残枝，
瞬息中间消散尽，外道飘飖无所依。
六师被吹脚距地，香炉宝子逐风飞，
宝座倾危而欲倒，外道怕急总扶之，
两两平章六师弱，芥子可得类须弥！

作者将他们的拼斗场面描写得幻化多变，诙谐幽默，使人们自然会想起后世《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之类的小说，从而使我们知道了敦煌变文怎样在精神上哺育了后代神魔小说。

3、变文的价值

敦煌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是：

第一、它在历史上是民间说唱的俗文学，是劳动人民自己开辟的一个文学园地。它利用各种各样的题材，在民间说唱，拥有众多的听众和读者，可以说变文是我国历史上真正的人民文学。通过对变文的内容分析可知，它完全是由人民大众创作的文学，其故事内容，都在民间有长期的历史渊源，变文中的人物，都是通过人民大众的爱 憎 而 陶铸出来的典型。只有正确认识变文的人民性，才能真正认识它的价值及其在我国文学 史上 的 重要地位①。

①参阅王重民《敦煌变文研究》，载《敦煌遗书论文集》

第二、变文内集中保存了许多唐五代时的通俗性语言——民间口语。在我国古代，口语体著作非常少见，正统文人在他们的创作中，很少有采用民间口语的。由于变文是真正的民间说唱文学，它大量采用的是民间口语，也是目前我们见到的最多、最古老的民间口语，因而对我国古代语言和文学，尤其是民间文学的研究，是极有价值的。

第三、变文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宋代话本、明代“三言”、“二拍”，以及明清以来的弹词宝卷、鼓词的由来，填补了文学史研究的空白。

敦煌变文的发现，改变了对中国文学史的认识。早在五十多年前，郑振铎先生就曾说过：“在敦煌所发现的许多重要的中国文书里，最重要的要算‘变文’了。在‘变文’没有发现以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出来？‘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盛行于明、清二代的宝卷、弹词及鼓词，到底是近代的产物呢？还是‘古已有之’的？许多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都成为疑案而难以有确定的回答。但自从三十年前史坦因把敦煌宝库打开了而发现了变文一种文体之后，一切的疑问，我们才渐渐的可以得到解决了。我们才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得到了一个连锁。我们才知道宋、元话本和六朝小说及唐代传奇之间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我们才明白许多千余年来支配着民间思想的宝卷、鼓词、弹词一类的读物，其来历原来是这样的。这个发现使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探讨，面目为之一新[1]”。

变文散韵相间的组合体制，当时就曾影响到传奇小说的形式，如唐代武则天时张鷟的《游仙窟》，其体裁也是由诗、文排列而成，这在唐以前是根本没有的，却与变文散韵相间的形式完全一样。里面的虚字、语助词和辅助说明时间转变的联系词如

①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六章《变文》，商务印书馆1938年出版

“少时”、“于是”、“余时”、“当时”、“于时”等等，也和变文中的“尔时”、“是时”等相同。再如《长恨歌》与《长恨歌传》、《莺莺歌》与《莺莺传》、《李娃行》与《李娃传》、《冯燕歌》与《冯燕传》等等，都是散文传奇与叙事相互组合。它们写作的具体情况虽然各不相同，但都从不同角度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变文的影响，则是无可置疑的。至于宋元以后的鼓子词、诸宫调、词话、弹词、宝卷等各类说唱文学以及戏剧文学，尽管其名称和体制各有差异，它们的发展道路和时代先后也各不相同，然而若追溯其渊源，却都与变文有很深的血缘关系。就连藏族的民间曲艺拉麻玛尼，据说也是受变文的影响而形成的。

宋代话本是唐代俗讲和变文的直接延续和发展，有了变文才有可能产生话本，有了话本才有“三言”、“二拍”和以后的弹词、宝卷等。过去研究我国说唱文学的历史，只能看到宋代的话本，宋以前的情况则不得而知。敦煌变文的发现，大大填补了这个空白，使文学史家们在六朝小说、唐人传奇与宋元明说唱文学、戏剧等文体之间，找到了中间环节，理出了承上启下，继承创新的衔接关系。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空白，由此得到了填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敦煌变文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价值。

六、诗苑奇葩竞争艳

敦煌诗歌，是敦煌遗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主要指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唐代诗人专集、唐代诗文选集、唐人选唐诗以及流传于敦煌地区僧俗人士的诗歌残卷，还包括某些即情应世、针砭时弊、感慨悲怀的敦煌民间诗歌，据张锡厚先生研究统计，其总数可达三千首左右。通过对敦煌诗歌的搜集整理，既可补《全唐诗》之不足，又可为研究唐代及敦煌文化作出宝贵贡献。

根据敦煌诗歌的特点，可将其分为四类，现分别叙述如后①。

1、敦煌诗人之作

所谓“敦煌诗人之作”，是指从敦煌诗歌抄卷中，可以明显判为敦煌地区的诗人文士所创作的诗歌作品。从内容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直接反映当时风云变幻的社会时事之作

唐代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西北边境空虚，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上层统治集团逐渐侵吞河陇大片土地。驻守边塞的军民陷入了异常悲苦的境地，一些边地城镇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甚至被夷为平地。对于这段历史，史书记载过于简略，无法知其详情，而敦煌写本P·2555《唐人诗集残卷》的发现，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生动而又形象的材料。如《冬出敦煌郡入退浑国朝发马圈之作》云：

西行过马圈，北望近阳关。
回首见城郭，黯然林树间。
野烟暝村墅，初日惨寒山。
步步缄愁色，迢迢惟梦还。

又如《冬日书情》曰：

殊乡寂寞使人悲，异域留连不暇归。
万里山河非旧国，一川戎俗是新知。
寒天落景光阴促，雪海穹庐物色稀。
为客终朝长下泣，谁怜晓夕老容仪。

再如《闻城哭声有作》说：

昨闻河畔哭哀哀，见说分离凡几回。

---

①本节主要依据张锡厚先生《敦煌诗歌考论》（载《敦煌学辑刊》1989年2期）一文写成，特此说明

昔别长男居异域，今殇小子瘗泉台。
羁愁对此肠堪断，客舍闻之心转摧。
漂泊自然无限苦，况复存亡有去来。

从这些诗歌中不难看出，由于吐蕃统治者的侵扰破坏，给河陇各地人民带来了惨痛的灾难与痛苦。

唐宣宗大中二年，张议潮率众起义，推翻了吐蕃在敦煌的统治，并渐次收复了其他各州。为了加强对河西的统治，唐王朝建立归义军。到了唐昭宗、哀宗时期（892—905年），归义军内部争权夺利，战乱频仍，张承奉遂自立为白衣天子，建西汉金山国。当时因白雀之瑞，“三楚渔人臣张永进上”《白雀歌》（P·2594、P·2864）。诗中利用谶纬之说，侈陈瑞验，以明天命所归，因此可视为金山国之开国史。诗云：

白雀飞来过白亭，鼓翅翻身入帝城。
深向后宫呈宝瑞，玉楼高处送嘉声。
白衣白鞚白纱巾，白马银鞍佩白缨。
自古不闻书不载，一剑能却百万兵。
……
我王自有如神将，沙南委付宋中丞。
白屋藏金镇国丰，进达偏能报虏戎。
楼兰献捷千人喜，敕赐红袍与上功。
文通守节如白银，出入王宫洁一身。
每向三危修令得，唯祈宝寿荐明君。
填词陈白未能休，笔势相催白汗流。
愿见金山明圣主，延龄沧海万千秋。

第二、敦煌人士所献贺诗及酬赠奉答之作

这一类诗篇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除具有一定的艺术情趣外，更注重诗歌的实用价值。

贺诗方面的代表作有S·1655《白鹰歌》，作者以白 鹰的异

瑞呈祥，歌颂秉节龙沙的尚书。诗云：

奇哉白晶灵圣峰，所感呈祥世不同。
尚书德备三边静，八方四海尽归从。
白鹰异俊今来现，雪羽新成力更雄。
平原狡兔深藏影，争能路上出其踪。

在敦煌诗歌中，酬赠奉答之作也较为习见，其中有些诗篇比较真切，充满着浓郁的感情色彩。如P·2555《赠邓郎四弟》诗云：

把袂相迎意最浓，十年言笑得朋从。
怜君节操曾无易，只是青山一树松。

某些赠释氏佛徒之作，又别有一番情趣，或描述高山窟龛，远离尘世；或刻划清夜月色，洗尽浮埃；或叙写寂寞苦乐，莫可言说。如S·2104《赠道清和尚诗》就是抒发对恩师的无限感激之情，诗云：

身到敦煌有多时，每无管领接括希。
寂寞如今不清说，苦乐如斯各自知。
思量乡井我心悲，未曾一日展开眉。
奈得清师频管领，似逢亲识是人□。

第三、描写和颂赞敦煌地区名胜古迹之作

这一类作品主要有《敦煌二十咏》，每首均为五言律诗，所咏景物依次为：三危山、白龙堆、莫高窟、贰师泉、渥洼池天马、阳关戍、水精堂、玉女泉、瑟瑟监、李庙、贞女台、安城祆、墨池、半壁树、三攒草、贺拔堂、望京门、相似树、凿壁井、分流泉等。

《敦煌二十咏》主要是运用写实的手法，充分展现敦煌风物独具异彩的粗犷景观和极其难得的美丽风光，从而激发人们热爱家国、热爱乡土的情怀，故能得到广泛的传诵。如《贰师泉咏》曰：

贤哉李广利，为将讨匈奴。
路指三危回，山连万里枯。
抽刀刺石壁，发矢落金乌。
志感飞泉涌，能令士马苏。

又《李庙咏》曰：

昔时兴圣帝，遗庙在敦煌。
叱咤雄千里，英威静一方。
牧童歌冢上，狐兔穴坟傍。
晋史传韬略，留名播五凉。

在敦煌写景诗中还有《题隐士咏》、《寿昌》及佚题诗残卷，它们分别选取特定的自然景物和历史环境，予以恰如其分的描写，从而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如P·5007佚题诗云：

万顷平田四畔沙，汉朝城垒属蕃家。
歌谣再复归唐国，道舞春风扬柳花。

2、释氏佛徒之作

敦煌乃丝绸之路的要冲，是汉族聚居区最先接触佛教的地方。作为佛教文化兴盛的标志，除佛教典籍得到大量传抄、讲经传道深入民心之外，释氏佛徒创作的诗歌作品也逐渐为人们重视，并广为传抄，其中亦不乏佳作，并可补《全唐诗》之不足。

敦煌诗歌中的释氏作品，大都佚去作者姓氏，留有撰者姓名的诗作为数不多，其中主要有河西都僧统赐紫沙门悟真的诗作。S·9304悟真诗残卷所载“诗序”云：“河西都僧统赐紫沙门悟真，年逾七十，风疾相兼，动静往来，半身不遂。思忆一生，所作所为实事，难竟寸阴，无为理中，功行阙少。犹被习气，系在轮回，自责身心，裁诗十首。虽非佳妙，狂简斐然，散虑摅怀，暂时解闷。鉴识君子，矜勿诮焉。”从此序及诗文内容可知，这是悟真回首往事、追忆一生而写的自省诗。其语言通俗，明白如

话，叙事说理，即情而发，虽然算不上名篇佳作，但也表现出释氏佛门追求口语体白话诗的倾向。

此外，还有洞山和尚《神剑歌》、丹遐和尚《玩珠吟》（P·3591）、融禅师《定后吟》（S·2944）、青剉和尚《诫后学铭》（P·3591）等，也都值得一读。

敦煌释氏诗中，佚去作者姓氏的诗歌很多，按其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揣摩人生，嗟叹凡迷之作。作者利用某些习见的人生现象，力图说明人皆易老，俄成聚尘的生灭道理。如《述凡情》诗曰：

圣意空无我，凡情计有身。
缘身起分别，五行益迷津。
触境怀颠倒，逢缘妄受熏。
既迷生灭果，宁识去来因。
日日贪财物，朝朝长我人。
本期千载活，俄成一聚尘。

第二、演绎生死，弘扬佛法之作。有的取材于佛经，铺叙成诗，以成生死之相，如S·6631《九相观诗》云：

色醉明神暗，贪迷达识昏。
情尘交触境，冥阴托灵魂。
孕气成珠貌，倾生路报分。
宠怜膝下育，娇爱掌中存。
肝胆非为此，珍财岂足敦。
宁知是虚幻，聚散等浮云。

（婴孩相第一）

第三、劝戒修行，参禅悟道之作。释氏佛门为了控制和约束僧徒道众的言行，往往以诗歌形式宣传各种戒规，谁若犯戒，必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如《和菩萨戒文》10首，就历述了“杀生、

偷盗、邪淫、妄语、沽酒、自说、毁他、多悭、多嗔、谤三宝”等十戒，详细描述地狱的凄惨可怖景象，以警僧众道徒，切不可犯戒。

释氏劝人修道成佛之作，以S·2295和S·3016两卷所载《心海集》为集大成者。如：

迷子念佛声切哀，勤苦长斋劝善哉。
万恶丝毫不肯改，凭贤求理觅菩提。

（《执迷篇》）

解悟成佛绝不难，调炼身心出世间。
蠲除想念攀缘尽，如空独秀迥亦然。

（《解悟篇》）

勤苦穿凿菩提道，昼夜镌雕心路门。
功深若能开圊得，无端掩闭作梁津。

（《勤苦篇》）

值得注意的是，敦煌释氏作品中，还有数量最多、内容丰富的《王梵志诗集》，据有的学者调查统计，王梵志诗已达30个卷子，加上唐宋以来诗话笔记所存王梵志佚诗，共得诗400余首。然是否都为王梵志之作，目前尚有不同意见。

王梵志诗有着和同时代诗人迥然不同的特点。他善于把通俗的语言、自由的章法引入诗歌领域，既明白如话、通俗易懂，又言近旨远，发人深省。如：

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
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

他家笑吾贫，吾贫极快乐。
无牛亦无马，不愁贼抄掠。
你富户役高，差科并用却。
吾无呼唤处，饱吃长展脚。
你富披锦袍，寻常被缠缚。

穷苦无烦恼，草衣随体着。

王梵志创作的某些描摹社会，直接反映贫富对立的诗篇，以及揭露封建官场种种弊端的诗篇，具有较高的现实主义水平。如其诗中的“里正追庸调”、“租调无处出”、“门前见债主，入户见贫妻”、“广种如屯田，仍更买奴婢”、“里正追役来”、“和市亦不避”等，都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史料价值。

3、敦煌民间诗歌

敦煌民间诗歌大多为敦煌地方人士所作，除个别留下作者姓名外，绝大多数为佚名之作。或抄在写卷背面，或写于其他文字夹行之间。约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劝善修道的诗歌

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一些宣扬业道因缘、轮回报应和劝善修道之作，便应运而生，如卫元嵩的《十二因缘六字歌词》（P·2385），就是宣扬佛门种种因缘观念的诗句。诗云：

百病酸疼苦切，四肢急如绳结。
悲啼叫唤耶娘，顿悟声嘶呜咽。
两手摸空撩乱，九孔不净脓血。
寄语诸徒览者，学道大宜志节。

（《十二老死缘》）

还有些以家教世训为内容的诗句，在敦煌民间广为流行，如《崔氏夫人训女文》（P·4129、S·5643、P·2633），语句通俗浅近，音韵谐和流畅，故而成为晚唐五代颇受民间欢迎的通俗读物。诗云：

香车宝马竞争辉，少女堂前哭正悲。
吾今劝女不须哭，三日拜堂还得归。
教汝前头行妇礼，但依吾语莫相违。

……

路上逢人须敛手，尊卑回避莫汤前。

外言莫向家中说，家语莫向外人传。

……

若能一一依吾语，何得翁婆不爱怜。

故留此法相教示，千秋万古共流传。

第二、反映民间风习之作

这类诗歌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有的以时令节候为题，如“卢相公咏廿四气诗”（P·2624），共有24首五言律诗，诗题依次咏“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等廿四节气，如《咏惊蛰二月节》云：

阴气初惊蛰，韶光大地周。

桃花开蜀锦，鹰老化春鸠。

时候争催迫，萌芽护短修。

人间务生事，耕种满田畴。

描写敦煌民间嫁娶为题的新婚诗，主要见于《下女夫词》卷内可以独立成章的五七言诗，如：

一花却去一花新，前花是假后花真。

假花上有衔花鸟，真花更有采花人。

神仙本自好容华，多事傍人更插花。

天汉坐看星月晓，纷纷只恐入云霞。

敦煌人民不仅把诗歌用于姻丧嫁娶，有时连生老病死也借助于诗歌表达自己的愿望，如S·5381《康大娘遗书》诗曰：

日落西山昏，孤男留一群。

剪刀并柳尺，贱妾且随身。

盒今残妆粉，留且与后人。

有情怜男女，无情亦任君。

黄钱无用时，徒劳作微尘。

第三、感叹抒怀之作

敦煌民间流传的《少年老翁相问叹诗》（S·2049、P·2129），就是感叹诗的代表作。诗云：

少儿答老翁曰：

余因游赏往东西，陌上春游逢一翁。
其翁皓发面无色，策杖微微怨无力。
侧耳听言听不闻，注目看人竟不识。
是时余乃叹其翁，谁教发白面无红。
何不双肩学春柳，飘摇两鬓骋秋蓬。

老翁答少儿曰：

翁乃其时闻此语，含笑叹言如且住。
体瘦皮疏吾不将，暗昧昏迷留与汝。
吾嗟三五少年时，神清美貌呈芳姿。
莫言我独今如此，汝等须臾还若斯。

诗中通过少儿与老翁的问答，尤其是老翁的感叹，生动地说明了人所共知的人生短暂、终须衰老的道理，很耐人寻味。为了避免发出“老之将至”的慨叹，那就要从少年时代勤苦学习，以求成名立身，如S·6204薛言俊诗曰：

童儿学业初殷勤，累习积圣德人钦。
但似如今常寻诵，意智逸出盈金银。
不乐利润须成道，君子烦道不忧贫。
数年读诵何拙晓，孝养师父求立身。

在有些敦煌写卷的尾部，还保留着一些抄写人的随手题诗。这些诗大都是即兴之作，以抒发个人抑郁不满的情怀，其中也有调侃戏谑之作，口语俚词皆入诗中。虽然格调特殊，却也反映出当地抄书人的真实情怀。如S·0692学仕郎安友盛诗云：

今日写书了，合得五升麦。
高代不可得，还是自身灾。

再如P·3386三界寺学仕郎张富诗曰：

计写两卷文书，心里些些不疑。

自要身心恳切，更要师父阇梨。

敦煌诗歌中还有以“重出字”构思而成的诗，它以重出之字，巧妙为对，寓意于中，实为难得。这种类似游戏之作，虽格调不高，但其包含的旨趣，还是耐人寻味的。如P·3597寺僧抄写的残诗内有：

春日春风动，春来春草生。

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

高僧高高高入云，真僧真真真是人。

清水清清清见底，长安长长长有君。

4、敦煌佚存唐代诗人之作

敦煌遗书中所保存的唐代诗人作品，有专集、选集、名篇珍本、残诗断卷等，它的发现，为唐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尤其是某些久已失传的名篇佳作以及唐人抄写唐诗选本的发现，其价值更是无法估量的。

第一、唐人诗集

敦煌发现的唐人诗集，除前面已经提到的《王梵志诗集》外，主要有《李峤杂咏注》、《高适诗集》、《白香山诗集》等。《李峤杂咏注》有两种抄本（S·0555、P·3738），诗注为张庭芳所撰。经比较对勘，两卷所存诗句与佚存本、全唐诗本略有差异，这是迄今发现敦煌唐人诗集的唯一注本，非常可贵。

《高适诗集》，敦煌有四种抄本，即P·3862，首尾俱残，有诗36题、49首，与今本相校获佚诗3首：《双六头赋送李参军》、《过崔二有别》、《奉献平原颜太守》；S·0788，存残诗16行，又2残行；P·2552与P·2567，共存高适诗50首，内两题不见今本：《自武威赴临洮谒大夫不及因事即寄河西陇右幕

下诸公》、《同李司仓宴睢阳东亭》。

《白香山诗集》，敦煌存两种写本，即P·2492,折叶装本，今存8叶半。首为《寄元九微之》，下署“白乐天”，附元稹《和乐天韵同前》，以下存白居易“新乐府”16首；P·3597，存诗3首：《蒲桃架诗》、《夜归》、《柘枝妓》，本为寺僧所写，卷末题记“乾符四年（877）二月二十日灵图寺僧某”，距白居易下世（846）仅31年，是极为难得的珍本。

第二、唐人选唐诗

敦煌所见唐人抄写的唐诗选集卷帙较多，有的还夹抄有文、赋、词等作品。如P·2555，有诗181首、词7首、文2篇、赋2篇，是一部十分丰富的唐人诗文选集残卷。其中有很多诗篇为《全唐诗》所未载，是研究唐代文学的珍贵资料。

在唐人选唐诗抄卷中，题为《珠英学士集》的抄本最引人注目。《新唐书·艺文志》曰：“珠英学士集五卷，崔融集五后时修《三教珠英》学士李峤张说等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亦有著录，说明宋代犹存。其后，该集散佚失传。今从敦煌本复得此集残卷两种，即P·3771，存元希声诗2首、房元阳诗2首、杨齐哲诗2首、胡皓诗7首、乔备诗4首；S·2717题有“《珠英集》第五”一行，存沈佺期诗10首、李适诗3首、崔湜诗9首、刘知几诗3首、王无竞诗7首、马吉甫诗3首。两卷共得诗52首，与《全唐诗》相校，可得佚诗27首。

其他“唐人选唐诗”卷中较为重要的有P·2567，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中有影印本，其序曰：“诗选残卷，共存者凡六家。前三首撰人名在断损处，不可见，今据《全唐诗》知为李昂。其名存者，曰王昌龄、曰邱为、曰陶翰、曰李白、曰高适。都计诗数，完者71篇，残者2篇。”

第三、唐人名篇佚存

敦煌诗歌中保存的唐人名篇佳作，以韦庄的《秦妇吟》最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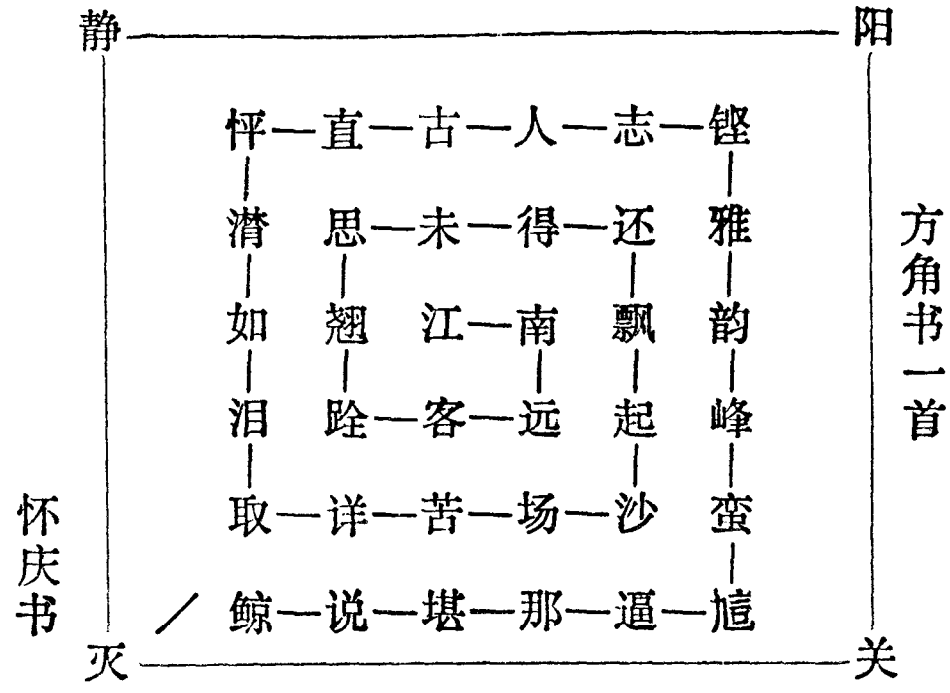
著名。该诗的抄本较多（如P·2700、P·3381、P·3780、P·3910、S·0692、S·5476、S·5477等），根据题记，写本年代最早的是“天复五年乙丑岁（905）十二月十五日敦煌金光明寺学仕张龟写”。该写本上距作者诗中述及的时间“中和癸卯”（883）只有22年，当属最接近原诗而又真实可靠的写本。该本原题“秦妇吟一卷，右补阙韦庄撰”。该诗久已失传，仅《北梦琐言》载其佚句，该书卷六云：“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巢犯阙，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尔后公卿亦多垂讶，庄乃讳之。时人号称秦妇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以此止谤，亦及也。”由于敦煌写本的发现，该诗方得重现于世，并以其深刻的艺术魅力，引起人们的关注。

《秦妇吟》长达1600余字，是古典诗歌中少有的巨制。诗人亲自经历了黄巢起义的动荡年代，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他以高度概括的现实主义手法，深刻反映了唐末农民起义冲击下唐代社会的真实情况。《秦妇吟》的主要倾向当然是反对农民起义，但它在客观上却表现了起义军的高贵品质和惊天动地的伟大气势，这是诗人始料不及的。诗成之后，不胫而走，远及边塞西陲。

曾在敦煌地区广为流传的还有《古贤集》（S·2049、S·6208、P·2748、P·3113、P·3174、P·3929、P·3960、P·4972、苏藏2872），该卷虽以集名，实为一首叙述历代先贤事迹的七言长诗，共76句。

S·0619《读史编年诗》也是以咏古人事迹为主的诗作，其序曰：“编年者，十三代史间，自初生至百岁，赋其诗以编纪古人百年之迹。其有不尽举一年之事，而复杂以释老者，盖为诗句之所在。七言八句，凡百一十。”由此可知，全诗应为110首，然今本尾残，仅存35首。分别赞颂窦武、汉成帝、谢安、卫玠、钟繇、陆云、谢庄、诸葛亮等人的事迹，借以激励后人。

此外，敦煌唐人佚诗残卷中还保存有某些特殊的抄本，如S·5644，原题为“方角书一首”，它的抄写方法是由中心向外回还发散，字与字间标以直线，如果由中心依线的标向读去，便是一首五言律诗。原卷如下：



原诗应读作：

江南远客跧，翘思未得还。
飘起沙场苦，详取泪如潸。
怦直古人志，铿雅韵峰蛮。
尷逼那堪说，鲸灭静阳关。

七、天真质朴的曲子词

1、词的起源与敦煌曲子词

诗的形式在盛唐以后开始有所突破，这就是曲子词。曲子词也简称为词，它是起源于民间，萌芽于六朝，发展于中唐以后，至五代、宋而蔚为大观的一种新诗体。敦煌曲子词的发现，解决了我国文学史上长期难以解释清楚的一些问题，特别是词的起源问题。在敦煌曲子词发现以前，关于词的产生与来龙去脉，人们往往只就《花间集》、《尊前集》等文人词进行分析，并以为《花

间集》是我国最早的词选集。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很多曲子词抄卷，其中较为完整的选集有《云谣集》30首，从而使词的起源问题得到了比较客观的说明。

宋人王灼《碧鸡漫志》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此所谓曲子，就是指隋唐时期流行的西域音乐——燕乐（即宴乐）。曲子词主要是用来配合燕乐的，词是这种新兴的曲子词的简称。我们知道，词是用于歌唱的，它和音乐，甚至和舞蹈有密切关系。用于宴会和饮酒作乐的歌舞，古时通称为燕（即宴）乐。隋唐时期，因和西域交往的频繁，大量的西域乐舞传入中原，燕乐就是以这种大量传入的西域胡乐为主体的新乐，其中自然也含着一部分民间音乐的成份。歌唱是音乐的主要成份，就是舞蹈，有时也要边舞边唱。唱就得有唱词，这种唱词就是词。俗语一般把乐调叫曲子，所以唱词也可叫曲子或曲子词。

在中国古典音乐史上，雅乐、清乐、燕乐是三大音乐体系，各自划分了一个音乐时代。正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说："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这就是说，以先秦的古乐为雅乐，以汉魏六朝的音乐为清乐，隋唐之际，则以燕乐为乐坛主流。所谓"燕乐"，也就是宴饮时所用之乐。隋文帝时奏七部乐，炀帝时增为九部，即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唐初沿隋旧制，太宗时又加燕乐、高昌乐，删除礼毕乐，从而成为十部乐，并以燕乐为第一部。在十部乐中，燕乐作为一部，乃狭义的燕乐，同时，十部乐的总名又称为燕乐，以区别于传统的雅乐。由此可见，燕乐正是中外音乐融合的产物，并在唐前期已经很成熟了。那么，配合燕乐而唱的词的成熟，自然晚于燕乐，亦即晚于唐代前期。从中国音乐史可知，很多词调名称是由玄宗时教坊曲演变而成，就是首先以《竹枝》、《杨柳枝》、《渔歌子》等词调作

词的词人刘禹锡、白居易、张志和等，也都是中唐人，从而可以得出结论，词的正式成熟，当在中唐时期①。

敦煌曲子词，虽然并非全是最初的曲词，有些可能还是较多的文人参与写词以后产生的作品，但它们却基本是民间曲词，保存了词的最早形态。

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种诗体的兴起，多是萌于民间，然后才为文士所摄取，并渐臻完善、成熟，四言、五言、七言，莫不如此。燕乐之于隋唐，已不限于宫廷及豪门贵族，而是作为流行音乐普及于民间，成了雅乐之外俗乐的总称，民间便以长短句句式的里巷歌谣来配燕乐演唱。敦煌曲子词中的民间制作，便显露出这种初级形态的痕迹。如《菩萨蛮》云："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石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这首民间词，原始质朴，非常明显地表达出了早期民间词的特点。由此我们说，唐宋词应该来源于民间小调和民间词(它们通过燕乐表现出来)，敦煌曲子词式的民间词是唐宋词的最早形态。

敦煌曲子词是由民间兴创的，在早期并没有被一般作家所接受，所以在唐五代作家中很少看到有这类作品。敦煌曲子词大半随便写在卷子后面或背面，也有写在卷子夹缝部位的，其句法、文意多具有民间爽直而富有感情的特色，可以断定这是民间作家的作品。敦煌本曲子词汇集在一起的只有一部，即《云谣集》（S·1441、P·2838）。这类曲子词大概是配合乐器歌唱的，所以都有一定的曲牌，如《菩萨蛮》、《更漏长》、《破阵子》、《倾杯乐》等。

《云谣集》原题作"《云谣集》杂曲子"，是晚唐时代编选的一本规模较大的词集，早于《花间集》、《尊前集》诸书。

---

①参阅张晶《关于词的起源》，载《文史知识》1990年9期

《云谣集》有两卷，共存30首。朱孝臧据董康手录伦敦本18首，刻入《彊村丛书》；刘复手录巴黎本14首，刻入《敦煌掇琐》。龙沐勋合校二本，除去重复者2首，适得30首，刻入《彊村遗书》，并作《校记》一卷，王重民据以录入《敦煌曲子词集》。

由于敦煌曲子词在不断地发现、辑佚和整理，因而其数量一时还无法确定。1950年出版了王重民编的《敦煌曲子词集》，收词162首（再版时增至164首），它是敦煌遗书发现后的第一部较为详备的曲子词集本，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前人。该书的出版“一方面给我们拓展了文学的领域，一方面给了我们许多研究文学史的启示和印证”。1955年，任二北编《敦煌曲校录》出版，收入545首。1971年，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编选、法国戴密微解说的《敦煌曲》在巴黎出版，收318首。但辑佚工作并没有结束，1982年周绍良的《补敦煌曲子词》，就是从庄严勘所藏《维摩诘经》背面辑录词13首而来。此外，任二北编《敦煌歌辞总编》，收1300余首，已于198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为敦煌曲子词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

敦煌曲子词绝大多数是流传民间的作品，有的或许经过集体润色，有的也可能曾经文人加工。至于作者，大多数已无法考证，只有少数留下了姓名，如：

温庭筠一首，《更漏长》（P·3994）

欧阳炯二首，《更漏长》和《菩萨蛮》（P·3994）

唐昭宗（李晔）二首，《菩萨蛮》（S·2607）

法照一首，《归来去》（P·2250）

2、丰富的内容

敦煌曲子词的内容极其丰富，正如王重民先生所说，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

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闺情与花柳”①等等。这和当时内容较狭的文人词相较，自然有天壤之别。而具有这些内容的题材，又都来自作者的亲身经历，表现了他们的真实感情。在艺术表现上，现实主义精神是其主要特征，如保家爱国之情，赋役的沉重，士子客商的情怀，人民的不满和喜悦等等，无不充满真情实感，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其次，它语言天真质朴，自然浑厚。敦煌曲子词中的大部分都是近于白描的口语，不加修饰，表现了一种真实的自然美。再次，敦煌词也与文人词一样，普遍运用了多种修辞方法，如夸张、比喻、衬托、影射、借景写情、借物写人等，都精妙确切，运用自如。另外，敦煌词用韵比较随便，每调字数、句数的多少均无具体的规定，四声格律同样无所谓定格。

以上我们从总的方面谈了敦煌曲子词的有关情况，下面再按内容分别加以介绍。

第一、描写普通劳动人民生活的曲子词

敦煌曲子词中描写普通劳动人民的词很多，许多都不知作者。有描写劳动场面的，如《浪涛沙》一首（P·3128、S·2607）就是专门描写船工生活的，词文曰：

五里竿头风欲平，张帆举棹觉船轻。柔橹不施停却棹，是船行。

满眼风波多闪灼，看山恰似走来迎。仔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

这是一首极好的描写船夫水上作业的敦煌曲子词。

敦煌曲子词中关于妇女问题的描写很多，作者勇敢地冲破许多封建文人轻视妇女、玩侮女性的偏见，为各阶层妇女经受的种种痛苦和不幸遭遇鸣不平。一首首饱含同情，激昂慷慨的曲子词或托物寓意，或触景生情，倾诉着征妇情思、怨妇悲愤和被侮辱

①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商务印书馆1956年出版

被损害女性的反抗心声，以及对始终不渝、纯洁无瑕爱情的追求和向往，这些内容都是同时代诗歌里不多见的。

敦煌曲子词中的闺怨题材，绝大多数率直地表达征妇对出征丈夫的思念。他们“相思夜夜到边庭”，毫不掩饰自己“泪珠串滴，旋流枕上，无计恨征人”的感情，如《风归云》曰：

征夫数载，萍寄他邦。去便无消息，累换星霜。月下愁听砧杵起，塞雁南行。孤眠鸾帐里，枉劳魂梦，夜夜飞扬。

想君薄行，更不思量。谁为传书与，表妾衷肠。倚牖无言垂血泪，暗祝三光。万般无奈处，一炉香尽，又更添香。

再如：

绿窗独坐，修得为君书。征衣裁缝了，远寄边隅。想你为君贪苦战，不惮崎岖。终朝沙碛里，只凭三尺，勇战单于。

岂知红脸，泪滴如珠。枉把金钗卜，卦卦皆虚。魂梦天涯无暂歇，枕上长嘘。待卿回归日，容颜憔悴，彼此何如？

（《云谣集·风归云》之二）

悲雁随阳，解引秋光，寒蛩响夜夜堪伤。泪珠串滴，旋流枕上，无计恨征人。争向金风飘荡，捣衣嘹亮。

懒寄回文先往，战袍待稳，絮重更熏香。殷勤凭驿使追防。愿四塞来朝明帝，令戍客休施流浪。

（《云谣集·洞仙歌》之二）

敦煌曲子词中还有描写最下层的妓女生活，如《忆江南》（P·3911、P·2809）一首：

莫攀我，攀我太偏心。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去那人攀，恩爱一时间。

这首词出自妓女之手，写出了她们受人践踏蹂躏的悲惨命运，字字似血泪。

第二、歌颂爱国志士的曲子词

中唐以后，由于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逐渐激化，国力渐衰，

再加上外族上层统治者的搅扰，我国西北边陲纷纷沦陷。唐德宗建中二年，吐蕃占领河湟一带，统治敦煌达七十年之久。敦煌地区人民在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率领下，奋起反抗，为保卫祖国西部边疆，作出了巨大贡献。后来在曹氏的统治下，又为坚守祖国边疆建立了“殊勋”。因此，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一些歌颂反抗外族压迫的爱国曲子词。

敦煌曲子词中有关爱国题材的词篇虽然都以忠君、忠于中原王朝为内容，但却融合着人民的爱国思想和感情，体现了晚唐五代敦煌地区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的可贵精神。如《菩萨蛮》（P·3218）一首：

敦煌古往出神将，感得诸蕃遥钦仰。效节望龙庭，麟台早有名。只恨隔蕃部，情恳难伸吐。早晚灭狼蕃，一齐拜圣颜。

又如《望江南》（P·3218）二首：

曹公德，为国拓西关。六戎尽来作百姓，压坛河陇定羌浑，雄名远近闻。

尽忠孝，向主立殊勋。靖难论兵扶社稷，恒将筹略定妖氛，愿万载作人君。

敦煌郡，四面六蕃围。生灵苦屈青天见，数年路隔失朝仪，目断望龙墀。

新恩降，草木总光辉。若不远仗天威力，河湟必恐陷戎夷，早晚圣人知。

这三首曲子词反映了敦煌地区的民族矛盾和张、曹二氏忠于大朝的耿耿丹心。《菩萨蛮》词，抒发了张议潮领导沙州人民驱逐吐蕃后，决心光复河西及对唐王朝的无限忠诚。“只恨隔蕃部，情恳难伸吐。早晚灭狼蕃，一齐拜圣颜”的誓言和信念，又是对张议潮一生煊赫武功的生动记录和对其忠君爱国思想的充分

体现。《望江南》二首，颂扬了曹氏父子心向中原王朝、安定河西的勋业。其中第一首反映了曹氏在河湟地区的雄威和深受人民的拥戴，“六戎尽来作百姓，压坛河陇定羌浑”。第二首反映了河湟地区民族关系的紧张事态及在这种紧张局势下，曹氏仍对瓜沙诸州实行着有效统治，因而得到了中原王朝的关怀和恩降。词中“新恩降”和“若不远仗天威力”句，直接流露了对中原王朝加封、宣诏的感激与颂扬之情。

还有些曲子词歌颂了边防战士为国忘身和以保家卫国为己任的爱国思想，如：

大丈夫汉，为国莫思身。单枪匹马盘阵。尘飞草动便须去，无复进家门。两阵壁，隐隈处，莫潜身。腰间四围十三指，龙泉宝剑靖妖氛。手将来，献明君。

（《补敦煌曲子词集》第8首）

平夜秋风凛凛高，长城侠客逞雄豪。手执钢刀亮如雪，腰间恒垂可吹毛。

（S·5637《何满子》）

少年将军佐圣朝，为国扫荡狂妖。弯弓如月射双雕，马蹄到处阵云消。休衰海，罢枪刀，银鸾驾□上超霄。行人南北尽歌谣，莫把尧舜比今朝。

（P·4692《望远行》）

第三、反映民族关系的曲子词

敦煌既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又是各民族相互交往的主要场所和聚居地，因而在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一些反映民族关系的曲子词。

敦煌曲子词在描述兄弟民族“相向共朝天”的热烈场面时，是那样的真诚感人，正如一位兄弟民族将领唱道：“本是蕃家将，年年在草头”。因为他们看到“中华好”，要“学唐化”，才“远涉山水，来慕当今”，并下定决心：“弃毡帐与弓剑，不

归边地”，由衷地赞颂“生死大唐好”。这些曲子词虽然有美化封建帝王，遮掩他们实行民族压迫的一面，然而就其主要方面看，却是对各民族相互友好关系的真实反映，如《献忠心》(P·2506)二首：

臣远涉山水，来慕当今。到丹阙，御龙楼。弃毡帐与弓剑，不归边地。学唐化，礼仪同，沐恩深。

见中华好，与舜日同钦。垂衣理，菊花浓。臣遐方无珍宝，愿公千秋住。感皇泽，垂珠泪，献忠心。

蕃却多少山水，直至如今。涉离山阻，意难任。早晚来到唐国里，朝圣明主。望丹阙，步步泪，满衣襟。

生死大唐好，喜难任。齐拍手，奏仙音。各将向本国里，呈歌舞。愿皇寿，千秋岁，献忠心。

《献忠心》二首，是写少数民族朝觐唐王朝献忠，据此词内容推知可能作于初中唐时代。当时唐王朝为世界上之一大帝国，对边疆民族实行友好政策，唐太宗曾被称为“天可汗”，到武则天时期，对睦邻各族更是和平相处，所以威加海内，臣服四方。“臣远涉山水，来慕当今”，“见中华好，与舜日同钦”，“生死大唐好”，“早晚来到唐国里，朝圣明主”，就是对这一时代历史的真实写照。另外，《献忠心》中有武则天所造新字，据此亦可判断该词的写作时代。

又如S·6357《何满子》曰：

城旁猎骑各翩翩，侧坐金鞍调马鞭。胡言汉语真难会，听取胡歌甚可怜。

再如S·2607《赞普子》曰：

本是蕃家将，年年在草头。夏日披毡帐，冬天挂皮裘。语即令人难会，朝朝牧马在荒丘。若不为抛沙塞，无因拜玉楼。

第四、分时联章体曲子词

在敦煌遗书中，还保存了一些以时间为顺序的联章体曲子

词。它们是以五更、十二时辰、十二月、百岁篇、十恩德的形式，来分时歌唱的。

《五更转》是以夜间五个更火为时间单位，分别作成的一首首互相关联的歌词，它基本上由五章组成，每章是一首，也可以是几首。

《五更转》的内容比较丰富，其中以反映太子入山修道成佛事和唐代佛教各宗（主要是禅宗和净土宗）的写本为多。也有征妇怀念出征丈夫的，还有悲叹未读书、不识字之苦的，如《叹五更》：

一更初，自恨长养枉生驱，耶娘小来不教授，如今争识文与书

二更深，孝经一卷不曾寻，之乎者也都不识，如今嗟叹始悲吟。

三更半，到处被他笔头算，纵然身达得官职，公事文书争处断。

四更长，昼夜常如面向墙，男儿到此屈折地，悔不孝经读一行。

五更晓，作人已来都未了，东西南北被驱使，恰如盲人不见道。

这是一首悲叹未读书，不识字之苦的《五更转》。未能读书识字者的悲苦心情流露于作品的字里行间。

《十二时》是以我国古老的十二地支的记时方法，将一天分成12时段而分别作成12章歌辞的民间曲词。其内容与《五更转》极为相似，以佛教劝善歌为多，也有写工农劳苦、持家俭约、儿女亲情等世俗性的，如《发愤》：

平旦寅，少年勤学莫辞贫，君不见朱未得贵，犹自行歌背负薪。

日出卯，人生在世须死老，男儿不学读诗书，恰似园中

肥地草。

食时辰，偷光凿壁事殷勤，丈夫学问随身宝，白玉黄金未足珍。

隅中巳，专心发愤寻诗史，每忆贤人羊角哀，求学山中并粮死。

日南午，读书不得辞辛苦，如今圣主召贤才，去耳中华长用武。

日昃未，暂时贫贱何羞耻，昔时相如未遇时，悽惶卖卜于廛市。

晡时申，悬头刺股是苏秦，贫病即令妻嫂弃，衣锦还乡争拜秦。

日入酉，金罇多泻蒲桃酒，劝君莫弃失途人，结交承己须朋友。

黄昏戌，琴书独坐茅庵室，天子不将印信迎，誓隐山林终不出。

人定亥，君子虽贫礼尚在，松柏纵然经岁寒，一片贞心常不改。

夜半子，莫言屈滞长如此，鸿鸟只思羽翼齐，点翅飞腾千万里。

鸡鸣丑，莫昔黄金结朋友，蓬蒿岂得久荣华，飘飘万里随风走。

此曲子词还有上文，上文有诗曰："自从塞北起烟尘，礼乐诗书总不存。不见父兮子不子，不见君兮臣不臣。暮闻战鼓雷天动，晓看带甲似鱼鳞。只是偷生时暂过，谁知久后不成身！愿得再逢尧舜日，胜朝偃武却修文。勤学不辞贫与贱，发愤长歌十二时辰。"所以取"发愤"二字为之题。

《十二月》是按照12个月的顺序连续歌唱的联章体裁，每月一首；有增加闰月一首的，便有13首。这种按月咏唱的联章体歌

辞由来已久，比《五更转》、《十二时》歌辞要早。

敦煌所出《十二月》歌辞大都散佚了，保存完整者很少。只有一篇拟题为《边使戎衣》的，是描写征妇对出征丈夫的怀念之作，残缺较少，现移录如下：

《十二月（边使戎衣）》（P·3812）

正月孟春春渐暄，一别狂夫经数年。□□□□□□□□，遣妾寻常独自眠。

二月仲春春盛暄，深闺独坐绿窗前。□□□□□□□赖，教儿夫婿远防边。

三月季春春极暄，花开处处竞争鲜。花□□□□□□笑，贱妾看花双泪涟。

四月孟夏夏初热，为忆狂夫难可彻。□□□□□□秦箏，更取瑶琴对明月。

五月仲夏夏盛热，狂夫归否问时节。庭□□□□□□，□见莺啼声更咽。

六月季夏夏共同，妾心恨如对秋风。□□□□□□□改，教儿憔悴只缘公。

七月孟秋秋渐凉，教儿独寝守空房。君在寻常嫌夜短，君无恒觉夜能长。

八月仲秋秋已凉，寒雁南飞数万行。贱妾忧存旧日意，君何无幸不还乡。

九月季秋秋欲末，狂夫一去独难活。愿营方便觅归□，使妾愁心暂时豁。

十月孟冬冬渐寒，为君捣练不辞难。莫怪裁衣不开领，愁君肌瘦恐嫌宽。

十一月仲冬冬雪寒，戎衣造得数般般。见今专访巡边使，寄向君边着后看。

十二月季冬冬已极，寒衣欲送愁情逼。莫怪裁缝针脚粗，

为忆啼多竟无力。

这是一首唐代的《十二月》歌辞。初、盛唐100多年中，由于边境战争的频繁，征夫远戍边地，长期不得归返，闺中征妇怀念征人，苦闷哀怨由衷而起。这首《十二月》辞与敦煌曲子词中其他描写征妇怨的词，如《风归云·征夫数载》等所表达的感情是一样的。

《百岁篇》是把人的一生按百岁计算，以10年为单位加以歌咏的民间曲词。从其内容和分题看，主要有缁门、丈夫、女人三类作品。《缁门百岁篇》是写出家人虔心事佛的，是借用《百岁篇》曲调而写的佛曲；《丈夫百岁篇》是写男人经历的；《女人百岁篇》是写女人一生的。不论何种《百岁篇》，都是用10章歌辞咏唱的，如《丈夫百岁篇》（P·3821、S·2947）：

一十香风绽藕花，弟兄如玉父娘夸。平明趁伴争毬子，直到黄昏不忆家。

二十容颜似玉珪，出门骑马乱东西。终日不解忧衣食，锦帛看如脚下泥。

三十堂堂六艺全，纵非亲友亦相怜。紫藤花下倾杯处，醉引笙歌美少年。

四十看看欲下坡，近来朋友半消磨。无人解到思量处，只道春光没有多。

五十强谋几事成，一身何足料前程。红颜已向愁中改，白发那堪镜里生。

六十驱驱未肯休，儿时应得暂优游。儿孙稍似堪分付，不用闲忧且自愁。

七十三更眼不交，只忧闲事未能抛。无端老去令人笑，衰病相牵似拔茅。

八十谁能料此身，忘前失后少精神。门前借问非时鬼，梦里相逢是故人。

九十残年实可悲，欲将言语泪先垂。三魂六魄今何在，霹雳头边耳不知。

百岁归原起不来，暮风扫雪石松哀。人生不作非虚计，万古空留一土堆。

《十恩德》是把父母养育之恩分成10个阶段来歌唱的一种民间曲词，由10章组成。这是那个时期比较流行的劝孝歌辞。敦煌写本《十恩德》歌辞，其内容都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歌颂，如S·4438等抄本中的《十恩德》：

第一怀躬守护恩

说着起不舒，慈亲身重力全无，起坐要人扶。如伴病，喘息粗，红颜渐觉焦枯。报恩十月莫相辜，佛且劝门徒。

第二临产□爱恩

今日说向君，苦哉母肠似刀分，禁扇不忍闻。如刀割，血成盆，性命只恐难存。劝君问取释迦尊，慈母报无门。

第三生子忘忧恩

说者鼻头酸，阿娘肚肠似刀劗，寸寸断肠肝。闻音乐，无心欢，任他罗绮千般。乞求母子面相看，只愿早平安。

第四咽苦吐甘恩

今日各须知，可怜父母自家饥，贪喂一孤儿。为男女，母饥羸，纵食酒肉不肥。大须孝顺寄将归，甘旨莫教亏。

第五乳饲养育恩

抬举近三年，血成白乳与儿餐，犹恐怕饥寒。闻啼哭，坐不安，肠肚计难翻。任他笙歌百万般，偷奏岂须看。

第六回干就湿恩

干处与儿眠，不嫌污秽与腥羶，慈母卧湿毡。专须缚，怕磨研，不离孤儿休边。记之父母苦忧怜，恩德过于天。

第七洗濯不净恩

除母更教谁，三冬十月洗孤儿，十指被风吹。慈乌乌，

绕林飞，衔食报母未归。枝头大有百般飞，不孝应也虚。

第八造作恶业恩

为男女作姻，杀个猪羊屈闲人，须肉会诸亲。倚早保，下精神，阿娘不为己身。由他造业自难陈，为男为女受沉沦。

第九远行忆念恩

此事实难宣，既为父母宿因缘，肠肚悉均牵。放儿去，任征边，阿娘魂魄于先。儿身未出到门前，母意过山关。

第十怨憎怜悯恩

流泪数千行，爱别离苦断心肠，忆念似寻常。十恩德，说一场，人闻争不悲伤。善男善女审思量，莫教辜负阿耶娘。

以上所说《五更转》、《十二时》、《十二月》、《百岁篇》、《十恩德》等分时联章体曲子词，显然是一种民间流行的曲辞，与至今尚流行于民间之“叹五更”、“绣金匾”、“四季相思”之类的民歌颇相似。其共同的特点是：以曲见胜，通俗易记，比喻生动，而思想感情却往往低沉。

第五章——

敦煌学研究遍天下

——敦煌学的发展及其研究概况

敦煌学产生八十多年来，已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发展，并由此兴起了一股敦煌热，如研究热、展览热、教学热、应用热、著述热等等。于是，美国有了“敦煌广播公司”，日本有了以敦煌图案制作和服的公司，香港则有了由五家敦煌酒楼组成的敦煌集团。尤其是近十多年来，敦煌成了人们关心的热点，敦煌学成了世界上唯一以地名学的国际显学，敦煌莫高窟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珍贵文化遗产①。我国的敦煌学研究，更是走在了世界前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敦煌学的产生及其在我国的初步发展

敦煌学的产生，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了。八十年来，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者，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回顾八十年的历程，可将我国敦煌学的发展划分为两个时期：从1909年起，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是敦煌学的产生、创业及其初步发展阶段；八十年代则是蓬勃发展、繁荣昌

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7年12月十一届全体会议将中国六大文化遗存列入“世界遗产清单”。这六项文化遗存是：泰山、长城、故宫、敦煌莫高窟、秦兵马俑坑、周口店北京猿人洞

盛的黄金时代①。下面先就第一阶段的情况加以探讨。

1、从史的角度考察敦煌学之产生

我们把1909年定为中国敦煌学的起点，并不意味着我国学者在此之前没有注意到敦煌。事实上，早在藏经洞发现以前，我国学者就已注意到千佛洞，并作了记载。

敦煌虽地处祖国西陲，但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存，早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例如：清代雍正年间，督修沙州城的光禄少卿汪灏，就写过《游千佛洞》等诗，对敦煌艺术推崇备至："神工劳劈划，匠手巧雕镌"、"大地形容盛，灵光绘画宣"、"庄严挥四壁，妙善写重颠"。这是十八世纪上半叶的事，比藏经洞的发现要早一百多年。嘉庆年间，著名西北史地专家徐松游历了千佛洞，并对敦煌的历史和碑刻进行了研究和记录。在其《西域水道记》中，收录了许多有关敦煌和莫高窟的材料，还论及了莫高窟的创建历史，一向为人们所重视。道光年间，许乃谷任敦煌县令时（1831—1834），也曾至莫高窟巡礼，写了《千佛岩歌并序》，描述了莫高窟当时的景况，并叙述了莫高窟的碑石和有关历史。

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后，1902年，金石学家、甘肃学台叶昌炽，通过当时的敦煌县令汪宗瀚，得到了藏经洞发现的一些文物。他在《语石》卷一《吐蕃一则》中说：汪宗瀚"先后寄贻宋乾德六年水月观音画像，写经卷子本、梵叶本各二。笔画古拙，确为唐经生体，与东瀛海舶本无异"。他还在其《缘督庐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有关情况，并曾建议将藏经洞发现的全部遗书运至兰州保管。

---

①关于敦煌学史的阶段划分，参阅颜廷亮《我国敦煌学研究史概说》，载《社科纵横》1989年1期

1909年秋，法人伯希和盗劫敦煌遗书之后，曾在北京给罗振玉、蒋伯斧、王国维等人看了一部分敦煌遗书，并送给罗振玉一些敦煌遗书照片，罗据此编成《敦煌石室遗书》一书，并撰写《鸣沙山石室秘录》，这是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刊布和大规模研究与介绍的开始。正是在罗振玉等人的大力奔走呼吁下，清政府学部才于1910年将劫余遗书8000余卷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保存。

1924年，陈垣先生依据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8000余卷，编成《敦煌劫余录》一书，这是我国学者编撰的第一部大规模的关于敦煌遗书的目录书。陈寅恪先生1930年为其作序曰：此书乃“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也。”并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第一次提出了敦煌学这一概念，使用了敦煌学这一名词。1940年，向达先生修订《唐代俗讲考》①时，也沿用了这一名词，说“时贤因为之特创一敦煌学之新名辞”。由此可知，当时学术界所谓之敦煌学，仅仅是指整理研究敦煌遗书而言，并不包含其他。

四十年代初，在政界、学术界一些有识之士的倡议进言、奔走呼吁下，国民党政府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从而开始了对敦煌石窟艺术的保护和大规模研究。1947年出版的史岩先生《敦煌石室画像题识》一书，是我国学者对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此后，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逐渐深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此，段文杰先生在《敦煌研究文集》前言中明确指出：敦煌学的研究对象包括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遗书两个方面。

---

①为节省篇幅，本章所引论著出处，尽量不作注释说明。读者请参阅刘进宝编《敦煌学论著目录1909—1983》，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所刊1983年以后每年论著目录索引

随着敦煌学研究的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了敦煌学理论和敦煌史地在敦煌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已在这两个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从而使敦煌学的体系更加完备，发展成为一门以研究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为主，兼及敦煌史地的学科了。

2、草创阶段（1909—1924年）

1909年8—9月，罗振玉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莫高窟石室秘录》。紧接着，王仁俊的《敦煌石室真迹录》、蒋伯斧的《沙州文录》等相继出版。我国敦煌学研究史的第一页，就这样在1909年揭开了。

敦煌学的帷幕拉开以后，我国学者整理刊布的一批有关敦煌文献的书籍和学术论文便接踵而至。主要有：罗振玉的《鸣沙石室遗书》及《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罗福苌的《伦敦博物馆所藏敦煌书目》、《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书目》；李翊灼的《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王国维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韦庄的秦妇吟》；刘师培的《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等。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序跋。

在这一阶段中，整理研究敦煌文献的主要方法是考证文献本身，其形式是为某一文献作跋或提要。文献的来源主要是伯希和盗劫的敦煌卷子，也有少数斯坦因劫卷。刊布和研究的范围主要是四部书，尤其是经部和子部。

这一阶段是我国敦煌学研究的草创时期，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卷子本身，还未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评述，更未涉及敦煌石窟艺术。虽然如此，仍然是敦煌学研究史上一个很有成绩的阶段，罗振玉、王国维、蒋伯斧、王仁俊、董康、李翊灼、陈垣等第一代敦煌学家，为开创我国敦煌学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3、艰苦创业（1925—1949年）

1925—1949年，我国的敦煌学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在遗书研究方面，由于刘复、向达、王重民、于道泉、姜亮夫、王庆菽等学者相继去巴黎或伦敦转录和拍摄敦煌文献，从而得到了一大批敦煌资料。再加上北京图书馆所藏遗书的利用，遂编辑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专集，如刘复《敦煌掇琐》、陈垣《敦煌劫余录》、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金祖同《流沙遗珍》、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序录》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敦煌掇琐》和《敦煌劫余录》。《敦煌掇琐》共收敦煌文献104种，是刘复在巴黎图书馆根据原卷抄录的，其“上集是文学史的材料，中集是社会史的材料，下集是语言史的材料”。《敦煌劫余录》汇集了北京图书馆藏8679卷的有关情况，详记每卷的起讫、纸数、行数和品次，在附记内还移录有题记和卷子的残缺情况。王重民先生曾评价说：“这样细致、渊博而又正确的目录工作，不是任何人所能作的①。”

这一阶段的敦煌遗书研究，由于使用了较多的资料，展开了各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些很有质量的研究成果。如在归义军史研究方面，有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唐长孺《白衣天子试释》等文；又如唐代民间文学的研究，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以及其他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专著都设专章或专节论述敦煌遗书中的唐代民间文学作品，包括歌辞、白话诗、变文、话本、赋、词文等。向达的《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论唐代佛曲》、《唐代俗讲考》，对唐代民间文学进行了深刻的探讨。孙楷第的《敦煌写本张议潮变文跋》和《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是有

①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后记》

关唐代变文研究的两篇重要文章①。

本阶段的最大特点是敦煌艺术的研究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

1931年，贺昌群的《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一文，是国内有关敦煌石窟艺术的第一篇重要文章。该文不但对敦煌艺术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而且还将伯希和《敦煌 图录》六 集376个洞窟的壁画，简明扼要地加以介绍，使国人对千佛洞的内容和结构有了大体的了解。日本敦煌学者神田喜一郎在《敦煌学五十年》中说："1931年贺昌群在《东方杂志》第28卷第17号上，发表了极为通俗的论文《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敦煌艺术）这才成为注目的课题"。

四十年代初，向达、阎文儒、谢稚柳、何正璜等到敦煌考察，他们不仅勘查了大部分洞窟，而且还抄录过碑文题记，对洞窟壁画的内容、建窟年代进行了考证。何正璜的《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调查》就是最早的一份内容总录。谢稚柳的《敦煌艺术叙录》（出版于五十年代），记录了415个洞窟的形制、塑像、壁画、供养人题记等内容。其他如卫聚贤《敦煌石室》、史岩《敦煌千佛洞概述》、《敦煌石室画像题识》等，都是敦煌艺术研究的重要著作。

在美术界，画家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等都先后到敦煌石窟临摹壁画，并撰文介绍敦煌石窟艺术。特别需要指出的有两批：一批是王子云率领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的美术工作者，他们临摹的壁画，曾在重庆沙坪坝举行过展览。第二批就是张大千。1941年，张大千率领子、侄、夫人等来到敦煌，为了系统、科学地了解和整理敦煌文物，他清理了309个洞窟，按从南到北的顺序给洞窟编了号。还花费大量时间对莫高窟中许多有价值的壁画进行了临摹复原。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敦煌艺术，他曾将

①详见王永兴《我国敦煌文献（汉文）研究概述》

其临摹的壁画在成都、重庆、上海举行过展览，并撰文介绍，出版了《敦煌临摹白描画》三集，对敦煌艺术的宣传，起了积极作用。

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所长常书鸿又从内地征聘了一批自愿到敦煌的美术工作者，如史岩、李浴、董希文、苏莹辉、段文杰、孙儒僩、史苇湘、李承仙、霍熙亮等。他们继张大千之后，开展了临摹工作。1948年10月，在南京举办了敦煌艺展，展出了他们的临摹品数百种，并发表了一些有关敦煌艺术的研究文章，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临摹与普及作出了极大贡献①。

本阶段的另一特点是重视敦煌学宏观研究。陈寅恪先生首先提出了敦煌学这一概念。此外，还有傅芸子的《敦煌学三十年》、傅振伦的《敦煌艺术论略》、常书鸿的《敦煌艺术与今后中国文化建设》、姜亮夫的《敦煌经卷在中国学术文化上之价值》等，都是从宏观上探讨敦煌学的文章。

4、初步发展（1949—1966年）

新中国的成立，为我国敦煌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关心敦煌文化及其研究。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将原敦煌艺术研究所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并受中央文化部直接领导，使石窟得到了妥善保护。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国家拨出巨款作为修复和保护敦煌文物之用。1960年，又通过国际交流，得到了伦敦所藏敦煌遗书缩微胶卷。1961年，国务院公布敦煌莫高窟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国家又拨出巨款，对敦煌莫高窟进行了全面维修和加固，使之面貌焕然一新。在这种客观条件下，敦煌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临摹、保护以及敦煌文学研

①参阅段文杰《五十年来我国敦煌石窟艺术研究之概况》

究，更是走在了世界前列，代表了国际最高研究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敦煌学者向达、梁思成、周一良、阎文儒、宿白、常任侠、史岩、李浴、段文杰、史苇湘、阴法鲁等，对敦煌艺术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他们或对敦煌史地进行了考察，或对莫高窟进行了详细探讨，或编著了敦煌石窟艺术的学术著作。如阎文儒的《敦煌史地杂考》、《莫高窟的石窟构造及其塑像》，宿白的《敦煌莫高窟中的五台山图》，向达的《敦煌艺术概论》，周一良的《敦煌壁画与佛经》，王逊的《敦煌壁画和宗教艺术反映现实生活问题》，金维诺的《敦煌佛本生图的内容和形式》、《敦煌壁画中的中国佛教故事》，段文杰的《谈临摹敦煌壁画的一点体会》，阴法鲁的《从敦煌壁画谈唐代的音乐和舞蹈》，潘絜兹的《敦煌莫高窟艺术》等。

在本阶段的敦煌艺术研究中，临摹工作占很大的比重。壁画的临摹，决不是依样画葫芦，而是一项艰巨的艺术劳动。临摹的过程也就是研究过程，临摹一幅壁画或一身彩塑，必须做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能表现原作的精神和艺术水平。本阶段共临摹了近千平方米的壁画，30多身彩塑，其质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先后在印度、缅甸、捷克、波兰、日本等国和北京、上海、兰州等地举行了大小20余次展览，对宣扬祖国古代艺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学习民族艺术遗产，推陈出新，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研究、临摹的同时，还出版了《敦煌画库》、《敦煌壁画》、《敦煌彩塑》、《敦煌唐代图案》等画册，对敦煌艺术的宣传、普及起了积极的作用①。

在遗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资料专集和研究专著，如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词集》（1950）、周绍良的《敦煌变文汇录》（1954）、任二北的《敦

①参阅段文杰《五十年来我国敦煌石窟艺术研究之概况》

煌曲初探》（1954）、《敦煌曲校录》（1955）、姜亮夫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1956）、王重民等的《敦煌变文集》（1957）、王重民的《敦煌古籍叙录》（1958）、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1959）、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敦煌资料》（1961）、王重民主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1962）等。

《敦煌曲子词集》是我国第一部专科性文献集，它将同类作品辑录在一起，加以校注，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多方面。但该书只收词162首，很不完备。任二北沿用这一体例，又编校了《敦煌曲校录》，收词545首，分为普通杂曲、定格联章和大曲三类。

1954年，由王重民、王庆菽发起，向达主持，周一良、启功、曾毅公参加，在广泛摄、抄国内外公私收藏的变文资料的基础上，过录了187个写本，作了认真的整理，选编78种，编成了《敦煌变文集》一书，于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敦煌变文集》是当时我国学者对变文写卷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整理成果，也是收集资料最丰富的一部变文总集，对推动我国变文及民间文学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现在看来，它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敦煌资料》第一辑是一部综合性的敦煌文献集。它辑录了社会经济方面的许多原卷录文，并采用了通行的价格低廉的排印本，因此它流通的范围比较广，为大部分敦煌文献研究者所喜爱，更成了敦煌经济文书和唐代经济史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书，对推动我国敦煌文献研究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编辑时间短促，在录文的准确性以及文献的时间、性质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缺点和错误。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是以《敦煌变文集》为根据，对变文中的难词加以考证和疏解的。该书对敦煌语言文学、汉语方言俗语以及汉语史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是我国开展敦煌文献研究以来，我们

自己编著的较完全、较准确、较好的敦煌遗书目录。它收录了北京、巴黎、伦敦及其他一些公私收藏的敦煌卷子目录，详记了每个卷子的标题、编号，在很多标题下，还记录了卷子的内容提要，有些还描述了卷子本身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从而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是前此六十年我国敦煌文献研究工作中成绩的反映和经验教训的总结。王重民先生为此书写的后记是一篇带有总结性的重要文章。当然，该书仍有一些缺点和不足，如对少数文献的性质以及标题的确定不大准确，甚至出现错误等等。

除以上专著外，这一阶段还发表了大量研究敦煌遗书的论文，研究的方面与前一阶段大致相同，在归义军史、唐代民间文学、唐地志、社会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综观“文化大革命”前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虽然各个时期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在许多方面，如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等，都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科学考察结硕果

从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我国大批的珍贵文物被外国“探险家”、“考察团”窃去，造成了我国文化史上不可弥补的损失，从而使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在某一阶段的某些领域落后了。这种落后的状况，是由于人民的觉醒，以及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团结奋斗，尤其是两次西北科学考察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才改变的。

1、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及其成就

1926年末，瑞典著名探险家、地理学家斯文·海定率一个包括8名德国航空人员在内的大型远征队第四次来华，准备去我国

西北部进行科学考察。这次学术调查计划包括制作详细的中亚地图、气象观测、民族调查、考古调查等，同时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即让中国中央政府承认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在新疆的航空权，因为该公司承担了海定的调查费用。当北洋军阀政府与海定的不平等协议，即不准中国科学家参加考查团，采集品全部运到国外等内容传出后，全国舆论大哗。正处在北伐高潮中的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了，北京大学考古学会、清华研究院、历史博物馆、京师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画学研究会、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央观象台、天文学会、地质调查所等在京的十几个学术团体联合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发表宣言，抗议政府的无条件批准，并派刘半农等人与海定反复磋商，经过“十余次”的协商，终于于1927年4月26日达成了一项包括19条内容的新协议：决定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领导下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团名称中谨慎地避开了“探险”字样；设中国及外国团长，参加的中外科学家各占一半；禁止将文物带到海外，采集品留在中国；凡直接或间接对于中国国防国权上有关系之事物，一概不得考查；不得以任何借口，毁损有关历史、美术等建筑物；本协议办法之解释，应以中文为准。这个协议的签订使中国学术界异常振奋，人们奔走相告，举手相庆。《大公报》和《世界日报》详细报道了事情的经过，并汇集舆论反映，指出这是中国第一次用自己的力量防止文物被“巧取豪夺，潜运境外。”刘半农径直以“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不平等条约垮台了”的词句率直表达了自己的喜悦心情。事后《大公报》曾这样写道：“尤有一精采之处，即该协定之解释，须依中文为准，开我国与外人订约之新纪元，当此高唱取消不平等条约之秋，望我外交当局一仿行之。”

这次考察，中国方面共10人，由徐炳昶任团长，再就是负责地质工作的袁复礼，担任地质和古生物工作的丁道衡，负责地图

工作的詹蕃勋，承担考古工作的黄文弼等科学家。另外还有摄影师龚元忠和承担气象观测工作的四位学生：崔鹤峰、马叶谦、刘衍淮、李宪之。

欧洲团员共17人，除海定任团长外，瑞典尚有4人，即队长兰理训、本团医生郝默尔、研究地质并负责作图的那林、研究考古学的贝格满；丹麦1人，即副队长哈士纶；德国11人，即本团气象主任郝德、本团会计米纶威、本团电影员李伯冷和汉莎航空公司8人：钱默满、海德、韩普尔、马学尔、华志、狄德满、马森伯、冯考尔。此外尚有瑞典人生瑞恒，随本团照料事务，但不列其名于团员中。

考察团到了新疆后，斯文·海定向新疆当局多次交涉，要求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取得新疆境内的航空权。这种单方面的航空权显然是不平等的，是有损于国家主权的。因此，黄文弼及其他中国团员为了捍卫国家权益，向新疆当局多次力争，不能同意斯文·海定的要求，包尔汉先生就充当了黄文弼与新疆省长杨增新的中间人①。在黄文弼等学者的努力下，杨增新“合乎逻辑地冷静地说明了拒绝的政治理由”，德国企图在新疆开辟航空线的要求未被同意，海定的交涉终于以失败而告终。

关于新疆航空权的交涉失败后，汉莎航空公司8人便离团归国，考察团遂又增加了研究地磁学的瑞典人安博尔。由于工作需要，团中又任用了新疆的气象实习生张广福、赵玉春、翟绍武、赵克勤等人。至于团中所用的听差、厨役、采集人、牵骆驼的人则随时雇用，多少不等。

1927年5月9日，考察队从北京出发。一个多月后捷报首次传来：我国年轻的地质学者丁道衡发现了白云鄂博大铁矿，其“成分必在八九十分以上，”“尤适于近代矿业之发展。”中国

①参阅黄烈《黄文弼传略》，载《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八辑

团员极为兴奋："这里或将成为北方的汉冶萍吧！"对矿石的化验结果证实，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含铌稀土的铁矿床之一，现已发现有71种元素和114种矿物，我国的大型钢铁企业、稀土生产科研基地——"包钢"，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

1928年10月，考察团的又一条消息轰动了全世界：袁复礼教授在新疆挖到7具完整的三迭纪爬行动物化石。法国一家报纸甚至渲染说："七个活恐龙在新疆发现。"四年中，袁复礼教授在乌鲁木齐以东博格达山至天山北阜远一带挖出大量爬行动物化石，较完整的有72具，其中有7个新种，古脊椎动物学家将其命名为：新疆二齿兽、布氏水龙兽、赫氏水龙兽、魏氏水龙兽、袁氏水龙兽、袁氏三台龙、奇台天山龙。另外还发掘到一具宁夏结节绘龙化石。这是当时我国发现恐龙化石最多、最完整的一次，这一成果把我国古生物考古学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在此之前，只有外国人在中国零星发现过几块白垩纪的恐龙化石，大批的爬行动物化石只在南非的卡鲁地区发现过。这次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短时间内竟发现这样多的二、三迭纪古爬行动物化石，比过去的发现提前了一亿多年，这怎能不使全世界的学者为之震惊呢？这些发现使中国的古脊椎动物研究跃入了一个新阶段，我国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认为："此其重要，殆不在中国猿人之发现之下①。"考察团中国团长徐炳昶在其《西游日记》中也说：西北科学考察团"最重要的发现，则为袁希渊（复礼）在新疆……所得之恐龙化石。此化石……在亚洲尚属第一次发现，并可以推倒从前地质学家天山东段无动物化石的断定。瑞典有一地质学家对赫定（即海定）博士说：你们费巨款，作考查，即使止得此一件大发现，已属不虚此行。"

---

①参阅徐恒、王忱《他们的功绩与精神永存——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60年纪念》，载《人民日报》1987年5月21日

西北科学考察团另一项震动中外的考察成果是一万多枚居延汉简的发现，它为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最有价值的资料。考察团发掘的地区，在今甘肃省北部额济纳河流域居延地区（下游今已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管辖），即东经100度至101度，北纬41度至42度间。在额济纳河下游，有一名叫黑城的废墟。在此废墟的东南方，有汉代遗址，据推测此地可能就是汉代张掖郡的居延县城，所以沿额济纳河广大地区出土的简牍，统称为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的发现，是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率我国采集员靳士贵在额济纳河流域的考古成就。1930年4月20日，贝格曼发现了一枚汉简，不久又发现了大批简牍。考察团在居延地区共发掘60区，主要的有21区。出土文物非常多，计586包，有木简者463包[①]。这批汉简按照协议于1931年5月运至北京，由北京大学教授兼故宫博物院文物馆副馆长马衡及贺昌群、余逊、劳干等分别作了部分考释。贝格曼博士也因研究这批简牍携眷在北京住了两年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的沦陷使这批国宝面临被毁劫的恶运，沈仲璋先生冒着生命危险把它们辗转运往香港，以后又被运到美国，现存台湾。劳干先生研究这批汉简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于1958年与杨振宁、李政道等同时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2至1974年，甘肃省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又在原简发现处破城子一带出土了汉简两万多枚。到目前为止，居延汉简已出土三万多枚了。

考察团还有一项成果，即黄文弼在新疆的考古活动。还在十九世纪末，一些外国旅行者在新疆沙漠中发现了古代遗址和大量的古文字文书，从而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注目。随后形形色色的外国“探险家”、“考察家”等接踵而至，穿梭式的活动在我国新疆以及毗邻的内蒙、甘肃一带，从而使我国大量的珍贵古籍、

---

①参阅林剑鸣编译《简牍概述》14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艺术品、简牍、文书等流散国外。迨至民国，我国学术界才逐渐了解了这些文化财富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在痛心之余，激起了研究西北的热潮。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黄文弼参加了西北科学考察团。

黄文弼先生是我国第一个进入新疆的考古学者。他考察的重点是吐鲁番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周围诸古代遗址，在塔里木盆地的考察，除了南部东段外，几乎都踏查遍了。他重点调查或发掘的地区有焉耆、库尔勒、轮台、库车、沙雅、拜城、和阗、于阗、皮山、叶城、巴楚等地，发现遗址极多，采集也非常丰富。

在吐鲁番地区，黄先生重点发掘了交河故城，得到了大量陶器和高昌麴氏王朝纪年的墓砖，对于补充高昌历史纪年有很大价值。

举世闻名的罗布泊地区，以前仅有少数几个外国学者考察过，黄文弼于1930年春踏上了这个地区，从而第一次印上了中国学者的足迹。他最富有成果的发现是一座西汉烽燧台遗址，出土了一批西汉简牍。这是汉通西域后最早的一批简牍，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黄文弼先生在新疆三年多的考察，获采集品80余箱，于1930年秋取道苏联西伯利亚返回北平。在北京大学为黄先生举行的报告会上，陈大齐教授说："黄先生此行前后三年余，经历许多艰难困苦，成功而归，外人在新疆考古者甚多，我国人今以黄先生为第一，而其所得材料之丰富，亦不亚于外人。"沈兼士教授说："我国的科学考古事业，今尚在幼稚时代，人才、经济及环境均有困难，黄先生当时勇往直前，今果战胜一切，成功而归。现在国内学术机关渐注意考古及民俗学之研究，但在六、七年前，只有北大同人注意于此，不但开通风气而已，今果有伟大成功①。"

---

①转引自黄烈《黄文弼传略》

考察结束后，黄文弼即在北大国学研究所从事采集品的整理研究，1931年出版了《高昌砖集》，次年出版了《高昌陶集》。1933、1943、1957年他又多次入疆，根据罗布泊沿岸的考古发现，论证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对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罗布淖尔水道变迁等，对该地区诸古国的兴衰和丝绸之路等重大课题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并出版了《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吐鲁番考古记》（1954）、《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958）、《西北史地论丛》（1981）、《新疆考古发掘报告》（1984）等，《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也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另外，考察团在德国专家赫德博士领导下的气象观测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全部观测记录汇集为地面观测和高空探测资料两大本（德文），成为此后二十余年间中亚气象的权威性资料。

这次考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科学家刮目相看。我国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由于在古生物方面的卓越贡献，获得了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北极星奖章”，考察团中国团长徐炳昶教授，也因出色的组织领导工作获得了以瑞典国王名义颁发的勋章。中国政府为了表彰考察团的功绩，特为该团发行纪念邮票一套，这是我国为学术界发行的第一套纪念邮票。斯文·海定博士在其著作中写道：“中欧间的这种善意的、友谊的合作在我看来，是一种真实愉快的源泉；我把同地球上最伟大的、在许多观点上最饶兴趣的民族这样密切地接触过这件事当作一种最大的获得。”

以上仅仅叙述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一些具体成绩，其最大、最重要的成就乃是开一代风气之先。正如徐炳昶在其《西游日记》中说，在一切具体成绩之外，“还有两件很好的结果，深应注意：第一，这一次的考查足以证明中国科学家对于工作的强固意志及丰富能力，并不像欧洲近视眼的外交家所说：‘中国人那里知道大沙漠是什么！他们将来走出包头不远，即将全体转回北

京！’第二，这一次的考查足以证明我国人并无盲目排外的意思，如为夸大狂所蒙蔽之欧美人所宣称。这两件证明实已足在精神界中开一种一纪元。”是的，自此之后，我国科学家不断对西北史地进行考察、发掘、研究，并在敦煌学、吐鲁番学、简牍学、丝路学等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2、敦煌考古促进了敦煌学研究

1942年春，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中央研究院组织了“西北史地考察团”，考察范围为甘肃、宁夏、青海三省。1944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教育部、中央博物院、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又共同组织了西北科学考察团，沿着斯坦因走过的玉门关、阳关以及汉代边防线遗址再次考察。这次组建“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目的，除了纯粹的学术研究外，主要是为当时的西北建设服务，以考察“所得供从事西北建设者之参考。”因此，除了历史考古组外，还有地理组、地质组、矿产组、动物组、植物组等。其中有历史考古和美术工作者向达、夏鼐、阎文儒、谢稚柳、何正璜、傅振伦等先生，他们在敦煌的考察，打开了敦煌史地研究这一领域。

早在1942年，向达先生就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约，经北京大学同意，赴河西入敦煌，考察莫高窟。因当时尚未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石窟的保管工作无人过问，任人破坏盗劫。莫高窟的荒芜景象，使这位毕生致力于敦煌学研究的学者十分痛心。他根据考察所得及其见闻，于1942年写成《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文章首先提出敦煌千佛洞应收归国有，交与学术机关管理，勿轻意剥离壁画，并希望此建议得到学人的支持，造成声势，促使国家重视。最后建议加强对河西问题的研究，主张在河西设立一工作站，从事历史、考古、地理、地质以及人类学等各部门的探讨研究。正是由于向达先生的呼

吁，再加上政界、学界同人的努力，于是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

向达先生曾在《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议在河西设立工作站。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分给历史考古组十万经费（总经费五十万），傅孟真等先生便商议用此款在河西设立一工作站，由向达先生主持筹备，并准备派夏鼎先生前往协助。随后便由向达、夏鼐、阎文儒三位先生组成历史考古组，由向达任组长，夏鼐任副组长，于1944年春赴河西，五月到敦煌，一直考察发掘到年底，1945年初返回。

现将在敦煌境内的主要考察成就简述如下：

1942—1943年，向达先生就对敦煌境内的古长城及关隘等作了考察，他在《西征小记》中说："余于三十一年十月九日午抵敦煌，下午即去千佛洞，住其间者凡九阅月。中于同年十月中旬至南湖一访阳关遗址，三十二年三月旬往游大方盘、小方盘，探玉关之胜迹，访河仓之旧城。其年四月复自敦煌至南湖，由南湖北行越中戈壁以至西湖，再访玉关，然后东行以归敦煌。五月至安西，礼万佛峡诸窟，历时一周，复返千佛洞。"

1944年10月31日至11月15日，夏鼐、阎文儒先生在敦煌驻军的一位营长陪同下，又对敦煌汉长城进行了考察与发掘。11月2日，他们赴古董滩考察，"滩在沙丘中，时露绳纹或刀削纹陶片、小榆荚钱和五铢钱，以及碎铁片等等。沙丘常因风吹而迁移，当地居民常拾到零星古物，所以叫古董滩，或叫古铜滩①。"

小方盘城就是汉代的玉门关。关城方形如盘，故叫小方盘城。"城垣每面二十六公尺二寸，高七公尺五寸。垣顶每面长二十四公尺八寸，宽三公尺八寸。开西、北二门，……城垣版筑，每层板痕约一公寸②。"

①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载《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4期

②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

向达先生在《两关杂考》中指出，阳关即今南湖古董滩西之西寿昌城，玉门关即南湖北之小方盘城。11月5日夏鼐先生率队对关城北疏勒河南土丘中的汉代垃圾堆（斯坦因编第14号墩）进行了发掘。他们用一天的时间，共掘得野麻绳、残木片、碎毡片、麻布片、白绢片、木栉等物，还有一些残木简，其中第三简有“酒泉玉门都尉护众候畸兼行丞事谓天（？）忌以次（？）马驾当舍传舍诣行在所夜（？）口传（？）行（？）从事如律令”等文字，由此简更可证明为玉门关城址无疑。

11月7日，考察队发掘了大方盘城。掘出长方形石刻一块，上有“泰始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甲辰造乐生”等字，还有五铢钱、陶片及白绿残绢片等。这次发掘所获，最重要的是泰始十一年的刻石，由此刻石得知，晋时敦煌仍隶属于中央政府，并可以推证大方盘城兴废的时间和用途。

大方盘城即河仓城。S·5448《敦煌录》说：“河仓城，州西北二百三十里，古时军储在彼。”当时至大方盘城虽无确定的里数，但根据考察队来往路程推测，与《敦煌录》所记里数相符合。又大方盘城城墙上下，有排列整齐的洞穴，“以今日关外清时军粮储藏的仓库遗迹来看，后墙为通风起见，也砌成洞穴，大方盘城的用途，可能是军储的遗址，与《敦煌录》所记的用途也相同。”从以上种种情况可知，“大方盘城的建筑，最晚当在泰始十一年（275），或者是汉时的边城。城的用途，可能为军储的遗址，就是《敦煌录》中所记的河仓城了①。”

敦煌附近除了古城遗址外，还有许多古墓，如罗盈达墓志铭、阴善雄墓志铭、索法律窟名等，均记其葬地。如能找到这些墓葬，乃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的重大收获。向达先生在《西征小记》中说：“三十一年冬始至敦煌，即闻人言佛爷庙至千佛洞中途戈壁上有

①阎文儒《河西考古杂记》

砾石堆甚多，疑是古代墓葬遗址。其后数次往观，则自佛爷庙以东此种砾石堆累累皆是，迤东以至于新店子，长达三四十里。大都中为砾石堆成之小阜，高者及丈，低则几与地平，为数三五不等。”“就其形式观之，与斯坦因、黄仲良（文弼）诸人在高昌所发掘之六朝以及隋、唐古墓绝相类似，则其为古代之墓葬群，盖无可疑也。”向达先生的这种推论，被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的发掘完全证实。

1944年6月30日至7月11日，鄎鄎、向达、阎文儒先生在敦煌城东约九公里的老爷庙发掘了一唐代墓葬，内容比较丰富。这个墓葬的墓门内两侧站立着一对高1.2米的武士像，他们都高举着一只手，另一只手叉在腰间，威风凛凛，表示门禁的森严。武士像的雕塑艺术也很精良，脸部的表情威严而生动，可以和千佛洞盛唐洞窟中的武士像相媲美。在武士像稍后的右首，站立着一对骆驼，高达0.85米，各有一个驼夫牵引着。再向后便是放置木棺的平台，台前排立着大批的小陶俑，共41件。其中骑士俑16件跨着骏马，好象一队骑兵，排立在平台前的左边。旁边的空隙放置一匹大陶马，马首向外，姿态生动，其旁站立着三个马夫俑，作牵马的姿势。这些马夫和驼夫，都身穿大翻领的狭袖短大衣，足穿长统的黑靴子。其中的两个不仅穿胡服，而且高鼻圆目，发辫盘在头上，可能血统也是胡人。此外，还有带金箔的铜片、开元通宝钱、玻璃细条和玻璃珠等。从其内容判断，它是盛唐时代的墓葬①。

这次西北科学考察结束后，考察队成员利用历史考古所得，撰写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向达先生的《两关杂考》、《莫高、榆林二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夏鄎先生的《新获之敦煌

①参阅夏鄎《敦煌考古漫记》，载《考古通讯》1955年2期

汉简》、《玉门关发掘新获的汉简》、《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等，都是很有见地的学术论文，大大丰富了敦煌学和西北史地学的研究内容，推动了敦煌学的向前发展。

三、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四十年代初，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中国才有了自己的敦煌学研究机构。同时，历经磨难的敦煌石窟艺术也才得到了保护、临摹和研究。那么，敦煌艺术研究所是怎样成立的呢？

1、于右任先生的建议书

提起敦煌艺术研究所，自然而然就想到了于右任先生。1941年甘新公路正式通车，时年63岁的于右任先生即由重庆来西北考察。10月2日抵西安，旋过兰州，趋敦煌。10月5日，恰值中秋节，于先生到了莫高窟。这时国画大师张大千正在洞窟临摹壁画，于先生当晚即在张大千的临时住所过中秋节，同到者有高一涵、马云章、卫聚贤、曹汉章、孙宗慰、张庚由、张石轩、张公亮、任子宜、李祥麟、王会文等。席间，大家的话题自然谈到敦煌和敦煌艺术，认为敦煌文物多年来不断遭到外人的劫夺，目前大量艺术珍品得不到妥善管理保护，许多洞窟濒于坍塌；由于气候恶劣，有的壁画大块脱落，而有关方面却对敦煌国宝漠然视之。在座诸人无不痛惜。在以后几天的参观考察中，于先生对敦煌艺术无法估量的价值和它濒临毁灭的危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其《敦煌纪事诗》曰：

敦煌文物散全球，画塑精奇美并收。
同佛残龛同赞赏，莫高窟下作中秋。

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

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

敦煌之行结束后，于先生又考察了河西走廊，复到兰州、西宁。1941年12月11日，完成了对西北的考察。14日离开西安，返回重庆。在兰州时，于先生曾谓莫高窟是中国的骄傲，更是甘肃的骄傲，应珍视！在他考察敦煌后，深感现状岌岌可危。因此返回重庆后，就立即在政界、学术界大声呼吁，希望重视、保护敦煌艺术宝藏。于先生作为政府高级官员，亲自撰写《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的建议书，并送达国民党政府，要求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鼓励学人研究敦煌艺术。这一建议书发表于当时重庆出版的《文史杂志》2卷4期(1942年2月15日出版)，建议书说：

为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期保存东方各民族文化而资发扬事。右任前次视察西北，因往敦煌县参观莫高窟之千佛洞，洞距敦煌县四十里，依崖筑凿，绵亘里许。志称有千余洞，除倾地沙埋者外，尚有五百余。有壁画者计三百八十，其中壁画完整者亦二百余，包括南北朝及唐、宋、元各时代之绘画泥塑，胥为佛经有名故事。其设计之谨严，线条之柔美，花边之富丽，绝非寻常匠画，大半出自名手。今观其作风，六朝以上无考，自唐以下率类阎立本派。唐分塑西番塑中国塑两种，衣纹神态，大者五、六丈，小者尺余，无不奕奕如生。就所见之文字，有梵文、西夏文等五、六种之多。而各时代供养人之衣冠饰物用具，亦可考见当时风俗习尚。洞外残余走廊，犹是宋时建筑。惜在过去未加注存，经斯坦因、伯希和诱取洞中藏经及写本书籍，又用药布拓去佛画，将及千数。复经白俄摧残，王道士涂改，实为可惜。沙埋之洞不知更存何物。且闻敦煌西部尚有西千佛洞，数仅二十余，壁画尚存。而安西万佛峡之榆林窟洞画完好者凡四十六，曾往亲自察看，壁画之精美皆可与千佛洞莫高窟匹敌。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

销。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将大。拟请交教育部负责筹画办理。是否可行，理合具文，提请公决。

这个建议经过讨论，决定交当时的教育部负责筹办。时值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正在对日作战激烈阶段，财政支出紧张，故答复须待次年始能成立。

2、向达先生的大声疾呼

于右任先生作为政府高级官员，其建议在当时引起了各方面强烈的反响，敦煌艺术也越来越多的受到人民的关心。1942年5月，围绕过去河南洛阳龙门浮雕被奸商盗卖的事件，重庆进步的文化界人士正在议论如何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问题。各进步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对国民党统治下发生的诸如此类的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与此相关，人们就敦煌石窟历次的被大肆劫掠和破坏，也对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1942年春，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向达先生应研究院之约，参加历史考古组赴敦煌等地考察。向达先生在敦煌详细考察了千佛洞、榆林窟及阳关、玉门关等名胜古迹。通过考察，更认识到了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价值，看到了千佛洞所经历的劫难及其被毁灭的危险，立即在莫高窟写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以“方回”为笔名，在重庆《大公报》1942年12月27至29日发表。向达先生在文中慷慨陈词，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政府重视祖国文化遗产，设立专门学术机构，保护敦煌文物。向达先生说：

我们之所以不甘为奴为隶，情愿忍受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困苦，来奋战求存，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的我们是有历史有文化的民族，我们有生存的权利，我们也有承先启后的

义务。千佛洞是我们民族在精神方面一个最崇高的表现。保护和发扬这种精神，难道不是我们的义务么？

向达先生作为著名学者，他的呼吁得到了学术界的大力支持与响应。有的学者就是看到了他的呼吁后，才知道了敦煌宝藏，才下决心去保护、研究敦煌艺术的。如潘絜兹先生读了向达先生的文章后说，它“激起了我强烈的共鸣。我怦然心动了。……下决心要到敦煌去，那怕只看上一眼，死也瞑目①。”从而历经艰险，到了敦煌，加入了敦煌艺术研究的行列。

3、贺昌群先生的积极响应

贺昌群先生是著名敦煌学专家。早在三十年代，国际学术界就形成了一股敦煌热，而在我国却注意者寥寥。为此，昌群先生大声呼吁国人重视敦煌学，他说：“我们只要在这中间抓住一鳞半爪，也可以牵引起许多新问题。至于敦煌石室中所发现的古文书，以及多种语言的手写经卷的研究，那真是沃野千里，只待人开拓。西洋的东方学者以及日本人，现在已经去得远了，我国学术界目前似尚无暇及此②！”他不仅对民族文化事业忧心忡忡，并且身体力行，发表了《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等敦煌学论文，还翻译了斯坦因的《敦煌取经记》。1942年12月，向达先生在重庆《大公报》发表有关莫高窟的文章时，昌群先生正任教于重庆中央大学。他随即在《大公报》1943年1月7日发表了《敦煌千佛洞应归国有赞议》一文作为响应，指出：“历史上一个没有历史记载的民族，无论如何强大于一时，终必至于灭亡”。“一个不知尊重自己历史的民族，未有能昌盛的。”从历史的高度，强烈呼吁国家拨款和设立专门机构管

---

①潘絜兹《敦煌的回忆》，载《文汇增刊》1980年6期

②贺昌群《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

理敦煌千佛洞。

昌群先生在文中说：

我们十分赞成他(向达)这番建议，我们希望政府也同样尊重这个建议。他的话已经言尽意至，本不用再加申说，但我们为了更加促起政府的注意，知此事为千百年国家文物之所系，非一二人之私言，所以愿借报章的地位，希望舆论界亦加以赞成，使其能比较普遍地为国人所了解，不但对于敦煌千佛洞如此，便是别的有关国家文化学术的古物遗迹，亦应同样具有这种意义去保护和管理。

……

保存古物的机关，我们本有古物保管委员会，不过该会原只保管古物，遗迹之保管不在其职责之内，加之经费拮据，人才零落，恐难负推广之责。傅孟真先生建议应由教育部会同内政部设立一保管机关如委员会之类。我们以为若此委员会之职责能包括管理全国规模较大或价值最高的遗迹，如千佛洞、云冈、龙门以及房山石经寺、嘉祥武梁祠、大同与蓟县的辽金建筑等，那末，傅先生的建议我们极端赞成，但在抗战期中，此事必难实现。若单为敦煌千佛洞而由政府组织一委员会，则政府在百忙中，未必能迅速办到，而目前千佛洞壁画之遭劫，已迫不及待，照方回先生在千佛洞目睹情形看来，一年四季的游览者和那班学画的人，正在进行剥离壁画的工作，“没有人能劝止，也没有人来劝止，眼见得千佛洞壁画，再过二三年，便要毁坏殆尽了”，这真是何等痛心的事。在政府未决定统一管理之前，我们以为目下对于敦煌千佛洞的当务之急，应由政府（教育部会同内政部）迅速指定纯粹学术机关如中央研究院或中央博物院负保管之责，保管费当另由政府酌拨。此事之实现愈早，千佛洞之劫运或犹可挽救于万一。总之，千佛洞的应归国家管理，当已不成问题，

我们万分希望政府与社会人士早日促其实现，岂仅是学术界之幸而已。

4、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

正是由于政界、学术界于右任、向达、贺昌群诸先生的诚恳建议和大声疾呼，再加上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与赞成，国民党政府始决议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2年春，于右任的建议送达政府研究后，决定次年成立研究所。1942年秋，即开始了筹划事宜，当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找到常书鸿，问他是否愿意担任拟议中的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后来监察院参事陈凌云也对常书鸿说："于右任建议教育部准备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想让你去当筹委会副主任。筹委会主任由陕甘宁监察使的人担任。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回去报告①。"常书鸿先生接受了这一邀请，开始筹划研究所的成立工作。

开始筹划时，常书鸿先生要让教育部指派几位专长历史考古和摄影临摹工作的同志，但教育部负责人回答说："我不能给你找到这些人，看来你只有在志同道合的朋友中去物色，或者到当地（兰州）去解决。"这样，常书鸿先生便只身从重庆珊瑚霸机场乘飞机来到了西北高原古城——兰州。

常书鸿到兰州后，首先拜访负责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官员们。"开始，这些当地的绅士名流对我还算热情，他们齐声赞许我不辞辛苦，前来从事敦煌艺术的研究保护工作。后来有人提出把所址设在兰州的意见，我说：'设在兰州，远离敦煌二三千里，还搞什么研究和保护工作呢？'这一来，他们嘻笑的脸上立即挂上了一层冰霜。结果，对于我提出的工作要求，如配备绘

①转引自常书鸿《铁马响叮当》，载《文化史料丛刊》第一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出版

画考古等方面的专业人员、购置图书参考资料、绘画物品和摄影器材等一个也没有解决①。”

常书鸿一人毫无办法，一天天在兰州消磨时光。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碰见了一位在西北公路局工作的国立北平艺专的学生龚祥礼。他俩一见如故，龚祥礼欣然应允随同常书鸿前往敦煌，并介绍了一名小学美术教员陈延儒。后来，又经过和省教育厅交涉，凑了一个文书，还指派了天水师范学校的校长李赞庭为秘书。最后又在省教育厅举办的临时会计训练班中招聘了一位名叫辛普德的会计。

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一行6人，乘着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开始了敦煌之行。经过一个月的艰难旅行，于3月20日下午到达安西。3月24日，终于到达目的地——敦煌。这时教育部正式宣布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筹委会由高一涵、常书鸿、郑通和、窦景椿等组成，任命甘宁青监察使高一涵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常书鸿为副主任。经过筹委会委员近一年的奔走张罗，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于1944年2月1日正式成立，直属教育部，常书鸿被任命为所长。并从重庆征聘来了20余位自愿到敦煌的专业人员，开始了敦煌石窟艺术的保护、临摹和研究。

四、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

“文化大革命”打断了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历史进程。整整十年间，除台、港地区外，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被迫中止，而国外许多国家的敦煌学研究却进展很快。“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的敦煌学研究才又出现了生机。到了八十年代，发展异常迅速，可谓进入了蓬勃发展、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

---

①常书鸿《铁马响叮当》

1、研究队伍日渐壮大

“文化大革命”前，专门研究敦煌学的机构，全国只有一个，即敦煌文物研究所。研究人员也比较少，专职研究人员更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适应敦煌学大发展的需要，全国成立了一些专门的研究机构和群众学术团体，并加强了人才培养。

（1）创办了许多研究机构

目前研究力量最强、图书资料最全的当推敦煌研究院。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结束后，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敦煌热。为了适应敦煌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形势，1984年1月15日，经中共甘肃省委批准，决定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大编制，增加经费，成立敦煌研究院，并将研究院确定为地级学术研究单位。院本部设在兰州，成为研究中心、资料中心和生活基地。下设美术、历史考古、遗书、石窟保护研究所和音乐舞蹈研究室，以及编辑出版部、资料中心、学术委员会、生活接待部等。院长由国内外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先生担任。全院有研究、保护人员150余人，并形成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学术梯队。敦煌研究院实已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室：1981年，筹建中的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就将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室作为重点机构开始筹建。研究中心的创建人和负责人邓广铭先生为建设这个研究室花费了不少心血。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室的负责人为王永兴先生。由于北京大学的国际地位和其强大的研究力量，再加上地处首都，便于国际交流，其研究成果非常显著，已成为敦煌研究院之外最强大的敦煌学研究机构。

北京图书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北京资料中心”：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后，学会就提出在北京图书馆设立北京

资料中心，并于1983年12月与北京图书馆进行了磋商。北京图书馆表示同意，决定在该馆善本部设立资料中心筹备组，由徐自强同志负责。经过两年多的筹建，资料中心于1986年试行开放。1988年8月，北京图书馆资料中心正式成立。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室：1979年1月，由历史系几位同志发起，组织了“敦煌学研究小组”。小组成立后，即开始了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并于1980年2月编辑出版了《兰州大学学报·敦煌学专刊》（即《敦煌学辑刊》第一辑）。1983年，成立了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学研究室。1984年，兰州大学历史研究所成立后，敦煌学研究室便划归历史研究所。

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西北师范大学为了组织和调动有关方面的学术力量，进一步推动本校的敦煌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于1981年由历史、中文、地理、美术、音乐等系和校图书馆共同筹建敦煌学研究所。1983年3月26日，经甘肃省教育厅批准，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正式成立，并确定为系级科研单位。

兰州商学院丝绸之路、敦煌学研究室：兰州商学院成立后，即开展了丝绸之路商业经济、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和敦煌文学艺术的研究工作。为了研究古丝绸之路商业经济的历史与现状，以便为开发和振兴西北经济，建设欧亚大陆桥——现代丝绸之路服务。于是积极酝酿，协调本院金融、商业经济、法律、财会、历史文献和文学艺术各方面的研究力量，在商业部教育司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支持下，经过一年筹备，于1987年3月成立了兰州商学院丝绸之路、敦煌学研究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敦煌小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敦煌小组成立于1981年，最初设在古文字古文献研究室，后转归隋唐室领导。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得天独厚的条件及其强大的研究阵容，敦煌小组成立后，开展了各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很

大成绩。

南京大学敦煌学研究组：1984年底，由历史系出面，联合中文系、图书馆等单位的有关人员成立了敦煌学研究组。其研究重点为敦煌民俗学、敦煌文书中社会问题及汇编台港敦煌学论文资料。

此外，湖北大学也成立了敦煌学研究组。

除以上专门研究机构外，其他一些有关研究机构也把敦煌学作为重点或主要研究方向，如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等。

（2）成立了一些学术团体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早在1978年，教育部就已深感敦煌学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学科群，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学科的发展都需要有所加强和促进。1981年10月，教育部派人到甘肃作了调查。1982年3月，在国务院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期间，教育部顾问周林同志邀请到会专家座谈了整理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情况及建立学会的设想。6月，教育部在南京又邀请了部分学者进行酝酿。许多专家学者一致表示了组织起来促进研究工作的愿望。与此同时，教育部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物局、中国艺术研究院、敦煌文物研究所、武汉大学等单位的有关同志进行了联系，并得到了他们的赞助。在此基础上，教育部本着促进团结、促进联合、促进科学研究的宗旨进行学会的筹备工作。1982年7月2——3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筹备会议在北京大学召开，由北京大学副校长季羡林教授主持。会议商定：参加筹备会议的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文化部艺术研究院、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学院、武汉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为发起单位，由北京大学牵头。教育部、中国社会

科学院、国家文物局为赞助单位。由发起单位向全国有关单位和研究工作者发出倡议，并由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指定专人成立秘书组，负责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具体由兰州大学、敦煌文物研究所和西北师范大学负责。1983年5月18—20日，由季羡林教授主持，在北京大学召开了第二次筹备会议，决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于1983年8月15—20日在兰州举行，以便在8月31日日本召开的第31届亚洲、北非人文科学大会之前闭幕，有利于我国在国际上的学术声誉。

1983年8月15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及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在兰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和香港的近20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章程，并聘请李一氓、周林、姜亮夫、王仲荦、金宝祥等27名著名专家学者和领导同志担任顾问。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与会全体代表用投票的办法，于8月18日选举季羡林、段文杰、唐长孺、张锡厚、金维诺等60人组成学会理事会。第一次理事会推选季羡林为会长，唐长孺、段文杰、沙比提、黄文焕、宁可为副会长，由宁可兼任秘书长，张广达、齐陈骏、穆舜英为副秘书长，金维诺、张锡厚、王永兴、沙知为常务理事。

1988年8月，在北京举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期间，学会于8月24日下午举行了会员代表会议，进行第一届理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会员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季羡林、段文杰、宁可、柴剑虹、荣新江等62人为第二届理事。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推选季羡林为会长，宁可、段文杰、铁列吾汗、唐长孺、黄文焕为副会长，由宁可兼任秘书长，张广达、齐陈骏、穆舜英、柴剑虹为副秘书长。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在敦煌学研究领域，语

言文学研究一直比较活跃，成果也比较突出。因此，在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后，就积极筹备成立语言文学分会。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于1984年10月16—24日在杭州召开了语言文学分会成立大会。会议选举姜亮夫为会长，周绍良、蒋礼鸿为副会长，张金泉任秘书长，柴剑虹、颜廷亮任副秘书长。并决定分会的会址设在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由于工作需要，特在甘肃分设办事机构。

1987年5月，姜亮夫会长委派周启成、张涌泉二人赴京，向学会领导周绍良、柴剑虹等先生说明：由于杭州大学古籍所工作安排的变动，张金泉同志不再担任分会秘书长工作。有鉴于此，7月23日，趁在天水召开《敦煌文学概论》编写会议之便，分会理事举行了一次工作会议，决定在1988年改选分会理事会之前，由颜廷亮同志代理秘书长职务，委托张涌泉同志负责设于杭州大学古籍所的分会机构的日常事务工作。

1988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期间，语言文学分会于8月24日上午举行了会员大会。并采用民主协商的形式，选举出了由23人组成的理事会。8月24日晚上，第二届理事会举行全体会议，选举姜亮夫为名誉会长，周绍良为会长，张锡厚、项楚、郭在贻、颜廷亮为副会长，由颜廷亮兼任秘书长，白化文、张涌泉为副秘书长。

此外，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舞蹈分会与音乐分会也于1985年8月成立，由董锡玖任舞蹈分会会长，蓝玉松任音乐分会会长。西藏分会筹备领导小组也于1985年成立，由巴桑旺堆任组长，索朗旺堆任副组长。

除了以上全国性的团体外，还有一些省或地区也成立了学术团体。如浙江敦煌学研究会已于1985年11月3日在杭州成立，由姜亮夫教授任会长，蒋礼鸿教授任副会长；酒泉地区敦煌学学习研究会也已于1984年成立；甘肃省敦煌学研究会经过近两年的筹备，已于1990年6月经上级批准正式成立。

（３）人才的培养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全国研究敦煌学的学者很少，据1982年初教育部的调查估计，老中青合计约一百多人，其中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约四、五十人，研究队伍的状况为倒三角形（即老年学者多，中年学者次之，青年研究者少）。为此，季羡林教授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上专门作了《关于开展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及人才培养的初步意见》的报告，建议在大学里设置有关敦煌、吐鲁番的专业，招收这方面的研究生。此外还可以举办各种类型的、期限不同的讲习班。

为了培养敦煌学人才，早在1979年，王永兴、张广达先生就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为唐史研究生开设了“敦煌文书研究”的课程，并有部分三年级学生选修；同年，兰州大学历史系也邀请段文杰、周丕显先生为该系进修班开设了“敦煌学”课程；八十年代初，项楚先生在四川大学中文系开设了“敦煌文学”选修课，高国藩先生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了“敦煌民俗学”选修课。

正是在这种良好的基础上，1983年敦煌学术讨论会期间，参加会议的杭州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厦门大学、四川大学、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西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代表专门召开了座谈会，讨论了有关高校开设“敦煌、吐鲁番学”课程的问题。大家认为，目前还不好在那个大学开设敦煌、吐鲁番学专业，而应该广泛地做普及工作。尤其是地处西北的高校，更应做好普及工作。通过普及，使学生对“敦煌、吐鲁番学”的内涵、以及敦煌吐鲁番学与自己所学专业的密切关系有较深入的了解，从而为在各个领域涌现出一批致力于研究敦煌吐鲁番学的人才打下基础。

这次会议之后，一些高校，尤其是甘肃的高校，如兰州大

学、西北师范大学、天水师专、甘肃教育学院等，都开设了有关敦煌学的课程。兰州大学还招收了敦煌学专业研究生，建立了硕士点。现在，已有十余所大学开设了有关敦煌吐鲁番学的课，毕业了40余名研究生。

除了开设课程外，杭州大学、武汉大学等还分别办了几期研究班。1982年冬，姜亮夫先生在有关部门的鼓舞下，建议在杭州大学古籍所创办敦煌学讲习班，并得到了教育部与全国高校古籍整理规划会议的一致肯定和推崇。1983年9月，讲习班正式开学，学员共14名，来自国内八个省、区，此外还有旁听生多人。讲习班由姜亮夫先生主讲“敦煌学概论”，蒋礼鸿先生主讲“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研究方法”，此外还有“敦煌语言校勘”、“佛学概论”、“敦煌壁画艺术”、“敦煌建筑艺术”等课程。

通过这些途径，培养了一批敦煌学研究人才，尤其是培养了一批有较高水平的青年研究人员，如荣新江、邓文宽、方广锠、赵和平、张涌泉、黄征、杨际平、杜斗城、刘俊文、郝春文、薄小莹、王冀青、杨宝玉、杨富学等，他们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引起了国内外敦煌学界的瞩目。

现在，敦煌学（包括吐鲁番学）的研究队伍已经扩展到300人以上，老一辈的学者继续在努力工作，如季羡林、姜亮夫、段文杰、唐长孺、蒋礼鸿、周一良、周绍良、王永兴、刘铭恕、史苇湘等先生，仍起着带头引路作用；中青年学者则大大增强了，尤其是中年学者，是我国敦煌学研究的主力军，如张广达、宁可、项楚、柴剑虹、郭在贻、张锡厚、姜伯勤、贺世哲、施萍亭、王尧、李正宇、张鸿勋、颜廷亮、沙知、白化文、齐陈骏、周丕显、李永宁、孙修身等先生，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代表了全国或国际先进水平；年轻后备军队伍也大有发展，并在老、中年学者的引导下，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原来研究队伍中的倒三角形状态已经改变了。

2、学术活动日益频繁

八十年代敦煌学蓬勃发展的标志之一，就是学术活动的频繁和对外联系的加强。现将主要的学术活动介绍如下：

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为了推动敦煌文学研究工作，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于1982年7月24日至8月5日，在兰州和敦煌召开了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全国高校、科研机关及出版、宣传部门的代表40多人，他们当中既有全国著名的敦煌学专家段文杰、刘铭恕、关德栋、王文才等先生，也有当时在敦煌学界风华正茂的程毅中、张锡厚、柴剑虹、项楚、张鸿勋、李永宁、周丕显、颜廷亮等先生。座谈会就我国敦煌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当前和今后的任务、应当注意的问题等进行了讨论。这次会议是我国敦煌文学乃至整个敦煌学研究史上的第一次学术盛会，对敦煌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会议收到的论文选编为《敦煌学论集》一书，已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是我国敦煌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次盛会。由于敦煌文物研究所进行了近三年的筹办，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重视，这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会议共收到论文和资料115篇，参加会议的150多名专家学者按照所提交论文的内容和所从事的专业，分别编为历史、遗书、考古、语言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六个小组，对收到的论文分组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遗书研究方面，涉及到了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民族史、中西交通史、语言文学、宗教、医学、音乐、民俗等等，在近八十年敦煌遗书研究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有一些课题在国内还是第一次出现，如民俗、藏医等。著名学者周一良、任继愈、饶宗颐、刘铭恕、周绍良、王文才、陈增辉等先生的论文，就一些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中青年学

者张广达、荣新江、陈国灿、刘光华、钱伯泉、李正宇、王尧、黄盛璋、施萍亭、马世长、李永宁、张锡厚、项楚、柴剑虹、颜廷亮、张金泉、高国藩、邓文宽等，都提交了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论文。在这次会议上，甘肃省博物馆、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还分别整理和公布了各自所藏敦煌遗书汉文写卷的全部目录，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赞扬。

石窟艺术研究方面，涉及到了石窟考古、敦煌艺术源流、敦煌艺术的题材内容、美术史、美术理论、壁画制作、绘画技巧、建筑艺术、音乐舞蹈艺术等等。段文杰、史苇湘、常任侠、潘絜兹、贺世哲、谭树桐、王伯敏、李浴、姜伯勤、叶栋、孙修身等先生的论文，都就各自的研究领域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或开拓了新领域，或填补了学术研究的空白。

这次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已由敦煌文物研究所选编为《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二编四册），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85—1987年出版。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成立大会及学术讨论会：1984年10月16—24日，在杭州召开了语言文学分会成立大会及学术讨论会，出席这次讨论会的专家学者，主要有姜亮夫、周祖谟、周绍良、蒋礼鸿、刘铭恕、龙晦、程毅中等先生。会议就如何开创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新局面及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收到的论文选编为《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一书，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唐史研究与教学座谈会：这次会议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唐史学会与厦门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于1984年10月27—31日在厦门大学举行。会议代表交流了近年来敦煌吐鲁番学和唐史的研究与教学情况，商议了今后的发展规划，着重围绕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研究与教学等问题进行了认真而热烈的讨论。

1985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文化厅和新疆大学联合举办的“1985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于8月3—9日在乌鲁木齐举行。这次会议是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之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共收到论文105篇，内容相当广泛丰富，有历史、考古、文献目录、民族、宗教、语言文学、美术、音乐舞蹈等方面。这次会议的主要特点是中青年学者增多，并提交了一批很有质量的论文，有的达到了世界水平；另一特点是首次邀请了日本、美国、印度等外国学者参加了会议，是中外学术交流的一个很好开端和尝试。会议收到的论文经过选编，已在《中国史研究》和《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1期发表。

语言文学分会1986年年会：由语言文学分会、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酒泉师范、酒泉教育学院、《阳关》编辑部和酒泉敦煌学学习研究会联合发起召开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1986年年会，于9月22—25日在酒泉举行。会议就敦煌语言文学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收到论文20多篇，已选编为《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为了交流学术成果，把国际敦煌学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敦煌研究院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筹备，于1987年9月21—27日在敦煌学的故乡——莫高窟举行了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应邀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的专家学者共83人，其中有来自英国、法国、日本、加拿大、美国、新加坡、原联邦德国、印度以及香港地区的学者。

会议收到学术论文56篇，由敦煌研究院编辑为《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分为《石窟考古》和《石窟艺术》两编，汉英两种版本，由辽宁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1988年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主办的1988年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于8月20—25日在北京举行。

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外来宾共28人，分别来自日本、英国、法国、美国、印度、瑞典、挪威、原联邦德国等。尤其值得一书的是，我国台湾省也有两名代表参加会议，致使海峡两岸学者沟通了信息，互相取长补短。长此下去，必定会促进我国敦煌学的大发展。

这次学术讨论会具有显明的特点：首先，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学术水平有了提高，如历史学方面王永兴对交籴、和籴的区分；少数民族历史语言方面陈践、王尧对吐蕃职官制度的勾划；音乐舞蹈方面彭松对敦煌舞谱破解等等。其次是研究领域的拓宽，如姜伯勤用艺术遗存来研究历史上的民族、宗教问题；张鸿勋把敦煌遗书中的文学作品放到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中去考察；叶栋将敦煌曲与敦煌辞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等，都为敦煌学的研究开拓了新领域。再次是一些专题研究取得了某些总结性成果，如李正宇对敦煌河渠泉泽的研究；荣新江对归义军的研究；赵和平对书仪卷子的研究；邓文宽对历书的研究等等。

会议共收到论文139篇，其内容涉及到历史、考古、文献目录、少数民族历史语言、宗教、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科技等各个方面。经学会选编，一部分作为《敦煌学辑刊》1989年两期专号出版；另一部分为《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影印出版。

199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由敦煌研究院组织的“199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0月8—14日在莫高窟举行。这既是在敦煌学发祥地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盛会，也是甘肃省举办的“纪念丝绸之路2100年”活动的项目之一。

参加本次学术讨论会的专家学者共200余人，其中我国大陆和台湾140余人，其余来自香港、南朝鲜、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美国、英国、德国、瑞士等地区和国家。他们之中既有80高龄的常书鸿、潘重规、藤枝晃等老先生，也有大量老、中、青年学者。讨论会分为石窟艺术、石窟考古、史地·遗书·

宗教和语言·文学·民俗四个组进行了学术讨论，交流了学术成果，并对大家关注而有兴趣的莫高窟早期洞窟断代和敦煌地区宋代与西夏之间的回鹘政权进行了专题讨论。

这次会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收到论文120余篇，在会上宣读了96篇。许多论文都很有质量，如在归义军和沙州回鹘的历史、敦煌早期洞窟的断代和敦煌的佛学研究等方面，都有许多新的见解和成果。敦煌研究院将择优选编并出版《199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学术活动还包括中外交流，苏联、南朝鲜、日本、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学者都曾来我国进行敦煌学研究的交流。如1981年4月8日至5月23日，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藤枝晃教授在南开大学历史系讲授了敦煌学课程，全国一些高校和科研单位的同志也参加了听讲。这次讲课的记录已由南开大学历史系整理印刷为《敦煌学导论》；1989年苏联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孟列夫曾来中国学习，并到北京、敦煌、兰州等地进行了学术交流；1990年8月，由金文经博士率领的南朝鲜民间学术团体敦煌学代表团一行30人来我国北京、西安、兰州、敦煌等地参观访问。在兰州期间，与兰州地区的敦煌学研究者进行了座谈，并表示今后要进一步加强联系，推动敦煌学研究。

中国学者也多次去国外进行学术交流与艺术展览。如1983年2月，我国敦煌文物研究所在法国巴黎举行了敦煌壁画展览，取得了巨大成绩，引起了国外中国学界，尤其是敦煌学界的高度重视。同时，在法国国立科研中心敦煌文献研究组的主持下，中法敦煌学者联合举行了敦煌学讨论会。敦煌文物研究所段文杰、史苇湘、李永宁、施萍亭四同志参加了讨论会，并提交了高质量的论文。中法学者讨论会的论文已汇编为《敦煌壁画与写本》一书在巴黎出版。

中外学术交流的最主要成绩，是英国和苏联所藏敦煌文献的

利用。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东方写本与图书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两方四家，在伦敦议定合作编辑出版《英藏敦煌文献·汉文典籍文书卷》①（以下简称《文献》）。1988至1989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宁可先生率人去英一年，与英国学者通力协作，已在伦敦基本完成了文书的拍摄工作，现已在北京转入编辑出版阶段。《文献》将收入英国不列颠图书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英国博物馆所藏全部敦煌汉文社会文书及敦煌绢纸绘画上的汉文题记的照片，计约3000余件，7000张左右（含彩色照片约400张）。《文献》于1990年起，分装15卷（8开本），由四川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预计至1992年底全部出齐。这将是首次以直接拍摄原件的方式，把英国所藏敦煌汉文社会文书的照片系统而完整地披露于世。其中尤其是不列颠图书馆所藏S·6981至S·11604号文书所含700多件社会文书，为五十年代的缩微胶卷所未收；印度事务部所藏40余种汉文文书和英国博物馆所藏40余种汉文题记，也从未系统披露过。这些照片均将在《文献》中完整地发表。这次全用120优质胶卷拍摄，其清晰程度超过了缩微胶卷，许多在缩微胶卷上无法辨认的字迹、朱书等在新胶卷上都能清楚地显现出来，用它制作的图版，清晰程度大大超过了台湾影印的《敦煌宝藏》。《文献》的出版，无疑将为学术界提供一部最完整、最清晰、最准确的高质量英藏敦煌汉文社会文书图片。这对于敦煌学各学科及各专门领域研究工作的开展，将会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也为以后按学科门类和专业领域编辑出版图版选集或录文选集，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英藏敦煌汉文文献即将全部面世之际，苏藏敦煌文献的编

①征订单将书名改为《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

辑出版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89年8月中旬，上海古籍出版社派出了以社长魏同贤为团长的代表团访问了苏联，与苏联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就合作出版现藏于列宁格勒的中国敦煌、吐鲁番与黑城文献进行了会谈。随后，苏联有关方面和学者又到上海进行了访问商谈。1990年夏，上海古籍出版社与苏联方面达成协议，双方合作影印出版藏于列宁格勒的全部敦煌、吐鲁番和黑城文献。并决定上海古籍出版社派人前往列宁格勒，直接进行整理拍摄制版。从1991年开始，列宁格勒所藏敦煌文献将陆续出版，按计划，全书将编成国际标准16开本60册左右，并在三、五年内出齐。

在英藏、苏藏敦煌文献即将问世之际，我们也期待着法藏、日藏、中藏等所有敦煌文书，都能尽快拍摄整理问世，使之合成完璧。这个目标如能实现，那将是国际敦煌学界的一大盛事。

3、研究成果大量涌现

早在1977年，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就已出现了复苏的苗头，这就是以王重民先生生前的校辑稿为基础而完成的《敦煌唐人诗集残卷》（署名“舒学”），与《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遗书目录》，同时在《文物资料丛刊》上发表。紧接着，《文物》编辑部又约组了一批敦煌学的稿件，在《文物》1978年12期刊出。随后又创办了《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等专门刊物，为逐渐增多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开辟了广阔的发表园地。

（1）资料的整理与刊布

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整理刊布了大量资料。如P·2555写卷上的诗文，舒学的《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已作了初步整理。随后，柴剑虹先生的《研究唐代文学的珍贵资料》、《敦煌唐人诗文选集残卷(P·2555）补录》等文，整理并刊布了P·2555写卷上的全部诗文。至此，P·2555写卷第一次以其全貌与世人见面；

张锡厚先生的《王梵志诗校辑》，校辑整理出王梵志诗366首，学术界普遍认为，该书的出版是敦煌资料搜集整理方面的可喜收获；任半塘先生的《敦煌歌辞总编》，收词1300余首，是目前所见收辞最多、品类最全、范围最广的歌辞总编，体现了半个多世纪敦煌歌辞的研究成果；周绍良、白化文、李鼎霞合编的《敦煌变文集补编》，收录了《敦煌变文集》出版后新发现的变文15篇，既有录文，又有原件照片，后面还附有俗字表，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是近年敦煌变文研究整理的新成果；赵健雄等先生的《敦煌医粹》，对敦煌遗书中的医药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是国内外关于敦煌莫高窟研究的最全面、最实用的权威性总录。它收录的洞窟齐全，内容完整，体例统一，定名和断代都比较合理，并编制有索引以备查检，使用方便。对敦煌学，尤其是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敦煌研究院的《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收录了今人所见的所有汉文题记。它除了注明洞窟的时代外，还在不同时代的题记之前，详细说明每条题记的文体类别、所在位置、题写形式、地色、尺寸及资料来源等。书后列有别体字简表，并附有莫高窟供养人姓名索引。该书可视为《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的姊妹篇。它们的出版，使莫高窟资料的整理逐渐趋于完备，是几十年来敦煌石窟资料整理、刊布的最重要成果。

除此之外，还有两套工程浩大的敦煌资料集，即《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和《敦煌大藏经》，现将其简介如下：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由北京图书馆唐耕耦、陆宏基先生编。编者从英、法、苏、日等国及我国收藏的敦煌文献中，将有关社会经济方面的资料辑出，编成该书。此书按类编排，分成五辑，用原件的照片与录文对照，兼附前人研究原件的论著出处，图文并茂，极便于敦煌学者之利用。

第一辑内容有：地志和瓜沙两州大事记及巡行记；姓望氏族

谱、名族志；户籍、手实；社邑文书；沙州敦煌县行用水细则与渠人、行人转帖；敦煌会计历、财政文书等共510页。

第二辑内容有：土地和宅舍的买卖、租佃；驴、驼、车具的买卖和租赁；人口买卖、典身、雇工、借贷粮食绢布契据；营田、勋田、寺田、请受地田、申报户口、户籍、赋役等文书；律、令、格、式、判等法律文书共630页。

第三辑内容有：什物历、入历、破用历、诸色入破历算会等各种公私帐簿；驼、马、牛、羊籍和契凭以及有关牒状；归义军节度所属军资库、内库、内宅、柴场、宴设司等机构的帐目和牒状凭证等共700页。

第四辑内容有：诏敕、奏疏、诰身、信牒、公验、军事边防、驿传、治安等牒；买卖、座设、财礼、纳贺、荣亲等文书；度牒、戒牒；僧官告身、寺职任免、僧尼籍帐、寺院行事等各种榜文和牒状；追念设供请僧疏等共530页。

第五辑内容有：各种杂牒状和书启、书仪；墓志铭；邈真赞、别传、功德记等共500页。

以上各辑一律八开精装，第一辑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至五辑改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

《敦煌大藏经》：敦煌佛经写本分藏世界各国，散乱无序，世人难窥全貌。有鉴于此，中国星星出版公司特邀有关专家学者组成《敦煌大藏经》编辑委员会，从事敦煌大藏经的整理、缀合、校勘、编辑，由台湾前景出版社出版。

本书的整理与编辑，以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佛经写本为主，必要时补充英、法等国已公布的材料。全书按《开元释教录》的顺序，校勘记说明收录写本与《中华大藏经》、《大正藏》的互见情况。共6000余万字、63册，每册约850—900面。第1—20册以般若部诸经的各种写本为主；第21—60册为宝积部、大集部、华严部、涅槃部诸经及五大部外其他材料等各种佛教文献；第61

—63册是世所罕见的民族古文字佛经。其经文为原件照片，校勘记是排印本。它将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最权威的一部大藏经，不仅是研究中国佛教最珍贵的文献，而且是唐代名家书法精品集。

除此之外，更引人注目的是许多单位公布了所藏敦煌遗书目录及有关情况。1977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在《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上公布了所藏敦煌遗书目录。在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期间，甘肃省博物馆和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也公布了各自所藏的敦煌遗书目录。随后，敦煌县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也相继公布了各自所藏的敦煌遗书目录。我们希望各收藏单位尽快整理公布所藏敦煌遗书目录及有关情况，以推动敦煌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2）高质量研究成果的不断问世

敦煌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另一标志，便是大批高质量科研成果的问世，尤其是敦煌研究院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中国美术全集》之《敦煌壁画》和《敦煌彩塑》、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武汉大学唐长孺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厦门大学韩国磐主编的《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以及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姜亮夫《莫高窟年表》、《敦煌学论文集》、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论集》、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颜廷亮主编《敦煌文学》等，都是高质量的学术论著，代表了敦煌学研究的国际水平。

此外，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敦煌研究文集》、《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敦煌学论集》、周绍良主编《敦煌文学作品选》、项楚《敦煌变文选注》、张鸿勋《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注》、白化文、杨宝玉《敦煌目录学初探》、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杜斗城《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

研究》以及译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敦煌译丛》、《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吐蕃僧诤记》、《敦煌学译文集》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敦煌学论著。

对一些专题的研究，则取得了总结性的或突破性的成果，如段文杰对莫高窟艺术的研究，张广达对于阗的研究，王永兴对社会经济文书的研究，宁可对社邑文书的研究，周一良、赵和平对书仪卷子的研究，周绍良对变文的研究，贺世哲对供养人题记的研究，姜伯勤对寺户的研究，郭在贻、项楚对语言校勘的研究，白化文对目录学的研究，张锡厚对王梵志的研究，柴剑虹对舞谱的整理与研究，李正宇对敦煌史地的研究，孙修身对回鹘的研究，叶栋对曲谱的破译，邓文宽对天文历法的研究，张鸿勋对讲唱文学的研究，荣新江对归义军的研究，黄盛璋对地理文书的研究，方广锠对佛经目录的研究，王尧、陈践对吐蕃文书的研究，肖默对敦煌建筑的研究，刘俊文对法制文书的研究，等等，都是自成体系，并已经发表了系列或总结性研究成果，有些甚至代表了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3）有待进一步加强的几个方面

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且在许多领域都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但无可讳言，仍存在许多问题，在研究范围、资料信息方面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首先，要加强理论研究。近年来，研究敦煌学的论著很多，也召开了几次国际或全国性学术讨论会，但对何谓敦煌学？敦煌学的概念、对象和范围，研究敦煌学的作用和意义，敦煌学的特点、历史及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价值等有关理论方面的研究却很少，一般地都侧重于对具体卷子的研究。据我编《敦煌学论著目录》及以后的统计，在所发表的全部敦煌学论文中，理论方面的文章很少，只有百分之一左右。由此可知，我们的敦煌学研究虽然很活跃，研究成果也很多，但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即轻

视理论研究。因此，目前要加强敦煌学理论研究，尽快编出一本高质量的《敦煌学概论》，以推动敦煌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其次，要重视宣传普及工作。在敦煌学研究中，还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即重视研究，轻视宣传和普及。不要说一般群众，就是文科大学生、研究生，不专门研究敦煌学的其他文学、史学工作者，对敦煌学都是比较陌生的。其原因是不重视宣传普及工作，报纸很少刊载介绍敦煌学知识的文章。目前还没有一本供一般群众了解敦煌学的通俗著作。现在应大力加强宣传、普及工作，《文史知识》1988年8期“敦煌学专号”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要尽快编出《敦煌学入门》或《敦煌学讲话》等通俗著作，以供广大群众之急需。

再次，为深入开展敦煌学研究，应大力加强资料信息工作。敦煌遗书共有五万卷左右，分藏世界各地，我们不得不依据复制本和第二手资料进行研究。现在利用的主要资料是缩微胶卷和台湾出版的《敦煌宝藏》，但由于数量庞大，价格昂贵，国内只有极少数图书馆及研究所才有收藏，大部分研究者是很难利用的。并且其内容庞杂，只是按各收藏单位的财产清单进行流水帐式的排列，利用起来很不方便。因此，目前迫切的课题是收集资料，分类编辑出版，以满足广大研究者的需要。

另外，应加强情报交流。国外及台湾出版的敦煌资料和研究成果，大部分研究者不容易见到，更是很少利用。希望能看到的同志多作一些内容介绍和书讯、书评，以便国内学者及时掌握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成果，并了解其研究动态和状况，以免花费不必要的重复劳动或人云亦云，以讹传讹。

五、台、港地区的敦煌学

四十年来，尤其是最近二十多年来，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

学者，在敦煌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现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1、敦煌学教学与人才培养

早在六十年代，台湾的一些高校就开设了敦煌学课程。1963年，台北中国文化大学首先开设“敦煌艺术”。1965年，台北政治大学的中国文学研究所，也开设了“敦煌变文研究”。随后，许多大学都开设了有关敦煌学的课程。

从六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台湾就从事培养专门研究敦煌学的硕士和博士。现任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系主任和政大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的罗宗涛教授，就是1969—1972年攻读博士学位的。其毕业论文为《敦煌讲经变文研究》，1974年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邱镇京是六十年代末中国文化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其论文题目为《敦煌变文研究》，1970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改名为《敦煌变文述论》出版，由高明教授指导。另一硕士研究生为徐蠹明，论文题目是《敦煌壁画研究》，由苏莹辉、罗寄梅两位教授指导。

苏莹辉曾在敦煌莫高窟工作，后来去了台湾，从五十年代起又任教于马来亚大学。他出版了许多敦煌学专著，如《敦煌学概要》、《敦煌论集》、《敦煌论集续编》、《敦煌》、《瓜沙史事系年》、《瓜沙史事丛考》等，从而使他在敦煌学界颇有声誉。

台湾现有两名敦煌学博士导师，即潘重规和台静农，其他中年教授均带硕士研究生。潘重规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敦煌学家，1930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曾任东北大学、四川大学、暨南大学、安徽大学等校教授。后又任台湾师范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教授。从1974年开始，任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所长。其敦煌学著作主要有：《敦煌云谣集新书》、《敦煌词话》、《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敦

煌变文论辑》、《龙龛手镜新编》、《敦煌变文集新书》、《瀛涯敦煌韵辑新编》等。

由潘重规教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郑阿财已于1982年毕业，博士论文为《敦煌孝道文学研究》。郑阿财1951年生，是台湾敦煌学界的后起之秀，已出版了许多敦煌学论著。郑阿财的夫人朱凤玉是1983年的博士研究生，其博士论文为《王梵志诗研究》。台湾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于1983年招收了敦煌学博士生林聪明，指导教授为台静农和潘重规。林聪明的毕业论文为《敦煌俗文学研究》。

除了博士生外，还有较多的硕士生，其毕业论文涉及的内容也较广泛。如中国文化大学陈世福的《敦煌赋研究》，宋新民的《因缘类变文研究》，雷桥云的《敦煌儿童文学研究》，许端容的《二十四孝研究》；政治大学金泰宽的《敦煌变文太子成道经、八相变、降魔变文、破魔变文与佛经之比较研究》，小野纯子的《敦煌讲史性变文主题之研究》等。

由于台湾重视敦煌学人才的培养，因此其研究队伍中的老中青三级梯队已经形成。

2、研究机构及学术活动

台湾的敦煌学研究中心在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1964年，在张晓峰先生的积极倡导下，设立了敦煌学研究机构，并提出了下列计划：敦煌文库；敦煌画室；敦煌展览；编印敦煌丛书；编印敦煌学报；复印敦煌图片。1975年，中文研究所成立了一个敦煌学会，由潘重规和金荣华领衔为指导教授，成立后的主要工作是：邀请国内外专家举行敦煌学报告及座谈会，如吴其昱、苏莹辉、日本的金冈照光等都曾应邀到会讲学；购置了斯坦因和伯希和两套敦煌写本的缩微胶卷；招收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培养敦煌学研究的专门人才；从事整理资料和理论研究工作。

香港的敦煌学阵地主要是新亚研究所，该所成立了敦煌学会，并于1974年创办了全世界第一个敦煌学刊物——《敦煌学》。第一辑为《戴密微先生八秩大庆祝寿专号》，1974年出版；1976年出版了第二、三辑；第四辑出版于1979年。从第五辑起，改由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敦煌学会编辑出版。

近几年来，台港地区举办了几次很有影响的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如1986年8月1—3日，由台湾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主持举办了“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会议邀请法、日、美、澳、韩、香港及台湾学者60人，由法国科研中心教授吴其昱、陈祚龙、东京大学教授金冈照光分别担任主持人，主讲者有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东京大学教授池田温、南朝鲜檀国大学教授金荣华、台湾成功大学教授黄永武、文化大学教授潘重规、师大教授邱燮友等。会议共收到论文33篇，全部由《汉学研究》1986年4卷2期《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专号》发表。其中一些很有特色，如吴其昱的《列宁格勒所藏敦煌写本概况》，对苏藏敦煌写本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黄永武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之补正》一文，谈了他编《敦煌遗书最新目录》的情况；林聪明的《敦煌汉文文书解读要点试论》一文，对敦煌写本的外形、内容等都作了详细探讨。会议还展出了台湾收藏的150余卷敦煌写本。

1987年6月25—27日，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协助，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在香港联合举办了“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会议。”应邀参加会议的学者共30余人，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法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其中中国大陆学者14人，如季羡林、段文杰、周一良、周绍良、宁可、王永兴、朱雷、姜伯勤等；台湾学者4人，即潘重规、黄永武、苏莹辉、林聪明；香港3人，即饶宗颐、王静芬、叶学颜。这是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敦煌学者的第一次聚会，相互沟通了信息，交流了成果，对推动我国的敦煌学研究具

有很大的意义。

6月25日上午，在香港中文大学祖尧会议厅举行了开幕式，由中文大学校长马临博士主持，中国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羡林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讲座教授饶宗颐分别致辞。

会议共收到论文32篇，全部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专刊上发表。有些论文很有特色，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教授梅维恒的《敦煌吐鲁番学的意义》、周绍良的《敦煌文学概论》、林聪明的《丹麦哥本哈根藏敦煌文书概况》、日本池田温的《1944年莫高窟土地庙塑像中发现文献管见》、宁可的《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法国远东学院戴仁的《散藏于欧洲图书馆之中亚出土汉文抄本及版刻本》等。

为配合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与上海博物馆还联合举办了“敦煌吐鲁番文物展览”，展品共37件，其中30件为上海博物馆藏品，7件为香港各界藏品。

1990年7月，由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等单位主办，在台北举行了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日本、法国、苏联、南朝鲜等国家的学者，会议采取宣读论文的形式交流了成果。

3、对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

台湾省收藏的敦煌卷子不多，现知台北图书馆藏有153卷。这批卷子，据说是由叶恭绰经手，从李盛铎旧藏收得，于1948年从南京运到台湾的。台北历史博物馆藏有20余卷，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有少量卷子。另外，台湾私人收藏敦煌卷子的有吴兴蒋谷孙、上虞丁念先、敦煌窦景椿、长沙罗寄梅、南海黄君璧数人，但数量不多。从目前所能见到的这些材料可知，我国台湾省藏敦煌遗书约200余卷。香港则基本上没有。

台港地区的敦煌学论文，除了主要在《敦煌学》上发表外，

台北出版的《大陆杂志》也是刊载台港地区敦煌学论文的主要园地。另外，台湾出版的《学术季刊》、《民主中国》、《文史哲学报》、《考铨月刊》、《幼狮学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和香港出版的《新亚学报》、《东方文化》等刊物，也发表有关敦煌学的文章。

在文献目录整理方面，首推潘重规、金荣华主编的《伦敦藏汉文敦煌卷子目录提要》。这部工具书由张其昀教授拨50万元（台币）专款作为经费，从1980年10月至1982年10月完成了初稿，随后又编了索引。

该《目录提要》是在翟理斯、刘铭恕二目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而成。编排体例依据《四库全书提要》，以写卷内容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佛经因卷帙浩繁，依佛教《大藏经》的目次，另成一类，置于最后。

其著录方式，首列书名、卷数、作者、斯氏编号；其次为翟目所录原卷之长度、纸色；再次标明写卷内容之完整或残缺。然后为卷中文字之起句、讫句及其卷中题记，并作必要的说明。如果同一卷中还有其他资料，也都一一注明。最后附有人名、地名、寺名、年号、非汉文卷子等索引，从各种角度提供了有关资料，以便学界利用。

另外，黄永武编的《敦煌遗书最新目录》一书也很有特色。该书以王重民等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为基础，并补充了《总目索引》出版后的一些新发现，如补充了S·6980号以后600号敦煌无名断片新标目和P·5579号以后的新目录。此外还补充了苏联和日本的敦煌写本目录。黄永武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之补正》一文中说："孟列夫氏之目录二册，出版于西元1963及1967年，较王书为晚出，固非王氏所及见，今特译为中文，一并补入《敦煌遗书最新目录》。至于王书散录中所列中央图书馆藏卷目录，现'敦煌卷子'已印出，亦可覆实对勘。尚有日本大学所藏

目录，亦已印成正续二册，与王书散录不同，均予校订，使《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一书中之缺憾，补正而完美。”

除了以上工具书外，潘重规教授主持的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还出版了两种刊物，即《敦煌学丛刊》和《敦煌学》。《敦煌学丛刊》已出三部：《敦煌俗字谱》、《敦煌俗字索引》、《龙龛手镜新编》。《敦煌学》原由香港新亚研究所敦煌学会主编，从第5辑（1982年9月）起，改由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敦煌学会主编，现已出版到了第16辑。

近年来台湾敦煌学研究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敦煌宝藏》和《敦煌丛刊初集》的编辑出版。

《敦煌宝藏》从1980年开始编辑，由黄永武主编，新文丰出版公司于1982—1986年陆续出版。从黄永武教授的编辑例言可知，“本书编集之资料范围，是拟将世界各地所藏敦煌卷子之微卷摄影图片约20万张，及画本、刺绣、壁画、塑像等图片千余帧，尽量收集，细心汇编成书。”为使所收资料真实，“凡摹本均不收列，损泐不清处，为保存原貌，不旁注，不校改。”其取材范围，“先以敦煌所藏汉文写本刻本为主，汉文写本间偶有非汉文资料，则一并附存。有关绘本、幢幡、壁画、塑像等美术品附载于各册之前，另行编号，以备参检。”该书的编排顺序，则“依搜集敦煌微卷之先后为序，英、法、中在前，其他各国在后，各卷子之次序，仍沿用斯坦因、伯希和之编号，此编号已为国际通用，故不归类重编。”至于北京所藏卷子，“则沿用《敦煌劫余录》所著录之体例，按经归类，按品次第，一仍旧贯，以便查检，其余则依所出版目录为顺序。”

《敦煌宝藏》共140册，每10册为一辑。其中第1—55册为斯坦因劫经录，即S·1—S·7599号；第56—111册为北京图书馆藏卷，即北图1—8738号；第112—135册为伯希和劫经录，即P·2001—P·6038号；第136—137册为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

撰之散录，即散1—1608号；第138—140册亦为新文丰出版公司编辑部编撰之欣赏篇，即P·2005—P·5007号，又苏联列宁格勒藏0096—2784号。

《敦煌宝藏》工程浩大，收录齐全，是敦煌遗书发现后的第一次最全面整理，对推动敦煌学研究有着极大的作用。遗憾的是，该书未收汉文以外的卷子。黄永武教授曾在序言中说："至于吐蕃文、梵文、粟特文、于阗文、回鹘文、希伯莱文等资料，待汉文资料编成后，再斟酌辑印。"目前，汉文资料已出版四年有余，还未见其他民族文字的写卷材料问世，我们希望尽快编印汉文以外的敦煌资料，以适应国际敦煌学大发展的需要。

在《敦煌宝藏》编辑结束，正在陆续出版之际，黄永武教授在新文丰出版公司的大力支持、赞助下，又编辑了一套大型敦煌学研究丛书——《敦煌丛刊初集》，于1985年6月由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

《敦煌丛刊初集》的编辑缘起及目的，正如该书的出版说明所说："敦煌资料之研究，乃当今国际汉学界之显学，随着本公司《敦煌宝藏》之辑印，更掀起广泛研究之热潮。非仅各方学术会议恒以敦煌学为重点，而各大学之纷纷开设"敦煌学"课程，尤为目下已蔚成之风尚。本公司为迎合潮流所趋，提供研究所需，促进文化复兴，特编辑民国以来中外重要之敦煌学工具书或经典之作，均为坊间绝版或难以购得之珍贵典籍，荟萃于一编，以利学术研讨之展开，兹先辑敦煌丛刊初集。"

《敦煌丛刊初集》共16册，即

第1册：翟理斯编《英伦博物馆汉文敦煌卷子收藏目录》。附黄永武撰《英伦所藏敦煌未知名残卷目录的新探索》和《敦煌六百无名断片的新标目》。

第2册：王重民等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附黄永武撰《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之订补》。

第3、4册：陈垣编《敦煌劫余录》。

第5册：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金祖同辑《流沙遗珍》；李证刚《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

第6、7、8册：罗振玉辑《敦煌石室遗书百廿种》。

第9册：常钧《敦煌杂抄》、《敦煌随笔》；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存古学会编《石室秘宝》。

第10册：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敦煌杂录》。

第11、12册：孟列夫主编《苏俄所劫敦煌卷子目录》。

第13册：羽田亨辑《敦煌遗书》；神田喜一郎《敦煌秘籍留真》、《敦煌秘籍留真新编》。

第14册：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第15册：刘复《敦煌掇琐》。

第16册：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

从台湾省的敦煌学研究情况，可以得知以下信息：

第一，大量翻印大陆著作。如《敦煌古籍叙录》、《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瀛涯敦煌韵辑》、《敦煌遗书论文集》、《敦煌文学作品选》、《敦煌变文论文录》等。

第二，采取各种形式，赞助出版事业。除前述《伦敦藏汉文敦煌卷子目录提要》由张其昀教授拨款50万元台币外，还有各种基金会。如台湾的民间团体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就是专门出资印刷台湾的博士和硕士论文的。王云五先生在《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丛书》序中说："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在其奖助之各种文化事业中，有研究论文奖助办法一种，系就国内（台湾）大学、研究所之博士、硕士论文，择优出资代为印刷。每种以八百部为度，除以五十部赠有关研究所，并由嘉新基金会保存二百五十部外，余五百部悉数赠予撰著论文之博士、硕士，供其自由处分。"这些论文比较专精，质量也较高，"惟是题材或涉

专门，或不避偏僻，除足备各科专家参考外，不易吸引多数读者；因而印刷成书，流行大都不广。无论何国之出版家，为保障成本，除附加特殊条件外，多不愿接受印行。所谓特殊条件，或由撰人负担部分成本，或由撰人承购印本若干，或由撰人提供全部印刷费，出版家仅代为发行。……嘉新文化基金会为使此类精心之作得以问世，经决议创行上述奖助办法。”这种民间资助的办法，对敦煌学及其他学科的发展很有好处，如蔡主宾的硕士论文《敦煌写本儒家经籍异文考》就是由该基金会出版的。

第三，出版速度快。台湾的敦煌学著作出版很快。一般情况下，博士或硕士论文通过答辩后3—6个月即可出版。如郑阿财于1982年8月14日口试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其论文《敦煌孝道文学研究》同月由石门图书公司出版；又如《敦煌学》第十辑为《张晓峰先生逝世纪念专辑》，张晓峰于1985年8月26日逝世，其纪念专辑便于同年10月出版了。其速度之快，的确令人惊叹。

以上对我国（包括台、港地区）各个阶段的敦煌学研究情况及有待进一步加强的几个方面作了详细的介绍与探讨。下面我们再对国外，尤其是法国和日本的敦煌学研究作一介绍。其目的是为了让国内学者了解国外的研究情况，知己知彼，以便于我们今后工作的开展。

六、法国的敦煌学研究

法国的敦煌学研究，在欧美国家中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几十年来，在敦煌学机构的建立、著作的出版以及敦煌学者的培养方面，都受到了国际敦煌学界的重视。近年来又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①。

---

①参阅黄振华《法国敦煌学研究述略》，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5年2期；耿升《法国敦煌学研究概况》，载《西北民族文丛》1983年第三辑

1、主要的敦煌学家及其著述

法国之有敦煌学，始于1899年邦宁（1865—1929年）的敦煌之行。1899年，法国考察家邦宁从北京出发，取道甘肃、青海、新疆，前往俄属中亚旅行，是年九月途经敦煌，参观了千佛洞，拓制了莫高窟保存的碑刻。1901年，他的游记《从北京到俄属土耳其斯坦旅行记》在法国《地理》杂志上发表，获自敦煌的碑铭拓片则交给沙畹考释、整理。

沙畹（1865—1918年）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学大师，是世界上最早整理、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被视为法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者。法国敦煌学大师伯希和与马伯乐都出自他的门下。

沙畹研究了邦宁带回法国的碑拓后，于1902年在巴黎出版了《中亚汉文碑铭十方》，其中便有李怀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及《李太宾纪功碑》、《速来蛮刻石》等有关敦煌的碑刻6方。

法国之收藏大量的敦煌写本，则始于沙畹的高足伯希和。继斯坦因之后，伯希和于1908年到了敦煌，运用欺骗盗窃之手段劫走了大量敦煌写本。他的研究成果多以论文的形式发表，重要的论文多经冯承钧先生汉译，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1—9编中。

马伯乐（1883—1954年）是与伯希和并驾齐驱的法国敦煌学研究者。在他所有的论著中（192种），属于敦煌学方面的很少，但由于其《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文书》是一部极为重要的敦煌学研究著作，是迄今为止关于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汉文资料唯一公开发表的录文、翻译与考释，所以马伯乐一直被认为是法国杰出的敦煌学家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敦煌学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戴密微、谢和耐、苏远鸣、吴其昱等人。

戴密微（1894—1979年）是法国当代敦煌学的代表人物，有的法国学者甚至还将他誉为“法国敦煌学之父。”

戴密微的敦煌学研究侧重于佛学，旁及敦煌变文俗讲。他的敦煌学代表作，乃世界敦煌学名著《吐蕃僧诤记》①，其内容是关于“中印僧侣于八世纪在拉萨举行的一次有关禅的大辩论会”的史料。该书的第一部分是对P·4466《大乘顿悟真理决》的译注，分析了八世纪在吐蕃赞普墀松德赞主持下，由汉僧摩诃（即大乘和尚）与印度僧侣莲花戒有关禅的一次大辩论。第二部分是史料疏义，主要研究了有关唐蕃关系的一批敦煌汉文写本。该书对唐史、吐蕃史、西域史、民族史、宗教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此外，戴密微还发表了《列宁格勒所藏敦煌汉文写本简介》，初步介绍了苏藏敦煌写本的有关情况；《敦煌学近作》对日本、法国、苏联、意大利、匈牙利、新加坡以及我国港台的22篇（部）敦煌学著作作了评介；《唐代的入冥故事——〈黄仕强传〉》②等，并与香港学者饶宗颐合著有《敦煌曲》一书。

1973年1月1日，在戴密微的倡导下，法国高等实验研究学院与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成立了第438联合研究组，即“敦煌文献研究组”，聘请戴密微指导。该组的宗旨主要有两项：一是编写《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另一项是指导和推动敦煌写本及有关资料的研究，其中包括影印发表一批重要文书。该组已出版了三集《敦煌学论文集》（今后还要陆续刊行），形成了目前唯一的一套西文敦煌学论著专集。

该组中包括苏远鸣、谢和耐、隋丽玫、华梅雪、杰尼、康德谟、戴仁、童丕等十余人。为了克服在汉文史料方面的困难，这

---

①汉译本由耿升翻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②汉译均载《敦煌译丛》，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个组不仅包括侯锦郎和吴其昱两位法籍华裔学者，左景权和陈祚龙两位旅法华人，而且还聘请饶宗颐、潘重规、苏莹辉等港台学者为客座研究员或合作者。法国对敦煌汉文写本的研究近年来之所以发展较快，主要归功于戴密微先生所创立的这个研究组的努力和推动。

谢和耐是戴密微的弟子和事业的继承人。现任法兰西学院教授，被奉为现代法国研究中国的代表人物。其敦煌学著作主要有《荷泽神会禅师语录》、《荷泽神会禅师传》、《从敦煌写本中的契约看中国九至十世纪的专卖制度》、《在敦煌写本中发现的一项缓税请牒》、《有关敦煌旅行中租骆驼的敦煌写本》等，其代表作则是1956年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①一书。该书根据汉文典籍、大藏经和敦煌文书探讨了从南北朝到五代的中国寺院经济。书中对佛图户、寺户、僧祇户、常住百姓、梁户、生长库、社邑等都作了深入研究，是法国研究敦煌经济文书的唯一一部重要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苏远鸣也是戴密微的弟子，现任法国科研中心敦煌资料研究组主任。他主要从事道教和佛教研究，曾与日本学者吉冈义丰合著《道教研究》四集，还有《一卷敦煌壁画题识集》、《敦煌写本中的十二日历》、《法国对敦煌汉文写本的研究》、《对敦煌石窟中某些瑞相的描述》等。

梅弘理是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主要研究佛教哲学和还愿文，发表有《慧思的生平和著作》、《〈天台智者大师愿文〉阿弥陀部分的研究》、《〈佛法东流传〉的最古老文本》等。

艾丽白小姐是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民间文学、六朝以来的小说和绘画，发表有《敦煌汉文写本中的鸟形

①汉译本由耿升翻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押》、《论某些敦煌写本中的“儿郎伟”一词》等。

戴仁是法兰西远东学院成员。主要研究敦煌文书中的纸张、字体等，发表有《敦煌的册子卷》、《敦煌写本中的圆梦术》、《对标有时间的敦煌汉文写本的纸张和字体的研究》、《论已断代的敦煌写本之纸张和字体》、《研究敦煌文书的方法论》、《敦煌和吐鲁番写本中出现的武后俗字》、《敦煌的经折装写本》等。

法国科研中心敦煌资料组的华裔学者饶宗颐、吴其昱、侯锦郎、左景权对于推动法国的敦煌文献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吴其昱祖籍江苏，现已加入法籍。其敦煌学著作颇多，发表有《敦煌写本中的〈珠英集〉残卷》、《敦煌本故陈子昂集残卷的研究》、《甘棠集与刘邺传研究》、《有关唐代和十世纪奴婢的敦煌写本》等。他还把许多法国学者的敦煌学著作译为汉文在《敦煌学》上发表。目前正在研究有关大秦景教的问题。

侯锦郎是由我国台湾省赴法的，现已加入法籍。其主攻方向是佛像、医学和绘画，发表了《论唐代的相面术》、《敦煌龙兴寺的宝藏》、《敦煌写本中的印沙佛仪礼》等。

左景权是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博士，祖籍湖南，是左宗棠的孙系，目前尚未加入法籍。他利用较长的时间编好了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的初稿，并发表有《伯希和敦煌写本第3836号再整理》、《敦煌写本一瞥》、《〈佛说生经〉残卷的研究》等。

祖籍我国湖北的旅法学者陈祚龙也是由台湾赴法的，目前尚未加入法籍。他是一位多产的敦煌学者，出版了《悟真的生平与著作》、《敦煌文物随笔》、《敦煌学海探珠》、《敦煌资料考屑》、《敦煌学园零拾》等专著。

2、对敦煌汉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伯希和于1909年返回法国后，即着手编写所获敦煌写本目

录。1920年完成了目录初稿，共著录了1532个汉文卷子，即从2001—3511号、又从4500—4521号。

伯希和的这个目录，在六十年代以前，一直是我们参考巴黎敦煌遗书的一部最好、最有用的目录。但该目录有三个缺点：第一，他的编目工作比较潦草，对于他主观上认为不重要的地方，为了避免麻烦，就没有著录；第二，伯希和虽然是欧洲很著名的汉学家，但对于阅读和认识我国四部书的知识和能力还是有限的，因此把一部分书名没有正确反映出来；第三，始终没有编出完整的目录。因此，王重民先生1934年到巴黎后，就开始编《伯希和劫经录》，该目收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中。

王重民所编《伯希和劫经录》也有许多空缺处，并有许多笼统称之为“残佛经”、“残道经”之类的地方。1952—1955年，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谢和耐与吴其昱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重新整理编写了2001—2500号汉文写本目录，这一工作于1957年获得了法国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的年度奖。但这卷目录在出版时却遇到了重重困难，拖了十多年才于1970年出版。其内容提要是经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的隋丽玫、吉娜与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魏普贤补充和修订的。该目录每卷著录书名，并记明纸数、高广幅度、行款等。凡近代学者有关著述，亦附载于当卷之下。最后还附有索引多种及题记书影多帧。

《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写本目录》第二卷（2501—3000号）已由左景权和隋丽玫编写。由苏远鸣等人编写的第三卷（3001—3500号）已于1983年先于第二卷问世。由于这批写本编目太慢，已引起了国际敦煌学界的不满，1973年法国曾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今后的发展可能要快一些，估计全部编完要6卷。据法国方面透露，法藏敦煌汉文遗书约3900卷。

法国陆续出版了一套《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写本丛书》，第一卷是吴其昱整理的《七世纪末未刊布过的道教经文

（本际经）》，1960年出版；第二卷是饶宗颐与戴密微合作整理、编辑的《敦煌曲》，1971年出版；第三卷是哈密顿整理的回鹘文本《善恶两王子的故事》，1971年出版；第四卷是饶宗颐的《敦煌白画》，1981年出版；第五卷是由麦克唐纳夫人和今枝由郎等影印发表的《敦煌藏文文书集》；第六卷是哈密顿的博士论文《敦煌回鹘文写本汇编》，1986年出版。

伯希和劫往法国的敦煌文物，曾以《伯希和考察团档案第1卷——敦煌石窟》为名，于1920—1924年分为6卷出版，共收图376幅。1945年伯希和病逝后，由韩百诗主持其遗著的出版工作，拟出版伯希和新疆和敦煌考察所获文物27卷，其中18卷都是有关敦煌的，已出版了《敦煌织物》、《敦煌的幡幢和绘画》（风格研究、肖像研究各1卷）。1978年韩百诗逝世后，伯希和档案由旺迪埃——尼古拉负责出版。

在敦煌文献文物的整理研究方面，法国近年来最大的成绩是《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的刊布。伯希和在敦煌时，曾对石窟的外景、建筑风格、经变画及故事画的内容和史实，特别是当时尚能辨认出的洞中题识（包括汉文、回鹘文、藏文、婆罗谜文、西夏文和蒙古文等）以及历代游人的题记都作了详细抄录。八十多年来，一方面，由于人为和自然的破坏，伯希和当年记录下的许多壁画内容和题识已不复存在或辨认不清；另一方面，伯氏的记录是对敦煌石窟所作的最早和最系统的记录，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资料价值。如归义军张氏政权第二任统治者张淮深全家于公元890年暴死，其原因何在？继任者又为谁？长期以来不得其解。在《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末尾，张淮深之弟张淮□，被议潮婿李明振题为“妻弟前沙瓜伊西河西节度使检校□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张淮□。”1981年出版的《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第一卷亦载其录文，而“张淮□”为“张淮鼎。”据有的学者研究，淮深为议谭子，淮鼎为议潮子，淮鼎为了和淮深争权夺利，便发动

兵变，杀死了淮深，并继任了归义军节度使。千载坠史，终于明瞭。

正因为伯希和笔记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因此从1981年开始，法国方面便陆续刊布出版。全部笔记共出六卷，每卷包括三个部分，即经过整理后的笔记刊本、笔记手稿真迹图版和当时拍摄的图片。这套丛刊是作为吉美博物馆所藏《伯希和探险团档案》第11卷而刊布的，由尼古拉·旺迪埃——尼古拉和莫尼克·玛雅尔夫人负责，并由她们作序和前言。第1卷(伯编第1—30号洞)于1981年出版；第2卷（31—72号洞）和第3卷（73—111号洞）于1983年出版；第4卷（112—120号洞）于1984年出版；第5卷（121—146号洞）于1986年出版。第6卷及全套笔记的索引将于近期出版。

此外，法国还以各种形式出版纪念文集。如1964年戴密微70周岁，自法兰西学院退休，法国曾出版《汉学论丛》以庆祝其70寿辰；1974年戴密微80大庆，法国又出版《汉学论丛》第二册以资庆祝；香港1974年出版的《敦煌学》第一辑即为《戴密微先生八秩大庆祝寿专号》；1979年5月23日，戴密微于巴黎逝世，法国曾出版《敦煌研究文集》以资纪念。

1979年是伯希和诞生100周年，巴黎国立图书馆于9月20—28日举办了以“伯希和百周年寿诞和中亚宝藏”为题的展览，展出了伯希和从中亚携回的大量文物，还出版了《中亚宝藏》一书，主要是介绍伯希和的生平及其发掘物。同时，第438联合研究组于10月2—4日，在巴黎召开了有世界各国学者参加的“五——十世纪高地亚洲写本和碑铭题识国际讨论会，”由于其重点是敦煌文书、题识和艺术，所以又通称为巴黎国际敦煌学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法国、芬兰、日本、以色列、土耳其、原联邦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美国、比利时、加拿大、英国、马来西亚、东德、波兰等国及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的学者共92人。法

国中亚和高地亚洲研究中心主席、法兰西学院教授石泰安被选为大会主席，会议的具体工作则由敦煌文献研究组负责人苏远鸣主持。讨论会的文件和论文已于1981年作为《亚细亚学报》第269卷第1—2期的特刊号发表①。

3、对其他民族文字写卷的研究

敦煌遗书除了汉文写卷外，还有许多民族文字的卷子，如古藏文、粟特文、于阗文、焉耆——龟兹文、佉卢文、梵文、回鹘文、突厥文等文字的文献，其史料价值并不逊于汉文文献，就西域、中亚史研究而言，其重要性甚至超过汉文文献。而法国在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等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很有加以介绍的必要。

伯希和劫卷中有大批的藏文卷子，原来估计有2000号，故伯希和把前两千个号空出来以备编藏文目录。现在看来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因为在拉露小姐极不完整的目录中就已经编到2216号，目前仍在其他文种的写本中不断“发现”新的藏文卷子。据《敦煌藏文文书选》导言说，巴黎藏敦煌藏文写本有2500余卷，其中254卷是用两种或三种语言写成的。

在敦煌藏文写本研究方面，法国早期的代表人物是巴科。他曾受伯希和委托编写过敦煌写本目录，并与杜散、托玛斯通力合作，经过15年之久，于1940年在巴黎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②一书，首次发表了一批敦煌藏文历史文书。巴科还于1956年发表了《八世纪五位回鹘使节对高地亚洲北部的考察》一文，公布了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第1283号，即《北方若干国君之王统叙记文书》。他的这篇论文引起了很大震动，各国学者纷纷发表文

---

①详见耿升《1979年巴黎国际敦煌学术讨论会概况》，载《敦煌研究》试刊第二期

②汉译本由王尧、陈践译注，民族出版社1980年出版

章，对这卷藏文卷子中出现的一些北方民族的名称进行了考证和注释。

在敦煌藏文写本中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则是拉露小姐。她的主要功绩是编写出版了三卷《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目录》，第1卷（1—849号）出版于1939年；第2卷（850—1282号）出版于1950年；第3卷（1283—2216号）出版于1961年。该目录对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有全面的反映，如藏文佛经方面，对每一经文的外观，象纸张大小、颜色、新旧、抄写者的字体是楷书还是草书、墨汁颜色、有无红色字夹杂在字行中间，以及纸张的厚薄与软硬等，都有详细的记述。编者还特别注意了经文的主要内容，如“缘起”、“唯识”、“空性”、“到彼岸”、“禅定”、“十力”、“行为”等佛学中的关键词。此外，对于经文有无修改处，拼音有何特点，标点符号是否与后世通用者相符合等，目录也有一定的反映。现在看来，该目录还有不少错误和遗漏之处，但目前仍是研究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必不可缺的工具书。

法国当代研究敦煌藏文写本的代表人物是法兰西学院名誉教授石泰安。他于1946—1947年曾被法兰西远东学院派往中国考察，后又在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工作。1954和1966年曾两次对喜马拉雅山麓进行考察。其关于敦煌藏文写本的名著是《西藏的文明》和《汉藏走廊古部族》，另外还有一些论文，如《有关吐蕃苯教殡葬仪轨的一卷古文书》、《神圣赞普名号考》、《敦煌藏文写本综述》、《敦煌藏文写本中的某些新发现》等。

石泰安近年的敦煌藏文写本研究成果，主要反映于1983—1986年在《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中发表的系列文章《古代吐蕃文献汇编》第1—4集。公布并研究了一大批敦煌藏文写本，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

由布隆多夫人领导的法兰西学院西藏学研究中心与国立科学研究中心配合，正陆续影印发表一批重要的敦煌藏文写本，作为《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研究丛书》陆续出版。在石泰安教授指导、今枝由郎协助下，麦克唐纳夫人和布隆多夫人已选编影印出版了两卷《敦煌藏文文书选》，若按其全名，应作：《国立图书馆所藏藏文文献选，并以印度事务部和大英博物馆所藏文献补充者》。第1卷出版于1978年，共58个编号，304页；第2卷出版于1980年，共111个编号，335页。据编者宣布，今后还将继续编选出版，一共计划出五大卷。该书的出版，是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得到了敦煌学界、藏学界的高度赞扬。石泰安教授在序言中说："长期以来，只有那些能接触到巴黎和伦敦所藏写本的学者们才能得以对此进行长期和详细的研究。所以，大部分文献都是由巴科、托玛斯和拉露等人翻译和发表的。但不少译文都未附原写本的影印件。因此，除了专程去亲自查阅之外，无法考察其解读是否正确。"为了使敦煌藏文写本的"研究工作能取得迅速进展，为了避免由于年代久远或反复使用而使写本遭到可能的损坏，当务之急就是出版和发行这批资料。"编选目的"首先是为了使这些写本容易被人所接受，以便发现和澄清西藏文明中的那些不为人所知或很少为人所知的方面。所以，我们优先选择了非佛教文书，同时也选择了一些对佛教具有特殊意义的文书。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只好将其中那些已经发表过影印件的文书删去①。"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的王尧、陈践先生已从此两册中选编译注了部分文书，编为《敦煌吐蕃文献选》一书，于1983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1971年，为了纪念拉露小姐80寿诞，在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资助下，出版了一本《西藏学论文集》（即《拉露纪念文

①见《敦煌吐蕃文献选》附录

集》），麦克唐纳夫人在集中发表了30万字的长文《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1286、1287、1038和1047号考释，兼论松赞干布王家宗教中政治神话的形成》（一般又通称为《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该文在巴科等人《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论述了松赞干布之前的吐蕃史，并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布隆多夫人撰文称此著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划时代的作用。法国近年来对敦煌藏文写本的研究，大都是围绕此著所提出的一些问题而展开的。

在回鹘文研究方面，首推国立科学研究中心的哈密顿。他继承了沙畹等人的传统，成了当代世界著名的回鹘突厥史专家。1955年出版的《五代回鹘史料》①一书，使用了许多敦煌汉文写本，此书成了沙畹《西突厥史料》的姊妹篇。1971年出版的《敦煌本回鹘文善恶两王子故事译注》，是他研究敦煌回鹘文书的主要著作。1979年在巴黎国际敦煌学讨论会上作了《敦煌石窟中的古突厥文写本》的发言，总结了法国研究突厥回鹘文写本的状况。尤其是1986年出版的二卷本巨著《9—10世纪敦煌回鹘文写本汇编》，刊布了已发现的敦煌回鹘文写本，是近几年有关此方面研究的最大成绩。

在于阗文研究方面，早在三十年代，伯希和就有所探讨，所著《于阗塞语中的几个西域地名》一文，讨论了于阗文《沙州纪行》的若干地名。这件于阗文文书就是著名的“钢和泰藏卷”，可能出自敦煌，因收藏者钢和泰而得名。二十年代钢和泰在北京大学讲授梵文（后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故得收藏之便。从五十年代末开始，哈密顿便着手研究敦煌于阗文文献，发表了《关于钢和泰藏卷的研究》、《十世纪于阗突厥语中的不稳定鼻音》、《十世纪的仲云族》、《851—1001年的于阗王》、《论

①汉译本由耿升、穆根来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九至十世纪于阗年代学》等文，几乎涉及到了所有重要的于阗文历史文书。

在粟特文文献研究方面，伯希和很早就有所注意，并与高梯奥合作研究，发表了《粟特文汉文双语文书》、《粟特文佛说善恶因缘经》等。1931年，伯希和研究了著名的《粟特古书简》，首次指出第二封粟特文书信涉及洛阳被焚事件，并认为年代属于公元二世纪中叶。

法国所藏敦煌粟特文文献的主要研究者为高梯奥和本维尼斯特。他们都发表了许多有关敦煌粟特文文献的研究著作。戴密微早年也曾对此有所研究。八十年代初，哈密顿还从敦煌藏文文献P·1689和P·1859A中发现了用粟特文拼写的汉语数词一至十。

七、敦煌学研究在日本

八十多年来，日本一直比较重视敦煌学的研究，并在许多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现将其主要的研究方面和成果，简要地介绍给读者。

1、二次大战前的研究概况

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始于1909年。当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时，日本书商田中庆太郎拜见了他并观赏了敦煌写本，随后便以《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为题，在北京日侨杂志《燕尘》第11期（1909年11月1日出版）上介绍了伯希和的收获。同时将这一消息传回日本，11月12日，大阪、东京两地《朝日新闻》上同时刊出题为《敦煌石室发见物》的文章，报道了这一消息。这是日本对敦煌文献的最早报道，被日本学术界称为日本敦煌学研究的“第一篇历史性文献”。

当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虎次郎）得知这一消息

后，立即致函罗振玉加以证实，并进一步了解详细情况。不久，罗振玉给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两人寄去了一大批从伯希和处得到的敦煌写本照片，还有罗振玉于1909年8—9月发表的两篇文章——《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这些情况立即引起了日本东方学界的极大关注。从此，日本学术界特别是以京都地区为中心，开始了敦煌学的研究工作。1909年11月28—29日，京都大学史学会在冈崎图书馆召开了第二届总会，会上展出了内藤和狩野从北京获得的敦煌遗书、雕刻和绘画等照片。内藤湖南等人，还分别发表演讲，介绍对写本照片的研究情况。其中小川琢治以“中亚探险与伯希和敦煌之行”为题，介绍了敦煌地理；狩野直喜介绍了《老子化胡经》；桑原骘藏讲《景教三威蒙度赞》；羽田亨就《摩尼经》残卷作了解说；内藤湖南讲解了《西州志》残卷。这次会议的召开，推动了日本的敦煌学研究。1910年，任职北京大学的藤田丰八，在北京发表了《慧超传笺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日本的第一部整理敦煌文献的专著。与此同时，日本大谷探险队获取的文物也陆续运到日本京都，从而更加促使了日本，尤其是京都“敦煌热”的上升。

1910年，敦煌劫余残卷运抵北京，内藤湖南得知消息后，随即提出了访书北京的计划。1911年8月，京都帝国大学派出了内藤、狩野、小川三位教授和富冈谦藏、滨田青陵两位讲师组成的访华团来到北京。五人在北京逗留近二个月，11月2日返国。次年2月11—12日，京都大学特地举行盛大报告会，请五位先生作访书讲演报告，同时还展出了五人在京访书时拍下的写本和文物照片。事后，由内藤湖南执笔，写出了《清国派遣教授学术视察报告展览号》，刊载于1911年12月5日的《朝日新闻》上，对此行及调查结果作了详细解说。

北京访书归来后，内藤湖南等人认识到，要想扩展日本的敦

煌学研究，必须对收藏于欧洲诸国的敦煌、新疆收集品作进一步的调查了解。1912年，京大派狩野到巴黎和伦敦调查伯希和、斯坦因劫去的敦煌写本，他抄回了许多珍贵资料；同时，东大也派泷精一到欧洲调查绘画资料；1924年，内藤湖南率弟子石滨纯太郎前往巴黎、柏林等地调查伯希和收集品；矢吹庆辉也曾两次前往伦敦，拍摄了许多斯坦因劫去的古写经；1931年，那波利贞前往法、德两国留学，调查欧洲之敦煌写本。他在欧洲二年，以巴黎为主并先后去过柏林和伦敦，调查敦煌写本收藏及著录研究情况，抄写了大量有史料价值的文书，这对以后日本学术界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敦煌学研究者就是用这种“搜宝式”的方法搜集了许多敦煌资料，为此后的敦煌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从1912年到1933年，日本学者大规模的欧洲访书活动，把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引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从敦煌学的兴起到二战结束前，是他们搜集资料和探索的初创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成果是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刊布，并在一些研究领域取得了初步成果。如在佛教文献方面，矢吹庆辉先后出版了《三阶教之研究》、《鸣沙余韵》及《解说》，整理研究了大批斯坦因劫去的佛典写本，尤其是在藏外佚经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新资料。铃木大拙、宇井伯寿等人，则利用敦煌新发现的禅宗典籍，如《六祖坛经》、《神会和尚语录》、《楞伽师资记》等，开始对禅宗深入研究；在中国古籍方面，小岛祐马将其收集的子部书，汇集为《沙洲诸子二十六种》（1928）。神田喜一郎编辑了《敦煌秘籍留真》（1938）和《敦煌秘籍留真新编》（1947），刊布了大批古籍写本的珍贵照片；在历史方面，羽田亨与伯希和合编了《敦煌遗书》活字本和影印本各一集，虽然收录的文书不多，但都是与历史文化有关的重要资料，羽田亨的简要解题，涉及到了不少新问题。那波利贞发表了一系列唐代社会和敦煌寺院经济的文章，其中重要的几篇，如《梁户考》、《唐

代社邑研究》、《中晚唐时代敦煌地方佛教寺院碾硙经营》、《从敦煌发现文书看中晚唐时代佛教寺院之钱谷布帛类贷借营利事业之经营实况》等文，收入了1974年出版的《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仁井田升对敦煌法制文书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1934年以《唐令拾遗》一书获日本学士院恩赐奖，1937年出版《唐宋法律文书研究》，1942年出版《中国身份法史》，为日本中国法制史和敦煌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绘画方面，松本荣一对大量的莫高窟壁画和藏经洞出土的绢纸绘画进行了分类研究，出版了巨著《敦煌画之研究·图像篇》及《附图篇》，为敦煌绘画艺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2、二战后至七十年代的研究概况

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段时间处于低潮，没有特别重要的论著发表，只是时有零散的文章问世。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才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其主要原因是：第一，在龙谷大学图书馆，找到了长期以来不知去向的大谷探险队所获敦煌吐鲁番文书；第二，经山本达郎和榎一雄的努力，英国博物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收藏的斯坦因所获汉、藏文写本的缩微胶卷运到日本，入藏东洋文库、京都大学等处。不久，又通过交换关系，获得了北京图书馆所藏的缩微胶卷；第三，我们的文化宝库敦煌千佛洞对外开放，各国的敦煌学者能够亲临其境进行考察，如画家福田丰四郎就是大谷探险队以后五十年第一个亲访敦煌的日本人；第四，中国王重民等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和苏联孟列夫主编《亚洲民族研究所收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的出版，为敦煌学研究者提供了美不胜收的新材料。于是，在1953年1月，由石滨纯太郎、羽田亨等人发起，在龙谷大学成立了以石滨为首的“西域文化研究会”，汇集了一大批各个领域的专家，对新找到的大谷文书和各类敦煌文献，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1958—1962年间出版了《西域文化研究》（六卷七册），这一成果被誉为是包括敦煌学在内的日本中亚研究的金字塔。与此同时，由文部省资助，铃木俊主持，在东京由东洋文库组织了“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以新获得的斯坦因文书胶片为主，并网罗其他各种收集品，着手编纂《（斯坦因敦煌文献及研究文献中业经引用介绍的）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陆续完成了菊池英夫、池田温合编的第一卷《非佛教文献之部·古文书类》之《公文书》（1964），土肥义和编的第二卷《非佛教文献之部·古文书类》之《寺院文书》（1967），吉冈义丰编的第三卷《道教之部》（1969）和金冈照光编的第四卷《敦煌出土文学文献分类目录及解说》（1971）。这些目录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这一阶段日本敦煌学研究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即不仅研究敦煌遗书，而且还研究敦煌石窟艺术。1956年，长广敏雄发表了《最近敦煌石窟的研究》，冈崎敬则在五十年代亲访敦煌千佛洞后，便以其考察见闻为基础写成《大谷探险队和敦煌千佛洞》一文，还有他的《中国考古之旅》和北川桃雄的《敦煌纪行》等，都从不同侧面对敦煌石窟艺术进行了探索。1958年，当我国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访日时，日本的《佛教艺术》发行了《敦煌佛教美术特集》，刊载了藤枝晃、日比野丈夫、水野清一、桶口隆康和冈崎敬等人的文章，其中水野清一的《敦煌石窟艺术》，是一篇优秀的研究著作。此外，日本的敦煌学研究者还对千佛洞石窟进行了编年研究，如福田敏男的《试论敦煌石窟的编年》、水野清一的《敦煌石窟笔记》等。

战后日本的敦煌学研究以文书为主，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研究队伍，涌现出了一批专家，如五十年代有仁井田升、山本达郎和冢本善隆等人；六十年代有藤枝晃、西村元佑、竺沙雅章和上山大俊等人。这一阶段，冢本善隆对敦煌佛教史的概说，牧田谛亮

对中国伪经的研究，柳田圣山对禅宗典籍的深入分析等等，在佛教领域内继续发扬了日本学者的特长。在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北朝隋唐史方面，池田温开创的《中国法制史研究》最为著名，该书出版于1959—1964年间，是他研究大量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结果，被称为"建筑在古文书研究上的顶峰"。除此之外，有关田制和赋役制的研究成果也比较突出，如山本达郎对S.613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的复原和分析，填补了北朝均田赋税制的某些空白。又如铃木俊、山本达郎、西村元佑、西嶋定生、日野开三郎、堀敏一、池田温等人对唐代均田制的施行，以及租田、户税、差科等问题的研究，大大丰富了唐代经济史的内容。其成果除散见于各种杂志外，还集中收入西嶋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1966）、西村元佑《中国经济史研究——均田制度篇》（1968）、日野开三郎《唐代租庸调研究》三卷(1974—1977)、堀敏一《均田制研究》（1975）、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1979）等著作中。此外，菊池英夫从零散的唐代军事文书中，找出了从行军制到镇军制的兵制转变过程；在西北史地方面，尤其是瓜沙归义军史的研究中，藤枝晃继早年发表的《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1941—1943）之后，又在京都《东方学报》上陆续刊出《敦煌的僧尼籍》（1959）、《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1961）、《敦煌千佛洞的中兴》（1964）、《敦煌历日谱》（1973）等长篇论文，基本理清了吐蕃及归义军时期敦煌历史的脉络。其中《敦煌的僧尼籍》一文，根据敦煌文书提出，敦煌曾是一个特殊的佛教都市，这种把佛教史同社会经济史结合起来研究，是当时世界上敦煌学研究的一个新倾向。另外，上山大俊通过对吐蕃统治前后佛教高僧昙旷和法成的详细研究，大大丰富了敦煌佛教史的内容。而竺沙雅章对敦煌的僧官制、寺户制和结社活动的探讨，展示了中晚唐以降敦煌佛教社会的真相，其成果已收入作者的《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1982）；在文学方面，也

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绩，如入矢义高对王梵志诗、敦煌变文俗语词及敦煌曲子词等，都有比较精辟的研究。金冈照光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敦煌变文的文章，川口久雄则独辟蹊径，把敦煌文学与日本文学加以比较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3、最近十多年的研究情况

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随着巴黎收藏的伯希和写本缩微胶片的公开出售，再加上世界各国敦煌写本或绘画藏品的陆续出版，日本的敦煌学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即朝着专一化研究和集体综合研究两方面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北京、伦敦、巴黎藏卷及其他一些藏卷的全部公开，使得力图在某一种文献上集大成的著作得以产生。如1978和1979年出版的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编》和《图录编》，就是敦煌道教文献的集成著作。1979年出版的兜木正亨编《敦煌法华经目录》，则是专门整理《妙法莲花经》的结果。1987年出版的福井文雅《般若心经的历史的研究》一书，对已知各地收藏敦煌写本中的《般若心经》及各种注疏做了详细的调查、分类、注记，并对该经的名称和各种写本内容的异同，以及《般若心经》在中日历史上的变迁过程，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在专精的研究方面，正在陆续出版的《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文书》丛刊可视为典范。该丛刊经国际哲学和人文科学委员会推荐，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由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编辑 出 版。第一卷 为《法制文书》，由山本达郎、池田温、冈野诚合编，已于1978—1980年出版，收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唐代律、令、格、式、判的残卷；第二卷为《籍帐》，由山本达郎和土肥义和合编，出版于1984—1985年。这是在池田温《中国古代籍 帐 研 究》的 基础上，经补充修订而成的籍帐、户口田地簿及差科簿文书写本的集大成者；第三卷为《券契》，由山本达郎和池田温合编，已于

最近出版；正在编辑印刷中的第四卷准备刊布社文书。收入该丛刊的每一件文书，都有精心的录文和清晰的照片，并有详细的英文解说。每一卷前，有对这一类文书的综合性和总结性研究论著，卷后还附有详尽的参考书目。由于敦煌吐鲁番文献的继续发现及各收藏单位的陆续公布，该丛刊还不能说是对某一类文书的最终结集，但至少可以说是对前人的整理研究作了一次很好的总结。

在综合研究方面，成果更多。如上山大俊、山口瑞凤、木村隆德、冲本克己、原田觉等人，对中原汉地禅宗传入吐蕃的历史，利用汉、藏文写卷内容，得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与好评。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青年敦煌学者协会”的成立。1983年4月，日本关西地区（京都、大阪）的五位对敦煌学感兴趣的青年学者，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学术团体，即“青年敦煌学者协会”。他们五位是：

森安孝夫，东京大学毕业，曾留学法国，现任大阪大学副教授，专攻伊斯兰化以前的中亚史，特别是回鹘史；

熊本裕，东京大学毕业，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大阪四天王寺国际佛教大学副教授，将转东京大学任教，专攻古代及中世伊朗语，特别是于阗语；

高田时雄，京都大学毕业，留学法国国立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现任京都大学副教授，专攻汉语音韵史，特别用力于敦煌汉文文献的语言学研究；

武内绍人，京都大学毕业，留学美国印地安纳大学，现任京都教育大学副教授，专攻藏语，特别致力于古藏文文献的语文学研究；

古田丰，京都大学毕业，留学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现任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专攻伊斯兰化以前的伊朗语，尤其是粟特语。

他们虽然专攻方向不同，但在利用敦煌文献上却是一致的。再加上他们在英、法、美的留学研修，已分别在回鹘、于闐、汉、藏和粟特文领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们约定每月聚会一次，共同探讨上述各种语言所写文书的格式和一些双语文书、碑铭等问题，并打算合作刊布汉、藏、粟特、蒙文本《善恶因果经》。这种集体的综合研究，代表了敦煌学的发展方向。

从1980年开始编纂，由日本大东出版社出版的《讲座敦煌》，是一套使“全世界东洋学界瞠目”的13卷本巨著。从已出版各卷及发表的书目可知，日本几乎动员了全国的敦煌学家。邓建吾、吴其昱、左景权、陈祚龙也应邀参加撰写个别篇章。全套《讲座敦煌》由冢本善隆、榎一雄、入矢义高、秋山光和监修，金冈照光、池田温、福井文雅任编辑委员。各分卷还设有主编，其中第一卷《敦煌的自然与现状》、第二卷《敦煌的历史》由榎一雄主编；第三卷《敦煌的社会》、第五卷《敦煌汉文文献》由池田温主编；第四卷《敦煌的美术》由秋山光和主编；第六卷《敦煌古民族语言文献》由山口瑞凤主编；第七卷《敦煌佛典与中国佛教》由牧田谛亮主编；第八卷《敦煌佛典与禅》由筱原寿雄和田中良昭主编；第九卷《敦煌佛教与中国文化》由福井文雅主编；第十卷《敦煌与中国道教》由吉冈义丰主编；第十一卷《敦煌的文学与语言》、第十三卷《敦煌手册》由金冈照光主编；第十二卷《敦煌学的现状与展望》由金冈照光、池田温和福井文雅主编。目前已出版了第一、二、三、四、六、七、八共七卷，其他各卷将陆续出版。

《讲座敦煌》的每一卷由相互关联的一系列个别题目构成，分别由研究这个题目的专家执笔写作。如第二卷《敦煌的历史》共分11章：（1）汉魏时代的敦煌，由榎一雄执笔；（2）从五胡十六国到南北朝时代，由佐藤智水执笔；（3）隋唐时期的河西与敦煌，由菊池英夫执笔；（4）吐蕃时期的敦煌，由山口瑞

凤执笔；（５）归义军时期的敦煌，由土肥义和执笔；（６）回鹘与敦煌，由森安孝夫执笔；（７）西夏统治时期，由中岛敏执笔；（８）元代敦煌，由大岛立子执笔；（９）明清时期的敦煌，由松村润执笔；（10、11）从考古学上看敦煌（上、下），由冈崎敬和大岛立子执笔。因为由众人执笔写成，有些篇章不免流于泛论，但大多数是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好文章，既能增加人们关于敦煌学各方面的知识，又标志着某些方面的研究水平，还给研究者提供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信息。

本节主要参考资料：

荣昱先生《日本敦煌学研究简介》，载《文史知识》1988年８期

那向芹先生《日本的敦煌学研究概况》，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９期

八、其它国家的敦煌学研究

国外的敦煌学研究，以法国和日本最为活跃。此外，其他国家也有可称道之处，现择要介绍如下。

苏联：苏联藏有较多的敦煌遗书，也有部分文物，但其研究论著不多。五十年代以前，苏联发表的敦煌学论著多属概述性质，如贾科诺娃的《敦煌的佛教古迹》、《敦煌所出中国绢织物》等。

苏联有计划地开展敦煌学研究，是从奥尔别里和克洛科夫1957年倡议建立敦煌研究组开始的。在苏联创建敦煌研究组的过程中，我国学者郑振铎、梁希彦、鲍正鹄等曾给予协助。这个设在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的敦煌研究组，最初的成员主要有孟列夫、斯比林和施科里亚尔，后来人员逐渐增多，又加入了丘古也夫斯基、维诺格拉多娃、巴甫洛夫斯卡娅等人。他们的主要工作

就是从事敦煌文献编目，于1963和1967年出版了两卷《亚洲民族研究所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

1963年敦煌研究组改称敦煌写本研究组，由孟列夫主持，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中国研究室领导。目前苏联研究敦煌学的主要有二人，即孟列夫和丘古也夫斯基。

孟列夫是苏联科学院东方写本部（后改为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1953年研究生。他除了主编两卷《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外，还有《维摩诘变文十吉祥变文》、《报恩经变文》、《敦煌所出汉文写本——佛教俗文学》等。

丘古也夫斯基于1957年加入远东研究室，后又转入敦煌写本研究组，专门致力于敦煌世俗文书的研究。主要论著有《敦煌所出借贷文书》、《有关敦煌粟特人聚落的新史料》、《敦煌寺院经济文书》、《有关敦煌寺院经济中的直接生产者特征的资料》、《敦煌寺院社邑》、《敦煌寺院的农奴》、《敦煌所出汉文法律文书》、《八——十世纪的敦煌》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敦煌汉文文书》的编辑出版。

丘古也夫斯基在多年研究敦煌世俗文书的基础上，编著了《敦煌汉文文书》。其第一册经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批准，编入《东方文献》丛书，已于1983年由苏联《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包括图录、录文、译文、研究和附录等部分。共560页，其中图版101页。

《敦煌汉文文书》第一册共收文书73件，其中籍帐文书21件，赋役与租佃关系文书15件，寺院文书18件，贷粮文书19件。据本书报道，通过对列宁格勒所藏敦煌遗书的整理，在大约12000卷文书中，找出了属于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非佛教文书约400件。他们计划将这部分文书分为三至四册出版。孟列夫在本书《编者的话》中透露说：第二册拟收录有关居民生活、农村组织和经济关系方面的文书；第三册包括官府命令、书信等；最后将单独以

一册收录敦煌史文书，其下限直到大约1036年石室封闭时为止。

从本书的整理水平看，已比两册《目录》有了明显的进步。其所刊布的文献及研究，很值得我们重视与进一步探讨。

美国：据目前已知情况，美国藏有部分敦煌文书和文物。除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院图书馆藏有敦煌写本外，还有两家图书馆藏有少量的敦煌写本：一为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的中韩文组，藏有8卷敦煌残卷；另一为伊利诺州1936年成立的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收藏数量不清。此外，据传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也有少量收藏。

美国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不多，现在主要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梅维恒教授。他长期致力于敦煌变文研究，于1976年完成了《伍子胥变文》、《降魔变文》、《目连变文》、《张议潮变文》的译注，作为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发表。1983年又加以修订，以《敦煌俗文学》为书名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他还曾到伦敦、巴黎、列宁格勒、北京等地阅读过敦煌卷子。于1988年出版了《唐代变文：佛教对产生中国通俗小说和戏剧的贡献》和《绘画、戏剧——中国绘画故事及其印度渊源》两本专著。

英国：英国虽然收藏的敦煌文献文物比较多，但研究工作却一般。1953年，伦敦出版了法国学者马伯乐编注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察所获汉文文书》，1957年出版了翟理斯的《不列颠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解题目录》，1960年出版了魏礼的《敦煌的歌谣与说讲》。翟理斯、魏礼之后，英国研究敦煌汉籍的代表人物是特维切特，他曾于1962年出版过《唐朝财政管理》，并发表过《敦煌发现唐水部式残卷》、《敦煌唐格残卷札记》等。

斯坦因所劫文物部分，保存在英国博物馆，由韦陀负责照管。韦陀是搞美术史的，他与日本的讲谈社合作，把佛像等艺术品刊出了一部三卷的著作，即《西域美术》。

南朝鲜：南朝鲜的敦煌学研究起步较晚。1986年，南朝鲜学

者李秀雄参加了在台湾召开的“敦煌学国际研讨会”后，就开始筹组南朝鲜敦煌学会。1987年该会正式成立，由檀国大学教授车柱环任会长，李秀雄任秘书长，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所长金荣华任顾问。该会已拟定了中国文学与南朝鲜古音文学、历史学、佛教学、美术学、服饰学五个研究项目，并定期召开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进行编辑丛书、杂志等，已翻译出版了张锡厚的《敦煌文学》一书。该会还将于1991年在汉城举行敦煌学国际研讨会。

此外，德国、印度、丹麦、挪威、瑞典、加拿大、匈牙利、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也都程度不同地对敦煌学有所研究。如印度尼赫鲁大学谭中教授长期致力于敦煌文化的研究，已发表了一批论著；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藏有14轴共16件敦煌遗书，已由彼得森撰写了目录；匈牙利藏学家吴锐专门研究敦煌藏文文书，目前正在编辑《藏语历史文献集成》；捷克驻日大使哈尼捷卡夫妇，曾在1963年发表过《有关敦煌变文的若干问题》一文。

后　记

《敦煌学述论》即将发排付梓了。在当今图书发行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甘肃教育出版社能够赔钱出版本书，我的内心是特别激动的。尤其是对我这样一个既无权、又无钱的无名小卒来说，对甘肃教育出版社总编辑徐明珏先生、副总编辑张祚羌先生积极促使、支持本书的出版，我表示由衷的感谢，也从内心深表敬意。

本书的酝酿，已好几年了。由于我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敦煌学的研究，也时时注意有关动态和研究状况。深感敦煌学研究中，既缺乏高质量的、全面系统的《敦煌学概论》，也没有为一般群众了解敦煌学的普及读物。因此，早就想写普及敦煌学的小册子——《敦煌学讲话》或《敦煌学基础知识问答》，并于1987年向张祚羌和徐明珏先生谈了这个打算，他们表示支持。这个计划也得到了社会有关人士的赞许，《兰州晚报》为此于1988年8月开设了“通俗敦煌学”专栏。但由于我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再加上与金宝祥教授等合著《隋史新探》，这个计划便暂时搁置了下来。1989年初，《隋史新探》与《甘肃古代史》交付出版社后，又开始了《敦煌学讲话》的撰写。1989年底，我正式向张祚羌、徐明珏先生提出了这个计划，他们表示尽力支持，并认为目前国内还没有一本全面系统的敦煌学专著，因此建议我写一本比较全面、系统，能够反映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与动态的《敦煌学》。其后，经过两年的积极撰写，三易其稿，完成了目前的这本《敦煌学述论》。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但又是科学家辛勤劳动的结晶。学术是不断继往开来，向前发展的。后人总是站在前人的肩上向上攀登的，对于新兴的敦煌学来说更是如此。本书取名为《敦煌学述论》，就包含着这层意思，也就是说，本书既有自己的一点研究心得，也吸收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将其提炼、综合后，加以通俗地叙述。当然，对于采用别人的研究成果，绝不敢掠人之美，而是尽量采用各种方式加以注释说明。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显学，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对敦煌学研究有所裨益，尤其对初学者来说，如果能起到一点入门作用，那就是笔者的最大欣慰。也希望学术界尽快推出高质量的《敦煌学概论》，那就达到了抛出这块引玉之砖的目的。当然，我仍要一如既往，加倍努力，如有机会修订再版，将使之更臻完善。

本书的撰写，得到了许多师长与学兄的支持与帮助。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郭厚安先生与责任编辑张祚羌先生细心审阅了书稿，并进行了认真的修改，使本书避免了许多错误。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颜廷亮先生及我的学兄魏明孔、李并成、王锷、张先堂、王永曾、伏俊连也看了部分书稿，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在此谨致最衷心的感谢。

最后还需说明，本书的撰写出版，得到了西北师范大学科研处与敦煌学研究所的殷切关怀与帮助，尤其是科研处领导对这一课题十分重视、关心，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从而使本书最终得以完稿出版，在此谨致谢忱。

刘进宝

1991年4月18日夜

（甘）新登字第04号

敦煌学述论

刘进宝　著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平凉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75 字数 280,000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50

ISBN 7-5423-0247-7/K·20　定价：5.30元

责任编辑：张祚羌

封面设计：王占国

书　　题：董戈翔

ISBN 7-5423-0247-7

K·20　　定价：5.30元

教育學概論